

解体党文化

(上 篇)

大 纪 元

二零零六年十一月

我们常说中华民族是勤劳勇敢智慧的民族,创造了辉煌的历史文明。在现在所谓的“人口多,底子薄”的国情之下,更需要全民族的智慧和胆识,共襄国是。可是人民的智慧却被党文化所控制,把思考权推给了共产党,在重大国策面前只想党之所想,只做党之所做,智慧被共产党所限制。

共产党把秉承神传文化的炎黄子孙变成了不信神的民族,把敬畏天地神明的善良百姓教唆成天不怕地不怕的狂徒,道德败坏,什么坏事都敢做,满嘴谎言,行为低下,这样的民族如何在世界之林“崛起”?

党文化带给我们民族的灾难是深重的。共产党关心的是自己的个人和集团利益,为自己的恶行制造各种似是而非的借口,作为一种罪犯心理,这种情况有其必然性。但是不管它们自己怎么想,人民大众除了关心今天的生活,也同样关心国家和民族的长治久安。如果接受共产党以维护它们自己利益为根本目的的思维和逻辑而置民族的未来而不顾,那就非明智之举了。

“给中共时间”,是人们回避中共问题的常用借口。听起来好像人们有很多种选择,这次先给中共多一点时间试试看。其实,人民根本就没有选择的机会,这么说是给自己找个心理平衡。时间本身不可能改变中国,只有在这段时间内人民的努力才能真正改变中国。解体中共,解体党文化,根除阻碍中国自由发展的根本因素,让人民回归到正常的思维,民族才有重振的希望。

(上篇完)

目 录

【解体党文化】绪论..... 3

第一章 系统的替代传统文化..... 4

1、宣传无神论..... 5

2、宣传唯物论..... 7

3、否定传统文化..... 9

4、宣传马恩列毛的伟大..... 11

第二章 系统的思想改造..... 13

1、批判儒释道..... 14

2、批判传统观念..... 22

3、灌输斗争思想、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邪说..... 26

4、灌输进化论与现代科学..... 32

第三章 灌输手段..... 43

1、紧抓宣传机器推行党文化..... 44

2、强制人民读马恩列斯毛的书..... 53

3、利用邪党的文人歌功恶党..... 55

4、利用教科书灌输党文化..... 61

5、利用多种文艺形式灌输党文化..... 66

结语..... 73

第四章 被改造思想后人们的表现..... 75

1、用恶党的思想思考问题,用恶党教会的话语说话..... 76

2、不信神,造成人做事不计后果,什么坏事都敢做..... 86

3、天不怕地不怕,张嘴就是谎言,满嘴脏话,行为低下..... 91

4、去掉党文化,人们已经不会讲正常人的话,不会用正常人的思维..... 95

结 语..... 102

【解体党文化】绪论

在地球的东方,生活着我们中国人,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风俗各异,方言口音千差万别,是什么纽带把我们维系在一起,使中国人成为中国人呢?显然不仅仅是地域,更重要的是文化和传统。数千年里,中国人同敬天地,祭奠共同的祖先,使用同样的文字,学习一样的典籍……在西方人的眼里,那里曾经是礼仪之邦。

然而,还是在那块土地上,今天的中国人却和历史上任何时期都不同。从小学到大学,我们使用简化字编成的教科书,我们的必修课是两个德国人在一百多年前创立的如何摧毁世界的理论和一个俄国人应用这个理论的暴力实践,我们曾经被告知一切和历史传统有关的物品都叫做“四旧”而应该被烧毁或者砸烂,我们今天的语言、风俗、习惯、思维方式早已和自己的历史格格不入,和传统文化格格不入,和世界格格不入,我们不知道自己来自哪里要去往何方,我们成了一个失去了自我的民族。尽管我们的血脉仍在延续,但是华夏文明的薪火承传却已被截断。从文化上看,中国人已经是亡国奴,这并非危言耸听。

纵观欧洲、亚洲各国,在其现代化进程中从来没有如此彻底地丧失民族性。如果去除了高科技工业化因素,在日本人身上仍可以看到传统日本人的影子。就是按中国人观点看没有历史的美国人,和两百年前独立战争时也还有很多相似之处。中国人的变化不是工业化、现代化过程中不可避免的自然过程,而是强制性的人为的过程和结果。这个变化开始于1949年,一直持续至今。老一代被强制性的放弃传统,新一代则完全浸泡在这种无所不在的环境中成长,以为中国人、中国文化就是这样的。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大陆创造出来的文化怪胎——党文化。

文化一词本身,很难进行精确定义。现代的“文化”词义,大约在十九世纪之后才逐渐定型。1952年,美国的克罗伯和克拉克洪在《文化:概念和定义的批评考察》一书中给文化下了一个综合定义:“文化由外显的和内隐的思维和行为模式构成;这种行为模式通过象征符号而获致和传递;文化代表了人类群体的显著成就,包括他们在人造器物中的体现;文化的核心部分是传统的(即历史的获得和选择的)观念,尤其是他们所带来的价值;文化体系一方面可以看作活动的产物,另一方面则是进一步活动的决定因素。”这个定义,被大部分后来的学者所接受。

在这个定义中,文化包括了两个部分,一是内在的价值观,二是外显的和内隐的行为和思维模式。所谓党文化,指的正是由共产党价值观为基础所支撑而成的思维方式、话语系统及行为模式。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党文化可包括三种类型:第一种为共产党强行建构和灌输的文化;第二种为民众为了在中共暴力和谎言下生活和自保而产生的变异文化;第三种为古已有之的糟粕,而被中共重新进行理论包装,并推广普及和充分实践的文化。

在其他文化系统中,终极价值观都来源于一个超越世俗的最高权力存在。在古代社会中,担任这个角色的是神,在现代社会,则由神和法律共同担任。和所有传统文化不同,共产党的价值观,是一种不断变动和调整的动态系统,其核心简单地说就是权力和利益。在党文化下,我们祖先留下的半神文化,似乎离我们已经无限遥远,人们不相信那些美好的事物曾经存在过;祖祖辈辈教给我们对天地神明的敬畏,今



中共的改革是跛足改革,但是,从党文化的框框中,就变得格外理解中共,“欣赏”中共。说是因为有意识形态的阻力,中共的改革是“光干不说”,有了效果再上升到理论,从经济改革会一直推演到政治改革。好像有一天中国人民都全民选举选出了总统,有了效果,中共才正式宣布要搞民主一样。其实,中共没有原则,只要有利它的统治,什么都可以做。但是,任何有实质意义的政治体制改革必然导致中共的垮台,所以,中共在经济领域是“光干不说”,大家都去捞钱享乐,而在政治领域,中共却是“光说不干”。如果在网上搜索“政治体制改革”,你会发现在中共的媒体上这是一个热闹非凡的词:“全面推进经济政治体制改革”,“设立政治体制改革特区”,“全面正确把握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和根本”,“政治体制改革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改革破冰启航”,“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环境治理与政治体制改革”,“以政治体制改革推进反腐败斗争”,“政治体制改革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唯一出路”……但是,人们的一切言论都是在党文化的框框中转悠,就好比一栋大楼要塌了,人们想的还是如何装潢房间的事。跳出党文化,就能看清中共改革的底线,中共的改革不过是为了维护其统治的改革。就知道它不愿也不敢退出历史舞台,指望中共从良,无异缘木求鱼。

有人说领导人的更替,新一代上来,总会自由了吧?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如果没有人民的努力,独裁国家不会有真正的民主自由。

大家都注意到一个现象,就是现在年轻一代升任到领导岗位之后,许多人比他们的上一代更大胆。这里的大胆不是民主大胆,而是抓权、抓钱和搞乌七八糟的事更大胆。他们就是在共产党的那个体制中吃透了共产党的那一套钻营上去的,是带着共产党的原罪上去的,他们是没有理想的,心思都在个人的、家族的、集团的利益上,指望他们把权力交给人民,是不可能的,就算有个别人要做,他们面对的却是共产党整个的一部暴力机器和一损俱毁的利益集团。

看到中共现在的领导权交接比较平稳,有人又想了,中共进步了。其实,过去因为党的地位很稳固,权力斗争就表现为个人与个人之间赤裸裸的争斗,他们没有“党要完蛋了”的后顾之忧。而现在,中共的“亡党危机”迫在眉睫,维护党的统治本身就成为中共的“共识”,党的集团利益是个人利益的最佳保护伞。所以,权力斗争就演变为要“维护大局”下的帮派与帮派的“团伙”斗争。表面上好像平静了,实际上,黑箱斗争更激烈了,既要维护党不垮台,又要争权夺利,矛盾更复杂,危机更深重。就像一条街上,过去是两个恶徒老在街上打架,现在是拉帮结伙,转入地下,变成了黑帮组织,这比过去更可怕。中共现在的所谓领导权交接的“制度化”,就是黑箱制度化,团伙化,完全黑社会化。

结 语

几十年来中共改造人们思想的努力一直没有变过。激烈的批斗大会、枯燥的政治学习、喜闻乐见的文艺节目,都是中共灌输党文化的有效工具。五千年的文化底蕴,终究敌不过共产党的这种封闭式的舆论宣传。人们的思想真的被改造了。



上的正义之士,看看在遇到中共迫害人民时,应该如何。就算胆小,不敢说“我要是高智晟律师,我也要如何帮助被中共迫害的人们维权”,也决不当非要把自己比作强奸犯、杀人犯或是独裁者啊,这不是个很可耻的比方么?

党文化对中国人思维的局限,也贯穿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以无神论为基础的党文化中,没有超阶级的普世价值,就如毛所说的,“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过去中共不承认自由、人权等普世价值的办法是给它们一概加上定语“资产阶级的”,所以是“虚伪的”,“无产阶级”不需要;今天则换上“中国的国情特殊”的借口加以拒绝。受党文化这种狭隘思维左右,特别是当整个社会都已陷入道德冷漠、出现诚信危机、当善恶有报被贬成“骗人的迷信”之时,很多人也不再相信良知、道义了。

中共通过长期赤裸裸的宣传或半遮半掩的暗示烘托其“中央领导人”的伟大,从昔日的宣传马恩列毛之“伟大”、歌功“红太阳”,到今日的吹捧“改革开放的设计师”、“继往开来的领路人”,造成很多中国人以宗教的虔诚信任“中央领导”。许多人都很清楚自己身边中共地方官员的腐化堕落,但这并不影响人们对“中央领导”的良好印象。尽管大家都知道今天中共的“中央领导”都是从地方官员一步步攀升上来的,但人们并不去琢磨为何贪腐的地方官员一旦进入“中央领导”阶层就会变得“英明”起来。所以坏事都是地方官员瞒着“中央”干的,重大问题只要“惊动了中央”,或“中央来人了”,就感到有希望解决了;面对中共几十年来造成关系国计民生的诸多社会问题,很多民众宁愿一厢情愿地相信“中央领导”总是有办法解决的,而不是如自由国家民众那样,对于国家和社会独立思考并提出自己的见解。中共镇压法轮功,很多人虽然不解中共为何对一个民间气功团体如此小题大做,但第一反应往往是,“中央这么做必定有它的道理”,用“党中央”的大脑代替自己思考,而不是理性地去思考“法轮功群众到底有没有违法”,“中共这么做到底合不合法”;中共的三峡工程上马后,有海外专家指出其可行性论证中有重大漏洞。有网友马上振振有词地质疑海外专家的水平,并说:“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真的从中央到地方不是傻瓜就是疯子,否则怎么会这样愚蠢的工程上马呢?”言外之意,“英明领袖”们不可能干傻事,不可能有私心,所以“愚民百姓”不必瞎操心。

正是因为人们跳不出党文化,才使得中共调动、控制人民的思想 and 行为变得易如反掌。中共就像快死的人一样,靠的就是不断的打强心针——面子工程,三峡大坝,神五神六,争办奥运等等。我们看到无数的国人跟着中共一起振奋,一起高呼。在这危机四伏的多事之秋,我们看不到人们的清醒和理性,看到的只是在盲目的喧闹中感受党文化酝酿出的扬眉吐气和得意忘形。中共大把烧钱搞面子工程,而不关心对老百姓生死攸关的事情,要的就是为摇摇欲坠的统治“涂脂抹粉”,欺骗人心。

大家都知道,教育和医疗的保障是一个国家生活水平的重要标志。教育是关系国计民生特别是民族未来的大事,不过,因为不是中共的利益所在,所以长期以来中共对教育的资本投入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例只有2%-4%不到,甚至低于世界上排名一百的非洲小国乌干达。中国的医疗制度更是造成老百姓看不起病。过去是广大的农民没有医疗保障,现在是许多城镇人口也有病看不起。为什么中国人的储蓄率居高不下,就是对未来没有安定感,有钱不敢花。西方媒体常问这样一个问题:中共一面为了当世界强国而到处招摇,另一方面对于真正让中国强大的基础问题却长期忽略。让他们感到困惑不解的是,中共领导到底想干什么呢?

天已经被战天斗地所取代;殊胜的修炼文化,今天被扣上了封建迷信的帽子;历朝历代的先人贤哲,被轻易地用阶级立场一脚踩翻在地;几千年来重德行善、仁义礼智信的美好价值,被当成了封建糟粕,成为讥笑嘲讽的对象。取而代之的是一套中共的反天、反地、反人性的邪恶党文化系统。在这里,道德原则的最高标准是党的权力和利益。中国人的一言一行,一思一念,无时无刻不被这个党文化左右着,人们深受其害而却难以察觉,更难以摆脱与归正。

本系列文章将分析中共是如何系统的替代传统文化,如何系统的进行思想改造,采用何种灌输手段,以及被改造思想后人们的种种表现。宣传中常见的党文化、党文化的话语系统、生活中的党文化以及习惯性的党文化思维这些遍及思想、语言以及行为上的具体表现也将在本文中详加论述。

落叶归根,中国人对自己根的寻求和渴望从未停止过。近几年海外流传着一句话,“要做中华儿女,不做马列子孙”,让无数海外游子燃烧起对自己民族的强烈的归属感。对党文化进行清醒的反思和抛弃,驱除马列毒瘤,解体党文化,回归中华民族正统文化,恢复民族的神韵,此其时也。

第一章 系统的替代传统文化

世界上所有的古文明文化,都是由神话开始的。印度幻化万物的湿婆之舞,雅典宙斯山上诸神的惊心动魄,耶和華维此一念创立世界,埃及太阳神及其万灵护法,以及中国盘古和女娲的伟大神迹,都是这些古老文明的启始来源。数千年以来,人类活动也都在神或者诸天的监护和启示下展开。

中国人称自己的家园为神州,是神的国度。中国人叫皇帝为“天子”,即天之子,天坛是皇帝祭祀天地之神的地方,面积比紫禁城还要大四倍。“观天之道,执天之行,尽矣。”这是《黄帝阴符经》开篇第一句话,或者说是中华民族有文字记载的第一句话——体察天道,顺天而行,所有道理尽在其中。中国人不但崇拜“天”,而且崇拜的还要是“天”中那个最老的,是谓“老天爷”,这是中国人对宇宙的敬仰。在中国人的记忆里,从盘古开天地,女娲造人,到神农尝百草,神扶持着人类走过了鸿蒙开辟时的艰苦岁月。中华远古半神文化留下的针灸、易经、八卦等文明,虽经几千年,今天的人类仍然只能惊叹而无法完全理解。从轩辕黄帝向神仙广成子问道,孔子向老子问道,再到佛法东传,儒释道为中国人奠定了重德行善的文化内涵,留下了正统的神传文化。显然,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人间规则之外还有通往“天”的部分,人们心里有对冥冥中超越世俗的世界的向往,中国人所说的谦卑的真正内涵是对神的敬畏。就连国家发生任何天灾人祸,都和“天子”自身的问题有关,皇帝需要自我反省,进行大赦或者是斋戒沐浴礼敬神天。

但是,自上个世纪共产主义祸乱人间,中共夺取政权后,为了维持共产统治,中共展开了全面摧毁中国神传文化的暴烈运动,系统的替代传统文化,建立起非自然的党文化体系。其替代的系统性体现在,中共用“无神论”斩断中国人几千年来对神的信仰,又把共产党的那一套“唯物论”当作认识世界和历史的基本方法强行灌输给人们,为暴力和斗争找到理论指



导,同时按照共产党的价值观来判断精华和糟粕,先进和劣质,全面否定中国正統的传统文化,使民族失去文化的根,然后在“无神、唯物、没有文化根”的中国人民面前,宣传马恩列斯毛的伟大,大搞共产党的“人造神”。至此,伴随着在实践中用这套变异文化去改造亿万中国人民的思想的同时,反天、反地、反人性的党文化理论体系就确立起来了。

1、宣传无神论

数千年的人类历史形成了种类繁多的文化体系,和社会制度体系同时并存。在所有的体系当中,人类的终极价值观都以神灵或者天意的形式,超越世俗的行政权力而存在。国王和皇帝之上,必须有神或者天的认证、监护和指引,是为“君权神授”。在这样的体系中,神灵和天意作为俗世中价值观的终极认定和裁判者,对世俗最高权力拥有评判和裁判的功用,使得世俗最高权力无限膨胀的倾向受到限制。同样,在普通的世俗生活中,神灵和天也同样扮演了极为重要角色,发挥着规范人类行为,限制人类私欲膨胀的重要作用,也以超越世俗利益的形式存在。纵观历史,文化中含有“敬天”、“神权”的因素在世界各地都有体现,即使现代西方社会的民主制度中都随处可看到基督教文化中“神”的身影。

但是,共产党认为,传统的有神论对其执政合法性提出了挑战。大多数国家的教育体系中,对神的概念采取中立态度,即不承认也不否认神的存在。事实上,科学并没有否认神的存在,也没有证实无神论。作为共产党宣传无神论的所谓“科学”基础——进化论——迄今也不过是未经证实的一种假说,要不然,今天的进化论学家们为什么还一直在致力于寻找证据呢?把完全否定任何超自然存在的“无神论”这样一种学说上升到整个国家的思想体系高度,只有发生在共产党这种寻找执政合法性的国家。

于是,在共产党这里,没有了全知全能的造物主,而只有大分子随机碰撞产生的生命,再经数十亿年进化为人,人又依据丛林法则弱肉强食,经过阶级斗争而从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进化”到社会主义社会。这一套漏洞百出的说法尽管回答了为什么要共产党执政的问题,然而却与传统文化对社会、历史和政权的认识格格不入。

传统的正教都教化人修心向善,与天地自然和谐共处,而共产党却要与天、地、人斗争;信仰正教的人有着对天国世界永恒幸福的追求,不看重世间的荣耀和享受,甚至能够看破生死,而共产党却要靠镇压和杀戮来恐吓民众,用物欲来收买民众;正教给人树立的善恶标准更显出共产党的逆天而行。因此,共产党把信仰的存在视为其统治的最大威胁。

列宁的老师、俄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普列汉诺夫,在他 1918 年 4 月病危期间口授、苏联崩溃之后于 1999 年 11 月发表的《政治遗嘱》中,就曾明确指出:“列宁为了把一半俄国人赶进幸福的社会主义未来中去,能够杀光另一半俄国人。为了达到既定目标,他什么都干得出来,如果有必要,甚至可以同魔鬼结盟。”

在这里,超越世俗、权力和利益的原则和价值观消失了,剩下的只有赤裸裸的权力和利益,为了目标可以不择手段。八十年代初,中国曾经展开所谓“真理的讨论”,其争论要点之一就是,真理、人道主义,美好、善良等等,是否有阶级属性?在正統的共产党人眼中,只有符合共产党利益的,才是值得鼓吹和发挥的道德,否则都属于被打倒之列。

是振振有词,问你谁看见了?他说网上的东西你也相信?当你说出张志新的名字,他傻眼了,他才想起来行刑前割张志新的喉管却是共产党自己都高调承认的。

人们跳不出党文化的思维定势

党文化在生活中造就了一个“场”,只要顺着党文化去说话去思维就如同“顺水推舟”,“如鱼得水”,显得额外“自然”和“理直气壮”。相反,想要去澄清党文化的变异思维,反而显得如“逆水行舟”。越如此,人们就越迷恋于党文化,越难跳出党文化。

一个常见的现象就是,人们不但用对共产党的“爱”来为共产党找借口,同时,还用对共产党的“恨”来为共产党辩护——他可以用“经济的表面发展”来给中共涂脂抹粉,他也可以用“中共是强权,杀人不眨眼”来抵触揭露中共恶行的努力,认为“没有用”,从而继续维护中共的统治。他一方面说:“多党制是人们私下的共识,很多党员都意识到这个问题,中共会走到这一天的。”用正面期望来歌功中共。另一方面,针对人民组建民主党派,他会说“那是胡闹!共产党是强权,怎容得了你?”以此作为反面认识来维持中共的现状。对中共的爱可以在党文化中找到共鸣,对中共的恨可以在党文化中得到宣泄,于是,党文化就成为了一个封闭系统,完全可以满足人们对共产党的“爱恨情仇”,让人不想离开了。

举一个简单的问题,“共产党杀了八千万中国人,该不该清算?”如果按照正常的思维逻辑,杀人偿命,这是很容易回答的,当然应该被清算。可是,今天的很多中国人,他回答不出这个简单的问题。他会转弯抹角的把问题弄得很复杂。他会问,“你怎么知道有八千万?你亲眼看到饿死了四千万人吗?”你说中共自己内部都发表透露出这么大的死亡人数。假设你把材料给他看了,他还会说,“你这不是以牙还牙吗?你总得给人犯错误的机会吧?”你说杀人犯在法庭上能为自己开脱,要求一个犯错误的机会吗?他还会说,“总不能都是共产党的错吧?”“非洲还有国家也搞大屠杀呢!”“共产党现在变了,干吗揪住过去不放?”“共产党是什么?谁敢清算共产党?整死你!”你盯住他,就要他回答一个正常思维的人的简单答案:该还是不该。逼急了,他会告诉你,“跟共产党作对,有什么用处?”“你这个问题没有意义”。总而言之,共产党杀了多少人,都是没有必要追究的。中共由此可以胡作非为,逍遥法外。

我们看到,当要他去掉党文化来回答一个简单问题时,他就以“没有意义”来应付了。离开党文化,他真不知道如何思维了,共产党成了他的思维底线,任何“没有共产党”或“清算共产党”的思维对他来讲,既是恐怖的,也是不可想像的。他就此打住,是因为他不敢触及自己内心深处对中共的恐惧,更不敢正视自身的党文化因素。

再比如,人们常用这样的话来表达对中共政策的认同:“我要是邓小平,我六四也会开枪”,“我要是江泽民,我也要镇压法轮功”,“我要是共产党,我也会搞独裁专制”,等等。人们这么说是觉得很自然,感到很安全。“我要是某某某”,本来是用于衡量一件事情“该不该”,把本来不是自己的事情,设身处地地假设一下,用这种方式来重点突出“我”的态度。但是,当用于中共的时候,“我要是某某某”就变成了用“别人(共产党)该不该”来代替“我该不该”了,重点不是“我”的态度,而是去表达中共的态度,“我”被藏起来了,从而默认、怂恿中共的恶行。追问一下,他本人到底是什么态度?他会说,我的态度不重要,“没有意义”。就是说,要他回到正常思维时,他又觉得“没有意义”了。其实,人们应该向好人看齐,把自己比作历史

文明？

人所看到的外部世界,其实恰恰是自己内心的世界的映射,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从党文化的斗争意识“武装”大脑的人,看到的中国历史自然也就是争斗与厮杀,而看不到唐尧禅让的美德、大禹治水之无私、将相和之宽容大度、看不到屈原的刚直不阿,也看不到苏武的不屈气节、文天祥的一片丹心、岳飞的精忠报国。

今天的中共虽然不再“以阶级斗争为纲”,可是人们的思想仍然受“阶级分析”的影响,“怀疑一切”、“深挖思想动机”,迄今仍然是许多人判断事物时的第一反应:分析中共六四镇压学生,因为学生领袖的动机不纯,所以他们应当负担一切责任,开枪杀人的中共反倒没有什么罪责了;海外有人揭露中共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罪恶,其动机一定是为了“抹黑中国”,中共的罪恶是否属实反倒不重要了;农民工辛苦一年却薪水被骗,不得已采用自焚、跳楼等极端方式讨薪,其动机是为了“作秀”,所以要立法惩治,而拖欠薪水的当事人和造成惨剧的社会制度反倒没有法律责任了;中共发动“大跃进”活活饿死四千万中国百姓,因为其动机据说是为了“赶英超美”,所以中共的罪行反倒是可原谅的了。

中国人的思维受党文化影响,受党文化支撑,其中唯物辩证法讲阶级斗争,进化论讲弱肉强食,简单的把中国历史看成血雨腥风的斗争史,这些都给中国人加深了斗的意识。中共反反复复种植暴力为核心的共产文化,把几代人造就成满怀仇恨、向往冲杀的“无产阶级战士”、“社会主义新人”、“党的驯服工具”。中国人的斗已经在思维里起主导作用,中国人喜欢内斗已经成为我们公认的事实。互相拆台,争斗得你死我活,中国人的生活规则变成了麻将规则——防住上家,看住下家,自己受不了,也不让别人和。有人有了成就,往往被排挤、诋毁,别人不是见贤思齐,而是妒火中烧。于是台上手握手,台下使绊子。斗还不光为了利益,而是以摧毁对方人格为目标,使用的手段也集中国人不好的智慧之大成,无所不用其极,不理睬任何规则。

这种党文化的非正常思维在解决事情时,往往第一念头就是整人、斗人、治人,把人家压服,气势上胜过对方,掌握“主动权”,强制对方按自己的意愿行事。体现在言语上就是语言中带有斗的意识,已经超越正常人的范畴,整个的语言系统的主导因素就是斗。语气带有质问,反问,挑衅的意味,说出的话刺人。如果说不通,往往胡搅蛮缠,不讲道理,无理辩三分。

有人做过一个小测验,问来自台湾和大陆的学生,如果到一间教室里觉得很热,要打开窗户的时候会怎么说。来自台湾的学生多倾向于:“太热了,我把窗子打开,你介意吗?”而来自大陆的学生则倾向于说:“这么热,怎么还不开窗?”两句话的意思相似,但反诘句使对方陷入被动,似乎没开窗是不正常、不应该的。后面这句话的说话者其实往往是无心的。这是因为党文化的争斗之心已经深入人们的话语习惯,人们都已经习焉不察了。

很多人,包括不少知识份子,在谈论国家大事时那种胡搅蛮缠、自以为是、怀疑一切的态度,让人很难平和的沟通。说他怀疑一切吧,他偏偏不怀疑共产党;说共产党不好吧,他说哪个党没有干坏事;说中共为了自己的利益而阻挠全面的改革吧,他说那是国情所限;说共产党正在迫害人权吧,他说证据在哪里;你指出证据吧,他说凭什么相信你的证据;说他喜欢共产党吧,他却忙着把财富和孩子送出中共治下的中国;说他不喜欢言论自由吧,他却很爱利用西方的言论自由来为共产党的恶行辩护……有一个不是笑话的笑话:你列出很多共产党干的坏事,他一个一个地否定,胡搅蛮缠,总是为中共找理由,问你证据在哪里;说中共竟然割犯人喉管,他才不相信,反驳说塞块布就完啦,傻子才会费那么大劲去割喉管;你说网上都有,他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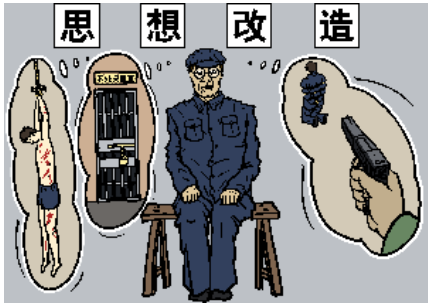
宣传无神论的最大障碍就是各种宗教信仰。因此,中共在夺取政权后就以镇压“反革命会道门”的名义向佛教、道教、基督教、天主教等各大信仰体系举起了屠刀;并派出特务打入宗教内部成立协会,一方面肆意歪曲宗教经典来迷惑信徒,另一方面宣布效忠于中共的领导,将中共的地位置于宗教信仰之神之上。

人生有三大问题:我是谁,从哪里来,向哪里去。传统信仰对此相应的解释分别是:神创论,前世今生与天国地狱。无神论的替代品:“神创论”变成了“从猿到人”、“劳动创造了人”;“前世今生”变成了“新旧社会两重天”;“天国地狱”变成了画饼充饥的“共产主义”。

在传统信仰中,“三尺头上有神灵”,他们以超常的能力监护着人。中共在摧毁人们的信仰后不断吹嘘自己“伟大光荣正确”,“带领我们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宗教中有救世主,中共则称从来就没有救世主,自己才是“人民的大救星”。

正统信仰具有稳定的特性。耶稣说“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中国人则讲“天不变,道亦不变”。因此有正教信仰的人会根据其经典来判断对错,这种是非标准是稳定的。而共产党却需要根据其政治需要,不断改变或推翻它刚刚还在宣传的是非标准。共产党的价值观最核心的一点是权力和利益,如果不在共产党权力控制之下,或者不符合其哪怕是临时的利益,都会被冠以“反动”而加以铲除。

如斯大林铲除俄国共产革命领袖之一的托洛斯基,毛泽东铲除同样是共产党领袖的刘少奇,并不是价值观的问题,而是由于权力归属的问题。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大量的“马克思主义小组”、“共产主义小组”等理论组织被宣布为反动组织,后来成为著名经济学家的杨小凯就是因为参加这样的理论小组,而被判刑十年。近年发生在中国的事情,也同样遵循这样的轨迹运行。2001年中共江西省委把一本减轻农民负担的中共中央文件集,宣布为反动刊物,下令全部收缴销毁。其原因十分简单,因为这些文件不利于江西省地方政府欺压农民政策的执行。



从消灭资本家到允许资本家入党,从“一大二公”到“包产到户”;从消灭私有制到大力发展私营经济;从“大鸣大放”到“不争论”;从“关键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永不翻案”的邓小平等毛一死就翻了案;“毛主席身边的人”被毛的卫士长逮捕成了阶下囚;“割资本主义尾巴”变成了“发家致富”,每一次改变都是原来的政策已经走入死胡同,再继续下去就要威胁到中共自身的安全了。

这恰如英国著名作家奥威尔所说:“极权主义国家的特点是,它虽然控制思想,它并不固定思想。它确立不容置疑的教条,但是又逐日修改。它需要教条,因为它需要它的臣民的绝对服从,但它不能避免变化,因为这是权力政治的需要。”

在共产党体系中,人性和神性的联系被彻底斩断,这些超越世俗权力的评判和裁判的功能被剥夺,原则和道德的认定和裁判成为世俗权力本身的一部分。共产主义者认为,非此不能建立真正牢固的共产党政权。但是,这样的价值观所支撑的人类行为,人性本质弱点所表现出来的所有恶劣部分,不可避免地逐渐被充分发挥和放大,最终演变成为独一无二的党文化体系。

2、宣传唯物论

无神论作为党文化的基础,摧毁了人们对神的正信,而让中共能够为所欲为。但是,中共还要走得更远。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作为共产党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党文化的另一块基石,被唯物论洗脑的中国民众看到的世界和历史同过去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论不过是很有争议的一个哲学流派。出版商爱德华·伯恩施坦曾把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手稿交给爱因斯坦,请他发表意见,看这部手稿是否应该付印。爱因斯坦看过后对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不以为然,认为“要是这部手稿出自一位并非作为一个历史人物而引人注意的作者,那么我就不会建议把它付印。”“因为不论从当代物理学的观点来看,还是从物理学史方面来说,这部手稿的内容都没有特殊的趣味。”但是,共产党却把马列主义当作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成为教科书里的必修内容,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马克思辩证唯物论中的唯物论和传统的唯物论还不是一回事,他认为传统唯物论不过是一种唯心的哲学,马克思的唯物论认为,为了用来改造世界,哲学应该停止纸上谈兵式地认识世界,哲学必须参加阶级斗争。到此,这个唯物论已经不单单是一种哲学,它不但预测了所谓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的历史进程,还认为达到共产主义必须靠暴力革命。

共产主义理论在出现的时候是充满了理想主义色彩的,要在人间建立“天堂”的理想吸引了无数热血沸腾的人加入其中,其结果是红祸流布十几个国家,十几亿人被奴役,上亿人口死于非命。仅用暴力维系的政权不会长久,共产党在“坏事做绝”的同时还要“好话说尽”,即需要用谎言为血腥的杀戮提供某种“合理性”的解释。这种谎言经过精密的共产主义理论包装,显得如此美妙和貌似完备,它不仅为杀戮辩护,还必须对政治、经济、军事、法律、科学、教育、社会管理、医疗卫生,乃至住房、养老和家庭生活等方方面面都提出一套指导和控制的理论,对于历史也要提出它的一套解释。另一方面,中共要对社会各个行业、各个微细胞进行全面控制。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正好为共产党的暴力革命和斗争哲学等等具体行为提供了理论指导。

党文化的“唯物主义”最初表现为“暴力崇拜主义”。因此我们看到——

马克思:“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

恩格斯:“机关枪、大炮是最有权威的东西。”

列宁:“暴力比100次辩论更有效。”“国家是阶级压迫的工具。”

毛泽东:“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林彪:“政权就是镇压之权,有了政权,百万富翁,亿万富翁,一夜之间可以打倒。”

现如今,党文化的“唯物主义”进一步派生出“物质崇拜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最终引向“唯利主义”,它引导人走向真正的道德堕落。当代中国众多的人,包括许多“知识份子”在内,匍匐于中共的暴力镇压和金钱收买政策之下,成了彻底的“唯利主义”者。

迷信暴力和金钱的中共不理解信仰的力量,它对镇压的信心也来自于它的“唯物主义”。

唯物主义否定道德的作用,认为没有超越于人类之上的普世道德。所谓道德都是从属于某一个阶级的,而在中国,道德的定义者和阐述者自然都是共产党。中共在

现成的,来的新信息和社会现象经过党文化思维的加工就成了新的党话。它们属于党的系统,具有党要的内涵,但是又因为不是赤裸裸的党的意识形态内的词汇,所以更不好分辨。

当今网络上流行一个字母缩写“FB”,这两个字母原本是腐败的拼音字头,一般代表吃饭聚聚,也有些人就直截了当说,“今天去腐败一下”。这个词诞生于民间,本身不是中共造出来的,但它是在党文化思想的影响下造出来的。它把本来属于负面的腐败行为正规化,弱化了社会对腐败行为的道德压力,实际上也认可了腐败现象无处不在,暗示中共的腐败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这好比人们若习惯把日常的正常行为称做偷窃,则真正的偷窃者就不会再感到自己的行为可耻。

“弱势群体”一词,也是产生于民间,随着频繁使用,2002年开始在中共正式文件中也出现了。“弱势”的概念源于党文化适者生存的邪说,暗示这个群体是不适应社会体制而被淘汰的。这从根本上否定了中共本身的独裁制度造成的问题。以中国最大的“弱势群体”——农民为例,中国农民在政治和经济上长期地位低下,这完全是中共的歧视政策造成的。这种歧视可以和恶名昭著的前南非种族政策相比。这里引一段中共四十年前编写的小学地理课本对南非的概况描述,读者不妨对比一下中国农民和非洲黑人的境况:“南非联邦政府先后颁布了‘通行证法’、‘种族隔离法’、‘奴役法’等七十多种种族歧视和压迫的法令,每一个法令就是一道枷锁,非洲人的权利和自由被剥夺干净。拿‘通行证法’来说,这项法令规定年满十六岁的非洲人必须携带‘身份证’‘迁移证’‘寻职证’‘纳税收据’‘居住证’等二十多种,以备警察检查。如果证件不全或者忘记携带,就要作为‘无业游民’遭到逮捕。根据南非联邦警察局的报告,仅在1958年,就有将近六十万的非洲人由于违反‘通行证法’和‘检查法’而被逮捕。”但在党文化的洗脑下,清醒认识到中共的歧视政策并对此进行合法抗争的人并不多。

这些年很多有代表性的新词,比如“中国特色”、“四个现代化”、“初级阶段”、“小康社会”、“下岗”、“待业”、“非公有制经济”、“思想道德建设”、“扶贫”、“三讲”、“三个代表”、“以德治国”、“与时俱进”、“和谐社会”、“不健康内容”、“有害信息”、“和平崛起”、“崇尚科学”、“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和谐社会”、“提高执政能力”等等。这些新词也都是党文化的产物,被中共赋予了特定的内涵,用这些词语来为维护中共的统治,信息有没有害不是对人民而言,而是对中共有没有“危害”,高唱“崛起”是给人们弄一个民族主义的画饼,让人们忘掉社会的危机而去拥护中共。中共继“三个代表”之后,又搞了“八荣八耻”,其实,里面的每一条内容都是在党文化的范围中讲的:什么是封建迷信,什么是尊重科学?什么是爱国主义?完全是中共党文化的定义。符合共产党的就是“尊重科学”,拥护共产党的就是“爱国”的主义。

党文化的斗争意识成为人们的生活习惯

传统中国人的思维里,儒家讲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佛家讲与人为善,道家讲顺其自然。然而今天的大多数中国人,却在相当程度上认同中共把中华五千年辉煌的文明历史说成是阶级之间争权夺利的斗争历史。在今天的许多中国人眼里,甚至在很多知识份子看来,中国的煌煌二十四史,只不过是一部充满勾心斗角,尔虞我诈、权势倾轧等等厚黑诡谋的争斗史。中国人都相信读史可以使人明志、可以明理、可以增进智慧,可是如果中国历史真的如中共描绘的是充满奸诈、一片黑暗,人们又何从明志、明理?这样一个黑暗愚昧的民族又怎么可能曾经创造出辉煌灿烂的古代

“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是真理”，这句话决不是仅仅具有修辞的意义。人们都讨厌党八股，可是从中共的文件、讲话、汇报、总结、报纸社论、大中小学教科书、新闻、电视、电影等等等等，被大量重复的恰恰是中共制造的那些党话，这些话并不因为人们讨厌它它就不发挥作用。恰恰相反，它们以语言符号的形式储存在人们的无意识深处，随时都会发生作用，左右人们的思想和行为。

有一个故事，说有一个厨师，家人深受共产党迫害，后移民到美国加州定居。在餐馆厨房剁肉时，伴着一刀一刀的节奏哼着小调，煞是来劲。不过，对共产党深恶痛绝的他，唱出的居然是“毛主席的书，我最爱读，千遍万遍下苦功夫”，别人给他指出，连他自己都哭笑不得。人们的思想中被灌输的太多的党文化的东西和太多党文化的话语了，成为了人们思维逻辑和讲话的自然部分。

中共建政之后，中共的老百姓就落入了中共政教合一的独裁统治的牢笼，但中共却宣传为“解放”；中共对中华民族正统文化的伤害、对中国人的迫害超过任何一个异族，但中共却称之为“新中国”；中共的瑞金“苏维埃”“革命政权”从事的其实是国家分裂活动，是投靠苏联的卖国政权；中共“长征”其实就是一场大逃亡；南泥湾“大生产运动”实际上是非法种鸦片的运动；中共的延安“整风运动”其实是一场骇人听闻的人间地狱式的精神迫害；饿死几千万人的“三年自然灾害”其实一场人祸；“文化大革命”其实是一场文化大破坏、全民大洗脑和政治大清洗；“改革开放”其实是暂时放松了专制高压，是中共不得已的救命招数……诸如此类，如果还原历史事件的真实面目的十分之一，就足以改变所有中共造出的那些词的骗人光环。但是，因为中共的灌输和话语垄断，人们一直沿用，如果去掉这些词，很多人真的会不知道怎样去描绘去思考那些历史事件，不知道该怎么说话了。

明明被共产党迫害了，一旦“平反”，就又对其感恩戴德；一提人权，就说是“搞政治”；西方有人一批评中共，就说是“反华势力”；海外华人抗议中共的暴行，就被认为是“不爱国”，是“抹黑”；听说了中共出卖大量领土，反而去给卖国的找台阶，觉得党这样做一定有我们不知道的“高瞻远瞩”（把他卖了还帮人数钱）；听中央电视台一年365天的灌输觉得很自然，收到几个揭露中共恶行的电话、邮件，或者几十分钟的真相插播，就认为是在“破坏社会秩序”；对于一个行凶的犯人，人们要追根究底，绳之以法，而面对共产党在历史上罄竹难书的罪恶，人们反而总是认为共产党善于犯错误，还会“有勇气改正错误”……人们自然流露的思维中，那些词语“平反”“搞政治”“反华势力”“不爱国”“抹黑”“高瞻远瞩”“破坏社会秩序”“有勇气改正错误”等等，都是中共高调宣传的词汇，却早已成为了人们逻辑思维的理论基础。

现代中国，人们的口头禅很多都是很有中共党文化的语句。比如“同志”，“贯彻”，“领导”，“号召”，“基本原则”，“基本路线”，“社会主义初级阶段”，“XXX特色”，“将XXX进行到底”，“跟共产党作对，没有好下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爹亲娘亲不如共产党亲”，“听共产党的话，跟共产党走”，“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团结就是力量”，“红星照我去战斗”，“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走在社会主义大道上”，“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形势一片大好”……去掉这些党文化话语，很多人可能觉得日常基本表达都会很吃力。党文化语言对中国人的控制之深，远远超出一般人的想像。

所谓的新词也是在党文化的思想中制造出来的

党话不是停止不变的。人们形成的党文化思维就像是加工厂，机器和流程都是

历次政治斗争中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做法彻底颠覆了普世道德。“道德多少钱一斤？”此乃党文化教育出来的“唯物主义者”典型的思维逻辑。

唯物主义造成了对生命的漠视。由于不承认人的精神要素，只承认肉体要素，恩格斯认为生命不过是蛋白质的存在形式。一个人死了，不过是一堆蛋白质改变了存在形式而已，没什么大不了的，这是共产党杀人的重要理论基础。

唯物主义直接否定了良知的作用。信神的人做了恶后都会良知难安，恐惧于神明鉴察、因果报应。而无神论者行恶却没有任何顾忌，正如毛泽东所说“彻底的唯物论者，是无所畏惧的”。如果没有了神，能够惩罚人的只有人间的暴力，特别是当一个人或组织本身就是人间暴力的掌握者，那么还有什么恶事是不敢做的呢？

而更重要的，是善恶道德等价值评判，从超越人类世俗存在的神和天意那里被剥夺，而完全成为世俗权力的一部分，再随着世俗权力的堕落和声名扫地，最后完成了以个人利益来判断善恶好坏的价值观转变。

党文化认为“物质决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因此经济发展必将导致政治文明、民主完善、法制健全、道德升华、文化繁荣，这种彻底的党文化“唯物主义”思维方式，已经被我们亲眼所见的与几十年改革开放伴生的政治腐败、专制横行、道德沦丧、文化凋零、司法系统沦为专制帮凶等现象彻底证伪。

中共用经济发展为自己辩护的时候常常陷于一种两难的困境中。当你指责中国民主与法制建设缺位，信仰、言论、结社等基本自由被国家暴力残酷而无耻地剥夺时，中共会以经济不发达、教育水平低、人民素质差为理由。

果真如此吗？

“我们不再应该以为，只要船坚炮利就能算是强大的国家。我们必须看出，民主本身就是一个力量。一切财富，一切国防的武器，只有和民主结合在一起，才能算是真正强大的力量。”“他们以为中国实现民主政治，不是今天的事，而是若干年以后的事，他们希望中国人民知识与教育程度提高到欧美资产阶级民主国家那样，再来实现民主政治……正是在民主制度之下更容易教育和训练民众。”

这两段切中时弊的文字，出自中共自己的机关报——《新华日报》，只不过印刷时间分别是1944年3月5日和1939年2月25日，针对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战时特别状态所作的批判。

可见，中共在夺取政权之前，从来不认为民众的经济状况和教育程度是实现民主的障碍，而现在的经济状况和教育程度总要比抗日战争或国共内战期间好得多，怎么反而成为障碍了呢？

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高喊“唯物”的中共，本身就并不“唯物”。讲究“物质决定意识”的中共，从来都把作为意识形态的宣传部门看得比农业部门要重要得多。在唯物主义的旗帜下，中共却一再犯着“唯意志论”的错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一天等于二十年”、“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等等。彭德怀因认为这些口号“浮夸”、“小资产阶级狂热”，以及不符合经济法则和科学规律，被毛泽东将其打为“反党集团”，并在全中国开始“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最后直接导致了三千多万人饿死的大饥荒，这实乃中共“唯心”的结果。

1960年林彪提出：“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这是我军政治思想工作的方向，也是整个军队建设的方向。”“四个第一”的提法将思想置于物质之上，毫无疑问属于“唯心主义”，毛却夸奖说“谁说中国人没有创造？四个第一好，这是个创造。”1964年2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全国都要学习解放军”中大力提倡“解放军大抓政治思想工作，坚持‘四个第一’的原

则……这些都是解放军无往而不胜的原因。”

时至今日，中共还在吹嘘“三个代表”，声称这几十个字“形成了一个系统的科学……”是共产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中宣部部长称“必须下大力气使‘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入人心，成为广大干部群众的行动指南，成为我们各项工作的根本指针。”以至于在某农村墙壁上，都赫然出现大标语——“用‘三个代表’指导我们的屠宰工作”。

无论是“唯物主义”和对民主的讲述，都被置于共产党的另一大理论系统中，这就是辩证法。辩证法的功能，是如何把“白”说成是“黑”。因为“白”有不同的“白”，因此白有白白、灰白、深灰白、黑白等等不同的分别，所以一般人认为的“白”，大部分属于灰白和黑白，因此，相对于白白来说，大众认为的白实际上是黑的一种。“白”于是变成了“黑”，最后，白变成了比黑还要黑的黑。这种白马非马，灰白非白的游戏充斥在共产党的话语系统中，并且被大多数人潜移默化地接受。因此，跛足的市场经济被称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共的独裁专制被称为“社会主义民主”，专政成了“人民民主专政”，侵犯人权成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理论”。总之，在附加了前缀之后，便可以任意修改原词的定义。这类被“辩证”过的荒谬概念过去在中国大陆泛滥，今天仍然在继续发生。

3、否定传统文化

正如绪论中所描述的那样，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半神文化。神传文化反映在中华文化的诸多方面，也深深扎根在民间生活当中。在世俗的另一半中，中国人把社会伦理作为一种信仰，忠孝仁义，是确定道德高下品德高低的最重要标准。

在中国，不忠不孝不仁不义，足以使单个的人无法在社会中继续存在。诗经《周颂》有云：维天之命，于穆不已。上天的命令，永远是非常的严肃。在中国古代，神灵常以具名和不具名的形式，隐藏在“天”的后面，中国人坚信，道德和世俗生活的最终裁判者，无疑是“神”。

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后，中国民间遂逐渐坚信天堂地狱和轮回转世、善恶有报。这些观念和中国人对伦理的坚持形成一个共同的价值基础，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

中国文化中更为重要的部分，由中国传统知识份子承担。这一部分，以历史作为鉴往知来和预知盛衰兴替的基础。世界上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像中国人那样重视历史。从中华民族创造文字之初，记述历史就成了历代最重要的工作。造字的仓颉就是轩辕黄帝的史官。春秋乱世，齐国的伯、仲、叔、季四位太史中有三个被杀了头，只为了写下一句真话：“夏五月乙亥，崔杼弑其君光。”竹简写字十分不易，司马迁硬是在受了宫刑后，借着昏暗的油灯在竹简上写了五十多万字的《史记》。自汉代以降，“隔代修史”的传统使中国成为世界上唯一有着连续而准确的信史的国家。

历代修史之人皆为当时之大儒，要求兼备“史学、史识、史才、史德”。记事之后常有“太史公曰”或者“臣光曰”之类的评论，这类评论体现了作者站在儒家观点上对一件事情的是非评断。因此，中国的史书不仅仅记录了真实的历史事件，也不仅仅是包括了当时的官制、天文、地理、水利、商业、兵法、音乐、科学等方面的百科全书式的著作，其中更包含了修史者所抱持的儒家道统。

这种儒家的历史观承载了厚重的中华传统文化，也是中共一开始就要立即消

常社会的表达方式，只有接受过党文化熏染的人才能够理解和解读。这种强行灌输而形成的全方位的遍及社会每个角落的党文化话语模式、行为和思维方式的现象，无论中国传统的古代社会，还是现代主流文明中，都从来没有出现过。因此，中共统治下的人们的言语、行为和思维方式，都与中国的传统社会、世界主流价值格格不入。中共领导人出访时的讲话与行为，也经常让人觉得怪怪的无法理解。

党文化的话语系统控制了人们的思想

党话是以“系统”的方式存在于当今中国人的生活中。与自然语言不同的是，党的一切建构了一个人为的“约定俗成”的政治话语体系，取代了正常社会自然形成的生活、思想和语言交际的内容，中国人就生活在党话编织的社会结构里。

中共建政以后，“人民”大概是使用最广泛的词语之一了：政府号称“人民政府”，军队叫作“人民军队”，钱币叫“人民币”，甚至走的马路也叫“人民路”，还有“人民电台”，“人民广场”、“人民公园”、“人民医院”、“人民银行”……和一切共产国家一样，一方面无处不在的被称为“人民”的各种设施、机构、团体暗示着每个人的一切利益、权利似乎都有了具体落实，不必自己再费心了；另一方面，“人民”被戴上了如此神圣的光环，以至于小老百姓都战战兢兢弄不清到底谁是人民。

有这么一个故事，上世纪 70 年代某人到“人民商场”购物，“人民营业员”态度粗暴，顾客质问：“你这是为人民服务么？”答曰：“为人民服务？你代表人民？”顾客竟一时结舌。

当然，同样的情形，也可以发生在和“人民政府”、“人民警察”打交道中……在中国，虽然“人民”没有法律上的定义，但在中共党文化里“人民”有着特殊的含义。在这里只有中共才可以代表“人民”，才有权划定谁是“人民”，谁不是；而后者就将成为“人民的敌人”，可以不经法律程序而剥夺其权利。他们通常被冠以另一个特定称呼：“一小撮”，尽管这“一小撮”有时候多达成百上千万人，比如 1957 年给中共提意见的“右派”、1999 年仍坚持修炼法轮功的人群等等。“人民”一词虽然不是中共造出来的，但在党文化中被赋予了特定的涵义，当人们习惯性的在各种场合使用着“人民”、“一小撮”等词语的时候，已经在无意识中认可了中共对于谁是或不是“人民”的随意划定，或按照中共的意图进行政治划分和站队。

类似这样渗透生活方方面面的党文化词句还很多。比如中共建政直到上世纪末，学生从学校毕业后，都要“分配工作”。“分配”一词就表明“党”具有支配权，所以很多人下意识中就觉得饭碗是中共“赐予”的，而不是自己通过努力获得的。特别是很多警察在追随中共迫害民众的时候振振有词：“共产党给我的饭碗，我就得听共产党的。”

党话系统是党的意识形态、党的意志、党的运作实施的载体和工具，中共利用一切国家手段和国家功能完成党语言的体系建立、规范和使用。所有标准话语产生的机构——舆论媒体都由官方占有，并配备中共独家特色的中宣部以及下属宣传系统，干部培训和组织生活系统，中央和各级党校等思想教育机构。历来报纸、文件、官方讲话、学校教材都是统一传播党语言的制度方式。多次政治运动生造出大量新词。各级组织带领群众使用并沉淀在日常生活中，形成党传统、党文化的基础。规范文艺、电影、广播、戏剧，树立党文人、党文化样板，推行党话语标准化。文字狱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的恐惧作用巨大而持久。在完成党话语建立过程后，中共又立法使之具有合法性。这一切都使得党话语系统成为中国人说话的主导。几乎每一个中国人，在需要的时候，都可以随口说出整段整段的极其标准的党八股话。

应熟习在不同场合的各种礼节,学习礼节仪文之事。历史上一些著名的“家训”、“学规”中,都有大量的关于日常衣食住行、待人接物等方面的礼仪规范。人与人交往,如何称呼对方,彼此如何站立,如何迎送,等等,都有礼的规定。即使是吃饭,也应该在举手投足之际显示出自己的修养,谓之食礼。行为合于礼,是有修养的表现,反之则不能登大雅之堂。可以说,当时社会的主流是要求文明、修养、礼仪、行为高雅得体,如果想被社会接纳,就要修身养德而规范自己的行为。

唐宋以前,中华文化是优雅的代名词,中国是礼仪输出国。史载中国商人到东南亚去,被看作来自礼仪之邦的人上人,甚至免费食宿。日本和朝鲜也一直深受唐代文化的影响。现在的韩国和日本仍然继承了一些来自中国的礼仪规范,人们还比较重视使用表示敬意的雅语和举止。

中共的党文化里边有进化论的弱肉强食部分,鼓励人们互相倾轧,没有提倡对人个体的尊重的部分,宣扬粗鄙,在个人行为中,不考虑他人,随随便便,我行我素,怎么方便怎么来。

现在大陆民众对“性”的认识,更是“与时俱进”,“上升”到把“性”、“家庭”、“婚姻”分开对待,把“性”作为一种社会的娱乐活动,很多人还认为是进步。这种低下行为导致了社会伦理的混乱,把几千年来中国人的家庭观念都打破了。有人觉得外国人不是也很性开放吗?但是,在西方社会有宗教和道德、法律的约束在那里,事情不会太过离谱,现在连西方人到了大陆,都感慨大陆性之开放早已“胜于蓝”了。

心理学里有一个著名的现象,就是从众效应。讲的是,个人总是倾向于跟随大多数人的想法或态度,不知不觉地在认识和行为上和多数人保持一致,以证明他自己并不是孤立的,而是存在与一个群体之中。同样,在这样的粗鄙党文化占主导的社会里,把卫生习惯差、教养程度低的人作为行为模板,人们不效仿的话,自己都觉得怪怪的不合群。人们形成了习惯,不觉得自己的行为已经被党文化改变得低下了。

中共基于进化论自然选择、适者生存的思维方式,认为新的东西是经过筛选的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比旧的更好,古人都是落后的。因此,人们按中共意识形态政治正确的党文化为标准,不分青红皂白对传统思想、传统文化、传统风俗、传统习惯文明进行破坏,礼仪教养被作为封建主义批判,整洁文明被当作资本主义唾弃,延续了几千年的礼仪之邦的文明被摧毁了。

4、去掉党文化,人们已经不会讲正常人的话,不会用正常人的思维

说今天的中国人离开党文化,就不知道如何思维了,不会讲正常人的话了,有人觉得这话太“过分”,带有“侮辱”性,但是,事实就是这样,因为党文化的种种理论、话语系统和思维方式早已浸透人们思想的各个角落。

在中共五十多年的统治中,通过各种灌输手段造就了整个社会由党文化构成的环境,让人们耳濡目染。同时,在否定了传统文化和传统观念、批判掉儒释道之后,使中国人接受了无神论、唯物论、进化论和斗争思想,造成了中国人建立在党文化上的一整套思维方式和善恶标准。中共的逻辑成为大众的逻辑,中共的语言成为大众的语言,这种逻辑和语言反过来又强化了人们的思想。把党话变成了普通大众的日常词汇,进而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从根本上使得党的意志融入了人心。在人们说话时,习惯性地吧头脑中的党文化思维当作自己的思维。

那一套话语、行为和思维模式的内在变异含义,是由中共强加的,并不是一个正

灭的对象。而共产党消灭中国文化的一大武器,是历史唯物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将历史的发展解释为“阶级斗争”的结果和生产力及生产关系矛盾的结果,并“预言”无产阶级将在与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建立政权,而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自然就成了掌权者。按照这种阶级分析的方法,古代帝王和知识份子无论做过多少好事,因为代表了剥削阶级,所以都应该受到否定和批判;而暴动造反者,无论他们杀害了多少人,奸淫了多少妇女,因为他们是无产阶级或被压迫者,所以都受到鼓吹和赞扬;而历代为民请命的清官,却被中共认为缓和了“阶级矛盾”,延续了所谓地主阶级的统治,而受到比那些无恶不作的贪官更严厉的批判。

中国人相信“生死有命,富贵在天”以及“善恶有报”,认为富贵名利都是因前世今生的所作所为积下的因果。无论是富贵还是贫穷,“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因此并不存在共产党“阶级斗争”史观所灌输的“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包容的文化,儒释道三教并存,儒家学说中,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并存,道教中南方的正一教与北方的全真教并存,佛教的禅宗、净土、天台、华严等不同的宗派并存,乃至西方的基督教、天主教、东正教、犹太教、回教等也都和中国文化和睦相处。这都显示出中国人海纳百川,以和为贵的精神。在中国从未发生过不同宗教之间的战争,和宗教内部不同教派的战争。

这种包容思想与中共的斗争思想截然对立,因此是必须消灭的对象。

中共并非为“斗争”而斗争。这里至少有两个目的:人们在互相的斗争中失去信任,变成一盘散沙,便于中共控制;更重要的是,中共耍了一下赵高“指鹿为马”的权术。承认“指鹿为马”的赵高可放心重用;沉默不语的人显然良心未泯,赵高要加以排斥;反对者都被赵高杀掉。然而,赵高的“指鹿为马”只是宫廷权术,而中共的“指鹿为马”却成了强迫全民参与的“大众文化”。

如“土改”、“镇反”、“工商业改造”、“戏剧界的改制改人改戏”等诸多运动,都是一次次“指鹿为马”的检验。每个人都必须参加、必须表态。在非此即彼的二元世界中,不跟中共站在一起的就立即成为斗争对象。

道家崇尚“真”,佛家以修“善”为本,孔子主张“仁”与“信”。而共产党的历史就是“假、恶、斗”的历史。按照中共1987年通过的档案法第十九条规定,一般档案超过三十年即可解密,普通公民皆可查阅,然而中共至今仍不敢开放涉及抗日、内战、镇反、土改、大饥荒等历史档案、不敢公布毛、周与斯大林签订的中苏密约,无非是害怕用谎言掩盖的罪恶曝光而已。

唯物主义对于精神领域显得非常苍白无力。其中“美”就是一个例子。雨后的彩虹,夕阳下的晚景,在唯物主义中只能被分析成为电磁波的不同光谱;爱情,被归结为人类自身荷尔蒙的变化;人类的高贵情操,则被理解成琐碎庸俗的小恩小惠。

从本质上来说,任何的人性美好都是共产党统治的障碍,以至于中共发明了一个常含负面意义的词汇——“人性论”。党员需要以“党性”压过“人性”,对于普通人来说,“人性”也是革命不彻底的表现。

在中共的文艺宣传中,曾经高举“禁欲主义”的大旗,否定爱情、否定家庭。但最近十多年中共已经从“禁欲主义”进行了180度的大转弯,变成鼓励“纵欲主义”。这些看似与中共以前的做法互相背反的政策,却出自于同样的原因——过去让人禁欲的目的是为了让人效忠共产党,让党性高于家庭、高于人性;如今共产意识形态破灭,中共鼓励人沉迷于黄赌毒、一夜情、包二奶,则是为了沦丧人的道德,

在纵情的享乐中无暇反对共产党,这样的“左右互搏”在中共的统治历史中比比皆是,背后维护中共统治的目的则一以贯之。

儒家文化的核心是家庭伦理,这种家庭伦理关注的是亲情,是仁爱。在共产党的宣传中,则是以阶级感情来取代亲情和友情。如李玉和所唱“人说道世间只有骨肉的情义重,依我看阶级的情义重于泰山”。所谓“亲不亲,阶级分”。互相成为“同志”者,即成为革命大家庭的一员,反之则是坚决镇压的对象。是“同志”还是“敌人”,简单的二元对立关系划分了一切社会关系,凌驾于亲人或朋友关系之上。当阶级斗争需要时,父子反目、夫妻成仇,用检举、批斗、毒打自己的亲人来表示自己阶级性强于人性,向党表示效忠。

在中共的宣传中,“咬住仇,咬住恨,嚼碎仇恨强咽下,仇恨入心要发芽”,类似的歌词充斥中国。仇恨是共产主义的动力之一,也是一种更为重要的共产主义情感,仇恨的反复灌输成为中共各种群众运动的动力所在。人类普世的同情、关爱、善良等等,因此成为共产主义天然的敌人,必须加以铲除。

4、宣传马恩列毛的伟大

在确立了无神论和唯物论两大党文化的理论基石之后,通过全面否定神传文化,党文化的体系就“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民众在信仰上形成了一个空白,共产党一定要造出自己的“神”,注入到民众的思想中去,填补这个真空。正是通过这种造神运动,共产党这种政教合一的邪教组织体系全部完成,画“神”点睛之后,反天反地反人性的党文化就终于活起来祸害人间了。

尽管中国历史上也出现过如“黄巾军”、“太平天国”之类政教合一的政权,然而这些政权都没有统一中国,更没有把他们的教义推广到其组织之外。而中共是唯一夺取了全国政权,并用暴力手段强迫人接受其教义的“政教合一”的组织。其教主就是中共在各个时期的最高掌权者。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之后,还有过两年的“英明领袖华主席”。造神词汇永远被用来修饰共产邪教的教主。因此相继成为“革命导师”的马恩列毛就是理所当然的造神对象。他们被冠以“解放者”或“救世主”的荣誉,捧上神坛。

神是全知全能,不犯错误的。中共在造神过程中也在树立自己“伟大光荣正确”的形象。因此,中共最高领导人如果在位的话,是不可能真的认错的。因其权力的合法性来源就在于他的“一贯正确”,一旦认错,就会造成合法性的丧失。而在另一方面,人不是神,不可能不犯错误,此时撒谎就成了必不可少的办法。

造神中完全否定任何超自然的存在另一个办法,就是伪造历史。举毛泽东为例,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狼奔豕突,四处逃窜。这一场失败大逃亡,在共产党的教科书中被宣传成了“北上抗日”。明明是在“九一八事变后”三个月,毛泽东就在井冈山成立了分裂国家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到了西安事变的时候,却成了“逼蒋抗日”的英雄。这种对历史的伪造给毛泽东套上了“民族英雄”的光环。

庐山会议上彭德怀挑战毛泽东左倾冒进和浮夸。这种对共产党领袖的挑战一旦成功,“造神运动”就会失败,如前所述,会直接挑战中共的执政合法性问题。因此,毛周等人在发动对彭德怀的批判后,更加失去理智的宣传“跃进”,直接导致了从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那一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饥荒。

中共不但通过文字,还动用戏剧、电影、歌曲、音乐等形式造神,用语录歌、忠字舞造神、用“早请示、晚汇报”造神,用敲锣打鼓欢迎“最高指示”造神。时至今日,

到文革全民运动中对流氓行为和语言的鼓励,再到八十年代以后引进上海滩之类流氓企业家影视作品作为样板,流氓居然堂而皇之成为了大家可以观摩效仿的对象。

在目前的社会中,信仰缺失,理想破灭,权力、金钱成为人们唯一的追逐目标和兴奋点。人们受进化论学说影响,争当欺压别人的强者,认为成功需要“匪气”。一般人没有随便打人的权力,骂脏话就可以起到让弱者畏惧、给自己壮胆的作用,“我是流氓我怕谁?”正是脏话背后天不怕地不怕心态的真实写照。

党文化使人举止行为低下

如果你直接对一位当代的中国人讲,你行为低下,很可能十个有九个觉得你有问题,自己的行为非常正常,哪来的低下?

2006年9月,中国国家旅游局在其官方网站公布了公众反映比较普遍的大陆游客国内国外旅游的不文明行为。

中国公民出国(境)旅游常见不文明行为:

- 1、随处抛丢垃圾、废弃物,随地吐痰、擤鼻涕、吐口香糖,上厕所不冲水,不讲卫生留脏迹;
- 2、无视禁烟标志想吸就吸,污染公共空间,危害他人健康;
- 3、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时争抢拥挤,购物、参观时插队加塞,排队等候时跨越黄线;
- 4、在车船、飞机、餐厅、宾馆、景点等公共场所高声接打电话、呼朋唤友、猜拳行令、扎堆吵闹;
- 5、在教堂、寺庙等宗教场所嬉戏、玩笑,不尊重当地居民风俗;
- 6、大庭广众之下脱去鞋袜、赤膊袒胸,把裤腿卷到膝盖以上、翘“二郎腿”,酒足饭饱后毫不掩饰地剔牙,卧室以外穿睡衣或衣冠不整,有碍观瞻。
- 7、说话脏字连篇,举止粗鲁专横,遇到纠纷或不顺心的事大发脾气,恶语相向,缺乏基本社交修养;
- 8、在不折扣的店铺讨价还价,强行拉外国人拍照、合影;
- 9、涉足色情场所、参加赌博活动;
- 10、不消费却长时间占据消费区域,吃自助餐时多拿浪费,离开宾馆饭店时带走非赠品,享受服务后不付小费,贪占小便宜。

国内的常见不文明行为,和这十条大同小异,但多了一些内容。比如,在景观文物、服务设施上乱刻乱划,踩踏禁行绿地,攀爬摘折花木;不听劝阻喂食、投打动物,危害动物安全等。一般旅游的人算是比较有钱的,社会地位和受教育程度也比较高,这些人尚且如此,一般生活在中国社会里的人就更不能幸免于这些低下行为。

全世界其他地方人也这样吗?其实不然。巴黎圣母院“请保持安静”这句话只写给中国人看,去过巴黎圣母院的中国人都会看到这句中文告示。在巴黎,公共场合有中文的地方并不多,而其他国家包括法国的游客并没有这种“礼遇”。泰国皇宫洗手间里有醒目的中文告示,“请便后冲水”。美国珍珠港的垃圾桶都有中文提示,“垃圾桶在此”。这种仅以简体中文标出的警示牌,也在中国人出境旅游的主要目的地——法国、德国、日本、泰国、新加坡等国频频出现。

中国人以前这样吗?中国叫礼仪之邦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了。中国的“礼乐射御书数”传统六艺中,“礼”字第一,充分说明了中国人重视礼仪的传统。《论语》上有一则故事,孔子警告儿子孔鲤说:“不学礼,无以立。”意思是:如果不学礼的话,是没有办法立足的。曾经家喻户晓的《三字经》中指出,做儿女的,从小时候起,就

德治国,……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贵州省委书记刘方仁,受贿 660 多万元,无期徒刑),“我最大的心愿是在未来 5 年内解决尚未解决温饱问题的 160 万人口的贫困问题”(云南省省长李嘉廷,受贿 1800 多万元,死缓),“想到广西还有 700 万人没脱贫,我这个当主席的是觉也睡不好呀”(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克杰,受贿 2000 多万元,死刑),“反腐倡廉工作一刻也不可放松,始终头脑清醒、旗帜鲜明、态度坚决”(上海市委书记,政治局委员陈良宇,涉及数十亿社保基金案,被撤职调查)……同样,普通的民众也存在两副面孔、两套话语系统。在做政治表态,写政治学习体会时使用一套冰冷的政治话语,在生活中使用另一套比较人性化的语言。

人人张嘴就说谎,既是为了适应中共的政治环境,同时,也已经变成了人们的思维习惯,谎言造成了社会的诚信危机,老百姓最后不得不吞食社会道德堕落的苦果。一个全面腐败,全面造假的社会,人们自己都说“法不责众”,谁也不知道该如何收拾中共造成的这个烂摊子了。

党文化教人学流氓说脏话

除了撒谎之外,满嘴脏话也是党文化中的一个特色。传统观念衡量好坏看品德,而中共的历史唯物主义是在“革命”和“阶级”标准下辨别好人和坏人,把中华传统礼仪一脚践踏在地。

巴黎公社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可以说是共产党的老祖宗。自称流氓无产者的巴黎公社社员们按照历史记载是地地道道的流氓,当年这些没有受过教育、靠偷鸡摸狗过活的社会流氓地痞打着共产主义的旗号洗劫了巴黎城。受巴黎公社流氓起义的启发和苏共的栽培,中国共产党也是依靠流氓无产者起家。中共认为“流氓地痞之向来为社会所唾弃之辈,实为农村革命之最勇敢、最彻底、最坚决者”。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里并不讳言游民痞子的革命作用而大声疾呼痞子运动“好得很”。毛还在 1964 年 8 月 18 日一篇《关于哲学问题的讲话》里说,“什么北大、人大! 还是那个大学好,我就是绿林大学的,在那里学了点东西。”

中国古代也有流氓得天下的例子,刘邦年轻时在沛县当亭长,以好色嗜酒而出名。可是他夺得政权之后,也懂得马背上得天下,不能马背上治天下的道理。他命令儒者叔孙通和他的门徒一起,制订朝仪,用道家思想,以道德仁义、清静无为令天下休养生息。古时的流氓也知道维持政权得用正统文化而不能用流氓手段。

但中共夺权之后,却继续以流氓手段统治国家。在党文化的体系里,处处充满流氓的匪气霸气,知书达理是“封资修”,知识份子“臭老九”,粗鄙下流成为最具“革命精神”。满手老茧的工人心最红、农民脚上沾的牛粪最香。“尽管他们的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小资产阶级知识份子都干净。”你要觉得牛粪是臭的,那么就说明你的阶级感情有问题,所以几乎所有的知识份子都必须说牛粪是香的,越闻越香。经过数十年中共对流氓粗鄙文化的宣扬歌颂,从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中改造着人们的生活习性,把人变得满嘴脏话,行为低下。互联网论坛上,充满脏话和诅咒的帖子可以说是中文网站的一大特色。本来可以心平气和地讨论,却变成了某些人用各种下流恶语进行谩骂和大搞人身攻击撒野的地方。在被党文化灌输的仇恨和狭隘的“爱国主义”偏见之下,民主、人权、台海、法轮功、宗教信仰、外交关系等等话题,都能成为被下流谩骂的牺牲品。

从最高领导人的流氓语言,如“脱裤子”、“割尾巴”、“放屁”等被写进教科书,

中共仍然在用“反复学习”、“深刻领会”、“贯彻实施”、“抓好落实”之类的宣传,对待江泽民或胡锦涛的“重要讲话”,实则是对现任领导的造神运动。

无神论的推行来自十九世纪的进化论学说(进化论的谬误将在稍后的章节中述及)。所谓“唯物”并非完全否定精神的力量,而是否定超越人类之上的一切存在,即神的存在。

至此,来源于信仰经典的道德标准,包括东方佛教中的善、道家的真、儒家的“克己”与“和为贵”、西方的摩西十诫等等全部失去了依托。于是,道德标准变成了“人”们可以不断改变的行为准则。

共产党社会中,价值观和道德的解释权落到了最高统治者手中,一切与中共价值观抵触的普世道德,都可以轻易被中共扣上伪道德、封建残余、资产阶级人性论等等各种帽子,而后中共自己再站在解释道德的制高点,冠冕堂皇地进行批斗镇压。

既然中共“伟光正”,一切“党文化”就必须歌颂这种“伟光正”。然而另一方面,中共又是一个血债累累、邪恶至极的邪教组织。在失去道德坐标的情况下,歌颂共产邪教“伟光正”的文化,可想而知,会给人的道德造成什么样的混乱,会对社会风气起到怎样恶劣的导向作用。

在中共的宣传中,马克思不仅仅是革命家、哲学家、科学家,而且是一个道德上的完人。然而实际情况却远非如此。1843 年贵族小姐燕妮嫁给了 25 岁的马克思,还带来了陪嫁的女仆琳衡。一向对“剥削”假装深恶痛绝的马克思,不但心安理得地花着当资本家的恩格斯“剥削”来的钱,无偿占有着女仆琳衡的劳动,并强占琳衡的身体在 1850 年产下一个私生子。当时,燕妮因为此事和马克思吵得不可开交,于是马克思把眼光投向了老朋友兼单身汉恩格斯。为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声誉,要恩格斯替罪,私生子用恩格斯的字命名,由恩格斯寄养在工人之家。吃了哑巴亏的恩格斯临死之前得了喉癌,不能说话,在一个纸盘上写下了:“亨利·弗来迪是马克思的儿子,图西把她的父亲理想化了。”弗来迪就是马克思的私生子,而图西是马克思的女儿。这段丑事,现在已经在东德的博物馆里展出了。

2004 年 6 月的《欧洲神经学学报》(The European Journal of Neurology)上披露,三位以色列医师参考历史资料得出结论:列宁在领导 1917 年的 10 月革命之前,就在欧洲感染了性病梅毒,并终于在 1924 年毙命。所参考的历史资料包括列宁在欧洲和苏联的治疗医生的记载、列宁的健康状况材料及被研究者称为“政治宣传”的验尸报告。研究者之一的精神病医生勒纳(Vladimir Lerner)对纽约时报记者说:“如果你消去列宁的名字,而把其症状拿给任何一位精通传染病的神经学家看,他会说,‘梅毒’。”

中共党员在文革以前似乎都是禁欲主义者,但毛泽东有三个老婆当无疑问:杨开慧没有死,就娶了贺子珍;还没有与贺子珍离婚,就娶了江青。1994 年,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了二十二年之久的李志绥出版《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一书,披露了毛泽东纵情声色犬马、糜烂透顶的生活。书中提到毛“一贯以女人为玩物”,征召大批美丽、年轻的女孩入宫,“女人像上菜般轮番贡入”。

毛泽东的卫士宣称毛在大饥荒的时候不吃肉,以示和人民同甘共苦。而事实上毛在大饥荒已经发生的 1959 年,指示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为他修建了滴水洞行宫,其代号为“二〇三工程”。从 1960 年下半年启动到 1962 年,建筑面积共 3638.62 平方米的一、二、三号主体工程连同韶山冲至滴水洞公路,同时竣工,耗资 1 亿。这些金钱如果购买粮食,湖南省就不会在那三年中至少饿死 150 万人。

共产党领袖的荒淫生活当然不会仅仅局限在纵欲方面,其权谋、冷酷、骄奢淫

逸因为缺少信仰约束、道德约束、媒体监督，所以利用国家权力行起恶来，其后果就极具灾难性。且其低下堕落的品质所起到的示范作用，带动社会道德急速下滑。

“造神”成为个人独裁的基础，因为神不会犯错误，共产党的领袖也自然要被装扮成真理的化身，其他人只要盲从就可以了。于是“一言堂”被合理化，一个大脑代替了几亿大脑，灾难性的后果得不到纠正。独立思考变成了一件危险的事情，因为可能会得到中共不想让人得出的结论，于是人们随大流、跟风等等，自己的人生自己不做主。一切问题唯中共马首是瞻，或等待组织决定。

造神的另一个后果，就是许多人在被迫害很严重的时候，仍然“相信组织相信党”。当信神者被迫害时，他们可以对着心中的神去祈祷，寄希望于神的公义，而无神论者被迫害时，他们无法寻找更高的道德权威，而陷于一种孤立无援的境地。此时人只好自我安慰说：中央是好的，“组织上会搞清楚的”。这种自欺欺人，也是中共自我神化的结果。

有神论者遇到困境时，会祈祷，甚至到寺院道观中烧香许愿。无神论者无处可去，于是“有困难，找组织”，希望党来解决问题，却不知党才是问题的真正制造者。

中共夺取政权之初即垄断媒体和教育，以一言堂的方式灌输“无神论”和“唯物论”，对传统信仰进行取缔、歪曲和镇压，对知识份子进行思想改造，对传统文化进行多方抹黑，贬成“封建”、“迷信”，一概骂倒，操纵暴力机器消灭不肯服膺于党文化的出家人或知识份子，或者利用切断生活来源的方式胁迫反对方臣服，再通过个人崇拜的造神行动填补人信仰需求的真空。在中共眼里，认同哪一种文化，并非是一个学术问题或单纯的观点问题，而是政治问题、阶级立场的问题。至文革后期，党文化终于磨砺成熟，对传统文化的系统性替代也达到了中共希望的程度。劣币驱逐了良币，新生代都在党文化教育中长大，对正统文化和观念更是懵然不知。

第二章 系统的思想改造

政治学习，改造思想，这类事情中国人都多多少少经历过。很多人可能会问，为何人的思想需要改造？其根本原因即在于中共的一套好恶标准、思维方式和话语系统都是反人性的，不但不可能在大众中自然产生，而且容易被人性所排斥。更何况共产党本是西方舶来品，是被唾弃的政教合一的独裁体系，与中华传统文化极为抵触。中共要想立足，就必须营造一个党文化环境，改造思想就成了必须而迫切的一步。

改造的重要一步就是批判中华文化的信仰之本——儒释道。同时，民间的传统观念，乃是三教所确立的价值观在世俗中的反映。这些观念早已成为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也容易使人上溯其宗教根源，因此对传统观念的批判，也是中共从中国人的思想里根除中国传统文化以及信仰的重要一步。这样，中国人就丧失了对中共及党文化的辨别和判断能力。

中共对儒释道的批判和对传统观念的批判清除只是属于“破”的一步，同时中共还要“立”它需要的思维方式，如斗争思想、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以及进化论与现代科学，从而让人



的心灵上的超越、人格上的升华之“道”，把来自东方的“慈悲”和来自西方的“博爱”视为“麻醉人民的精神鸦片”和“虚伪的遮羞布”。人们的语言中充满了“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咄咄逼人，充满了“战天斗地”的狂傲，举止粗俗、满嘴谎言和脏话，却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张嘴就是谎言

世界上哪个国家都有人说谎，但是，在许多国家整个社会的机制是以诚信为基础的，讲信用是一个人能够长期立足社会的资本。而在中共统治下，谎言成为中共社会的“立国之本”，整个社会靠说谎支撑，说谎成为人们在社会上生存的基本技能。

中共的历史就是一部谎言史，谎言是维持共产党的统治的柱石。不管是公开，还是私下，不管是对内，还是对外，不管是大事，还是小事，处处都充斥着谎言。人们在政治斗争中，从中共的榜样中，也学会了谎言。人们为了符合党的要求，避免自己成为被运动打击的对象，就得陪着党说谎，跟着喊“超英赶美”、“亩产万斤”、“一片形势大好”。中国大陆流传过这样一首打油诗：“村骗乡，乡骗县，下级骗上级，省长骗中央，一级一级往上骗，一骗骗到国务院。”一路说过来，人们觉得习惯成自然，好像说谎就是天经地义的事，整个世界和社会就是这样运作的。

电影《手机》反映了张口就是谎言的社会现象的一个侧面：因为有了外遇，所以要精心编制谎言来欺骗别人，家庭成了编谎和拆谎的战场。不但如此，它也演出了生活中惯用的许多经典谎言，整个社会存在手机恐慌症，不是怕手机，而是因为手机容易揭开谎言。电影的编导有句话：“有很多时候谎言支撑着我们的生活”。

传统观念中，道家讲做真人，佛家讲出家人不打诳语，儒家讲信，都认为撒谎是不对的。孔子把“仁义礼智信”作为五常。其中人与人之间的诚信，是人最重要的美德之一。所以孔子也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就是说如果人没有信用的话，不知道他还能做什么。

治理国家的道理何尝不是如此。孔子的学生子贡曾向老师请教治国的办法。孔子说：“一是让老百姓丰衣足食；二是国家拥有强大的军队；三是取得臣民的信任。”子贡问：“如果迫不得已要去掉一条，应该先去掉哪一条？”孔子说：“去掉军队。”子贡又问：“如果再去掉一条呢？”孔子答：“去掉衣食，宁可不得足食，也要保住信用。如果得不到臣民的信任，国家迟早要灭亡。”

因为唯物论强调物质是第一性的，人们考虑问题都从物质利益出发。在传统观念被批判否定后，中国人没有任何对谎言的顾忌和来自道德的约束。整个党文化体系又是鼓励说谎，人们说谎话没有任何负罪感。说谎变成了没有任何理由的一种本能行为。只要对我有利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天不怕地不怕，因此用谎话来取得自己的利益变成了普遍现象，不但张口就是谎言，而且说谎的时候已经在考虑下面怎么说怎么做能够圆谎了。

还有人把撒谎不讲诚信的社会现象，归结为西方“资产阶级”特有的、唯利是图的市场本性。然而市场经济在西方发达国家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了，而这些国家并没有因为实行了市场经济就成了骗子社会。恰恰相反，西方国家十分注重诚信，诚信是最不可或缺的个人品质和最重要的人生财富。在西方，诚信已成为经济交往中最基本的准则，也是企业追求的目标。在利益和信义发生冲突时，人们会选择信义，因为惟有信义才能带来持续的利益，一时的欺诈会取得短期的收益，但最终会成为企业发展的绊脚石。不讲诚信，在西方国家里，时间一长寸步难行。

党文化让人说谎还表现在两套话语系统中，就是台上一套，台下一套。“落实以

中国人在性的问题上自古都是严肃认真,把操守看得很重。只有结婚之后才能住在一起。结婚时要拜父母、拜天地,有天地神明为自己的婚姻作证。反之,如果有人被指控私通、淫乱,那会是一项大罪。强奸就更是跟杀人放火一样,罪不可赦。“万恶淫为首”,但今天的中国人,似乎已经完全忘记了先辈的古训。这种局面,不能不说与中共破坏传统道德价值,宣传无神论、唯物论密切相关。在中共的党文化里,权力就是道德的最大诠释者。只要有权,只要有条件,就可以肆意妄为。从共产党早期的“共产共妻”,到毛泽东的淫乱,再到现在中共官员的腐败堕落,从官方到民间,一切传统价值都被颠覆了,一切家庭人伦观念被抛弃了。但历史一次次地告诉我们,乱性往往是一个民族走向覆灭的先兆。再发展下去,我们到底期望一个怎样的未来?

黄赌毒产业化 官方成保护伞

中国卖淫业一直是非法的,性产业必须同军警结合才能生存和发展。有些性产业根本就是同军警合作办的,有的也不隐瞒这点,因为这是提供安全的保证,例如军队或公安的招待所反而客似云来。性服务业涉及的经济利益越来越庞大,就业人员大约有 1000 万,涉及的消费每年大约 1 万亿人民币。由于 2000 年的警察行动,中国经济学家杨帆估计,失业的女性工作者的消费降低,中国 GDP 因而减少了 1%。北京大学中国公益彩票事业研究所兼职研究员王增先在研究会上“保守估算”,每年有将近 6000 亿元人民币的赌资流向国外及港澳地区。毒品市场 3000 多亿人民币,吸毒人员超过 1 千万。沈阳市禁毒支队队长陈鑫、沉河区分局原局长曲月福和现局长张保华及另外 100 多名警官为毒贩做保护伞,毒贩和警察勾结,贩毒“一条龙”。黄赌毒三大市场几乎相互关系协调发展,由于从事三大行业的人员需要有特殊的地位与背景,因此,中国的军警及政府要员成为三大行业的最重要的受益者,因为没有政府及军警做背景这三大行业在中国寸步难行。官方参黄参毒参赌,上行下效,造成中国人对吸毒贩毒赌博卖淫嫖娼司空见惯,甚至亲身参与,不觉得自己干坏事。

在感受着经济发展带来的现代生活时,人们最有切肤之痛的就是社会道德下滑后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有人形容共产党过去在课本里宣传的“德育、智育、体育”全面发展,今天早已变成了社会实践中的“权欲、钱欲和性欲”全面崛起,名曰“三玩博士(玩权,玩钱,玩女人)”。假货盛行,色情泛滥,黑社会活跃,官商勾结,警匪一家,而民间疾苦却乏人问津,社会公正更是不得伸张。这样的社会里,没有内在的道德约束,没有外在的舆论约束,没有外在的法律约束,每个人都是受害者。

3、天不怕地不怕,张嘴就是谎言,满嘴脏话,行为低下

中国素以“礼仪之邦”闻名于世。敬天信神、相信善恶有报是中国人几千年的传统,即使那些没有明确信仰的人,也相信“老天爷”的存在。传统上中国人遵循神佛、圣贤的教诲而努力完善自己的人格。人们对天、地、人的态度是恭敬、谦卑的,整个社会通过礼仪来规范。

然而共产党鼓吹的是“天不怕地不怕”。只有把人改造得无所畏惧,中共利用来夺权、搞运动才方便。要是人对人有礼,对物有惜,对天地神明有敬畏,这样的人是不会把“听党的话”放在第一位的。因而在党文化的建立过程中,中共灌输的无神论使得中国人远离华夏祖先对天地神明的敬畏和对生命终极的关怀;其斗争思想又使得中国人既不信“壁立千仞,无欲则刚,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古训,也不信“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教诲;其唯物主义则使中国人彻底抛弃祖辈们上下求索

系统地接受中共以无神论为基础的邪说,进而再制造并维护适合中共生存的社会环境。这就是中共进行系统的思想改造的后果。

1、批判儒释道

在几千年的历史中,儒、释、道家的影响深入到中国社会各个阶层。

中国儒家尚“仁”、尚“义”,孔子讲“见义不为,无勇也”,又讲“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儒家的天命观深入民间,《论语》中说“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中庸》开篇讲“天命之谓性”,指出人的根本特性乃受天所命。在古人看来天是万物之本,是一切价值的源头。人的生命既由天所赋,此生的目的即在回归天命,实现内心向善的要求。被儒家视为群经之首的《周易》讲“三才”,即天、地、人,天生人,地养人;人又可以取法天地,“与天地合其德”。天地的运行则遵循不变的天理。老百姓相信一个高高在上而又制约人世间一切的“天”,用“不变”的天理衡量人间的一切。儒家思维维系着道德与社会秩序。

佛家讲善,讲慈悲、讲忍辱,重视生命,信奉众生平等。在中共建政之前,佛家的六道轮回、积德行善、因果报应已成为百姓的常识,即所谓“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来世果,今生作者是”。客观地讲,佛家“善恶有报”的观念对于稳定社会、维持人的道德,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道家强调“真”,强调清静无为,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的统一,达到返本归真的目的,即所谓“人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中国的中医与气功皆源自道家,此外服气、炼丹乃道家养生之道,道家占卜与预测之准确则让人叹为观止,大道修炼者更有肉身成道、羽化成仙的神迹。在世层面,当今天人与自然的关系越来越对立,环境问题成为全球最重要的话题之一时,道家思想也引起各国学者的重视,更显出其特殊的价值。

对于中共来说,儒家的“天命”、佛家的因果报应、道家的无欲无求、与世无争是中共发动“阶级斗争”的障碍。儒释道经典确立的道德观,是中共树立自己道德权威的障碍,也阻碍了中共造反、革命、专政等政治运动。佛道两家修炼都让人超越生死,儒家让人舍生取义,这是中共利用物质手段来控制整个社会的障碍。佛家的涅槃彼岸、道家羽化成仙的遗迹与道法自然的精神、儒家的天命观都被中共视为宣传无神论的障碍。

1) 批判儒家

(1) 批判孔子

儒释道三教中最溶入生活的还是儒家思想,盖因中国人一直以家族为生活中心,而儒家文化所规范的正是家庭伦理,再将家庭伦理推广到社会生活和政治中。

近两千五百年来,中华文化的入世部分基本上以儒家文化为主导。自鲁哀公立庙祭孔开始,汉高祖用儒家的礼节制定朝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唐太宗追封孔子为文宣王,到清圣祖康熙大帝手书“万世师表”四字于曲阜孔庙等等,历朝历代对孔子都有追封或祭祀,即使是在汉化程度最浅的元朝,元成宗也加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孔子对人类的影响早已超越国界,不仅日本、韩国、越南等亚洲国家承



续了部分儒家思想,即使西方启蒙时代的大哲学家伏尔泰也自称是孔子的学生。

自汉代以降祭祀孔子的香火不绝。夺取了国家政权却骂孔子、砸孔庙的事情只有共产党一家而已。

中共从毛泽东开始就非常痛恨儒家文化,其原因在《九评共产党》的第六评中已有分析,此处不再赘述。毛喜欢秦始皇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因为他与秦始皇一样采用法家的诡诈权谋祸乱国家,特别是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尤为毛欣赏、仿效和超越。

倡导“文、行、忠、信”的孔子被中共骂成“一切旧理论的师表,恶势力的灵魂”,称“自有生民以来,实未有如孔子罪大恶极,而为善人、大多数人的公敌者。今后,人类共起而攻之,可也!在古今中外所有思想家的言行当中,孔丘可算第一荒谬。”

上述泼妇骂街式的言论占据了中共批判孔夫子文章的主流,因为中共除了对孔子的言论进行断章取义、玩逻辑陷阱之外,从来没有拿出过、也不可能拿出令人信服的证据。

中共对儒家的批判是以阶级斗争为出发点和基础的,称孔子代表了奴隶主阶级的利益。今天在资本家已经加入中共,或者中共官员自己已经成为腰缠万贯的权贵资本家或权贵地主的时候,阶级斗争理论破产到中共都不愿意提起的程度(当然并不妨碍中共以阶级斗争的手法继续迫害异己)。此时回头观看对儒家的批判都成了笑话,因此中共为维护自己统治起见,也不得不假装去褒扬孔子。最近几年为了搞统战,中共又在海外准备建所谓“孔子学院”,试图利用自己批判过的孔子去骗向往中国文化的人。另一方面,大陆教学生背诵儒家十三经的民间学校却被中共取缔。

中共早在夺取政权之初,就出版了蔡尚思的《中国传统思想总批判》一书(以下简称《批判》),对孔子进行诋毁、谩骂和批判。其中中共所惯用的逻辑陷阱值得概要分析,因为这些逻辑问题仍然是中共党文化中大批判的重要手法。

第一种是断章取义。从孔子要收取学费(束脩)就断定孔子只为贵族服务,全然不管孔子“有教无类”的主张。孔子的学生中子路就出身贫贱。

第二种是张冠李戴,把别人说的话安在孔子的头上。例如《春秋谷梁传》为子夏的弟子所做,《批判》却利用其中有关伯姬的论述部分攻击孔子。

第三种是不当类推,从孔子说的“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得出“这无异于认‘国家兴亡,匹夫无责’”的荒谬结论。把个人对待职位的态度类推到公民的义务上去。

第四种是不当类比。称自汉代以降的独尊儒术与秦始皇独尊法家一样,全然不顾儒家以道德感召人,而法家以赏罚来引诱和胁迫人的不同。

第五种是混淆原命题与逆命题的不等价关系。比如《批判》中说:“既然女子全是小人,就可想见男子全是君子了。”

第六种是扣“反科学”之类的帽子,称孔子“违反自然科学”。事实上,孔子谈论的大多是伦理和政治层面的事情,这些都与自然科学无涉。正如不能用直尺测量重量,自然科学的原理也无法衡量人的行为的善恶。更何况孔子规定的“六艺”中包含“数学”,此为自然科学之基础。

第七种是含沙射影。提出“三纲”者明明是法家韩非子、汉儒董仲舒等人,《批判》一书也承认这一点,但是指出妇女为守贞节而自杀的时候举了几个很惨烈的例子。这些例子与孔子毫不相干,恰恰相反,《礼记》记载,孔子的儿媳妇与孙媳妇都是再嫁的。然而在通篇批判孔子的大背景下,难免不让读者将《批判》一书中的

除了少数心里还遵从传统道德约束的人,更多的人是觉得道德、良心能值几分钱?中共的无神论、唯物论、不讲天理,不讲道德,教育出来的就是这种为了钱,为了个人利益,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的人。

2001年4月16日,朱镕基在视察上海国家会计学院时,为该校题写的校训是:“不做假账”。无独有偶,2003年3月24日的《三湘都市报》报导,有些当地教育局出台的治理教育“三乱”的“八个严禁”,“严禁奸污猥亵女生”竟赫然名列其中。不知这样的校训和规章,是让人民放心还是更担心。

当一个社会已经确立了游戏规则,社会民主制度、法律体系、媒体监督和言论自由和宗教信仰已经比较完备地建立,民众的道德维持在一定程度,国民心态比较平稳时,再有乱七八糟的东西,也会是在规则之内,道德和法律在原则上有个约束。而中国是规则还没有确立,就先学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而且有过之无不及,没有任何道德的制度的宗教的底线约束,后果可想而知。

性泛滥造成社会危机

时下的中国,是一个“笑贫不笑娼”的时代。中共的政治改革是禁区,相反,“性生活”却成为开放最彻底的。婚外恋、包二奶、一夜情、白领阶层的换妻游戏、婚前同居、网婚、闪婚、隐婚、成人用品商店、卖淫、色情按摩、性表演、脱衣舞、电视电影节目煽情性的表演、性感美女在平面媒体的独领风骚等等,谈政治色变的中国社会,人称正在发生着一场前所未有的“性革命”。公安部的数据表明,1984年查获的卖淫嫖娼的人数是6千,1999年达45万,被查处的人数直线上升,但查获率是1%还是10%,没有人知道,但绝对超不过10%。在这股席卷全民的“黄潮”中,不但是青年一代意识领先,就是中老年人也不甘示弱,似乎要挽回过去被“耽误”的时光。电影《手机》和安徽原副省长王怀忠的名言“查嫖娼就是破坏投资环境”,就是这种社会现象的折射。忆往昔“全国上下一片红”,看今朝“全国上下一片黄”。

包二奶、养情妇、性贿赂,已经成为官员追求的一种“流行时尚”,不但不引以为耻,反而引以为荣。调查数据显示,被查处的贪官污吏中,95%有情妇。在1999年广州、深圳、珠海公布的102宗官员贪污受贿案件中,100%包养了“二奶”。但这还只是冰山一角。天门市委书记张二江一个人就有情妇107个。

从官方到民间,从权势人物到平头百姓,没有了道德的约束,只要有条件,就都想着占上一把便宜。上级对下级,老板对员工,教授对学生,导演对演员,强者对弱者,性侵犯处处可见,天理、人伦都可以不管。

就连本是教书育人的学校也频频出现禽兽教师。有的学生遭到强奸怀孕,有的被强奸并包为二奶,有的老师强奸未成把学生杀害了,有的甚至对非常年幼的小女孩下手。国内媒体2003年报导,重庆大足县一名小学教师,从2002年至2003年,先后对自己所教的10名未成年女学生实施强奸猥亵。甘肃陇西县一名体育老师以帮学生走后门上学为名,将该校12名初三女生强奸,其中两名学生被强奸后怀孕。贵州省锦屏县河口乡中仰小学一名51岁的教师在一年半时间里42次强奸12名女学生、35次猥亵16名女学生,仅有3人幸免于他的魔爪。2004年6月,临夏县一小学教师在一年半时间内先后将三年级的9名女同学多次强奸和猥亵,其中次数最多者达数十次,而这些孩子最大的一名还不满15岁,其他均是9到10岁的女童。湛江市下辖的雷州市南兴镇某小学校长林登平3个多月竟然作案7次,共强奸11名均是在校学生的未成年少女,受害者最小仅10岁……这样丧心病狂、触目惊心的恶行,在今天却已经屡见不鲜。

河三门峡大坝,被毛泽东亲自点名,打成右派。数年后三门峡大坝的失败证明了他的主张是正确的。关于三峡工程,黄教授写过三封信,陈述“三峡工程永不可建”的理由。他只要求中共领导人给他 30 分钟的时间,把三峡工程问题给他们讲清楚,说服他们改变这一决策。然而,他连这 30 分钟的时间也没有得到。

“南水北调”是继“三峡工程”之后又一项世界级工程,主要目标是将长江水分东线、中线、西线调往严重缺水的华北和西北地区。东线、中线工程已于 2002 年底开工;西线工程计划于 2010 年开工。当初“三峡工程”还象征性地有个全国人大无记名投票,而现在人们连那个过场都嫌碍事,南水北调西线工程的设计者们竟然说,中央宣布东线、中线开工,就意味着西线也开工了。早在 2001 年 7 月就通过水利部专家委员会审查的“西线工程纲要”,到 2005 年 3 月才让长期工作和生活在调水区的自然科学家、工程技术专家、经济学家、人文科学家等才第一次看到其“庐山真面目”,让这些第一线的专家们十分忧心。西线工程要在源头上把长江水引到黄河,而黄河比长江高出 200 米,比三峡工程不知要难多少倍,风险也不知要大多少倍。有专家感叹“西线工程令人担忧,会不会救了黄河毁了长江,甚至救不了黄河还毁了长江?”呼吁中共“告别改造、征服自然的幻想”。但是,他们的话在以政治决策为中心的中共那里,又能传多远呢?极力支持工程上马的西线工程设计总工程师对外界质询的回答是“随着项目推进,一切都会逐渐明了”。被中共的“战天斗地”洗脑过的人们,在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上动土,态度居然也是“摸着石头过河”。

老子讲“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从来没有让人去和地斗,破坏自然。在传统观念中,人和自然不是相互对抗的,“天人合一”讲的是要与自然和谐相处。现代的可持续发展观其实不是什么新鲜事,中国早在公元前就有保护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理论,它使得中国拥有过发达的传统农业,支撑了灿烂的传统文化。为什么现在发生了生态和人文环境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正是因为这种不计后果的做事方式,违背了自然规律,使得青山不再,绿水断流。特别是现在在金钱利益的驱使下,失去了对自然的敬畏心理的人们,更是胆大妄为,什么都敢去干。当大自然报复的时候,谁来拯救我们的民族呢?

世风日下 不讲道德

公务员以及其他各行业的职业伦理也日渐低下。看医生要递红包,孩子入学要交红包,打官司要给红包,记者写新闻要收红包……金钱把一切固有的职业道德污染了;正常的社会运作模式被破坏了;旧有行业的职业道德变坏了;新生行业的职业道德根本就没有一个健康发展的环境,一出生就已经被污秽包围了。

就说造假的程度,从假烟假酒假火腿,到毒米毒油毒奶粉,什么都有。2003 年安徽阜阳发生了害死婴儿的“毒奶粉”事件。长期食用这种奶粉的婴儿,头大身子小、身体虚弱、反应迟钝,并伴有大面积皮肤溃烂、内脏发育肿大。仅阜阳市出现营养不良综合症的婴儿就有 171 人,因并发症死亡的有 13 人。许多患“大头娃娃病”的农民家庭,为了给孩子治病,几乎花费掉了所有积蓄,有的甚至变卖了家产。不少家庭因为没有经济能力,不得不放弃治疗,眼睁睁地看着孩子死去。2006 年,北京市粮食局所把 2300 多吨陈化毒米流入市场,里面含有大量致癌物质,包括目前发现最强的化学致癌物黄曲霉素。然而商家为了利益不管百姓死活,毒米公然进入市场波及全国,湖南、湖北、上海、北京、广东、辽宁、四川、湖南都出现数以吨计的毒米。更有甚者毒米掺好米,百姓无从分辨,曝光已经是几年后的事情了。

过去叫盗亦有道,掺假骗钱,也就骗个钱,再缺德也不能下毒。而今天的人们,

悲剧算在孔子头上。

第八种是挑动人的嫉妒心。《批判》一书专门渲染“孔子的贵族生活”挑动人的嫉妒心。事实上,如孔子所言“鱼馁而肉败,不食”等实为基本的养生之道,并非什么贵族生活。

(2) 批判知识份子

《左传》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中国传统文化给知识份子提供大显身手的历史舞台,群星璀璨,人杰地灵。

改造知识份子也被中共视为极其重要的一步。中国传统社会讲“士、农、工、商”四个阶层,其中“士”简言之就是知识份子。“士大夫”阶层是道统的承担者,因此从道德角度来看,他们甚至比统治者更有话语权,更遑论普通民众。中共不认同知识份子代表的正统道德观念,但需要以知识份子为中介去改造普通人的思想,因此中共一旦掌握政权,首先要做的就是改造知识份子的思想。

1950 年 6 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的讲话中就谈到,对知识份子,“要使用他们,同时对他们进行教育和改造。要让他们学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等几门课程”。毛所谓的教育和改造除了令大中学校组织教师学习政协三大文件、社会发展史和新民主主义论之外,从 1951 年秋天开始,组织大批知识份子参加或参观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运动,这一场场的血腥运动让许多知识份子看到了共产党的残忍和凶狠,许多人的脊梁骨那个时候就吓软了。1952 年 1 月,全国政协常委会做出《关于展开各界人士思想改造的学习运动的决定》,即让被改造后的知识份子把中共给他们灌输的思想推向全国,改造所有人的思想。

早在清末废科举后,知识份子中的很多人转而去依附政党。这个过程是个痛苦的过程,也是知识份子“主动”进行思想转变的过程。这种转变当然不会被中共认为已经足够,因为知识份子尽管认为他们需要高扬民主和科学的大旗,而儒家的绝大多数修身立命之学仍可作为判断是非的准则。这恰恰是中共不能容忍的。

毛泽东在 1939 年 12 月发表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将知识份子一笔划进“小资产阶级范畴”。在那个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这项“小资产阶级”的帽子就足以让知识份子抬不起头来。

中共通过宣传机器歌颂工人和农民,将他们的知识匮乏当作是革命的动力,宣传“朴素的阶级仇恨”加上共产党的引导就足以使革命走向胜利。而在另一方面,知识份子被电影赋予了符号化的脸谱——戴一副眼镜,畏畏缩缩;他们拘泥书本,看不起群众,做事主观等等。

1958 年由成荫导演的《上海姑娘》公映不久就受到严厉批判,其原因竟然在于:“第一,知识份子在没有一个党委书记或支部书记给以批评教育的情况下,居然坚持原则,在建设中发挥自己的才干,这是取消党的领导,反对党的领导;第二,没有写知识份子的‘软弱性、动摇性、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等缺点,……这是美化资产阶级知识份子;第三,……表现主人翁是受到工人中一些落后思想的影响才导致急功近利……这是‘往工人阶级脸上抹黑’。”第三点的原因也是挑拨工人与知识份子的关系。

这些对知识份子的污蔑宣传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其原因在于知识份子一直是社会思潮的领导者,一直是社会问题的发言人,一直是传统文化的传承者和论述者,当知识份子的形象被成功抹黑后,他们所代表的价值观也就随之颠覆了。在群众眼中,知识份子不再是尊重和求教的对象,而是嘲弄和批判的对象。

如果说上述的诬蔑还属于“名誉上搞臭”，卡住知识份子的饭碗则是“经济上截断”，从反胡风运动到反右、文革则是“肉体上消灭”的一部分。

许多同中共在夺取政权年代出生入死，倾囊相助的民主人士天真地以为自己是开基立业的功臣，因此“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中共也会让他们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宏大的抱负得到施展的机会。在鼓励鸣放的“真情”邀请中，这些“士为知己者死”的高人义士，一个比一个正气凛然，一个比一个跌得更惨。当人们目睹了中共的所作所为，“党天下”的真实含义遂昭然于天下：“人民民主专政，或曰人民民主独裁”。章伯均、章乃器、罗隆基、储安平……等著名文人，无论是爱国归来的留学博士，还是携财从共的资本家，从部长、教授、文学家、总编辑、记者的位置纷纷被扔进共产党的右派牛棚，至死也没能从冰冷的现实中弄清楚这“民主”和“独裁”如何能被中共结合成“人民专政”。久诵不衰的精忠报国、舍生取义、人格尊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传统品格，都随着这末代鸿儒博学之士孤独的死去永远从历史舞台上消失了。人们恐惧的看到，积极悬挂人间天堂诱饵的中共党，首先建立的是人间地狱。

那些能够幸存下来的人，从此战战兢兢，不敢再提传统的价值，不敢再坚持知识份子独立的思想 and 人格。例如冯友兰、郭沫若，仅仅因为毛泽东的一句批评便吓得赶紧改变自己的学术观点。对于知识份子而言，独立的思想与人格就等于生命。这种摧残造成知识份子的内心苦痛绝对是无法形诸笔端的。

“知识份子”曾经是一种道德的同义词，表达的是清贫、正义、知识、涵养、不趋炎附势的社会形象。到江泽民时候，党的官场上出现了这样一种角色——“政治化妆师”。与文人的正统迥异，他们在政治舞台上抬轿子、吹喇叭的匠人，辅佐的不是圣贤之君，而是鸡鸣狗盗的江泽民之流。

在一片机枪坦克屠杀造成的血污中、在国际社会一片制裁和谴责的声浪中上台的江泽民需要涂抹厚厚的政治油彩，于是这帮文人发明了所谓的“三个代表”。他们不仅从政治上葬送了国运，而且从道德上玷污了知识份子必须具有的清白。

时至今日，中国的“专家学者”早已不同于那些继承了深厚正统文化和行为方式的知识份子，其中绝大多数经过中共无神论、斗争哲学、社会发展史洗脑，他们只是掌握了科学技术的专业人员，对正统的儒释道文化并未做过深入研究，更未将其融入生活。

此时的中共打出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标语，做着“党恩浩荡”的表演，伪知识份子则不遗余力地编造繁复理论去论证中共统治的合法性，抑或是各种社会悲剧的合理性。中共成功营造了“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文化精英”的铁三角，需要的就是象何祚庥这样面对死于矿难的矿工说“谁让你不幸生在中国了”的“知识份子”。

还有一些受党文化污染严重的知识份子，虽保有做人的基本良知，但空有忧国忧民之心，苦无报国安民之路，无奈中只能争取“体制内”身份，要求“体制内改革”，凡事寻求“体制内解决”。“体制内解决”无非是首先向共产党称臣，承认共产党和党文化对自己的控制权和任意使用权，进而取得一点点可怜的发言权。在没有选择的社会环境中，一些浸泡在苏联文学和共产党著作中长大的人，珍惜自己成长过程中的宿食，不知道是毒药，难以放弃对共产党的理想心结，为社会不公呐喊之余，却无法帮助人们弄清中共才是万恶之源。这些人对中共寄予希望的做法实乃用个人的德行遮盖中共的丑陋，延缓行将就木的中共寿命。

口沦为生态难民。2006年8月26日中国人大常委会在一份环境检查报告中，以“有水皆污”、“逢雨必酸”、“污染之重，触目惊心”、“不能再拖下去了”等字句来形容污染的严重性。中央电视台2频道曾报导中国每年产出的GDP当中，有18%的GDP是通过透支生态环境和资源取得的。有一幅卫星拍摄的地球照片，许多国家是绿色覆盖，而中国是一片黄土。许多网友面对祖国母亲被蹂躏如此，看到中共还在高喊“崛起”，不觉“万念俱灰”。

“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这曾是中共宣扬爱国主义的主打歌曲，有考证指出，这条美丽的大河就是承载全国六分之一人口的中国第三大河流淮河。有道是“走千走万，不如淮河两岸”。但是，短短的几十年，淮河污染之触目惊心，让这句民谣成为历史。工业企业偷排污水、农村水源污染和城市生活污水，使淮河流域约60%为劣五类水质，污染由地上波及地下，直接影响1.3亿居民生活。中共也喊治理淮河，但是，如果人心不治理，是没有用的。2004年7月20日至27日，淮河爆发有史以来最大的污染团，有如巨大的黑蘑菇，从上游奔腾而下，横扫千里淮河，充斥河面的黑色污染水团全长133公里，总量超过5亿吨，一路浩浩荡荡杀奔洪泽湖，顺者昌，逆者亡，满河黑暗，浮尸（鱼虾蟹）千里。“10年治污水质回到‘原点’，600亿付诸东流。”

党文化带给中国人的“不计后果”的心态，更是表现在热衷于搞大运动、大项目，劳民伤财，不顾自然规律。再大的工程，总是先上马再说，哪管什么后果，满足战天斗地、好大喜功的变态心理，走一步看一步，出了事算“交学费”，把国家民族的未来当作儿戏。

在“三峡工程”、“南水北调”等如此重大的项目中，决策人员也仍然以政治为决策依据。“六四”之后，中国民心低落，三峡工程就被选为振奋人心的工程。关于三峡工程，该不该修，人们听到的都是一面倒的消息，就算提到负面消息，也是早就有了“应付”对策，而反对一方的专家们的进一步反驳和详细讨论，百姓是看不到的，那是禁区。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水要流动就得有坡度，库区的头尾就要有落差，淹没区就必须是一条斜线。但是三峡工程“移民组”为了迎合当局缩减移民搬迁费用，提出的三峡移民淹没线竟是平的，就是如果大坝蓄水到预定的175米，另一头的重庆的淹没线也是175米。但是按三峡工程泥沙组公布的万分之零点七的水力坡度来计算，600多公里以外的重庆的水位高度将不是现在说的175米，而是超过海拔217米，到时就要为重庆“准备后事”了。如果要保重庆，水位就不能蓄到175米，那当初的防洪发电的效益也就大打折扣了。从中央到地方这么多精明的官员，还有这么多科学家，都知道水从高处流向低处，这么严肃的后果就不当回事？还有，三峡工程中的目标和措施之间大多互相矛盾。防洪和发电矛盾，防洪和航运矛盾，防洪和排浑蓄清矛盾，发电、防洪、航运与移民矛盾等等。大坝防洪就要保持低水位准备蓄洪，水位降低又会导致发电和航运能力下降。2000年5月17日，力主工程上马的张光斗教授在发现三峡工程的实际防洪库容不可能达到设计标准的错误后，对三峡建委办公室主任建议了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案：即把洪水控制水位降低10米。但低水位必然影响到航运，同时也必然影响到发电，为此张光斗主张修建燃油、燃气或燃煤的火电厂进行调峰，张一再叮嘱“但这件事在社会上公开是万万不行的”（《三峡探索》总第二十七期）。再有，如何处理泥沙淤积是水库成败最关键的因素之一，而200公里长的三峡是沙石最好的避风港，三峡水库拟采用“蓄清排混”的运行方式。海外有学者预言“排混”只对大坝前很短距离有效，而清华大学著名水利专家黄万里教授则斩钉截铁地说一块石头也出不去！黄教授1957年因为反对修建黄

者本身固然有被中共欺骗的一面,但他们之所以能做出这些恶行,却跟党文化的洗脑紧密相关。一个相信天理,相信人伦人性的社会,不可能大面积干出这种伤天害理、泯灭人性的事情。

“大跃进”之后的大饥荒,饿死的大约有四千万人,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饥荒。这一场大饥荒被中共歪曲成“三年自然灾害”,实际上那三年风调雨顺,大规模的洪水、干旱、飓风、海啸、地震、霜、冻、雹、蝗灾等自然灾害一次也没有发生,完全是一场彻底的“人祸”。事实上,如果当饥荒发生的时候,能够开放粮仓,能够寻求解决办法,这场饥荒的死亡人数不至于那么高。更令人震惊的是,面对饿得奄奄一息的村民,中共干部却命令军人强行封锁道路,目睹他们活活饿死也不准他们爬出去逃生。

文革中的“打砸抢”,学生居然用皮带抽死老师,孩子用砖头砸死父亲。还有人把对方打死之后,把器官取出吃掉。

中国古代讲“人命关天”,“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被当局整肃的对象,本身已经够可怜了。但现在很多人却不但见死不救,还要落井下石,甚至以杀人为乐,只要中共叫干什么就干什么,认为是党性的需要,是党的政策的需要,什么后果都可以不顾。中共思想改造的后果之可怕,可见一斑。

时至今日,这种不把人命当回事的党文化思维并没有随时间的推移而成为历史。因为中共的腐败与暴政,社会产生了大量的被压迫团体。富人高官可以利用特权过着一掷千金的生活,而下岗工人却因为没钱治病在家自焚身亡,贫穷人家的母亲因为没法替儿子交学费而上吊自杀……但面对下层民众的凄惨生活,很多人已经漠不关心,毫不在意。面对可怜无助的上访民众,那些所谓的执法人员可以大打出手,将人致伤致残,丝毫不管他人死活。所谓的何院士何祚庥,可以面对无数的矿难,说出“谁叫你生在中国”这样的狠话来。而中共将官朱成虎,则放话可以牺牲西安以东地区、不惜中国一半的人口来打一场核战争,跟老毛的“中国死了一亿,还有三亿”的说法如出一辙。仅仅因为没有“暂住证”,大学生孙志刚就被收容所活活打死。而在迫害法轮功过程中,大量法轮功学员惨遭酷刑甚至折磨致死,在2006年更曝光出自2001年以来法轮功学员器官被活体摘取,中共官员和医生从中牟取暴利。人性之泯灭,骇人听闻。

漠视生命不仅仅表现在政治运动当中,也不只体现在权势者对百姓的态度上,现在社会上人与人之间都充满好勇斗狠,肆意残杀的现象。现在年轻人动不动就砍啊,杀啊,对越暴力的越崇拜。手段残忍的校园凶杀案也屡屡发生。社会上谋财害命、用钱买命的事情随处可见。官员、富豪雇凶杀人,有时连自己的妻友也不例外。

当人的道德沦丧到如此穷凶极恶的时候,这个社会就处于极其危险的地步了。

战天斗地 破坏自然

几十年来,党文化把中国人民塑造成“无法无天”、“战天斗地”的一族,从当初的“大炼钢铁”、“围湖造田”、“疯狂地打麻雀”、“乱砍滥伐”到今天的以环境为代价的经济高速增长,都是只管眼前,无视子孙后代的福祉,给自然带来了巨大的破坏。中国国家环保总局透露,每生产价值为一万美元的商品,中国所消耗的原材料是日本的7倍、美国的6倍,甚至比印度还要高2倍。如果环境问题不能得到改善,中国的经济奇迹很快就要成为过去。世界银行说,在世界上10个环境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中国占了6个。全国水土流失面积占国土的38%,18个省(区)的471个县,近4亿人口的耕地和家园处于沙漠化威胁之中,专家估计,中国未来将有1.5亿人

2) 批判释家和道家

(1) 否定神佛存在,歪曲信教动机

老子的思想曾被孔子认为云中龙。今天的西方学界对老子的思想仍然推崇备至。“福兮祸之所倚,祸兮福之所伏”“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等《道德经》中的箴言至今影响力长盛不衰。自汉代以降,道家符箓、丹鼎等各个流派皆尊老子,留下如张道陵、邱弘济、许旌阳、葛洪等修道者白日飞升的神迹。历代帝王常以道士为国师,张良即称自己“以三寸舌为帝者师”,余者如蜀汉诸葛亮,唐朝袁天罡、李淳风,宋代苗光义,明朝刘伯温等都被开国帝王待以国师之礼。成吉思汗晚年也不远万里请长春子丘处机前去讲道。

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打坐七七四十九天,最后开功开悟,洞彻他所在境界的宇宙真相,教人重德行善,跳出轮回。释迦牟尼有十大弟子,都有很高的神通。他的第二十八代弟子达摩一根芦苇渡江,非常人所能为之,后在少室山面壁九年,将身影印在石上,成为千古奇观。禅宗六祖慧能圆寂迄今1000多年,肉身不腐,至今仍然端坐于广东南华寺中。

中共一方面进行社会发展史宣传,否定神的存在;另一方面,令其在各个宗教内部的代理人散布否定宗教创始者的言论。佛教认为佛是天国世界的创造者,如极乐世界即为阿弥陀佛愿力所成,而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赵朴初1965年在见到印尼总统苏加诺的时候却说“佛陀被神化了”“佛不是造物主……不能主宰人的吉凶祸福。”与此类似,受中共控制的基督教三自教会的主席吴耀宗也称耶稣的神迹都被自己“扬弃”了,并说“上帝已将人类得救之钥匙,从教会手里夺去,交予共产党了。”

神佛为宗教之本。无论是佛教、道教或其他正教,信徒努力提升自己的境界,最终是为了去所信神佛的天国世界,如佛教净土宗的人希望往生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等。如果否定神佛的存在,否定天国世界,对于宗教信徒来说,修炼就变得毫无意义了,而宗教这个修炼团体也就会瓦解。

中共作为无神论的宣传者,将宗教描述为“自然力量和社会力量在人们意识中虚幻的反映”,“在于劳动者对于剥削制度所造成的巨大苦难的恐惧和绝望”。基于这种宣传,一切有关天国地狱、善恶报应的教义都是中共直接否定的对象。

中共宣传“社会苦难是宗教存在和发展的肥沃土壤”,并刻意将那些在常人中遭遇苦难、万念俱灰的人入教当作是宗教信徒的常态。

事实上,道家的张道陵(即张天师)曾三次被汉和帝征为太傅(在九品官制中为正一品官),张道陵都没有答应,而是隐居在鹤鸣山中修炼。释迦牟尼佛出家之前是迦毗罗卫国的太子,他的父亲为了阻止他出家的念头造了一座大花园,修筑壮丽宏伟的宫殿,令几百美丽的宫女日夜歌舞管弦陪伴他,并为他迎娶印度第一美女耶输陀罗为妻。然而太子仍然夜半骑马跨越城墙,至山林中苦修。太子成佛后,最早度化的五十六人中有五十一人都是波罗奈国的豪族公子。世尊返国宣说佛法,有王族豪贵的子弟中品貌端正者五百人随佛出家。因此,出家绝非对现实苦难(感情失意,或经济困难等)的逃避,而是发菩提心,以慧剑斩断尘缘的大愿。

在中共夺取政权之前,民间有一个信神的环境。释教和道教中的修行者被称为“法师”、“道长”、“高僧大德”等,是德高望重的象征,也是人们尊重的对象。即使是传统皇朝的皇帝遇到高僧也都给予礼遇和尊重。

而中共夺取政权后,就在民间强行推广“社会发展史”教育,破坏信神环境,将

修行者描绘为愚昧、无知、迷信，甚至利用宗教敛财等形象。此时，修行者的社会地位一落千丈，从被尊重者变为大众嘲弄的对象。许多出家人因为受不了这种精神落差而还俗。

“人往高处走”，每个人内心都潜在地珍惜自己的名誉，希望与成功者为伍。中共将佛、道教徒描绘成一个失败者、甚至是“剥削阶级”，将信奉神佛的人描述为迷信和思想落后，这都会使民众与信徒保持距离。

（2）摧毁修行的物质环境

如果出家人不在意世俗的看法，继续精进修行，那么接下来中共就要断修行者的粮道了。

一般来说，修行者的资粮来自两个方面，一为大众的供养，二为庙产土地的收入。当中共破坏民间信神环境时，第一个来源就中断了。对第二个来源，中共的对策就是土地改革。中共在1950年1月颁布的《老解放区市郊农业土地问题的指示》中规定寺庙、教堂等土地一律收为国有。各地寺庙中凡是有劳动能力的僧尼，转而从从事农、林、手工业和服务性行业，到麻袋厂、织布工厂、印刷厂、比丘尼缝纫组等处工作。

依照佛教传统，小乘佛教的教徒也都以乞食为生，并不从事生产。传入中国后，禅宗四祖道信定居双峰山，聚徒五百人，因为住地远离城郭，乞食困难，于是自耕自给，以农养禅。道信教诫门人，“努力勤坐为根本。”“能作三五年，得一口食疗饥疮，即闭门坐。”由此可见，农业生产并非目的，仅仅是为能打坐参禅而从事的糊口劳动，且只要有一口饭吃，就要闭门打坐。

由于中共对生产资料和商业行为的全面垄断，寺院道观的生产性质已非道信所提倡的以农养禅，完全成了世俗化的工作单位，并被置于共产党的经济控制之下，仰共产党鼻息而生存。经济上对政权的依附，结束了宗教的独立性，并进而在政治上成了共产党的附庸。这是对宗教传统最大的破坏。

（3）消灭肉体

1955年7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展开斗争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史称“肃反运动”，打着“纯洁佛教队伍”的旗号，杀一儆百，将不与中共合作的僧尼道士当作反革命分子逮捕枪毙。经济上的剥夺、政治上的压迫以及这种“罗织罪名、万人公审、宣判、枪毙”的恐吓，使很多僧尼站到了共产党的一边。

（4）歪曲宗教经典，将宗教庸俗化

佛教称“佛、法、僧”为三宝。其中“法”即佛经。中共除了否定佛的存在、镇压迫害高僧大德之外，对于经典的破坏更为隐晦和阴险。

释迦牟尼在《大般涅槃经》中预言了未来的情况，即有魔王转生成僧尼和男女居士从内部坏乱佛法。

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太虚和尚提出“人间佛教”的说法，认为三乘共法（天乘、声闻、圆觉）要么属于“迷信神权”、要么属于“消极避世”。“人间佛教”进一步主张“修行现代生活化”和“寺院现代学校化”，“现代化的佛教事业应包括工厂、农场、保险、银行、公司、所谓工农商贸”，等等。这种打着“人间佛教”的幌子而将佛教彻底世俗化、庸俗化的做法，与佛陀原意直接相悖，并不符合佛教几千年来所要求的远离尘世欲望，追求心灵升华与超脱的修行方法。藏传佛教的白教始祖密勒日巴也告诉弟子说：在自己修成正果前，不要谈度化众生的事业。

如绪论中指出的党文化的第三种类型，中共将已经存在的思潮加以“发扬光

体的，而不懂得抽象的东西，从而得出农民都“要饭吃”，于是，就否定了民主自由的重要，结论就是“温饱权高于人权”。

我们稍稍换一个说法，把民主自由具体化，农民们就不会上中共的文字游戏的当了。按中国农村9亿人口计算，要养活县乡村三级官员6000万，这就是说每15个农民（包括老人和小孩，按人口计算）要供养一个中共官员和工作人员。从历史上看，国民政府末年（1949年）是50个百姓供养一个官员，现在是15个农民供养一个官员。过重的负担，压得农民翻不过身，就连中共自己都承认减免农民负担是一项关系国家的大事。

对饥肠辘辘的农民，如果把“民主人权”的抽象字眼转换成具体的行为，我们可以这么问，“我们农民被整得苦啊，找人把你们的情况反映出去，你们愿不愿意？”“当官的欺压农民，苛捐杂税多啊，咱们把那个坏蛋乡支书罢了，选个真正为我们干点实事的，大伙乐意不乐意？”对于这样的提议，农民们难道会拒绝？

人的肚子饿了，要想得到帮助的话，首先就要发出声音，让人知道你的肚子饿了。就是说“言论权”比“温饱权”更紧要。可是，为什么中共颠倒顺序的狡辩人们也能欣然接受，听之任之呢？就算吃不饱的人没权说话，现在不是有很多人已经吃饱了吗？为什么不让他们说，或者容许他们替吃不饱的说呢？

其实，“温饱权”对于中共来说也不重要，中共在意的只是一个敷衍外界、抵触言论自由的借口。

类似上面这样的似是而非的例子还有很多很多。党文化改造人的思想之后，的确使得人们沟通起来都很困难，一个问题解决了，还有另一个问题冒出来。如何避免用党的思想思考问题，避免用党教会的话语说话，很关键的一点，就是把角色分开。把自己同党分开，克服党妈妈情结，突破“离不开党”的底线，不把党的无神论、唯物论和斗争哲学、仇恨哲学当作自己思想的基础。对于那些似是而非的观点，看一看如果你附和那些观点，到底对谁有利，是鼓励党干坏事还是监督党、抑制党不让它干坏事。中共可以为自己辩解，但是，我们老百姓不能跟着起哄。别人批评中共的时候，并不是在骂中国人。丢中共的面子，不等于丢中国人民的面子。能够挑战独裁，为真相挺身而出，是真正的勇士，是会赢得世人的尊敬的，这种尊敬是对中国人民的尊敬。

2、不信神，造成人做事不计后果，什么坏事都敢做

无神论是党文化的核心之一。中共之所以得以改造人们思想，就在于切断了民族传统文化，用马列主义外来文化替代了中国几千年来半神文化，从此“无神论”主宰大陆，敬天畏神、善恶有报变成了封建迷信和愚昧无知。就人类历史而言，对神的信仰和宗教在很大程度上维持着人类的道德。不再相信神的存在，也就没有了道德的约束，没有道德的约束，法律的约束也只能是有名无实。于是，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不相信今生来世，不相信做坏事有报应，于是，做什么事都不计后果，什么坏事都敢做。

漠视生命 肆意杀人

1949年以后，在“镇反”、“土改”、“三反”、“五反”、“反右”、文革等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中，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但在历次运动中，起作用的却不仅仅是中共本身。中共搞运动历来是煽动群众斗群众。很多受害者往往是被中共扣上什么帽子，然后众多乡邻、亲戚甚至家里人就会一拥而上，将其活活整死、打死。那些打人

取得多大的成功,有人说他是军事家或是经济学家,这些都不重要了,因为他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了全球九千万人的伤亡,造成了四千亿美元的损失,同时他在集中营里面对犹太人残酷的屠杀,有六百万犹太人因为二战在集中营里失去生命。这些事情就足以给希特勒和纳粹定性了,所以今天你要是到德国去的话,没有人说我们要对希特勒和纳粹进行一分为二,而且包括现在拥有纳粹的标志,或者对希特勒崇拜都是违法的。

我们再拿日本人打一个比方。侵华日军在中国除了杀人,它还办了很多实业。特别是在东北三省,它开工厂,开矿业,一直到中共夺取政权之后,当时东北三省的老工业基地,很多都是日本人留下的底子,包括当时东北三省作为全国铁路网最发达的地区,都是日本人弄的。甚至南京大屠杀之后,日本在中国也搞了很多文化活动,比方说盂兰盆会,到南京秦淮河两岸看一看那也是属于花柳繁华、温柔富贵的,大上海那也是朝朝饮宴、夜夜笙歌的地方。那么我们要不要感谢侵华日军对中国经济发展作出的贡献呢?也要来个一分为二呢?我们好像没有人这样想,因为日本人有南京大屠杀,有七三一部队,有三光政策,而且这场侵华战争造成了中国两千万军民的伤亡,就这些事情本身就足以给侵略战争定性了。

所以回到共产党这儿,在夺取政权之后,中共造成了中国八千万人非正常死亡,其中四千万人是被它屠杀掉的,四千万人是活活被饿死的,这个屠杀的数量超过纳粹德国法西斯的十几倍,超过日本人四倍,另外一方面,共产党又出卖了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所以就这两件事情本身,就足够给共产党定性了。

在另外一方面来讲,共产党它自己做事情它也常常不分为二,它常常把事情做绝了。比如它在镇反的时候,为什么不对原来国民党的官兵一分为二呢?在迫害刘少奇、打倒林彪邓小平的时候,那时候怎么不对他们一分为二呢?今天镇压法轮功的时候怎么一句好话都没听说,全部都是诋毁法轮功的话呢?所以从它的表现来讲,它所谓一分为二,实际上是为它维持统治所找的一个借口,让大家对它有一定程度的认同而采取的一种策略。

如果真要是“一分为二”的话,那么,中共就应该面对过去,面对错误。中共说的“一分为二”其实是一个障眼法。它先虚晃一枪,说事情总有好有坏吧,让人觉得很“客观”的样子,然后,话锋一转,“坏”就不说了,落脚点却是“好”。所以,中共是不让人们去彻底全面地反思中共的过去的,它干的坏事是不让人说的,要说也只能按它的调子和分寸来说,这样说的后果反而是给今天的中共贴金。德国总理勃朗特(Willy Brandt)在华沙下跪忏悔对犹太人的罪行,而中共领导人却从来没有向全国人民忏悔。如果在德国的格言现在是“千万不要忘记”,而在中国则是“千万不要记住”。可是,忘记历史的社会能够自救吗?

6) “温饱权高于人权”

面对世界民主潮流,中共在人权方面的恶行成为中共在世界上的一大包袱。于是,御用文人们杜撰出了一个人权歪理,“温饱权高于人权”,“你到饥肠辘辘的农民那里去问问,他们是要饭吃还是要民主自由?”很多人面对国际社会批评中共的人权记录时,也会用中共这一套话语进行批驳。在中共的政治教科书和每年的政治考题中,对这个问题都是有标准答案的。中共在不同的外交场合,也经常俨然理直气壮,一副义正词严的样子。人们重复这句口号,跟中共的宣传和灌输是分不开的。

其实,这是一种混淆逻辑的诡辩,它把民主自由当作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把这个抽象的东西去同具体的“食物”进行对比,加上暗示农民的教育水平低,只会要具

大”,并从深度和广度上动用其掌握的国家资源进行推广。

中共认为“人间佛教”种种似是而非的说法恰好可以大加利用,只要信徒把关注“天国”的眼光转移到关注“人间”,那么中共就可以轻易编出更多的谎言,操纵教徒的思想。于是,“人间佛教”的传人,太虚的弟子赵朴初就成为中共最理想的代理人人选。

在赵朴初等人的带动下,中国佛教协会将“庄严国土,利乐有情”时时挂在嘴边。事实上,佛经中提到的“庄严国土”是指庄严佛国净土(如《妙法莲华经》中的诗句“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利乐有情”是指将“有情众生”渡化到涅槃彼岸,而绝非佛教协会所说的“积极参加祖国建设,努力为人民服务。”

(5) 成立中共宗教协会, 让代理人从内部批判宗教

五十年代,中共建立了完全受其操纵的佛教协会和道教协会,以其代理人占据要津,成为附属中共的类似现在所谓八个“民主党派”的政治组织。这些协会在党的组织体系中归统战部管辖,在政府体系中归国务院宗教事务管理局管辖,其目的不是为了繁荣宗教,而是为了控制宗教。

中国佛教协会在其发起书开篇处即热烈讴歌中共镇压反革命,并“感谢这一切的领导者——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谰词滚滚,与任何一个世俗组织相比都毫不逊色。

释迦佛出世为印度迦毗罗卫国净饭王的悉达王子,出家后又有瓶沙王欲以国王之位相让,悉达太子都没有接受,而是入山林苦修。可见,佛教之真意并不在人间的荣华与世俗的政治。而中共操纵的中国佛教协会在其成立章程中确立的宗旨即要求佛教徒参加所谓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道教的情形也差相仿佛。2005年通过的中国道教协会章程中明确规定要“加强……时事政策的学习,提高道教徒爱国主义觉悟和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自觉性。……促进道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为构建和谐社会的贡献力量。”简单地说,道教协会就是要让《道德经》适应于中共的政策,直白露骨地要改变信仰的内涵。

佛教协会、道教协会在政治上投靠中共,自然也就按照中共的看法去解释教义。宗教认为世界是苦难的,这种苦难自然是与天国世界的美好相比,否则就无法解释释迦牟尼为何要放弃王位去修行。而中共的宗教代理人却谎称中共治下的中国“就不能再……说成是黑暗的、痛苦的”。更进一步,为促进信徒更进一步溶于世俗,各协会都在批判所谓“消极厌世、逃避现实的宗教观念”,让教徒相信建立人间天堂。这种说法与佛陀所说“苦、集、灭、道”的四谛妙法截然相反。

这些宗教协会的代理人以其在宗教中积累的资源从内部进行批判,例如佛教的主张废除戒律并说这些典章害死了许多青年男女。这种内部的批判要比中共从外部的诋毁有力得多。

(6) 营造宗教自由假象

中国所谓的“宗教自由”是一种伪自由,它有一个前提,就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简单的说,一个人烧香磕头、忏悔许愿,干什么都行,但是当他的信仰和共产党冲突的时候,他就必须服从共产党。

伪宗教自由表现为宗教世俗化、宗教团体机关化、宗教场所商业化、宗教领袖政治化或干部化。

在中国,宗教局是政府用来控制宗教的部门。许多寺院的方丈、道观的主持同时也是中共的干部,他们有行政级别,领工资,参加政协会议,甚至配备车辆、电脑,

每周进行政治学习。与其他中共干部唯一不同的是,这些人穿着袈裟或道袍而已。其心不在方外,四大不再皆空,寺观仅仅是其工作单位而已。

伪宗教自由的另一个表象就是建立大量的庙宇,组织各种宗教大会,修佛像、印佛经等等,给人中共在极力扶持宗教的假象。然而这些事情却跟真正修行的实质没有任何关系。

《九评之六》写道“再以寺院为例,这本是个晨钟暮鼓、青灯礼佛的修行场所,或是给红尘中人忏悔礼拜的地方。修行讲究的是清静无为,忏悔礼拜也要求环境庄严肃穆,然而现在却成了发展经济的旅游胜地。真正来到寺院的,有多少是沐浴更衣后,带着虔诚敬佛的心来反省自己的过失呢?修复门面,毁去内涵,这也是中共迷惑世人的策略。无论是佛教、其他宗教还是派生文化,中共就是要使他们沦落到这步田地。”

如今中国的禅宗祖庭少林寺已经成为旅游和拍摄电影的场所,少林寺方丈贩卖少林文化,近期决定花费 3.5 亿元人民币将清静佛地变为休闲区,被讽刺为少林寺的“CEO”。他推崇“少林寺也应该有企业的观念”,于是开着豪华越野车,乘坐飞机周游世界,策划各种大型表演,每日周旋于企业老总、政府官员、国际友人等各类社会人士之间。他生活中最多的时间,是用于接待来宾和处理事务。达摩老祖所传的“壁观”修法需要清静的环境,如今荡然无存。

2006 年 8 月,江西省化成禅寺监寺圣观法师因为“六四”为天安门死难者举行佛教超度仪式,而被当局威胁、逼迫离开寺庙。桂阳县宗教局何局长对圣观法师说:“你吃、喝、嫖、赌都行,就是不能反对共产党。”

伪宗教自由让许多不明真相的人加入到中共把持的宗教场所,他们研习的经典被中共歪曲,他们的正信被中共用世俗的利益所侵蚀,这都是中共系统破坏佛、道教的圈套。

伪宗教自由同时让一大批听命于共产党的品行恶劣之人成为寺院、道观的住持以及各级宗教协会的负责人,一方面他们积极配合中共需求在国际上为中共的伪自由涂脂抹粉,另一方面拼命敛财,乃至吃、喝、嫖、赌。例如广州两座寺庙里的和尚到三元里集体嫖娼;光孝寺、法幢寺和南山寺等三大古寺的和尚集体嫖妓;广东佛教协会的会长、光孝寺的方丈明生和尚,在寺院内开了一个“甘露坊”素食馆,弄了几个妓女模样的人站在寺院门口招揽顾客……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求神拜佛的传统,但必须指出的是,到寺庙烧香许愿都是相信眼下的不如意乃因果报应所致,以虔诚忏悔之心许愿未来要做多少好事加以弥补,希望神佛给以一时之方便,解脱目前的困境。伪宗教人士则把求神拜佛歪曲成给寺观布施钱财即可获得保佑,全然不管这些钱是否是偷抢或贪污来的。此时求神拜佛从“忏悔”变成了“花钱收买佛,与佛做交易”。

“贪官拜佛,和尚嫖娼”这种伪宗教自由对正教的破坏力最大,许多人因此而批判宗教为虚伪、敛财和淫乱的场所,这种自发的批判比中共的直接诋毁具有更深远的影响。

必须强调的是,中共对儒释道的批判是多层面的,包括理论层面的批判;把科学宗教化,用所谓“科学”的大棒对儒释道思想进行批判;收编宗教界,在宗教内部对儒释道进行批判;在党内进行思想清理;对儒释道进行妖魔化。这种批判是长时间的持续批判,贯穿在教育、生活中,辅以定期的政治运动强化,人人写文章,或抄文章,强行洗脑。同时,这种批判也是全面否定式的,没有任何可以让人对传统思想进行保留的余地。在中共狂热的无神论、唯物论意识形态宣传中,在恶毒的对儒释道

体的公开报导和美国政府关注的案例,中共为什么要劳民伤财去多此一举呢?就是为了出一口“气”,非为改善美国人权(实际是希望美国人权丑闻越多越好,方便中共做文章),实为侵犯自己人民的人权罪行强词夺理。

中共为自己狡辩,那是它坏到那个份上了。可是,不少普通老百姓也附和中共的说辞,甚至认为中共的回应理由是多么“为国争了光”,这就是糊涂了。且不管美国的人权怎么样,美国批评中共的人权,客观上是帮助中国人民,因为在中共的人权迫害下,被害的不就是中国人民自己吗?别人呼吁中共改善人权,不是中国人民自己受惠吗?遗憾的是,因为党文化的影响,认为批评中共,就是批评全体中国人民,触及了被中共灌输的狭隘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自尊心,结果盲目维护中共的面子。有人为中共找理由,说别人批评中共的后面一定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是在用人权要挟中共。就算如此,如果我们不买中共的托辞,坚持要中共停止迫害自己的人民,那么,中共改善自己的行为后,别人不就没有办法要挟了吗?这样,既为中国人民带来实惠利益,又打击了别人“不可告人”的目的,一举两得,不是更明智吗?

所以,正常的思维是,不管对方做得怎么样,只要指出的是事实,就应该听取并改正。有人说“正人要先正己”。这又是一种误解。这话应该是批评者自我勉励的话,那是批评者境界高,为了更有说服力,严格要求自己的表现。但是,不能作为被批评者抵触别人意见的理由,不是有句话叫“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吗?

在外国元首要跟中共谈论人权问题时,有一个很典型的被认为是“机智”的回答,就是“你没有资格跟我们说中国人权,因为一百多年前你们严重侵犯过中国人民的人权”。在说起中共天不怕地不怕,破坏自然,污染环境时,也有个类似的说法,就是“西方强国不也转移污染工业,甚至把废料运到别国吗?”言外之意是什么呢?就是西方国家曾经侵犯中国人民的人权,为什么共产党就不可以侵犯中国人民的人权呢?西方国家能够污染中国,共产党怎么就不能污染中国呢?

中国要与世界接轨,融入世界潮流,就需要听取国际社会的意见,除了学习别人的先进技术,还要研究先进的制度。为了化解国际社会在人权、民主自由等方面的压力,中共总是用“说我没做好,你自己要先做好”来无理取闹,误导民众,受害的是国家和民族的长远利益。

5) “对共产党要一分为二”

共产党自知坏事干绝,所以,希望人们能对它一分为二。老百姓自己也附和着说,“难道共产党一点好事也没干?”这种观点听起来好像有道理,但是这要看一分为二的场合和目的是什么。

一个杀人犯,杀人偿命,按照法律来说,就已经可以给他定性了。如果在法庭上要求一分为二,想用小时候曾经帮助老大爷推过车,植过树什么之类的来抵消杀人罪,那是不可接受的。

拿国家和政党来进行类比的话,可以看一下二战以前的德国。1933 年希特勒成为德国的元首,他的经济政策使德国的经济连续多年以 100% 的速度增长,德国的失业率从 30% 降到 0%,德国当时的国际地位大大提高,因为在一战以后德国是战败国,英法列强对德国是很歧视的,要收它的赔款,但是希特勒当了元首之后,德国成了欧洲的强国特别是 1936 年成功地在柏林举办了奥运会,使得很多国家对它刮目相看。当时德国修建的高速公路都是可以起降战斗机的,很多地铁的挖掘都是希特勒时代完成的,而且希特勒当时说要让德国的每一个家庭都有自己的轿车,这就是德国“大众”车牌的由来。但是不管希特勒在经济上做了多大的努力,在军事上

主化后的反例宣传的确是在误导民众。一些中国人到海外听到俄罗斯的外汇储备跃居世界第三时（2006年7月的报导），竟大吃一惊，觉得俄国人不是连饭都吃不上吗？印度的民主也一直是中共嘲笑的对象，是民主失败的经典样板。但是，印度自1991年拉奥政府正式开始经济改革至今，其年增长率达7%，这一经济增长率已非常接近中国的水平。印度的金融业和资本市场比较发达，经营效率较高，银行坏账率低于10%。印度的经济结构跟一些发达国家相似，再加上印度有大量优秀且成本低廉的技术人才，因此有人预言印度将在未来成为“世界的办公室”。实际上，印度如今已成为世界的主要研发中心之一。我们无意为俄罗斯和印度说好话，他们都有自己的严重问题和发展变数，但是我们不应该被中共为了维护其既得利益、不愿全面改革所做的片面报导而误导，不加分辨地重复中共的论调，按照中共的说法去思考问题。事实上，共产党在俄罗斯仍然是合法组织，如果俄国人民真喜欢共产党，完全可以在大选中把共产党选回去，人们不走这条路，显然共产党不受欢迎。

对于中国现在遇到的掠夺瓜分社会财富的问题，有人用“资本的原始积累”来形容，意思是西方世界现代化过程中也走过这么一个阶段，所以，也就是正常的了。我们不去说这个原始积累的对和错，我们至少看到西方在原始积累之后，资本很快进入了再生产，同时有产阶级在政治上有了明确诉求，参政，办媒体，搞教育，做慈善等，成为巩固社会秩序的重要力量。而中共治下的原始积累就是捞钱，捞个没完，然后外逃，享乐，根本无意去影响政府和共产党，同西方当时的情况根本不一样，怎么能指望出现“原始积累”后的良性循环呢？

还有一个听起来最彻底的类比：如果你去颠覆国家和政府，你看哪个国家不镇压你？这是一个很“巧妙”的偷换概念的问题，很有迷惑性。其实，这个说法本身就是中共反复宣传灌输造成的概念混淆的典型表现。“煽动和颠覆国家罪”是中共继过去的“反革命罪”以后的替代罪名，这个罪名把普通的人权和言论自由有关的活动归到“煽动和颠覆国家”，本身就是对人权的侵犯。被中共称为“煽动和颠覆国家”、“泄漏国家机密”等等的许多行动，在西方民主国家根本就是受到宪法保障的基本权利，民主政府怎么会镇压呢？办报骂政府，在中国，这就是颠覆国家的“惊天大案”，而在西方是很正常的事，同颠覆国家根本无关，除非是囤积武器或者搞恐怖主义暴动。

对于一些少数极端宗教组织在世界上引起的恐怖和战乱作为，也是中共用来否定宗教自由，为中共的无神论开路的反面教材。而对世界上作为主流的那么多的正教正信带来的对社会道德和人性的正面意义，中共却尽力回避。很多不明就里的人，因此而跟着中共对信仰一概进行批判，排斥别人争取信仰自由的努力。

这样似是而非的类比还很多。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些对于中共不利的东西，中共就不类比了，而是强调中国特色和国情。“国情”成了中共逆世界潮流的一柄尚方宝剑。其实，这不能学，那不能学就是因为触动了共产党的既得利益而已。

4) “说我没做好，你自己要先做好”

“说我没做好，你自己要先做好”，这是人们反驳别人批评的常用语。其实不对。生活中人人都可以对电影明星、足球运动员指手画脚一番，并不要求自己一定要比对方更会演戏，更会踢球。

但是，中共很喜欢用这句话来为自己的恶行狡辩。当美国批评中共人权问题时，中共的回应就是美国的人权也有问题，而且也要出一本指责美国的人权报告，从而认为自己的人权问题就无所谓了。而中共出的美国人权报告，其内容都来自美国媒

体的妖魔化中，在政治暴力的威胁中，在中共险恶地安排代理人从内部进行颠覆中，中共完成了对儒释道的系统批判和取代。今天，大多数中国人已经不知道儒释道为何，只要一句“封建迷信”，就足以让人们条件反射式的避而远之。口号式批判即可，无需证明。

2、批判传统观念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易经》最开始的两卦即点出中国人对天地的态度，君子顺天道而行才能自强不息，以柔顺而深厚的道德去承载万物。对人则讲诚信和睦，推己及人，把对自家老人的尊重和对孩子的爱护推广到所有的老人和孩子身上，即所谓“讲信修睦”、“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地人”三才既定，传统观念的根本也就定下来了。

中国人敬天、敬地、敬神、敬祖，并由此形成一套日常生活中的处世之道，代代相传。

而共产党就“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共产党宣言》）。它对传统观念的批判，是其从中国人的生活中彻底清除传统文化以及信仰的必要步骤。

中共建政伊始，就系统的通过“社会发展史”教育向全民洗脑，把中国近百年来遭受列强侵略的原因统统归结为传统文化的“落后”、“愚昧”，把传统社会描绘成“腐朽、没落”的“旧社会”，把传统观念中的信仰部分标为“愚昧和迷信”，把其中的道德部分标为“吃人的礼教”。这样，利用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理和自强的愿望，中共在全社会发动所谓破除“封建迷信”的运动，打着所谓“移风易俗”的口号，杜绝一切与传统信仰相关的民间活动；同时中共还把传统观念批为替“封建统治者”麻醉人民的政治工具，“使他们安于被剥削的生活”，把传统社会秩序批判成压迫百姓的“封建宗族制度”，是和“封建专制制度”相呼应的，把根除传统文化的运动上升到政治高度，这样就可以通过大规模的群众运动，“监督”、“检举”、“揭发”民间仍然保持传统观念的言语和行为，达到彻底根除的目的。

在此试举数例被中共批判的传统观念。

1) 批判对天的敬畏

中国人一直保持着对天的敬畏。即使那些没有明确信仰的人，也相信“老天爷”。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天虽然无形无象，但却无所不知、无处不在。

当王朝末世或者社会普遍道德堕落的时候，天就会降下灾难，之前也会有警告，即所谓“天垂象，见吉凶，圣人则之。”帝王登基后，要行祭天之礼；每年正月十五和冬至，皇帝都要到天坛祭天，这都体现出对天的尊崇。

在政治生活中，“天”昭示了治国的法则，孔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在日常生活中，“密室私语，天闻如雷”；兵法、建筑、乐器等都体现着天的规则，即使造反也要打出“替天行道”的大旗。

对“天”，传统观念中从来都只有敬畏，而只有共产党才对“天”斗争。

对天的敬畏维护了人的道德，“人命关天”的观念维护了对生命的珍视，“天人合一”的观念则有效的保护了自然。这些都是共产党杀人和毁坏环境的障碍，而中共却需要依靠杀人来让人在恐惧中臣服于它，需要“战天斗地”的豪言壮语激起人们对它的崇拜，和破坏自然的决心。

毛泽东说“我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这本来是贬义的“无法无天”变成了褒义的勇敢，并鼓动人参与到“无法无天”的政治斗争和环境破坏中。

2) 批判命运与善恶报应

中国人从对“天”的敬畏中派生出“天命”观,以及“善恶有报”。

“认命”是中国常说的一句话,被中共解释为面对困境的消极与无可奈何。事实上,“认命”的真正意义是“尽人事而听天命”或“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孔子提出“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却仍然在 54 岁时辞去鲁国大司寇的职位,周游列国十四年,推行王道,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里并无消极避世的含义。

在个人的生活中,“认命”的思想并不否认个人的奋斗,仅仅是对人生中不可抗力的解释。更进一步说,传统观念中认为人的命运取决于前半生、乃至数世行善或行恶所承受的善报或恶报。因此“命运”也常常与“善恶有报”、“福报”、“恶报”联系起来。

《易经》有云:“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这种观念让人努力行善,为自己今后的生活,乃至子孙后代积累功德。“善恶有报”也基于“头上三尺有神灵”,“人间私语,天闻如雷;暗室亏心,神目如电”等观念。

相信命运与报应,让人能够努力行善,看淡欲望,顺天而行,不会为逞一时之快而不计后果。这种思想更让人相信冥冥之中自有天意,“人心生一念,天地必相知,善恶若无报,乾坤必有私。”

对朝代更替来说,中国自有文字以来就不断留下对后代历史大事的预言,其准确程度令人十分惊奇和赞叹。这种“奉天承运”的天命观也是帝王执政合法性的来源。

中共将“命运”与“报应”批判为“封建迷信”,并禁演宣传这类题材的戏剧。其依据为无法证实的“进化论”及“历史唯物主义”假说。中共非常清楚的是,如果一个人恐惧于报应,是绝对不敢一直跟着中共行恶的。

3) 批判柔顺与忍让

“柔顺利贞,君子攸行”——《易经》以“坤”卦来描述大地。大地有“柔顺”之德。这种柔顺并非无原则地逆来顺受,而是顺应天道而行。

“柔顺”中含“忍让”之德,“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韩信受辱于胯下的典故流传了两千多年,这都反映出中国人对“忍”的推崇。

中共则鼓吹斗争,“共产党的哲学是斗争的哲学”、“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解决问题的方法不是靠协商与对话,而是靠暴力和镇压,并将敢于报复描述为勇敢。

苏东坡曾经说过,受了侮辱后就立刻拔剑而起与别人打起来,这是匹夫,根本谈不上勇敢,真正勇敢的人,在突然面临侵犯时,总是镇定不惊。而且即使是遇到无端的侮辱,也能够控制自己的愤怒。这是因为他的胸怀博大,修养深厚,志向高远。

“忍”在传统文化中是自持、宽容、不记他人之过,但绝不是懦弱和无原则的退让。

中共主张的“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实为心胸狭窄、睚眦必报的表现。这非常符合其“斗争”精神。这种思路让社会上的人冤冤相报,人人为敌,这也是造成今天人际关系紧张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国人看到乾为刚、坤为柔,刚柔相济,万物咸亨,由是领悟和谐之道。传统观念中非常重视“和”。皇宫三大殿,分别叫“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即反映出对和谐、和睦的推崇。

中共的发言人现在也常常把“对话”、“协商”、“合作”等等挂在嘴边,这种谎言是镇压的另外一面。近者如汕尾事件、汉源事件、陕北油田事件以及对上访人士、

但根本不会批准申请,对申请人还要打击报复,更别提你要申请到天安门示威。而在美国,民众可以很容易地申请去白宫前面抗议,而且有些抗议人士就是故意要让警察抓走制造新闻效应的,美国警察常常会主动问抗议者要不要被逮捕。根本就不是象中共宣传的那样,美国白宫前不容许抗议,要象中共一样抓人什么的。就算抗议者有过激行为,那也是按法律制度来处理。

还有人说美国也对民众开过枪啊。是有,那是 1932 年美国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退伍军人补贴金事件,一万多名失业的退伍军人在美国国会大厦前集会。当时的胡佛总统下令联邦军队进驻华府,驱散示威民众,造成两名退伍军人死亡,多人受伤。根据美国公开出版的百科全书、记录片、历史书、回忆录等记载,他们并不是死于美国军队,而是被华盛顿的警察误杀。不论这件事本身的是非,我们来看看美国朝野对这件事情的反应。首先,美国政府遭到新闻媒体的无情鞭答,《纽约时报》以头版头条的长篇通讯报导了事件经过,胡佛总统也向美国人民承认自己的责任。在当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中,人民更是用选票把胡佛赶下台去,动用军队的教训之深,成为后来美国总统的前车之鉴。1971 年在白宫附近发生大规模的反越战示威,尼克松对前来请示的助手说:“让他们在那里好了。”对比之下,至今中共也没有对“六四”事件有一个自我反省的说法,中国立法机构也没有提出过如何接受镇压民众的教训,以及如何避免将来犯类似错误的提案。

还有一个很流行的讽刺西方言论自由的例子,就是说你写篇文章,看西方报纸是不是给你发表,如果没有发表,那肯定证明言论自由是假的。很多中国人因为这么一个例子,似乎一下就看穿了西方言论自由的虚伪,也就认为中共控制言论也就顺理成章了。这其实是中共给人们制造的歪理。报纸怎么可能来什么都给发表呢?真要如此,那也只能是头几个人有份,版面有限啊。事实上,言论自由并不是说每个媒体都要做到“绝对公正”。每个媒体都有自己的理念,他们后面当然也有自己的政治经济势力,也就是说,媒体作为个体来说,除了职业道德之外,当然有自己的喜好,对稿件和报导角度都有自己的选择,这并不是媒体界要掩盖的什么秘密。言论自由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对媒体本身,它可以自由地发表它想要发表的内容(出格了会通过法律途径解决),二是对读者而言,他的自由体现在可以获得任何意见的媒体,你既可以看反共的报纸,也可以看亲共的报纸,还可以看中共的喉舌报纸,你也有自由去办自己的媒体去发表你的意见,这才是媒体自由的真谛。新闻自由最关键的尺度是权力者有多大权力控制资讯。在美国,政府常常处于媒体的批评之下,即使政府想动用权力制止,也无能为力。但在中国,如果共产党不想民众在媒体上看到什么消息,动不动就给予封杀。把言论自由当作任何媒体都必须发表你的言论,根本就不现实。用西方报纸都有自己的立场来否定言论自由,不过是为中共钳制媒体找借口。中共自己是知道西方言论自由的妙处的,所以中共才在海外极力渗透、操控,并大肆发展自己的亲共媒体。

海外的民主选举出现的争端,也常常成为中共笑话民主自由、用来劝说人民拥护中共独裁的素材。很多人也由此而相信中共的说法,帮助中共维护一党专制。民主也许不是最好的办法,但是,相比中共的黑箱斗争和可能带来的动乱,民主的透明、媒体的监督和军队的独立毕竟是一种可借鉴的出路。大家都注意到,民主国家不管选举争端多厉害,国家很难陷入动乱和战争,这就是民主对社会的制衡作用,根本不是中共宣传的那样像个洪水猛兽。

俄罗斯和平演变之后,中共就一直害怕俄罗斯好起来,所以总是宣传俄罗斯如何如何惨。俄罗斯固然有其自身的“国情”,问题多多,但是,中共把俄罗斯作为民

盾积蓄到一定时候,就会像火山一样爆发。共产党宣传的“(党的)稳定压倒一切”就是积累社会矛盾等待总爆发的过程,一旦危机爆发,我们今天拥有的财富都会化为乌有,民族又会遭到生灵涂炭。

大家知道,经济的运行有自己的周期,不可能是“稳定”的,动荡不可避免。越如此,越需要有合理的制度作基础,来保障社会的稳定。真正的稳定,需要自由的秩序,法治的秩序和公正的秩序。英国是最早实行宪政民主的国家,三百多年来保持高度稳定,人民自由,经济繁荣。有矛盾要及时疏导而不是强行压下,中共利用人们在各种运动中整怕了、希望稳定的心理,偷梁换柱,把它自己统治的稳定强加给民众。这种稳定是不稳定。

中共“稳定压倒一切”带来的代价,就是现在转型更难了,成本更高,风险更大。在社会矛盾越来越尖锐的今天,中共只知道一味的打压维权和异见人士,镇压信仰团体,封锁、过滤消息。中共在维护集团和个人既得利益的过程中,原罪越来越大,已不可能指望着它有一天会心血来潮,大发慈悲,主动开展政治改革,实行自由民主。可以说中共本身才是最大的不稳定因素。

3) “别人也一样”

中共很喜欢用“国情”来作借口。别人有民主,中国不能有,别人能有言论自由,中国不能有,别人有信仰权利,中国不能有,为什么呢?因为国情不同。但是,如果别人有什么坏事,中共这时就不讲“国情”了,而是强调“普世价值”,告诉人民原来“天下乌鸦一般黑”,然后就要老百姓认可、理解、原谅中共的劣行。

说腐败,它会说哪个国家没有腐败?说镇压民众,它会说美国也对民众开过枪;说民主,它会说印度搞民主,也没搞出什么名堂;说和平演变,它会说俄罗斯演变后是如何糟糕;说选举,它会说台湾的选举是多么混乱;说中国现在资源浪费,贫富差距大,它说那是资本的原始积累,哪个发达国家没有经历过?说没有言论自由,它说西方哪个媒体不是被财团控制?说天安门抓访民,它说你到白宫去抗议试试,看抓不抓你;说中共人权不好,它抓住美军虐囚大做文章,说美国自己都不好,哪有资格说中共?……

这些似是而非的言论有时比那些严肃的说教更有迷惑性。但是,这种类比本身却是错误的,是欺骗误导民众。

首先,人都有人的弱点。所以,哪个国家都有贪污,都有人权问题。我们无意去为其他国家的行为辩护,我们只是要指出中共“因为别人杀了人,所以我就可以杀人”的这种颠倒是非的逻辑。其次,中共在报导宣传那些类比例子时,常常对事情发生的背景、经过和处理方式断章取义,有意隐瞒不利中共的东西。我们知道,出问题是一回事,对问题的反应和处理是另一回事。而中共重在渲染问题的发生,而回避民主国家从政府、媒体到公众反应和处理问题的姿态。

美军虐囚事件一出来,中共就大加炒作,无非是想说,美国人权也好不到哪里去,中共的人权不好有什么关系呢?但是,如果我们对比美国政府和中共在这种事情上的处理态度,就会发现区别很大。事实上,案发之后,美国自己是举国震动,不但美国媒体上大量曝光,就连总统也得马上回应,立即着手调查。中共引用的资料基本上也都是来自美国媒体的公开报导。而中共对自己的人权恶行,却是从上到下地一味掩盖,还不准别人去揭露。

对于中共在天安门抓访民,甚至“六四”屠杀,有个说法,就是你到美国白宫前面抗议看抓不抓你。中共在这里混淆了一个根本区别。中共说是可以申请游行示威,

失地农民、拆迁户、下岗工人的残酷镇压,实则为斗争精神的延续,利用屠杀营造“伪和谐社会”。而在另一方面,由于斗争已经成为中共赖以存在的主要支柱,一旦寻求对话与和解,中共自身就会解体。

4) 批判传统社会秩序

中国人从天尊地卑的自然状态,以及《易经》中“乾坤”与“阴阳”的对应扩展出一套家庭和社会伦理,再从这套伦理中派生出社会秩序。

“尊卑”是中国传统观念中的重要部分。按照正统文化,“卑”不一定是坏事。道家一直推崇水的美德,因为水总是“处下”。“处下”的一方是被爱护和保护的一方,处上的一方则是付出的一方。男为强,女为弱;男为刚,女为柔;但刚强不一定意味着好事,道家有“兵强则灭”、“木强则折”、“柔弱胜刚强”的说法。

中共一直打乱秩序,谎称要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但是社会不存在中共意义上的平等。

在社会生活中,一个国家、企业、社团或家庭,总要有人负责任去协调一些事情,有人提出计划,有人具体执行,这是一种正常的社会状态,也是每个人的智力、体力等综合因素决定的。而中共将其极端化了,将其描述成阶级压迫和阶级斗争。所以中共要打乱一切尊卑和秩序,这事实上是无法做到的,这种所谓的“解放”实为制造“混乱”。

举例来说,倡导男女平等的人也无可否认,在遇到灾祸、疫病、饥荒、战争的时候,妇女儿童都是首先要保护的对象。如果倡导男女平等,似乎妇女应该和男子受到同样的对待,这显然是不对的。当年泰坦尼克号沉没的时候,妇女和儿童是最先上救生艇的人,即使她们的丈夫也必须以一个男子汉的担当和轮船一起沉没。无人对此决定持有异议,这反映出在我们的内心深处并无男女的绝对平等。

推广到社会生活中,一个企业或者国家需要有决策者,决策者的决议需要执行者去执行;一支军队需要司令官,下面的各级军官和士兵负责执行命令;如果从社会职能来看,确实存在“尊卑”的问题,但“尊卑”并不必然意味着剥削和压迫,它也需要上下之间的“仁”和“忠”的美德来维系。

推广到家庭中,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传统的伦理自然承载起一个和谐有序的家庭和社会。

而“平等”从根本上来说,是佛法中的“众生平等”,是道家的“天道无亲”,是儒家的“有教无类”,是西方的“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是机会的平等,而绝非结果的平等。

中共对于“平等”的歪曲宣传导致了社会的极度失序和混乱;对于“男女平等”的歪曲解释实则为对妇女的迫害,强迫她们去做力不胜任或者不适合妇女做的工作。例如中共1976年4月出版的《同旧传统观念彻底决裂》一书中列出了15位女青年的文章,她们所从事的行业即为本应男子所做的送煤工、屠宰工、装卸工等,“紧握杀猪刀,能顶半边天”成了歌颂的对象。

中共治下的社会同时也是极其不平等的社会。由于中共垄断了一切资源,虽然它号称人民公仆,实际上人民都被当作奴隶,无论是政治权利和经济权利,官民毫无平等可言。

5) 以财产为衡量道德的重要依据

翻开中国正史的第一章,《五帝本纪》中记载了五帝的德行以及百姓对这些

德行的认可和尊敬。这些德行深入人心,流传数千年,并从汉地流向少数民族地区和其他国家。

在中国人的观念中,道德和学识是使人获得声望和地位的来源。孔子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一个人的人品成为选官的重要指标。汉代的时候实行察举制,荐举标准为:“德行高妙,志节清白;学通行修,经中博士;明达法令,足以决疑……”另外还要具有“质朴,敦厚,逊让,节俭”的美德。至魏晋,官府实行九品中正制,道德也成为选官的重要因素。至隋唐开科取士,对于儒家道德的理解程度也同样是应试者能够写出好文章并由此登上仕途的先决条件。

到了中共建政时,德高望重的乡绅、行会首领和知识份子反而成了镇压和打击的对象,而一个人的出身是否“根红苗正”才是获得社会资源的最重要考量。每个人的道德本来取决于其个人的思想行为,而到了中共那里,道德成为一个阶级的群体性标志。“谁受穷谁光荣,谁致富谁狗熊”,贫穷代表了天然的正确和正义,代表了受压迫者、代表了“造反有理”、代表了“革命”最坚决最彻底。

一个人的贫穷和富贵本来是不定的,也可能因为勤奋肯干和抓住机遇而致富,也可能会因为挥霍而败家。也可能某人田连阡陌,但数年后却讨饭为生。而中共实行“一刀切”,以它夺取政权的那一刻来划分阶级。

对于富贵的仇视,导致中国人在几十年的时间里,以贫穷作为傲视他人的资本。在另一方面,中共在打倒某人时,只需称此人是地主或者资本家,余下的话就不用多说了,富贵代表了“剥削”,代表了“镇压”,代表了“罪恶”。

几十年后,共产党自己颠倒乾坤,号召大家去发家致富。今天的人们不再以富贵为罪恶,转而以贫穷为可耻。此时评判一个人的好与坏、成功与否也和道德脱钩,而以人的富裕程度来衡量,谁有钱谁就有本事,哪管这钱是偷来、抢来、骗来、贪污受贿来的、出卖肉体来的或者出卖灵魂来的。“笑贫不笑娼”的结果是让大家更加不择手段地捞取财富,之后便沉迷声色之中,以既得利益者的身份认同中共的统治。

6) 宣扬粗鄙的党文化

中共治下的许多人以文雅为耻,以粗鄙为荣。

中华民族向来被称为礼仪之邦,人与人之间讲文明,重礼仪,人与人见面拱手作揖,文质彬彬。但中共却号召人们“滚一身泥巴,磨一手老茧,养一身革命虫”。“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才是最革命。知识份子讲礼貌,中共则宣传“大老粗”。在文明与野蛮之间,中共毫不犹豫地选择了野蛮。

今天的中国人,不讲礼貌,随地吐痰,公共场合大声说话,不管有钱没钱,都要说几句粗话、讲几个黄段子。出国以后,许多中国人在禁烟区吸烟;在宗教场所嬉戏游玩,不尊重当地民俗;在飞机、宾馆、车船等地高声接打电话;在大庭广众之下脱去鞋袜、挽起裤腿;穿着睡衣出家门;排队加塞儿等等,以至于在许多国家的旅游场所,当地人都特意在厕所里贴上中文的“便后冲水”的提示。这都是中共破坏传统文化带来的恶果。

7) 其他受到批判的观念

中共的批判常常不是理性的批判,而是将思想批判转变成人身攻击。然后用“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反对”的歪理邪说将被批判者的思想一概骂倒。而对于思想者的人身攻击,也仅仅是非常简单地扣上“奴隶主阶级”、“地主阶级”、“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等帽子而已。

名。维持 9%左右的经济成长率 100 年,可能吗?有人评论到,下一个世纪远远不是“中国的世纪”。但在大城市橱窗式的繁荣之下,一个真正的中国被掩盖起来了。经济表面繁荣带来的视觉冲击,一“俊”遮百丑,帮助中共披上了一层迷惑人的面纱。短期利益和盲目展望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抑制了人们对现实的全面认识,“不识庐山真面目”,更谈不上对共产党的历史反思和理性思考。

我们都知道做诗的功夫在诗外。同样,要把经济真正搞上去,就要首先解决信仰、道德、法律、言论自由、媒体监督等一系列非经济因素。这些问题不解决,经济也就不可能“搞上去”。“把经济搞上去再说”只是共产党拖延体制改革的借口而已,但现在人们竟然毫无察觉,还以为是真理。其实就是陷入了党文化思维,按照中共的思想思考问题。中国人民现在有很多自由,但都集中在私生活、体育和娱乐上面,其他方面依然是禁区。其他国家在发展过程中,人民是积极参与政治和制度的改良,争取自己的各种权利,而中国人民现在不是这样,对于那些敢于要求权利反中共迫害的民众,许多人不但理解,还反对别人去争取权利,他们愿意把一切都交给共产党,幻想共产党的自动改良和恩赐。

2003 年中国大陆出现了一部引发广泛争议的电视剧,它就是电视连续剧《走向共和》,后遭禁播。该剧真实地揭示了清王朝改革开放必然失败的命运,这一点对中共来讲具有刺激性。清王朝在改革开放之前是没有电灯、电报、电话的,也没有火车和汽车。短短的几十年,上海滩成了世界四大明珠之一,成了帝国主义冒险家的乐园,它的三大条马路上的一栋栋花园洋房,它的浦江岸边的一栋栋的高楼大厦,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早期橱窗。可是这个成就它挽救了清王朝灭亡的命运吗?没有。1905 年孙中山先生说:单单是引进铁路、火车、电话、电报这样一些西方的物质文明措施,却不进行政治改革,只能为国内的贪污腐败敲诈勒索,打开更加广阔的门路。

其实,今天的人们也不是不懂得要各方面协调发展的基本常识,都知道越往后,修正的成本越高。关键就是在党文化的氛围之中,屈从中共的淫威,迎合中共的利益,觉得发展经济至少对眼前短期有利,就跟着一点点的叫喊要“把经济搞上去再说”,而对中共的杀人放火都可放任不管。

2) “稳定压倒一切”

经历过政治运动的中国人,对“稳定”有特别的渴求。所以,“稳定压倒一切”在老百姓中很有共鸣,成为中共新时期维护统治的主打口号。

说起共产党,人们联想到的就是暴力革命和政治动乱,怎么现在的中共却祭起“稳定”的大旗了呢?说起来很矛盾,其实,也很简单。就是中共可以“动乱”人民,而一旦人民要“动乱”中共,中共就要高唱“稳定”了。几十年来肆无忌惮地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把人民“动乱”得民不聊生,而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兴起的民主自由浪潮和人民的觉醒,眼见要把中共“动乱”掉了,这时中共就高喊起要“稳定”了。

显然,中共说的稳定只是中共政权的稳定,而非国家和社稷的稳定。在中共的跛足改革中,那些既得利益者,尤其是那些不受制约的权势者,最需要“稳定”,以便“稳定”地捞取利益。由于他们最维护既定秩序,因此就成了最坚定的“稳定”力量,最可靠的“稳定”因素。这种“稳定”可以高于良知和道义,老百姓是死是活也可以不顾了。当矿井工人死于矿下,中共以“稳定”掩盖死者的冤屈;当拆迁户被逼上梁山,不得不冒死上访,幻想着找回公道,中共又以“稳定”为名进行截访,甚至用“破坏稳定”对遭受不公者进行迫害打击……这样的稳定是假的,社会不公和矛

容中共,中共就不会改良。于是,期望等于没有希望。

可以这么说,在人们盲目的“期望”中,所谓给中共三十年时间的幻想中,社会危机可能已经把中国破坏好几个来回。

更重要的是,“改良”对今天的中共来说,已经太奢侈了,因为中共积累的原罪使它根本不愿、不敢、不会改良了。维护统治地位成为中共保住集团和个人利益的一切底线,在中国警察网上有一句醒目的口号,就是“维护党的执政地位”,如此明目张胆地把警察当作党的家奴,可见共产党是铁了心地“不会从良”,而人们的盲目期望更是给中共增加不愿顺应历史潮流的能量。很显然,今天的中共已经成为理性讨论和解决中国问题的基本障碍,只有把中共解体掉,让中国人民没有后顾之忧地来发挥一切聪明才智,自由讨论国家的方向和前途,民族才真正有希望。

下面我们举一些典型例子来说明今天的人们是如何用恶党的思想和恶党教会的语言来思考问题的。现在人们对共产党的一个最大情结就是这二十几年的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的巨大变化。在这种冲击之下,人们对如何认识共产党,共产党变没变,有没有希望等都变得非常困惑了。

1) 经济表面繁荣带来的视觉冲击:“把经济搞上去再说”

视觉和感官对人的冲击是巨大的。被共产党整怕了、弄穷怕了的中国民众,在生活有了一些改善之后,就很容易满足了。再经过中共一年复一年的“好日子”、“盛世大联欢”的宣传,好像又闹起“赶英超美”,把人们整得飘飘然了,中共乘机浑水摸鱼,用经济的发展来为其执政合法性寻找依据。其实,经济发展同中共毫无关系,功劳属于勤劳的中国人民。有人说,只要有外商投资,只要有智慧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只要有吃苦耐劳的工人和忍辱负重的农民,就是放到非洲小国,也能在二十几年堆出一个繁荣的物质世界。

但是,这样的跛足发展符合民族的长远利益吗?发展的顺序问题,什么先,什么后,相互依赖关系等等,是现代管理中最基本的问题之一。

看看在中国表面繁华的后面是怎样一幅景象。政治改革的停滞,经济体制的畸形,社会的不公,官场的腐败,贫富的差别,道德的堕落,环境的破坏,资源的短缺,对人权、信仰和宗教团体的严厉压制,对民主自由的敌视,对言论和媒体自由的根本钳制,银行坏帐,金融危机,黑社会,娼妓,占大多数人口的弱势群体没有声音等等,以及盘根错节的社会矛盾,风起云涌的民间维权和快速增长的群体性抗争(2005年达8万多起),等等,更别提天有不测风云的大自然的惩罚和报复。在表面繁荣之下的中共政权,犹如坐在火山口上一样。所谓的经济高速增长实际上是以破坏环境和浪费能源为代价的,如果算上环境代价,中国这些年的实际GDP是负增长。

对于中共急功近利的经济畸形发展带来的潜在危机和可能的民族灾难,人们不愿去想,不愿去面对。一是屈服于中共的强权,觉得想也没用,还自找麻烦,二是觉得现在生活总是好了些,哪管这种发展能不能持续,只顾“闷声发大财”。而那些只为赚钱的外商和政客们,看到的只是想要如何从这世界上最后一块市场大饼中分得一杯羹。虽然外界认为经济的发展会给中国带来民主和自由,这二十几年的事实证明外商不但没能把民主和自由带进中国,反而成为中共腐败食物链中的添加剂。

有学者把中国分成三个世界,第一世界住在别墅里享受着别有洞天,第二世界在为住房、医疗和子女教育而不敢消费,第三世界正在温饱线上苦苦挣扎。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撰写的《中国现代化报告2005》一书,认为中国经济落后美国100年,如果维持9%左右的经济成长率100年,才能进入世界前10

中共通过诋毁孔子,随之否定了儒家的“中庸”思想、“仁义礼智信”、“克己复礼”、“温良恭俭让”等。许多人在看到这些字眼的时候,想到的不是其本身的内涵,而是高分贝的广播、铺天盖地的大帽子、大字报,以及被批判者的悲惨下场,从而出于恐惧而自觉与这些思想“划清界限”。

儒家讲“仁”,就是要关怀他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对“仁”的批判导致“己所不欲、要施于人”。

中国人崇尚“中庸”。“中庸”绝非中共所解释的“和稀泥”、滑头、左右逢源、两面派,其本意是“常守中道”,即遵循天命,“不可须臾离也”。其中包含学习方式“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处理好“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的关系,达到“至德”,完全是修身治国之道。在中共那里,完全扭曲了“中庸”的本义,变成了为了保护自已而放弃原则的犬儒。

3、灌输斗争思想、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邪说

2005年中共少将朱成虎在香港面对西方记者曾说过:一旦中美开战,中国“准



备西安以东的所有城市被摧毁。当然,美国人将必须准备好数以百计,或两百个,甚至更多的城市被中国人夷为平地。”这是中共党文化斗争思想的一个典型反映。实际上在党文化中斗争和流血已经成为常态,而和谐、包容反倒不正常了,因为按照马克思主义,后者缺乏“革命性”。

在这种斗争思想指导下的生存逻辑,就是为了发展、为了生存,就必然要有牺牲。当然被牺牲

的首先是无能力、也无权进行自由选择的弱势者。朱将军虽然没有明言中美开战时自己将身处何地,但可以肯定的是,像朱将军这样的“国家栋梁”,自然有着比平头百姓大得多的选择自由。早年因鼓吹“自然科学的阶级性”而得到中宣部科学处处长的赏识,后来又仗《红旗》杂志推荐之力而成为中科院院士的何祚庥,在2005年底接受媒体采访时谈到中国矿难频频的问题时,就脱口道:“谁叫你不幸生在中国了?”“中国要发展,某些代价是不可避免。”其实,相当一部分年轻人也是这样看待当今中国底层民众的不幸与苦难——大概他们本人都与“何院士”、“朱将军”一样,以精英自居,并无打算把自己作为发展的代价。

党文化中的斗争思想,经过中共几十年灌输,早已不仅局限于政治领域,而且贯穿于中国整个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种斗争思想,说白了就是把达尔文的进化论应用于人类社会,主张“弱肉强食,适者生存”。它推崇的是禽兽的丛林规则。在这种规则之下,是与非、善与恶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不择手段在竞争中取胜——无论是官场、商场或情场。

在一个鼓吹生存竞争、弱肉强食、崇拜狼性的社会里,人与人之间必然是紧张的争斗、撕咬、充满戒心。这也就不难理解充斥整个社会的假药、假酒、假酱油,毒大米、毒面粉、毒瓜子,更有注水肉、地沟油、大头婴儿奶粉……不但文凭可以轻易造假,桥梁、大坝都可以造假,甚至结了婚的不敢相信婚姻,女人怕丈夫背叛,男人则怀疑孩子跟自己没有血缘关系……而见死不救、落井下石都已经司空见惯。很难想像,付出这样代价的“发展”会使这个民族最终走向强大。

1) 中共灌输斗争思想的目的

在乔治·奥威尔的名著《动物庄园》中，一群动物不堪人类的“剥削”而起来革命造反，最终赶走了人而建立了一个由动物自己当家作主的“动物庄园”。率先领导动物们进行“革命”的领袖们——猪——不久就取得了单独享用牛奶和苹果的特权。面对当初怀抱“所有动物一律平等”的信念而参加革命的其他动物们的疑惑，斯奎拉（负责宣传的猪）解释说，“我们食用这些东西的唯一目的是要保护我们的健康。……庄园的全部管理和组织工作都要依靠我们。我们夜以继日地为大家的幸福费尽心机。因此，这是为了你们，我们才喝牛奶，才吃苹果的。你们知道吧，万一我们猪失职了，那会发生什么事情呢？琼斯会卷土重来！是的，琼斯会卷土重来！真的，同志们！”琼斯是原来的庄园主，也即“旧社会”的统治者。尽管个别动物还依稀记得琼斯在的时候动物们生活状况似乎不比目前更差，但是经过日复一日的宣传，对于琼斯卷土重来的恐惧，已经条件反射般的深入每个动物的头脑中，因此大家对于猪的特权也就无话可说了。很快地，猪的特权越来越多。而另一方面，如何防范“亡我之心不死”的琼斯卷土重来，特别是揪斗、屠杀与琼斯勾结、破坏庄园建设的动物“叛徒”，则成了动物们日常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在这样的“头等大事”面前，其他的不满和异议都成了不重要的琐事了。而时刻“提高警惕”、“准备战斗”则成了超越一切社会生活最重要的内容了。

奥威尔以寓言的形式，形象而深刻的描绘了极权统治者鼓吹斗争哲学的实质：通过在人们头脑中塑造和保持一个无时不在的敌人，通过时刻强调敌人的危险，强调“团结一致”的必要性，使人们不得不“暂时忍受”极权统治者的一切暴虐行为，以为这种暴行出自于一个良好的愿望，并最终将给民众带来幸福。然而这种斗争总是“长期的、复杂的、艰巨的”，所以人们的“暂时忍受”也就永远没完。

作为中国人，我们都很熟悉这种时刻存在的“危险”，这种“危险”曾经来自于“一小撮蒋帮特务”，来自于“一小撮妄图复辟翻天的地、富、反”，来自于“一小撮猖狂进攻社会主义的右派份子”，来自于“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来自于“一小撮牛鬼蛇神”……这些“危险的敌人”，曾经是我们身边的亲朋、好友、长者、导师、街坊邻居。按照中共“你死我活”的斗争理论指导，他们中一小撮一小撮的被“消灭”，算起来大约已有至少4千万中国人死于非命。

随着岁月的流逝，随着共产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破产，今天中共已经无法向百姓解释清楚，当初这些“人民的敌人”到底危险在哪里？然而不知不觉中，人们发现新的“危险”仍然来自于身边，在民众意识中斗争依旧是必要的。只不过如今“危险的敌人”的罪名悄悄从已经过时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换成了所谓的“危害国家安全”、“颠覆政府”、“反华势力”、“从事X教活动”等等。

这正是中共几十年来向民众灌输斗争思想的结果。实际上几乎在传统的文化被打倒、批臭的同时，当中国人几千年来一贯承传的传统善恶价值观被彻底颠覆的同时，中共就已经开始向民众灌输党文化的是非价值观了。这种价值观的核心之一，便是其“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斗争哲学。

共产党的世界观是建立在阶级斗争的理论上的，其哲学思想是唯物辩证法，主张世界的矛盾性、对立性、斗争性；主张事物内部通过斗争，从量变到质变，事物由此从低级向更高的阶段发展和转化。这种思想应用到人类历史，就是所谓历史唯物主义，即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阶级斗争的历史；斗争的核心是国家政权；国家政权依靠暴力来获得，也依靠暴力来运行和维持。说白了，也就是把达尔文的进化论运用于人类社会，阶级之间通过残酷的斗争，最终弱肉强食，适者（所谓“先进阶级”）生存。

天嘲笑昨天用恶党的思想思考问题的人，站在昨天的位置又是觉得一切都很正常，照样拥护那时党的政策，很可能还在那里嘲笑前天的行为。今天认为共产党可以迫害法轮功的人，倒退三十前，他一样觉得共产党应该发动文化大革命，再往前，他一样觉得大跃进是如何英明正确。

说起“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人们都会嘲笑那时的荒唐。其实，今天的人们一样在用这种逻辑思考问题，只是表现形式不同，自己觉察不到而已。

在连续几年取得农业发展之后，《人民日报》1958年8月27日发表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一文，这是中共中央办公厅派赴山东寿张县了解情况的人写回来的信。文章为了说明亩产万斤“一点也不神秘”，有声有色地描述道，只要足水足肥加深耕加密植，“亩产万斤就成一个现实的事物了。”更有科学家出来根据植物对太阳光能的利用，论证亩产潜力可高达5.85万斤。如今回首当时的言论和行为，都觉得不可思议。

今天，中共的跛足改革使经济有了一些发展，于是在中共的宣传和灌输之下，人们对于中国的未来有了个直线外推的思考模式：现在制造玩具出口，将来就能制造飞机出口；现在是贫富差距，将来是共同富裕；现在有腐败、社会不公、教育和医疗福利等各种问题，将来都会解决；现在环境被污染，将来自然会被治理；现在能源不够，将来一定会有；现在是群体抗争不断，犹如火山要爆发，将来一定会成为“和谐社会”；现在人们的道德日益败坏，将来一定会高尚起来；现在是经济发展，将来一定会有民主自由的制度发展……“二十一世纪将是中国的世纪”，“中国将在本世纪成为雄霸世界的超级大国”——其实，这就是新时代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翻版。

在那个年代，“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造成了“共产风”、“浮夸风”和“瞎指挥风”，把大跃进变成了大后退，人民公社变成了人民空社。今天这种思想的危害绝不亚于当初，而且由于更隐蔽，人们不容易觉察，更重要的是，当初的思想是被灌输的，而今天人们的这种思想却是自己“思考”出来的，危害也就更甚。

其实，“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句话本身很“唯心主义”，不过是表达一种气魄和决心。但是，一旦普通的哲学内涵被灌进了党文化，就变得极具毁灭性了。在极端唯物主义看来，这不再是表达决心，而是要变成实实在在的物件，要的就是亩产指标，层层夸大的指标，是亩产万斤的高产卫星。不信神的共产党，追求的是“敢叫日月换新天”的大无畏精神，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一种莫名的东西冲昏了人们的头。党文化扭曲人性之甚，可见一斑。

昔日“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号角鼓动人们不顾客观规律和现实，要亩产万斤，亩产十多万斤。今天“全面崛起”的鼓噪同样激励着人们面对中国的危机熟视无睹，盲目相信中共。二十几年来的跛足改革带给中国巨大的危机，但人们不去监督中共，不去批评中共，不去反思中共，不去解体中共，而是不作为，甚至反对别人作为，盲目地把一切期望都寄托在造成这一危机的中共身上，期望中共有意愿解决，期望中共有能力解决，认认真真地重新演绎着二十一世纪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人有多大的期望，中共就能有多大的希望”。

对中共的期望悖论：期望等于没有希望

中共历史上几次重大政策的调整，都是因为来自党内党外的巨大压力，感受到了“亡党”的危机才不得已开始了改革。也就是说，只有给中共压力，中共才会改良。光是有期望而不反思中共的历史，不揭露中共现在的恶行，放任中共，附和中共，纵

1) “独立思考”中的党妈妈情结

“党就是一切、党就是母亲”，“命是党给的”，“饭是党给的”，这种“母子情”数十年来早已深入人心。虽然现在不像过去那样露骨的高唱“党啊，亲爱的妈妈”，但是，党无处不在、至高无上的威权，对人们衣食饭钵的控制，依然让人觉得“国家就是党的”，“饭碗是党给的”，“共产党是中华民族的唯一选择”，把党、国家、民族等概念混在一起，整个生活环境似乎都是党建造、赐予、维持的。这成为了人们思考中国问题的一个底线，就是不能越过共产党，想像不出没有党的日子该怎么过了。外界的人很难理解这种心态，孩子大了，不就远走高飞了吗？可是，党文化的封闭式高压式环境是让人可以老，思想却长不大，那孩子能离开母亲吗？

2) “独立思考”的理论基础

人们思考问题的理论基础仍然是无神论、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进化论、斗争哲学和所谓的科学社会主义，让人不相信在党之外还有“神和天”的存在。人们思考所依赖的基本词汇或者话语系统，仍然被赋予了党文化的含义，都是中共教会的语言，这就使得人们只能在党文化中打转转，人们甚至对于超越了“没有了共产党”这个底线的思维方式感到莫名的恐惧。同时，政治运动依然不断，比如，最近二十几年的反自由化、镇压“六四”和迫害法轮功，每一场这种全国性的政治运动，都是对党文化理论的又一次全面地强化复习。

3) “信息不完整”影响思考过程

人们思考问题的信息来源仍然受到共产党的严密控制，就连负面消息都是在党的精心操控下，有效地转化为维护党天下的素材。俗话说“兼听则明”，一个人得到两个相反的观点，并且认为都有道理的话，他就必须开始自己真正的独立的理性的思考来做取舍。而中共的一言堂和信息封锁、过滤造成“信息严重不完整”，实际上切断了人们做出正确判断的必要条件。再聪明的大脑，再有独立思考的愿望，也逃不出“无米之炊”的尴尬，这样的思考也就谈不上是真正“独立理性”的思考。

4) “强权论”让人的思考不了了之

“共产党是强权，党是残酷的，跟党作对绝没有好下场。”这是人们从几十年的运动得到的共识。就算是痛恨共产党的人，也因为畏惧强权政治，使得在思考的心理上很难越过共产党，觉得“你能把共产党怎么样？”，从而反过来以看破中共红尘的心态去附和中共，也跟着感慨“没有共产党，中国怎么办？”。人们普遍认为的言论宽松的象征——在私底下可以骂共产党了——其实，都是在党文化里骂，在骂中来理解党，最终维护现状，变相地拥护共产党。

影响人们独立思考的因素还很多。这种经过“思考”后仍然跟党一致的现象，比过去的直接灌输更有危害性。一旦认为那些想法是自己的独立“思想”，就会更加相信那些观点，客观上造成更主动跟党一致，自然更便于中共来统治人民。如果说过去是一个被动地被塑造的过程，那么今天就是党文化发酵成熟和人们主动自律的过程。人们从过去的强行灌输到今天的主动自律、配合理解党的政策，“骂着拥护共产党”，正是共产党长期改造人民思想的典型结果。

今天嘲笑昨天用党的思想思考问题的人，明天又会一样嘲笑自己的今天

一个很具讽刺的现象就是，如果把中共的历史分成一个个时代，人们总是站在“现在”的时间点，对党的政策给以拥护，而对“过去”的时间点上的很多事情，给以嘲笑，觉得那时怎么那么荒唐。如果把时间的坐标往过去移动，会发现那个站在今

依靠暴力夺权上台执政的中共，为了给自己贴上“合法政权”标签，常常说“历史选择了中国共产党”，而人民决定历史，所以这也是人民的选择。中共说“历史选择了”它，其隐含的逻辑就是“弱肉强食、适者生存”，因为中共造反成功，而胜利者代表了“历史发展的潮流”。这正是中共热衷于灌输其斗争邪说的原因之一。遗憾的是，这样混淆是非、倒因为果的邪说，无疑等于是说从300多年前中原的汉人“选择了”满族的入侵和清朝的建立，700多年前汉人“选择了”蒙古的入侵。中共的执政历史，也不过才50多年，说历史的选择未免太早了点。

辩证法的思想，并不是马克思的创造。马克思自己也承认其唯物辩证法来源于黑格尔，而後者的思想则是受中国古代辩证思维的启发。事实上中国古代的《易经》、八卦、河图、《黄帝内经》、《孙子兵法》等，无不充满辩证思维的智慧。一部《易经》，就是通过六十四卦，淋漓尽致的展现了在人类所能认识到的宇宙层次中，事物中相对立的两种因素之间相互制约、转化和依存的关系，以及由此而演绎的事物发展规律。这里不仅有事物运动发展中动静之变化，阴阳之消长，五行相生相克等等因素的阐述，还有事物自“潜龙勿用”、“见龙在田”而最终到“飞龙在天”而“亢龙有悔”（《易经·乾卦》）的完整发展历程描述，更有剥复循环、否极泰来的转变规律。马克思在其唯物辩证法中所论述的事物的普遍联系、变化发展、量变质变、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等等，只不过是不同的提法而已。而周易中不但有定性的描述，更有定量的把握。以周易为基础实际运用于人体的中医、运用于军事的古代兵法则具体显示了古代东方的高超智慧。

马克思对于辩证法的所谓“发展”，不过是其特别强调和夸大了斗争性，强化矛盾的对立冲突方面。他主张“对立面的统一是有条件的、暂时的、易逝的、相对的；而相互排斥的对立面的斗争则是绝对的”。所以共产党的理论家们认为斗争性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革命灵魂”。以此为基础，处理社会矛盾的办法，只有斗争，通过斗争而消灭对立面。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之所以热衷于强调斗争性，其实是为了给共产党暴力夺取政权提供理论依据。而其历史唯物主义则认为，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动力，暴力革命是“新社会”的助产婆，把暴力夺权美化成社会的进步因素。毛泽东曾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这句话实际上点到了实处。正因为如此，嗜血好斗的党文化，也是所有共产极权国家动荡不安、冲突不断的根源。当今中国社会人心冷漠、彼此猜忌、无法相互信任和包容也与党文化中的斗争哲学息息相关。

2) 政治斗争中的灌输

中共依靠斗争哲学发家，也依靠斗争哲学维护统治。实际上，正是在中共发起的一次又一次不断的政治斗争中，民众头脑中的斗争思想不断强化。这终于使得原本讲究中庸之道、遵从以和为贵的中华民族，人人都不得不将斗争视作社会常态；将人与人之间充满戒心视为常态；将你争我夺、尔虞我诈视为社会竞争的生存之道。

1951年，中共刚刚建政、立稳脚跟，就开始了所谓知识份子“思想改造”运动。批判电影《武训传》就是中共夺权成功后“思想改造”运动的序幕。这场运动确实基本上按照毛的希望达到了改造知识份子思想的作用。中国人的思想由此而产生了巨大的变异，从此认为衡量善恶的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阶级斗争”。清末行乞办学的武训尽管一生受尽屈辱、节衣缩食只为兴办义学，使贫寒人家的孩子能读书，但就因为他“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毛泽东语），“站错”了阶级立场而被中共批倒批臭；明朝的海瑞

不畏权贵秉公执法，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尽管历来受百姓尊重和爱戴，但是因为海瑞属于“剥削阶级”，“是地主阶级利益忠心的保卫者”，所以中共认为他为百姓所做的一切好事都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因而文革一开始就被批倒批臭；国民政府在南京修建的“航空烈士公墓”，安葬了抗日战争中牺牲于全国各地的一百多名空军烈士，以及为中国抗战献身的美国教官、苏联飞行员。但因为他们为“反动政府”效命，文革一开始，毛泽东的红卫兵便开到公墓，将烈士墓彻底捣毁。烈士的骸骨从此全部被丢弃失散。

对于共产党来说斗争性就是革命性。矛盾和冲突的存在是好事而不是坏事，因为它们“是革命的种子”，而历史就是在斗争中前进的（不过今天的中共，则开始害怕人民用革命一词。）。但是斗争性并不是人的先天本性，所以共产党认为群众的“革命觉悟”需要启发，要不断“教育”以提高他们的“革命觉悟”，并为此不惜采用欺骗手段故意制造矛盾和冲突。

比如“白毛女”原本是民间传说中的一个惩恶扬善的仙姑，为了“教育”人民而被塑造成为“苦大仇深”的被压迫阶级典型。戏中贯穿复仇思想——“千年的仇要报，万年的冤要伸”，由于它的煽动性太强，竟然发生过士兵观看演出的时候举枪差点打死“黄世仁”的事件。

所谓“启发阶级觉悟”，所谓“培养阶级感情”，实际上就是灌输斗争思想、宣传仇恨，在过去中共毫不隐讳的宣传：“血债要用血来偿”，“仇恨入心要发芽”，“牢记血泪史，不忘阶级仇”。随着国门的开放，这种在文明社会被普遍唾弃的仇恨宣传不能再明目张胆的进行了。虽然中共不再搞“痛说家史”，“忆苦思甜”，但这并不意味中共放弃这一手段了，而是它改变了面目，并利用现代科技进行了精致的包装。比如2001年8月14日，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在联合国会议上发表正式声明，指出中共反复宣传的所谓“天安门自焚案”就是一个精心包装的骗局，目的就是为了煽动民众对法轮功的仇恨。

在中共历史上一个接一个的运动中，在一波接一波的疯狂宣传中，人们不知不觉地充满了对共产党划分的敌人的“刻骨仇恨”，这敌人是“地主”、“资本家”、“富农”，“反革命”，“右派”，“走资派”，“民运分子”，“邪教分子”……“革命觉悟”就体现在对“敌人”的刻骨仇恨上，学习雷锋精神，要对敌人像严冬一样冷酷无情，这叫做“阶级感情”，它超越于人类一切感情。毛泽东讲：“对打人也要进行阶级分析，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好人光荣；好人打好人误会。”毛的这一讲话文革中在“红卫兵”中曾广为流传。既然对“阶级敌人”的暴力是他们“活该”，暴力和血腥于是很快就遍布中原大地了。

按照“革命者”的阶级感情，刘少奇既然反对人民的“大救星”，那他就“死有余辜”，张志新既然替死有余辜的刘少奇翻案，她就“活该”被狱警轮奸，被割断喉管，被处决就是“罪有应得”——雷锋的“对敌人的残酷无情”在这里有了最真实的写照。

北京“红八月”里那些被自己教过的学生亲手打死的老师，也许没有想到，正是自己按照“党”的要求教学生们“对敌人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夺过鞭子抽敌人”的时候，告诉学生对阶级敌人怎么做都不过分的时候，埋下了自己灭顶的种子。

在群众批斗场合，人人争先恐后表现自己的阶级性。一个人越是表现出有“刻骨仇恨”便越是说明爱憎分明、阶级觉悟高，反之则有“阶级立场不稳”的可怕嫌疑。

1、用恶党的思想思考问题，用恶党教会的语言说话

虽然替代传统文化和改造人们思想是中共几十年一以贯之的政策，但是，中共在不同时期的思想和语言却是变化无常的。从“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到不得不“摸着石头过河”，从“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到“不管白猫黑猫”，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呀，就是好”到“旗帜鲜明地制止‘动乱’”，从“越穷越光荣”到“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笑贫不笑娼”，从歌颂“张铁生交白卷”到现在学术界为求名利而大行其道的“学术腐败”，从昔日的“禁欲主义”到今天的“纵欲主义”……中共政策之出尔反尔，真可谓令人眼花缭乱。

但是，人们的思想被党文化改造之后的表现就是，不管党的思想怎么变，人们总是盲目地跟着变，总是用恶党的思想思考问题，用恶党教会的语言说话，从而总是维护着恶党的统治。

在那“一句顶一万句”的时代，说用恶党的思想思考问题，人们是相信的。“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人民公社好”，“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斗私批修”，“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抓革命，促生产”，“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走狗”……那时就一个声音，人们觉得当然就只会跟随恶党的思想和语言来思考来说话。

现在信息传递这么快，这么多，言论也比起过去不知宽松了多少，老百姓都敢骂几声共产党了，人们都在做独立思考状，怎么能说还是用恶党的思想思考问题呢？

今天谁还能控制人们的思想吗？

那么我们看看今天的人们都在想什么：“没有共产党，中国怎么办”，“中国不能搞民主，一搞就乱”，“不要揪住共产党的过去不放，要一切向前看”，“给共产党时间，民主自由早晚会到来”，“人权就是温饱权，饭还吃不饱，讲什么人权”，“什么宗教信仰，哪有神，要破除迷信，崇尚科学”，“坏事都是个别人的素质问题，党本身是好的”，“国家这么大，换谁不一样？”，“谁反对共产党，那就是搞政治，就是被人利用”，“胳膊拧不过大腿，闹什么闹？”，“稳定压倒一切”，“把经济搞上去再说”……等等，人们普遍认为这些观点是自己独立理性的思考，而非来自中共的片面灌输。

人们真的是在做独立理性的思考吗？其实不然。大家想想，上面那些观点，一个不落的都是共产党为维持统治而宣传灌输、处心积虑地要让人们去接受的东西。只不过“造反有理”变成了“（党的）稳定压倒一切”。可以说，在人们认为已经摆脱了盲目崇拜，并觉得对共产党的思想控制有了免疫力的时候，党文化正牢牢地掌握着人们的思维模式，只是在前三十年，人们的思想更多的是被党直接灌输所致，而今天的人们经过多年的折腾后，不再“盲目”，觉得自己能“独立”、“理性”地思考了。

从被动灌输到主动思考后自律——骂着拥护共产党

不幸的是，在这个思考过程中，思考的理论体系仍然是共产党给予的，思考的信息来源仍然是共产党控制的，所谓的“独立”不过是在党文化框框中的“独立”，所谓的“理性”也不过是在党文化理论体系中的“理性”，很显然，这样思考后得出的结果当然就是共产党所期望得的结果。

为什么人们“独立”地思考独立不起来呢？有下面几个因素。

第四章 被改造思想后人们的表现

站在未来回首今天的人类历史,人们会真实地看到共产邪灵肆虐中华大地的那一幕幕触目惊心、喧嚣闹腾和血雨腥风。在短短几十年里,在神州的土地上,共产党以一次一次的杀头,一轮一轮的批判,一波一波的灌输,构建起了一个同我们的传统格格不入的“党文化”部落。在这个部落里,共产党宣传无神论,宣传唯物论,否定传统的神传文化,宣传马恩列斯毛的伟大,从而系统的替代传统文化;在这个部落里,共产党批判儒释道,批判传统观念,灌输斗争思想、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邪说,为其政治目的而灌输进化论与现代科学,从而进行系统的思想改造;在这个部落里,共产党更是利用无所不在的灌输手段,从宣传机器到教科书,从犬儒文人到各种文艺形式,彻底把人洗脑了。呜呼!血染神州,山河色变。五千年神传文化之根被切断了,人们不再认华夏始祖,而是甘做马列子孙,在短短的时间内,共产党真的把人们的思想彻底改造了。

有一个笑话说大学考试题目是“请谈谈对世界一些国家粮食短缺的个人看法”,结果美国的考生不知道什么叫“短缺”,北韩的考生不知道什么叫“粮食”,而中国的考生不知道什么叫“个人看法”。这个笑话反映出我们中国民众在中共几十年的宣传和高压以及运动实践中,“个人思想”成了稀有物。

思想控制着人的语言、人的行为和人的再思想。被改造思想后人们的表现当然就同原来的本性大相径庭了——人们习惯于用恶党的思想思考问题,用恶党教会的语言说话;不信神,做什么事都不计后果,什么坏事都敢做;天不怕地不怕,满嘴脏话,行为低下;目前中国人,去掉党文化,都已经不会讲正常人的话,不会用正常人的思维了。

有人想,这是不是说得太过分了?至少,共产党自己都在嘲笑过去,现在同过去应该是有很大的不同了吧?

1979年是分分水岭。谈论起前三十年的历史,人们会觉得那时真是荒唐可笑,说起现在,觉得已经很正常了。是的,人们不再相信共产主义了,人们不再讲“磨一手老茧,滚一身泥巴”了,人们甚至也高喊要恢复“传统文化”了……但是,党文化本身并没有改变,而是更臻成熟。党文化的理论体系无神论、唯物论、进化论和斗争哲学,依然是中共的基石和被思想改造后人们的“科学共识”,党文化依赖的灌输手段依然没有收敛,随着电视的推广,变得更加容易用“声情并茂”来改造人们的思想,而面对互联网的普及,中共比任何时候都更热衷于封网、过滤和监控。中共的所谓恢复“传统文化”,是在抽掉传统文化的内涵之后,今天又按照党文化的无神论、唯物论等思维模式来盗用传统,完全是为了现在人们追逐经济利益和国际认同这个根本目的来恢复的,这恢复的当然不是我们真正的传统文化,相反,这是继第一次对传统文化的神韵施行阉割之后,对传统文化的表面内容进行的第二次阉割。

所以,无论过去,还是现在,被改造思想后的人们都有着同样的表现。



亲人被定为“党的敌人”后,家属必须表明立场,不能含混。章伯钧被打成右派以后,他的儿子、妹妹都在报纸上发表文章进行批判。另一个毛泽东亲自指定的右派储安平的儿子则这样教训自己的父亲:“我要给储安平先生一句忠言:希望你及时悬崖勒马,好好地倾听人民的意见,挖掘自己反社会主义思想根源,彻底交待自己的问题,以免自绝于人民。”

于是乎,一方面人们在一次次斗争中被强灌斗争思想,另一方面又正是在这样一次次“触及灵魂”的斗争中,为了生存,人们被迫学会了用厚厚的冷漠包裹自己的良知,学会了唯有打击、整垮别人,才能保全自己,不少人由此认定“弱肉强食,适者生存”便是真实的生活的法则。

被中共禁演的电影《蓝风筝》里有这样一个基于真实故事的情节:反右开始了。主人翁铁头的父亲林少龙的单位摊上了一个右派指标,大伙不得不讨论决定这顶帽子该给谁戴上,完不成指标就别想散会。但少龙却在这个关键的时刻起身离场——他要去上厕所,在那一刻,也许他认为上厕所比开会更重要。于是,等他推门回来的时候,已经被“推举”为右派了。

既然在“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中,人们已经练就了完全越过道德底线,践踏别人、保全自己的厚黑术,那么今天在同样“你死我活”的商战中,腐败贪污、假冒伪劣、毫无顾忌地损害他人等等行为迅速充斥其中也就毫不奇怪了。因为这其中的哲学依据都是一样的,即“弱肉强食,适者生存”。

今天的人们习惯于用“成功”与否作为衡量个人价值的唯一标准,而不论其采用了何种手段。所以攀上“款爷”、“老总”是女人的目标,身边簇拥着漂亮女人是男人的风光,孩子考上名牌大学是家长唯一的期望。在这种斗争哲学里,“成功”是建立在他人的“失败”基础上。这里没有良知与公义,也没有是与非、善与恶,剩下的只是成与败:成功便是好的,失败便是劣的,于是人人都想争做“老大”。是故血泪工厂比比皆是,民工待遇惨不忍睹;有毒变质商品充斥市场,“为富不仁”被视为理所当然;能够弄权枉法仍逍遥法外者,则被视为“背景硬”、“关系铁”……在党文化“弱肉强食、适者生存”邪说的灌输下,中国人互相争斗、彼此猜忌,整个社会成为一盘散沙,一群无凝聚力的民众更便于中共的极权统治。

3) 回归和谐相处之道

2005年“狼文化”风靡全国。跟风“狼文化”的一本书,《狼魂》中说:“不学狼不行吗?不行。为什么呢?因为,在你死我活的生存竞争中,在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市场角逐中,如果心存善良,对竞争对手一味地心慈手软,那么就会被对方毫不留情地吃掉”。这可以说是深得党文化斗争思想之精髓了。

这里有一个例子可以与上述思想作为对比。林肯作为美国总统,他对政敌的友好态度曾引起了一位官员的不满。他批评林肯不应该试图跟那些人做朋友,而应该消灭他们。“当他们变成我的朋友时,”林肯十分温和地说,“难道我不是在消灭敌人吗?”

中国人有句古训,“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中华历史上最强盛的盛唐时期,在思想、文化、国力、疆土等方面几乎都达到了鼎盛,这和大唐文化包容一切的气度是分不开的。唐初突厥曾经为患北方多年,唐高祖为了国家安宁都不得不向突厥称臣。然而唐太宗打败突厥后,并未赶尽杀绝以雪父耻,反而极其包容地任用了一百多名曾经与大唐为敌的突厥降将,担任五品以上的将军和中郎将,约占朝廷武官之半。同时唐朝还允许归降的突厥人迁入中原。这些举措深得各少数民族的信任,西北各

族领袖共同请求为唐太宗上尊号“天可汗”。历史上吐蕃（今藏族）曾经是一个剽悍好战的游牧民族，与中原时有征战发生。然而唐朝几次战胜吐蕃以后，反而派出文成公主和亲。文成公主将农业和佛教传播到吐蕃，此后数十年中，吐蕃与大唐和睦相处，这不能不说是文教之功。很显然，赶尽杀绝只会加剧仇怨，边疆地区仍不安定，战争还会再起。正是唐朝对突厥的宽容政策、对回纥、粟末靺鞨、南诏等族首领所采取的册封政策、及对吐蕃的和亲政策赢得了人心，一时间四夷宾服，诸国来朝，即使远如波斯、昭武九姓国、阼国等等都自愿纳地成为唐朝府州。在文化上，唐朝尊道、礼佛、崇儒，实行开明的“三教”并立政策。也正是这种宽松、自由的思想环境，造就了唐代恢宏的文化气象。

中华民族向来讲究“和为贵”，推崇中庸之道。我们的祖先赋予自己以教化天下，即所谓“平天下”的神圣历史使命。从根本上说，实现“平天下”的理想所要仰赖的不是武功，而是文治；它所要实行的也不是霸道，而是王道。所谓“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在5千年的中华历史中，尽管华夏民族也曾历经各种灾难，但它在同化周边各族群的过程中，毕竟已将它们凝聚、融合而为“泛中华”的文化大国。历史上蒙古族、满族都曾入侵、统治过中原，然而最终却被强大的中华文化所同化，蒙古族、满族如今都成了中华民族的一部分，清朝的康熙皇帝自己就说要做中华的千古一帝。

党文化不但在纵向割断了中华民族祖辈承传的智慧，同时也在横向以敌视的态度对待西方的优秀文明。这就使得受其熏陶的中国人只能相信党文化中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机关枪、大炮是最有权威的东西”（恩格斯），“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摧毁”（马克思）。中国人有句古话，可以马上得天下，不可以马上治天下。历史上用枪杆子夺取政权的例子不少，但用枪杆子对付本国的百姓以维持政权，并最终使得民众彼此内斗，使得社会中的个体都自然而然的把暴力作为解决矛盾的第一手段，这恐怕是中共的“独创”了。

尽管中共今天也提出所谓“和谐社会”，但其真实目的，其实是希望社会底层民众不要再上访、不再为自己应有的权利合法抗争，希望民众不要对中共的腐败而发出批评意见，其根本目的还是维护中共的统治。这种党文化包装下的所谓“和谐”不过是中共装点门面的需要，与传统文化中的“和为贵”截然不同。

事实上，采用暴力的手段来解决人类的社会矛盾，往往最终付出的社会成本大于收益。几十年的流血斗争，已经给中国社会带来难以愈合的创伤。矛盾的双方除了你死我活的斗争关系，还可以表现为共生关系、和谐关系，而斗争关系是最有破坏性的一种。上世纪60年代美国的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所领导的民权运动，并未用一枪一炮，却争取到了黑人、乃至一切白人、有色人种的平等权利，改变了美国历史；被印度人尊为国父的圣雄甘地，用和平理性的方式争取了印度民族的独立，为人类留下了很好的典范。

美国受到911恐怖攻击之后，一些地方出现了袭击和骚扰阿拉伯裔移民的个案。马里兰州的清真寺被人抹上涂鸦，一高中女教师便联络几个朋友在这座清真寺外为伊斯兰教徒站了一个礼拜的夜岗；俄亥俄州的伊斯兰中心收到了非穆斯林美国公民的捐款；许多不同肤色的妇女，穿上了穆斯林妇女的披肩和头巾上街，以表达她们对不同宗教信仰和不同文化的族群的尊敬和支持；911事件之后四天，一名穆斯林女学生戴着头巾和两个非阿拉伯裔的同学到先付款的自助餐厅吃饭，落座不久，女侍者走过来，二十三岁的穆斯林女学生以为“她要赶我们走”，原来女侍者是来退还三十美元的餐费，并告知餐厅决定给她们提供免费餐。女侍者还说自己不

便地把责任一股脑推到传统文化上，比如让所谓“封建遗毒”为文化大革命负责。这就好像张三杀死了李四，然后披着李四的衣服去犯罪，结果人们误以为做坏事的是李四，于是把李四掘坟鞭尸，却让真正的坏人逍遥法外。

我们不得不遗憾地承认，中共灌输党文化的巨大工程十分成功。这是因为，第一，中共的灌输以暴力手段做后盾，它的所谓思想改造不仅仅改造思想，很多时候，它还会去改造人的肉体（批斗、劳改、判刑、直至杀害）；第二，中共垄断了一切社会资源，在中共统治下，要想出人头地、取得成就，就不能不对中共俯首听命，因此各行各业的优秀人才大多被中共网罗来为其统治服务；第三，中共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制造了一个封闭的环境（现在是半封闭），人们无从获得完备的外部信息；第四，它的“思想政治工作”不仅仅停留在书本上，而是把所有人都推进“革命的大熔炉”里，用频繁的政治运动给他们留下刻骨铭心的印象；第五，中共按照马列毛那一套制造了一个社会现实，反过来显得那套理论是正确的。比如斗争的观念就是经过几十年几乎不间断的残酷斗争建立起来的，斗争成了中国老百姓的生活现实，所以斗争哲学也好像是对的。

人之为人，是因为有人的道德准则、行为规范和思想感情。共产党劫持整个国家的力量，千方百计扼杀人先天的纯真善良，向人们灌输变异邪恶的思想情感。如果把一个人的思想比作一个瓶子的话，那么瓶子的性质取决于其内容：灌进去蜂蜜就是一瓶蜂蜜，灌进去毒药就是一瓶毒药。每个中国人都不妨反思一下：在人生重大问题上，决定你的选择的，是自己的本性，还是被中共灌输的观念？那些邪党灌输的观念将把你带向什么样的未来？

常言道，“故土难离”。长期生活在一个环境中的人，会对那个环境产生一种眷恋。同理，长期浸泡在党文化中的人们，对这种文化也会产生一种精神依附和感情依附。当我们指出这种文化的虚假和邪恶，并且开始清除它的时候，有人甚至觉得怅然若失。

可是，党文化是中共赖以存在的人文环境。今天，当我们看清了中共历史上对中华民族犯下的滔天大罪，看到了中共正在把整个民族拖进万劫不复的深渊，我们不能不悚然惊觉，继而叩问自己的良知：是什么样的弱点使我们容忍了中共在中国的肆虐？现在的情形还允许我们继续容忍下去吗？这个问题，对于我们民族的未来，对于我们每个人的未来，都至关重要。

反思党文化，解体党文化，我们才能走向美好的明天。

通。其实,中共在激发、诱导人的魔性,在使人适应这种魔性的状态。

这种不理性的状态是中共得以存在的社会心理条件。中共虽然现在不提“不断革命”的理论了,但它的本质决定了它从斗争中吸取能量,把革命当成常态,拿运动当饭吃,把穷折腾当日子过,一旦遇到危机,首先想到的是制造一个敌人,再煽动人们和这个假想敌斗争。如果中国人都平和理性地决定自己做什么不做什么,没人跟中共瞎跑,中共就没戏可唱了。由此可见,让观众心血冲头、激情澎湃,是党文艺的重要职能之一。

以上简单分析了中共利用多种艺术形式灌输党文化所涉及到的一些问题。相信每个读者都会举一反三,自己举出大量的例子。

结语

综上所述,中共灌输党文化具有强制性、制度性、系统性、伪善性等特点。让我们再一起分析一下中共灌输手段的三个主要特征。

第一,党文化是一个由中共在总体上掌控的自我调适系统,因此中共的灌输手段也具有自我调适的特征。中共只要政权在握,设定极少的初始条件,党文化宣传品就可以按部就班地自动生成出来。

毛泽东在 1964 年说过一段话:“要把唱戏的,写诗的,文学家,戏剧家赶出城,统统都轰下去……不下去写不出东西来,谁不下去不给他开饭,下去了再开饭。”中共的文艺理论书可谓汗牛塞屋,哪本书也没有这段话说得透彻:谁不听话不给谁饭吃。中共掌握了一切生产生活资料,掌握了中国人民的生杀予夺大权,所有人都必须俯首听命。知识份子和艺术家被编在文联、作家协会、戏剧家协会、曲艺家协会、美术家协会、音乐家协会里,在人屋檐下,不得不低头。所以“党”并不需要自己动手制造党文化,党只要决定“坚持某某,反对某某”,党文化宣传品就可以被源源不断地制造出来。同理,每次国内外形势发生变动,中共不得不调整政策时,只需对宣传部门发布一些简单的指令,宣传部门就可以“创造性”地实现长官的意图。高等院校的传播学院、新闻学院、艺术学院等,更是可以大批量制造出“社会主义新闻学”、“马列主义舆论学”、“中国特色的文艺学”等等,为中宣部支招和辩护。

第二,中共的党文化灌输是以暴力为依托、以利益为诱饵的。对顺从的人中共动辄施以小恩小惠,可是对于那些思想独立、不愿与“党”保持一致的人,中共的政策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在中共统治下,人们时时刻刻都能感受到“无产阶级铁拳”的巨大威胁,因此如果听信和中共宣传口径不同的话,就得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另一方面,一个人如果接受了真相,一定会想做点什么以改变现状,可往往又没有那么大勇气,这种矛盾心理就会使他十分痛苦。在中共的恩威并施下,为了自我保全和心理平衡,人们只好从真相退却,主动把自己闭锁在中共的谎言圈套里。因此,很多时候人们不是看不破中共的谎言,也不是没有机会了解真相,而是不敢接受真相,毋宁相信中共的谎言,配合中共欺骗自己的良心,来换取一点可怜的安全感和良心的虚假安稳。

第三,党文化是一种附体文化,因此中共的灌输手段具有民族文化的某些表面形式。上文已经探讨过,党文化是如何附体在民族文化之上,增加欺骗性、增强宣传效果的。附体的另外一个效果是,当中共的罪恶越来越多地被揭露出来,中共可以方

愿意看到战争,对穆斯林女学生勇敢地穿着民族服装而感到骄傲。女侍者一离开,女学生就哭了……一位巴勒斯坦裔医生说,911 之后的第一个星期五,他去清真寺祷告,内心的疑惧却挥之不去,害怕被人辱骂,等他到了清真寺,发现门口集结着五十多个基督教的牧师与教徒,他们打着表示团结和联合的横幅……这位巴勒斯坦医生说:“他们令我感到安慰和看到了和平。美国的强大不在于她的军事和科学的领先,而在于珍藏于这个国家大多数人民心中的伟大精神。”

美国人这种爱国方式,或许能给我们一点启示。在中共党文化熏陶下,许多人心目中的“爱国”,已经和“仇恨”画上了等号。一个简单的常识是,不论仇日或仇美,都不可能是中华民族强大的精神来源。美国作为一个多民族的移民国家,也许优势就来源于其对各种不同的文化的兼容并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传统文化中的美德。摒弃“战天、斗地、整人”的党文化,回归和谐相处之道,这才是民族强大的精神之源。

4、灌输进化论与现代科学

1) 灌输进化论的真实目的——推行无神论和斗争哲学

一九六八年的一个夏天,一位名叫威廉·米斯特的美国业余化石专家在位于犹他州附近,也是以三叶虫化石闻名的羚羊泉敲开了一片化石,赫然发现一个完整的鞋印就踩在一只三叶虫上。三叶虫是一种生长于六亿年前至二亿多年前的生物,换句话说,在这久远的历史时期之前,是不是有着和我们一样的人类文明存在?

一八四四年,以发现反射偏光“布鲁斯特法则”闻名的布鲁斯特爵士在英国科学发展协会发表了一篇报告(Report of Meeting of the British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 Vol. 14.),引起了很大的轰动。报告中提到,在英国北部靠近 Inchyra 的 Kindgoodie 采石场挖掘出的一块沙石岩中,居然有一枚钉子的一半埋在里面。这枚钉子虽已被腐蚀了,但仍然能辨别出来。1985 年,这块沙石岩经测定后发现至少有四千万年历史。那么是谁在古老岩层里留下的钉子呢?

在 2001 年进行的一次关于人类起源和发展的盖洛普民意调查中,1000 名美国人被要求选择与自己看法最接近的观点。调查显示,45%的人选择了“上帝在过去 1 万左右年创造了今天的人类”,37%的人选择了“人类从比较原始的形态经过上百万年的演化而来,而上帝主导着这一过程”,12%选择了“人类从比较原始的形态经过上百万年的演化而来,并且上帝与这一过程无关”,剩下 6%的人表示没有观点或无任何倾向。在另一项由美国裴优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于 2005 年 7 月进行的调查表明,63%的美国人愿意接受学校在教授进化论的同时,也教授宗教的创世论,38%的人干脆主张学校只教授创世论,不教进化论。

许多来自中国大陆的读者都会对上述调查结果感到非常惊讶。其实在信仰自由的西方国家,不接受进化论的大有人在,而与中共党文化的思维定势相反,这并没有导致这些国家落后、愚昧。事实上这些国家的文明发展恰恰与其开放宽容的自由思想氛围密切相关。进化论来自于西方,但当今相信进化论的人中,比例最大的是中国、前苏联和原来的东欧前共产国家。这些国家的共同特点是:国家权力被用来禁止对神的信仰和灌输无神论。中共自从 1949 年以后就一直在持续地压制和迫害各种宗教信仰的同时,强制性地灌输“进化论”,以至于许多国人不仅自己把“进化论”奉为金科玉律,而且当然地认为普世皆然。

中共向民众灌输进化论,一方面是出于维护自己的极权统治的目的,因为这样

就可以为强行灌输无神论铺平道路,以便于把自己打扮成至高无上的人间救主;另一方面是因为进化论可以为“阶级斗争”的理论提供支持。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清楚的说明进化论与信仰的关系:“现在我们以进化的概念来看宇宙,再也没有空间容纳一位创造者或统治者了。”(《马克思、恩格斯论宗教》)马克思又说,“达尔文的著作非常重要,它从自然科学的角度支持了人类历史上的阶级斗争,完全符合我的观点。”恩格斯也说,“(进化论是)十九世纪三大科学发现之一……优越的无产阶级将赢得这场生存斗争。”

人类自有了理性思考以后,就一直在追寻“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这样一个永恒的根本问题。在消灭各种宗教信仰之后,进化论就成了中共唯一能够用来解释生命起源的学说。在网上做一个搜索,往往会发现许多中学教师对于生物教材中“生命起源和生物进化”一章这样分析:“对于学生形成生物进化的观点,树立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有重要意义。”因而中共在铲除中国敬畏天命的传统文化的同时,把进化论作为解释生命起源的“唯一真理”,以“科学”的名义在中国强行灌输。今天的许多中国人在谈到信仰的时候,都会不假思索的声称,“我是信仰无神论的,我是相信进化论的。”抛开无神论、进化论本身的是非对错之争不谈,事实上对于绝大部分中国人来说,对于无神论的“信仰”,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信仰。信仰是自由心灵的选择,是相对于“不信仰”而言的,但在中共的强权之下,谁不信仰“无神论”,谁不信进化论就面临着“封建迷信”、“愚昧”、“误国误民”、“反科学”等等可怕的政治帽子,就面临着被划离“广大人民群众”而成为“一小撮”另类的“改造对象”。在这种环境下,根本谈不上自由抉择的权利,还有什么信仰可言呢?

2) 进化论是未经证实的假说

一八五九年,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根据一些零散的事例,唐突的提出了生物进化的假说,认为今天复杂的生物界是从简单的原始生物一步步进化而来。然而随着科学深入广泛的发展,大量的事实发现对进化论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1) 脆弱的逻辑基础

许多人都很熟悉“返祖现象”。在人民教育出版社网站的“初中生物教学资源”中这样写道,“在人类,偶然会看到有短尾的孩子、长毛的人、多乳头的女子等等,这些现象表明,人类的祖先可能是有尾的、长毛的、多乳头的动物。所以返祖现象也是生物进化的一种证据。”要按这种逻辑,婴儿无脑的畸形更多,那人的祖先就没有大脑了?先天肢体残缺的、多长手指、脚趾的也常见,那么人的肢体就是从各种畸形进化来的?跳出进化论的思想框框一想,就会发现所谓的“返祖现象”只是畸形或缺陷而已,是基因病变的反映,和人类祖先联系在一起是没有道理的。

科学上,如果一个理论的证明违背逻辑,这个理论就不能成立,但是人们对进化论的逻辑错误却不深究,也是因为深究起来,就没有证据可言了。许多人听到这话感到很惊讶。其实,问题的揭示会使人更惊讶。

比较解剖学证据是进化论的三大主要证据之一。按照比较解剖学,哺乳类中老鼠的爪子、蝙蝠的翅膀、海豚的鳍足和人的手,均有相似的骨骼结构,因此达尔文推断它们从同一远祖遗传而来,只是进化过程中因为功用不同而分化出不同的外形。很显然,用比较解剖学证据来论证进化论,存在逻辑上的漏洞,因为从同一祖先的假设,逻辑上可以推断出四肢骨骼结构相似的结论,但反过来却不一定。正如冰箱制冷可以使水结冰,不等于水结冰一定是由于冰箱制冷。

古生物化石也是进化论的三大主要证据之一。然而进化论支持者以古生物化

中华大地的山川秀丽、物产丰饶跟共产党并没有什么关系,如果有,也是被破坏的关系。可是这么一唱,毫无逻辑关系的两件事物之间被强行扯上了关系,人们因为热爱祖国的自然风物,好像也对共产党充满了好感和感恩情绪。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5) 相声、曲艺、小品的独特作用

中共发动政治运动不是从摆事实、讲道理开始(因为如果能够摆出事实、讲出道理的话,它也就不需要发动政治运动了),而是往往首先进行人身攻击,用粗鄙的想像编造迎合人的阴暗心理的妖魔化故事,从而达到挑起仇恨的目的。实践证明,这种栽赃法,十分有效,屡试不爽。

比如文革时,很多人根本不懂得为什么刘少奇是叛徒、内奸、工贼,于是中共散布谣言,说刘的老婆王光美为了自己的皮肤好用牛奶洗澡。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能喝上牛奶都是了不得的,而刘少奇的家属用牛奶洗澡!于是人们根本不需要知道为什么刘少奇是叛徒、内奸、工贼,就可以对他切齿痛恨、鄙夷不屑了。

基于同样的道理,戏曲、相声和小品等文艺形式在贬低传统人物和传统文化、打击中共的敌人方面,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五十年代的很多相声都是讲破除“封建迷信”的,很多传统文化中的观念和风俗都在被讽刺挖苦之列,比如婚俗、阴阳的观念、宗教信仰等。很多人都会记得,在一个流传极广的相声里,一位老太太请来一尊神像,邻家的小伙子问:“您是多少钱买的?”老太太教训他:“不能用买,要说请。”小伙子改口说,“那您是多少钱请的?”老太太心疼地说,“噫,就他妈这么个玩意儿,八毛!”善男信女被丑化为庸俗功利的愚夫愚妇。

2001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有一个小品《卖拐》,就是间接地诽谤法轮功的。小品演出后,各地报纸纷纷发表文章,藉机打击法轮功。比如《检查日报》上《从春节晚会小品〈卖拐〉看“法轮功”伎俩》,《云南日报》评论春晚,中间提到《卖拐》,说“鞭答法轮功,表演很到位”,被大量转载的网络文章《由赵本山〈卖拐〉看心理暗示》也落脚到揭批法轮功上。

这种手法的危害在于,它不是说某一事物或观点是错的,而是把它荒诞化、漫画化,使人根本没有机会去理智思考这一事物的是非对错。被抹黑者的辩白被淹没在观众的哄堂大笑之中。

(6) 中共文艺作品里渗透着强烈的激情和战斗性

孔子曾说过,“郑声淫。”意思是说,郑这个地方的音乐,溢出了人的情志以外,是一种夸张虚伪的艺术,对人的道德有负面影响。中国古人重视艺术对世道人心的作用,讲究用理性节制情欲,用艺术辅助和谐的人生。

中共的理论宣传和文艺作品里渗透着强烈的激情和战斗性:样板戏的原则是“三突出”;塑造人物要“高、大、全”;革命歌曲的风格是“高、快、响”,犹嫌不够,在歌谱上还要加上“豪迈地”、“激昂地”、“意气风发地”等风格提示。就像总喝烈性酒的人,无法体味茶的隽永;听惯了重金属摇滚乐的耳朵,很难欣赏优雅的古琴曲,习惯了中共艺术的人们,也失去了对艺术的正常品味,以为中共艺术里那种强烈的激情和战斗性是人类的常态,殊不知那恰恰是人的魔性的体现。

另外一个例子是颜色的运用。红色是血的颜色。在传统艺术里或在生活里,红色只能作为点缀,不能够大面积使用,因为它会使别的颜色都显不出来。可是在中共的舞台艺术里,红色的服装、红色的布景、红旗、红灯笼、红道具,整个舞台一片红通

板戏被吹捧为“经典”，重新走上舞台，或者被改编成电视剧公开放映。可见样板戏的阴魂不散，样板戏灌输的党文化也已经在几代中国人的心里生根发芽了。

今天的人们可能会觉得样板戏这种宣传方式，非常简单粗陋，人人都能一眼识破，因此不会对人的心理造成很大的影响。可是，中共的宣传也是量体裁衣的。八十年代以前的中国人，生活和思想都相对简单，也许绝大部分人都能意识到杨子荣、阿庆嫂、李玉和、柯湘等人的形象经过了艺术夸张，但却多半不会想到，他们反映的，是完全颠倒、扭曲了的历史。

文革以后，戏曲人才和戏曲观众纷纷老去。随着新的媒体形式和审美习惯的兴起，戏曲逐渐被边缘化，中共宣传部门对戏曲也不再像以往那么重视了。

(3) 审美习惯具有滞后性

人的审美习惯具有滞后性，也就是说，形成或者改变一种审美习惯，往往比形成或者改变一种理性思维更加困难。因此，中共利用文艺形式灌输党文化虽然似乎见效比较慢，不像杀人、搞政治运动那样能够立竿见影地制造出恐怖气氛，也不像舆论宣传那样能够迅速达到统一思想的目的，但文艺宣传诉诸人的感情，培养一种独特的审美习惯，入人心深、危害隐蔽而持久。

2004年“七一”之前，中共在全国各地推出了一系列所谓“红色经典”演出，节目包括歌剧《洪湖赤卫队》、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歌剧《江姐》及歌舞等。据说“很受群众欢迎”，“票房很好”。一位观众在接受采访时说，“这部作品曾经伴随我们走过了人生最重要的年代，我们是唱着‘洪湖水浪打浪’的歌声走过来的，在七一这样特殊的日子，重看这样的经典歌剧让我似乎回到从前。”

这位观众也许并没有说假话。可是，艺术和审美并不是存在在真空之中。在共产中国这样一个高度政治化的社会里，大量的歌曲都带有强烈的党文化色彩，否则就难以理解为什么“党”那么热衷于在各种节日、纪念日办“歌咏比赛”和“文艺汇演”。

过去的人们一张嘴就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烽烟滚滚唱英雄”、“一条大河波浪宽”，现在则是“一位老人在南海边划了一个圈”、“继往开来的领路人，带领我们走进新时代”。《东方红》、《歌唱祖国》、《长征组歌》、《唱支山歌给党听》、《党啊，亲爱的妈妈》、《大海航行靠舵手》、《毛主席来到咱农庄》、《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毛主席的话儿记心上》……这些歌大多运用民歌风格，曲调优美上口，使人百唱不厌。对领袖的忠诚、对“党”的热爱，就在人们摇头晃脑之际被悄悄压进了他们的潜意识。就灌输党文化的效果而言，这些歌曲起的作用绝不亚于四卷《毛选》。

有过出国经历的人，只要想一想改变自己的饮食口味多么困难，就知道清除共产党培植的邪恶审美心理有多么不易了。

(4) 利用移情作用

“移情作用”，简单地讲，就是爱屋及乌，因为喜爱欣赏事物甲，连带着也喜爱欣赏事物乙丙丁。商业广告经常请娱乐明星推荐某个品牌的商品，追星族们因为崇拜该明星，对他/她推荐的商品也不加别择地接受，这就是移情作用的效果。

“洪湖水，浪打浪，洪湖岸边是家乡。清早船儿去撒网，晚上回来鱼满舱。四季野鸭和菱藕，秋收满舱稻谷香。

人人都说天堂美，怎比我洪湖鱼米乡！洪湖水，长又长，太阳一出闪金光。共产党的恩情比那东海深，渔民的光景，一年更比一年强。”

石论证其进化的过程，却又需要依赖于进化的模式。比如中国著名猿人“元谋人”的确定，是从仅有的3颗人类牙齿推断来的；蓝田猿人的确定，仅凭一个下颌骨；丁村人，三颗牙齿，一小块头盖骨；马坝人，一个不完整的头盖骨……把它们确定成什么，要完全套用进化模式。这里边暴露了一个逻辑问题：从进化论来的东西，再去证明进化论，显然是循环论证。所谓西方古猿（尼布拉斯加人）的发现，就充分暴露出这种论证逻辑的缺陷。一九二二年，生物学家奥斯本宣布发现了一颗牙齿，这颗牙齿同时具备猩猩、猿人及类人猿特征。他给这颗牙齿的主人取了一个名字——尼布拉斯加人。接着，相信进化论的人士画出了这个猿人的想像图，仅仅凭着一颗牙齿。但一九二七年，经过更深入的研究后发现，这颗牙齿的主人是一种绝种了的美洲野猪！

那么进化论是归纳法吗？不是，太多事实归纳不进去。

有人曾说进化论是归纳法，这种逻辑思路稍微难一些，其实也好理解。归纳法就是提出一个命题，如果能把涵盖的所有问题都归纳进去，那这个命题就是真理。然而对于进化论，太多的事实归纳不进去。从前面的史前文明证据来看，从进化的速度、物种爆发式的产生的方式、进化的概率等等许许多多不但归纳不进去，而且都在否定进化论，可见进化论的论证作为归纳法是不能成立的，其实还是循环论证。

似是而非的“循环论证”贯穿了整个进化论，人们似乎都对此习以为常了。然而当我们严格的分析起来，都会大吃一惊。

中学生物课本上有一张胚胎发育图，显示鱼、蝾螈、乌龟、鸡、猪、牛、兔、人等动物在胚胎发育不同阶段的侧面，其原版收藏在伦敦大学的Bodleian图书馆，它的作者是十九世纪德国Jena大学的生物学教授海克尔。从这张图得出的结论是，虽然这些动物成年后形态各不相同，但在胚胎发育过程中均有一个形态相似的阶段，包括人类，各种动物在胚胎发育的某个阶段，其形态会重演一个类似鱼的形态，表明它们的共同祖先是水生动物，它们祖先的特征在胚胎发育过程中重演了。这就是支持进化论的三大证据之一“胚胎重演律”。

其实，用重演律证明进化论，也可形式地表述为：“假如进化论成立，胚胎发育会重演进化的过程；因为观察发现胚胎发育会重演进化的过程，所以进化论成立。”逻辑上讲，这仍然是用假说证明假说的“循环论证”。

1997年，英国科学家理察逊和多家实验室合作，收集更多种系的动物，观察它们在各个胚胎发育期的形态。他们发现海克尔的图谱不是基于事实的描述，“我们的研究严重削弱了海克尔图形的可信性，海克尔图形与其说是显示脊椎动物胚胎发育过程中一个相似时期，不如说是按固定程序设计的胚胎。”权威的《科学》杂志于1997年专门就此事发表了一篇综述（Science 1997, 277:5331）。那么，为什么海克尔和理察逊的研究结论差异如此之大呢？原来，海克尔有意选择形态上比较相近的动物胚胎，比如他用水生的蝾螈代表两栖类，而不用青蛙，因为蝾螈本身更像鱼。又如早期鸡的胚胎其眼球是没有色素的，但海克尔把它涂黑，使得鸡的胚胎和其他动物胚胎更相似。海克尔特别对人的胚胎图作了艺术加工，去掉了人胚胎的内脏部分和腿，就成了一个有尾巴，类似鱼的胚胎。

随着遗传学的出现和分子生物学的发展，特别是对基因的深入研究，重演论在理论上面临着空前的危机。现在公认基因突变是进化的原因。既然过去的基因已经突变成新基因了，怎么还重现过去的特征呢？

(2) 概率计算否定了进化论的核心——基因突变机制

达尔文时代,近代西方科学正处于奠基阶段,对生命现象的认识还很肤浅。那时的人看到了家养动物的诸多杂种变异,就认为物种也能这样变成其他种,这就是进化。后来,随着基因的发现和深入研究,学者们才意识到如果基因不发生根本的变化,不管后代表面与祖先有什么差异,也没有进化意义。然而基因又是极其稳定的,只有不正常的“基因突变”才能使之发生改变,那么“基因突变”也就成了现代进化论的核心了。这是现代所有的进化论者公认的。这里,我们就集中分析这个核心理论。

物种基因的稳定性极难逾越

基因的稳定性是物种保持自身稳定所必需的,同一物种不同个体的基因交流,并不能使此物种变成其他物种。动植物育种专家都知道,一个物种的变化范围是有限的。最终,培育出的品种不是不育,就是又变成原来的亲本。哈佛大学的梅尔教授称之为基因体内平衡。最常见的就是狗再怎么杂交育种还是狗。这说明进化论有一个无法跨越的障碍。在理论上,人们把突破这个障碍的可能性寄望于基因突变,这是唯一的可能了。

理论和实际上,基因突变产生高级性状的机率几乎是零

基因突变,是一种在基因复制或修复损伤等过程中发生的随机错误,所以又叫随机突变,本身就是一种病态现象。它发生的机率非常低,大约在万分之一到十亿分之一之间。低等原核生物的突变率较高,大约为千分之一,而高等类型的生物中,许多基因的突变率是十万分之一到一亿分之一。

基因突变能否产生具有生存优势的高级特征(性状)呢?我们知道一个基因的核心是由几百到几千个碱基排列而成,如同一个复杂精密的计算机程序,随意的改动一两个字符能够产生更高级的程序吗?当然不能。基因突变也是这样,单个碱基的变化结果往往是各种缺陷、畸形、致死,在自然条件下具有生存优势的没有发现一例。

概率计算表明,生物进化的可能性小到了绝对不可能的程度

现代进化论以基因突变为其核心,但是如前所述,基因突变本质上是一种随机错误,因此概括地讲所谓从猿进化到人的过程,其实质就是有一部分古猿在数百万年里,因为一系列的基因发生“阴差阳错”的突变,“恰好”使得古猿前额逐渐增高,眉骨变小,吻部后缩,脑容量增大,脊椎变直……最终成为现代人类。

很显然,自然选择的过程只能决定最终哪些物种存留下来,却不会增加整个过程发生的概率。许多学者进一步的计算表明,这样一连串的“阴差阳错”要想每一步都发生,其可能性微乎其微。美国生物化学家贝希以血液凝固的一系列生物化学机制为例,讲述如此复杂精密的生命现象不可能是进化出来的。其中一个蛋白(TPA)产生的机率是十分之一的十八次方,经过计算至少需要一百亿年才能发生(目前科学家认为太阳系的年龄约为 50 亿年)。如果同时进化出和它相互作用的蛋白,机率就是十分之一的三十六次方。他说:“很可惜,宇宙没有时间等待。”

对于生命的产生,现代进化论认为也是一个自然过程,认为简单的有机物和无机物在某种特殊条件下碰撞而成复杂的生命大分子,各种复杂的大分子进一步组合演化形成原始生命。读到这么多串连的“理想化”过程,读者恐怕会考虑其中的机率问题了,英国科学家霍伊尔曾表示:“上述事情发生的可能性正如利用席卷整个废料厂的飓风来装配七四七喷射机一样。”

(3) 进化论的尴尬——关于进化时间表的种种疑问

1943 年,这首陕北高原上传唱数百年的情歌被重新填词改编成《东方红》,芝麻、白菜和豆角被置换成了东方、太阳和毛泽东,从此在中国大地上唱响,成为党文化的“主打歌曲”之一。

类似的“借尸还魂”的例子数不胜数,比较有名的有把惩恶扬善、扶危济困的白毛仙姑变成苦大仇深的白毛女,演绎“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主题。民歌刘三姐中的唱词“塘边洗手鱼也死,路过青山树也枯”原来是讽刺忘恩负义的狠心人,被篡改成“莫夸财主家豪富,财主心肠比蛇毒。塘边洗手鱼也死,路过青山树也枯”,把刘三姐变成阶级斗争的先行者。形形色色的“新编历史剧”利用古人的嘴,宣扬中共的世界观和历史观,如《逼上梁山》,林冲“从恨高俅个人到恨整个剥削阶级”:“要把这世界翻转了,那须得枪对枪来刀对刀。”

经过三十年的文化灭绝运动、把优秀民族文化破坏殆尽以后,中共向人民和世界宣称:它代表了正统的中华文化,同时更加肆无忌惮地打着传统文化的幌子贩卖党文化的邪恶货色。它所以敢更加肆无忌惮,是因为世界还不了解中国,人民多忘记了传统。失去了敬神向善内涵的伪飞天、伪千手观音和伪民歌民乐,伴着邪党文人花言巧语、似是而非的诠释,给中共的黑暗统治装饰了一道华丽的花边,同时更隐蔽、更彻底地摧毁人们对神佛的正信、变异了人们的道德观念和艺术品味。

(2) 八亿人八个样板戏

传统戏曲对忠孝节义等美好情操进行形象化解说,对于维系社会的道德水准起到了极大的作用。二十世纪以来,激进知识份子对所谓“封建礼教”横加批判,传统戏曲也被大加挞伐。鲁迅在论及戏曲改革时说:“(改革)不久也就沉寂,戏剧还是那样旧,旧垒还是那样坚。”这恰恰从反面说明,戏曲的形式和内容是一个整体,是传统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如果大肆改动,也就不是戏曲了。

1949 年以后,中共“改制、改人、改戏”,戏曲界被摧残得百花凋零。才子佳人、帝王将相、因果报应被批判,只有经过改编、能够承载起中共灌输党文化的职能的戏剧,才被允许存在。剧作家吴祖光愤而指出,中共“把拥有几万出戏的古典戏曲生生挤兑得只剩寥寥几出戏在舞台上苟延残喘”,“党趁早别领导艺术工作。”文革中推出的“样板戏”是中共利用文艺形式灌输党文化的登峰造极之作。

样板戏一般是指现代京剧《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海港》和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以及钢琴伴唱《红灯记》、钢琴协奏曲《黄河》、交响音乐《沙家浜》。这些京剧和舞剧,有些在文革前就被创作出来了。在江青直接指挥下,以“三突出”(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为指导原则,把这些戏剧改造提纯,使之更符合中共意识形态需要。文革中,绝大部分电影和戏曲作品被作为毒草禁映禁演,样板戏和样板戏拍成的电影几乎是仅有的合法文艺形式。十年中它们反复上演、播出,强制性地让群众收听观看。今天四十岁以上的中国人,对样板戏都有刻骨铭心的记忆。

样板戏从创作到演出集中了当时戏剧界最优秀的人才,在技术上的确有可圈可点之处。可是,样板戏大肆篡改历史、渲染暴力、歌颂仇恨、颠覆传统价值观、对中共领袖和所谓“英雄人物”进行无限神化和吹捧,这一切都说明它们是为了一个邪恶的目的服务。那么,其技术越精良,危害就越大。

文革后,样板戏在舞台上消失了一段时间。可是,听惯了样板戏的八亿人民为样板戏的复活提供了土壤。时至今日,样板戏中的某些唱段仍然为人津津乐道,某些样

一些影片因为有娱乐片的外包装,其中的党文化非常隐蔽,观众在欣赏历史传奇、爱情故事、或感叹视觉奇观时,不知不觉地被灌输了党文化的观念和趣味。电影《英雄》耗资 2.5 亿人民币,以美轮美奂的电影语言,讴歌独裁强权和暴力征服;《漂亮妈妈》把下岗工人的悲惨遭遇归咎于生理原因(女主人翁的儿子耳聋),间接掩盖了中共政策失当造成城市工人大面积失业的事实;更多的影片编造故事,替中共煽动民族主义情绪。

第四,中共利用电影贬低传统文化和传统人物。经过长时间的党文化宣传灌输,绝大多数中国人已经不知道传统文化和传统社会的本来面目。八十年代以来,很多电影人虽然力图反抗党文化,但因为他们本身就是在共产党的统治下长大,因此只能用党文化的逻辑推想传统社会的真实样貌,因此很多影片中的传统中国社会集封闭、压抑、野蛮于一身,似乎还没有中共统治之后的社会开化、进步。其实,这也是按照进化论那套逻辑推出来的,是在用另一种方式重复党文化。

第五,无所不在的党文化成为电影的审美风格元素,渗透于一切影视作品之中,利用观众的怀旧情绪,巩固党文化对人心灵的桎梏。

与其他艺术式样相比,电影有自己的特点。比如,文学、美术、音乐表现什么、不表现什么,有很大的自由空间,而电影必须全面表现故事发生时的物质环境。因此电影画面的背景和道具,都要经过精心布置,使它们能再现故事发生年代的典型环境。比如,表现文革时期的环境,要有毛像、大字报、绿军装、红宝书等。1949 年以后的中国,是共产党一党的天下。要想表现这一时期的典型环境,只能使用带有浓重党文化色彩的物品、声音和场面。这些场景往往唤起观众的怀旧情绪,使观众觉得虽然那个时代有很多缺点,但毕竟自己曾经拼搏过一回,就像普希金说的,“那过去了的,就会成为美好的回忆”,过去的日子不管多么痛苦和荒谬,但人们那时还年轻,现在回想起来不免有一种浪漫的感觉。

充满说教意味的影片在今天一般会招致反感,所以这种“顺手捎带”的方式,就成了影视作品在客观上帮助中共灌输党文化的主要形式之一。这种勾起人怀旧情绪的电影元素往往是电影要表现的故事的背景;惟其如此,这些符号携带的信息才不会引起人们的警戒心理,畅通无阻地进入观众的头脑之中。

影视(《激情燃烧的岁月》)、歌舞、文学、时尚、甚至广告(北京中关村曾经有一个巨型广告,仿照文革宣传画风格,上书“Internet 就一定要实现”)、旅游(“红色旅游”)等等都在加入这个“怀旧情绪”的大合奏,其实都是在帮助中共巩固党文化对中国人心灵的桎梏。

2) 利用戏剧、歌舞、曲艺等多种文艺形式灌输党文化

中共的文艺宣传形式,很多是从苏联生搬硬套来的。但是,因为灌输党文化的对象是所有中国人,中共必然利用一切民族文化资源,以适应不同人群的口味,使灌输效果最大化。歌舞、京剧、话剧、评剧、豫剧、吕剧、越剧、粤剧、秦腔、秧歌、黄梅戏、花鼓戏、二人转、京韵大鼓、河北梆子、山东快书、相声、评书,中共无所不盗,党文化附体在这些传统文艺形式上,流毒可谓广而且深。我们这里重点探讨几个相关的问题。

(1) 附体在民族文化之上

既然中共给人民带来了那么多的灾难,为什么有那么多“民歌”歌颂共产党、毛泽东?这难道不是中共得民心的体现吗?其实不然。

“芝麻油,白菜心,要吃豆角嘛抽筋筋。三天不见想死个人,呼儿嗨哟,哎呀我的三哥哥。”

根据进化论的概念,人类是由最原始的水生动物,慢慢爬上陆地,从两栖生物、爬行类、哺乳类,最后进化到猿,再下到地上进化成人类,中间的过程经历了几亿年。生物学家按照生命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等到高等,画出了进化时间表。

然而许多考古学家的发现都直接地反驳了进化论支持者的论点,这包括在世界各地陆续发现了远古不同时期的人类的直接证据,从几万年前至几亿年前的人类脚印到人体的骨骼化石,都无法被归纳到进化时间表。例如,据一九九七年十一月六日《中国地质矿产报》报导,在中国云南富源县三叠纪岩石上面发现有四个人的脚印。据考证,这些岩石已有二亿三千五百万年的历史;一八五一年的六月号《科学美国人》刊载的一篇文章上提到在马萨诸塞州道契斯特(Dorchester)进行的爆破中,一个金属花瓶因被炸成两半而飞出岩石,将炸裂的两半合而为一后,拼成了一个钟形花瓶,花瓶由锌银合金制成,它自地下 15 英尺处破石而出,据估计有十万年历史。

就考古学发现而言,令进化论者头疼的另一个问题是,进化过程中确凿的过渡类型,严格地讲并没有发现。例如在从猿到人的问题上,科学家们发现了一些化石,归类为“古猿”、“类人猿”、“猿人”、“智人”,唯独没有“类猿人”。寻找过渡物种“类猿人”,被列入了科学的“十大悬案”。数次宣布的人类始祖,很快就被否定了。例如 1892 年发现的人和猿之间的过渡化石“嘉伯人”,是一块猿的头骨和相距 40 英尺的一根人的腿骨拼凑出来的,学术界否定了“嘉伯人”,科教方面却还在宣传。直到 1984 年“嘉伯人”才被新发现的猿人化石“露茜”代替。但后来的鉴定中,露茜同样被大部分学者否定了,科学家已经确定了露茜是一种绝种的猿——南方古猿,和人无关。

假如进化论是真的,过渡类型化石就应该很容易找到,为什么没有呢?大家沿用达尔文的解释:“化石记录不完全”。深入想一想:从宏观上看,化石的形成是普遍和随机的,为什么单单漏掉了过渡类型呢?

观察、假设、验证的“三步曲”,至今还是实证科学的科学家们发现自然规律和抽象科学定理所奉行的准绳。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只完成了前两步;然而经过几代人一个多世纪的努力,这至关重要的最后一步——“验证”,迄今尚没有得到令人信服的结果,并且从当前各学科的发展趋势和进化论自身的局限来看,进化论走完这三步曲中的最后一步,已经变得越来越渺茫了。

3) 灌输进化论的后果

中共灌输进化论和其推行无神论的目标是一致的。按照进化论的观点,人是自然界随机产生的。人的产生无目的,存在也无目的。这样,一切对神的信仰也就成了“虚无缥缈”的了。并且,人不过是进化了的猿,和其他动物并无本质的不同。动物和植物,生物与非生物,也没有不可逾越的界限。所以按照恩格斯的看法,生命也不过是“蛋白质存在的一种形式”而已。按照这样的观点来看,中国传统文化中对生命的尊重就成了不必要的“迷信”了。的确,从进化论的观点来看,砍掉一棵树与打死一只狗,杀掉一只猴子与杀死一个人,只有程度的差别,并无本质的不同,都只不过是改变了一些蛋白质存在的形式而已。

2003 年 3 月,SARS 蔓延到香港。香港媒体连续报导疫情发展。博鳌论坛秘书长、中共前对外经贸部副部长龙永图责怪说:“香港的报纸连续十天、二十天、三十天头版报导肺炎事件,谁还敢来?”“如果六百万人中有五十万人得了这个病,我觉得应该恐慌,但现时才三百多个就搞成这个样子了,我觉得有问题。”这种对生命极度

漠视的心态,不仅在中共高官中普遍存在,就连普通百姓也常常深受其害而不自知。中共建政以来,造成中国人非正常死亡达8千万。然而许多中国人即使明白了这一历史事实,仍然觉得那一条条逝去的生命不过是个数字而已。这种漠视生命的心态,和中共灌输进化论不无关系。

中共不断灌输进化论的另一个恶果,是使人们觉得“优胜劣汰、弱肉强食”是理所当然的法则。这样,在“国家”、“民族”这样美丽的口号下,对弱势者的劫掠便有了冠冕堂皇的辩辞:为了所谓的“发展”、为了所谓的“稳定”就无法避免牺牲。因此便有了何院士“谁叫你不幸生在中国”的豪言,便有了邓小平64时“杀20万,保20年稳定”的壮语。当这种法则被社会普遍接受的时候,人心对社会公义就失去了期望,随之而来的是社会道德水平的整体下滑。

4) 灌输现代科学的真实目的——压制信仰

自刚刚建政开始,中共就在全中国范围不断开展所谓“破除封建迷信”的运动。近几年又加入了“崇尚科学”的口号。几十年来学校教材都按照中共制定的教学大纲编写,确保课本知识只能成为中共的“社会发展史”、“辩证唯物主义”的佐证,而不会发生冲突。中共还设有专门的“科学技术普及法”,几乎所有的城市都设立了由政府出资的“科技馆”、“科普站”,其重要任务之一是配合“中央”在基层进行大规模的“科普”活动,举行“破除迷信”、“反对邪教”展览等等。几十年的灌输,使大多数人头脑中不但牢固树立了科学至上的观念,而且更将其上升到政治高度。于是“反科学”、“搞封建迷信”不仅仅是个人信仰的选择问题,而是祸国殃民,甚至应当全民共诛的“罪行”。

事实上在现代科学更发达的西方国家,政府也从来没有用科学的棒子去批判任何信仰。在各大学里,学生有充分的自由组织各种信仰团体,政府和校方不但不会干涉,反而鼓励多元文化的繁荣。西方国家虽然也有政府支持的科普活动,但与扫除“迷信”、反对“伪科学”等毫不相干。这些活动往往是普及灾难逃生常识等等,如从幼稚园、小学生开始就设有灾难逃生等课程,经常演习训练个人在火灾、飓风、地震、海啸等灾害发生时的应变技能。可是不但在中共的教学大纲中没有这些内容,甚至在灾害频发的地区,这些内容也不是当地的科技馆、科普站的重点。这是因为中共灌输现代科学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强国富民,而是为了压制信仰。本来一个人的信仰完全是个人的行为,即使中共自己制定的宪法也不得不承认公民的信仰自由。但是中共祭起“科学”的大旗,就可以“名正言顺”的给各种宗教信仰扣上“迷信”、“反科学”,扣上导致人民“愚昧”、“落后”的政治帽子。这样铲除信仰就披上了科学“卫道士”的外衣,甚至于还可以和爱国主义联系起来,因为“迷信”会导致国家“落后”。

中共建政之初,1950年开始便在全国各地大规模解散“迷信”组织,诸如基督教、天主教、道教(特别是一贯道)、佛教等组织。要求这些教会、佛堂、帮派的成员到政府登记并悔过自新。如不按期登记,一经查明,定予严惩。1951年政府明文颁布,对继续会道门活动者处于死刑或无期徒刑。据不完全统计,共有不下三百万教徒、帮会成员被抓被杀。

1999年中共开始镇压民间信仰法轮功,也是以“崇尚科学、破除迷信”的口号为其撑腰,以“反邪教”的名义对法轮功进行镇压之后,又进一步对其他气功门派、地下教会进行镇压。警察抓捕基督教地下教会信徒的理由往往直接就是“信神就是反党”。究其根本原因,以无神论为基础的中共独裁政权的确容不得民间对神的

电影上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主旋律”高峰。

(2) 主旋律与多样化

八十年代以来,随着中共的经济改革,电影界也尝试引入企业管理和竞争模式。目前中共大陆上映的国产影片中,大约25%是所谓“主旋律”影片,70%是娱乐片,5%为艺术片。然而,电影的宣传功能并没有被削弱,它只不过采取了更为复杂精致的形式。

首先,主旋律电影仍然承负重要的灌输党文化的职能。中共政策保证了主旋律电影的高投入、大制作、红头文件发行,各级组织观看。《大决战》投资数千万元,拍摄地区涉及十三个省,参拍群众多达十五万余人次,中共对此的重视可见一斑。中宣部、中组部、国家教委、广播电影电视部、文化部、全国总工会、全国妇联、共青团中央等单位多次就主旋律影片的发行放映发出联合通知,要求各级单位组织观看。《开国大典》、《焦裕禄》、《毛泽东和他的儿子》等影片的观众数量都相当巨大。

其次,主旋律电影向高科技化、精致化、人情化发展。八十年代以后,由于国门打开,观众的辨别力加强,中共从前编造的赤裸裸的谎言行不通了。中共的御用电影人揣摩观众心理,发展出一套复杂的主旋律策略。在所谓“革命历史题材”的影片里,创作者刻意制造出记录片的假相,把具有倾向性的对历史的陈述假扮成客观的历史。战争影片注重大场面的表现,以逼真的战争幻像冲击观众的理性判断,使其不愿去分辨历史与叙事。影片中的“革命领袖”被塑造成有血有肉的个人,以对他们的亲情、爱情、友情等的呈现,拉近与观众的距离。“党的敌人”也不复是以前电影中那副庸碌无能的模样,他们被表现为有一定才华和人格高度的人物,但在历史的较量中,败在中共手下,以此烘托中共领导人的棋高一招。

《江泽民其人》中记录了一件事,可以佐证中共主旋律电影手法的精致。江泽民曾应邀观看电影《开国大典》。影片中的一些镜头让他十分好奇,因为看起来像是极为珍贵的记录片。江泽民问导演那些镜头是从哪里找到的。导演回答说,那些镜头根本就不是找的,而是他们刚刚拍摄的,经过特殊技术处理后,看起来就像记录片一样。江十分满意,看完电影后总结说:“真的和假的糅合在一起——我都被骗过去了。”

中共的经典宣传片的基调是伟光正、人物形象高大全。随着它历史上越来越多的罪恶被揭露出来,并且陷入一个又一个现实的困境,中共必须采取不同的宣传策略为自己辩护。在有些影片中,中共领袖被塑造成虽具有崇高人格、但在无情而必然的历史进程面前也无能为力的悲剧型人物,以求得观众对他们在历史上犯下的罪行的谅解,同时使观众体会到普通人的快乐,从而更安于现存的社会秩序。

另外一个被广泛采用的手段是“煽情”。电影《邓小平》的导演声称:“我们必须把邓小平的一系列伟大革命创举,变成巨大的情感冲击波,把一切理性的事件化为感性的情绪!”《焦裕禄》和《孔繁森》中都有大段的群众性葬礼场面,用荧幕上群众的哀哭感染剧院中的观众,使观众在被影片主人翁的“高尚道德”感动之余,认同他们所代表的“党”的形象。

第三,娱乐片也同样承担着灌输党文化的职能。《电影通讯》1991年第五期评论员文章说:“作为一种创作精神,它(主旋律)不是一个量的概念,不是指多数作品与少数作品的关系,不是指这一题材与那一题材的关系,不仅不排斥任何创作,反而要求渗透于一切作品的创作指导之中。”

比,具有很大的优势,迅速在社会上普及开来。嗅觉灵敏的共产党很早就注意到电影。列宁说:“电影是教育群众的最强有力的工具之一”,“在所有的艺术中,电影对于我们是最重要的”。1949年8月,中共宣传部发布了《关于加强电影事业的决定》,指出:“电影艺术具有最广大的群众性与最广大的宣传效果,必须加强这一事业,以利于在全国范围内,及在国际上更有力地进行我党及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宣传工作。”1951年,中共夺权后第一个思想改造运动从批判电影《武训传》开始,毛泽东亲自捉刀,对《武训传》进行高调批判。毛泽东此举预示着其后的中共历任党魁都对电影这一艺术形式格外重视。1953年,对电影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全部完成,早于对其他民族工业的改造,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中共把电影生产纳入第一个五年计划,对电影进行行政指令性管理。

从1949年到1966年间,中共总共拍摄了700多部故事片,全面编造“历史选择了中共”的谎言、图解中共各个时期的政策、正面烘托党代表人物、贬低传统文化和传统人物。这个时期的代表作品有《白毛女》、《钢铁战士》、《南征北战》、《青春之歌》、《红旗谱》、《地雷战》、《地道战》、《李双双》、《红日》、《小兵张嘎》、《英雄儿女》、《野火春风斗古城》、《霓虹灯下的哨兵》等。

在这些影片里,中共领导人、中共的所谓“英雄模范人物”、甚至心理阴暗、行为下贱的中共特务都成为被歌颂的对象。电影这种媒体形式使中共能够“逼真地造假”,俊美的男女演员、诗情画意的环境氛围、传奇般的或史诗性的情节设计,最大限度地达到了烘托党代表人物的作用。人们心理上觉得艺术作品里的人物形象更“本质”、更具有普遍性,更有资格代表“党”,殊不知他们看到的只是“党”的假面具而已。

1949年以前,电影主要是一种城市艺术。为了扩大电影的宣传范围,中共以行政区为单位进行电影发行,系统建立电影放映队,把宣传触角伸向农村和厂矿基层。1949年全国电影放映单位为646个,到1957年增加到9965个,其中电影院1030个,电影放映队6692个。工会放映队在1954年一年放映114000多场,观众达1.1亿人次。这种电影放映队一直活跃到八十年代中期,对普及党文化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90%以上的“十七年”(1949年到1966年)电影被打成毒草,文艺领域成了样板戏的天下。1979年,“十七年”影片被大量解禁,当年全民平均观看电影28次,全国电影观众达293亿人次之多。这种现象其实反映了中共的一个统治策略。在经济上把人民剥夺到一无所有,所以只要经济状况略有好转,人们就对中共感恩戴德;在文艺领域把人民剥夺到一无所有,人们就会对灌输党文化的宣传品甘之如饴。

传媒研究发现,一种媒体越是诉诸人的多种感官,越是容易取得较好的效果。电影作为一种艺术,综合了文学、音乐、美术、表演等等,全面诉诸人的各种感官,是一种非常强有力的宣传形式。中共在电影里塑造了大量的党代表人物,他们的说话声调、面部表情、肢体语言等等,成为人们、尤其是青少年模仿的对象,比如毛泽东在地图前“指挥若定”的形象,苏联影片中列宁的演讲动作等等。很多电影中的语汇进入人们的日常语言之中,例如电影《英雄儿女》中王成的台词“为了胜利,向我开炮”就一直流行到今天。电影以“潜移默化”的方式改变着人们的心理和行为模式,其效果之巨难以估量。

中共对电影的重视程度超过对文学的重视程度,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似乎越来越是如此。1989年之后,中共在意识形态上趋于收紧,1990年到1992年之间,在

信仰,容不得在“党中央”之上还有至高无上的神。

虽然中共通过灌输进化论和现代科学来确立其理论根本——无神论,甚至还造了一个唬人耳目的词语叫“科学无神论”。然而就科学发展本身而言,它并没有证实无神论。按照正统宗教的观点,人是神造的,人否定神的存在,就如同实验室培养皿中的细菌企图否认人的存在一样是徒劳的。因为从现代科学的实证方法来讲,对于无神论的证实,必须要求在整个宇宙所有的空间和时间范围否认神的存在,这当然包括人类远未认识到的空间和时间范围。宇宙如此之宏大、多样、复杂,谁能保证,从浩瀚的宏观到无限微观,只有人是高级生命呢?甚至谁能保证,生命的存在形式只能依赖于我们所知道的蛋白质、氨基酸的形式呢?进一步讲,现代宇宙学认为人类无法观测的暗物质占宇宙的2/3,就是说即便穷尽人类现有的观测技术尚有2/3的宇宙属于未知;现代理论物理更提出膜世界理论,认为我们的宇宙不仅仅只是我们所能感受到的三维空间,认为许许多多空间是以多层膜的形式存在于一个多层超空间上。就是说还可能存在着另外的空间。那么谁能保证另外的空间没有高级生命呢?如果另外空间存在高级生命,如果他们具备远远超越人类的大慈悲,具备了悟宇宙真理的大智慧和超凡的能力,那对人类而言他们不就是佛、道、神么?因而不论从逻辑上和技术上讲,从科学的角度证实无神论是不可操作的。

需要指出的是,这里并不反对任何个人信奉“无神论”。作为个人而言,信神与不信神都应当是无可非议的自由选择。在正常的社会里有神和无神的信仰完全可以并存不悖。但是当政府以强制手段在全社会灌输无神论,压制对神的信仰而造成整个社会的信仰迷失,必然会使原有的传统社会价值体系丧失依托,从而导致全社会滑向物质主义、纵欲主义的泥沼。

5) 中共不讲“科学”,马克思主义反自然

尽管中共把自己打扮成科学的卫道士,而且还特别豢养一批御用的“反伪科学”专家,“反对迷信、反对伪科学”由政府出资大力宣传,其高调甚至超过科学发达的任何一个西方国家,但却无法掩盖中共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处处违背自然规律的实质。

2006年是唐山大地震30周年,长篇调查报告《唐山警世录》在1月甫出不久即被中共宣传部门悄悄下令封杀。因为书中披露,在大地震前中国的科技工作者多次准确预测了将要到来的灾难。

然而当时中共政局紊乱,政治稳定高于一切,无人敢上报或公布对地震的预测。唯一例外的,是河北青龙县科委有人在一次非正式场合得到国家地震局一位技术人员关于震情的预测通报,并将震情通知到县里每一个人。因此,距唐山仅115公里的河北省青龙县,在1976年的大地震中无一人伤亡。这一奇迹作为特别案例被联合国公众管理和灾害科学全球整合计划记录下来。

即使到了今天,中共政治挂帅,违背自然规律,犯下危害百姓生命财产的罪行仍然不断。2003年全球流行的萨斯(SARS),2002年11月最先在中国广东省爆发,但当时中共内部正面临党魁江泽民16大退位问题的争执,为了政权稳定而将疫情瞒下,最后错过春运前控制疫情扩散的机会,导致SARS全球爆发。这里哪有一点科学态度的影子?

几十年来中共好大喜功,为了狂热的政治目标做出无数违背自然规律的蠢事,最后遭殃的却都是中国百姓。比如三峡工程的上马就是中共导演的一个政治高于一切的“科学决策”表演。1986年,中共决定对三峡工程进行“论证”,以期通过这

一跨世纪的浩大工程，“全面展示改革开放成就”，展示中共驾驭自然的能力，为自己执政的合法性作注解。于是反对工程上马的著名水利专家黄万里教授有意没被邀请参加工程论证。黄万里数次给中共领导人写信，痛述三峡工程将造成的危害。他还指出，公布的论证报告错误百出，必须悬崖勒马、重新审查。中共对此没有任何回应。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即将结束时，正赶上1989年64事件，有的三峡工程反对人士被牵连入狱，另一些反对派也因而受到压制。当时生态环境论证组报告的结论是：三峡工程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是“弊大于利”；此外中国科学院环境科学委员会、科学院三峡领导小组办公室，也有一批专家反对三峡工程上马。这当然不为中共所喜，于是可行性论证领导小组技术负责人潘家铮于1990年7月6日，在国务院召开的三峡工程论证汇报会上，将三峡工程论证生态环境组的“弊大于利”的结论改为模棱两可的“三峡工程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是广泛而深远的”。随后长江水利委员会又以原生态环境论证组的报告的大纲未报国家环保局审批的程序瑕疵为借口，否定了该报告。短短的6个月后，在重新编写的报告中，结论却成了“利大于弊”。1991年3月，中共党魁江发出批示：“看来对三峡可以下毛毛雨，进行点正面宣传了，也应该开始做点准备。”1991年底和1992年初起，中国媒体大量正面报导三峡工程，反对的声音则被完全压制下去。

2000年5月17日，力主工程上马的张光斗教授在发现三峡工程的实际防洪库容不可能达到设计标准的错误后，一再叮嘱三峡委办公室主任“这件事在社会上公开是万万不行的”（《三峡探索》总第二十七期）。

此外，海内外专家指出，三峡工程对生态环境的破坏，远远大于三峡工程的经济效益，仅仅是三峡水库蓄水导致水流减缓、水体自净能力减弱、水质变坏而造成的损失，就将超过三峡工程的发电的经济收入。三峡工程论证中的环保主审人张光斗在工程上马后的2000年却发现三峡库区污染造成严重问题，曾建议拨款治理，他估计需3000亿元人民币（《三峡探索》总第二十七期）——需要注意的是三峡工程总投资是1800亿元。由于工程问题太多，以至于后来中共没人愿意承担责任，2006年5月这个跨世纪大工程竣工，现任中共领导人竟无人出席典礼。

在中共那里，“科学”和“科学家”都不过是听从政治需要的奴婢，不需要的时候，可以打倒在地，任意践踏；需要的时候又成了打击异己的棍子。一方面，敢讲真话、有独立人格的科学家如黄万里，在中共治下却只能抱憾终生；另一方面，又有一批善于迎合中共胃口的“科学家”，如前面的讲的潘家铮、张光斗等，都因为“听话”而得到重用。当中共需要“科学界”支持镇压法轮功等民间信仰的时候，两人又都摇身变成了所谓“中国反邪教协会”的发起人。

中宣部有个科学处，主管科学领域的意识形态问题，今天中共的“反伪科学”旗手何祚庥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就曾是该处的一员“大将”。上个世纪中宣部科学处发起所谓批判“伪科学”运动一个接一个，几乎波及到自然科学的所有学科。例如：对摩根基因学说的批判、对孟德尔遗传学的批判、对梁思成建筑学的批判、对马寅初人口学的批判、对量子力学一些理论的批判、对相对论的批判、对控制论的批判等等。典型的批判如，控制论被说成是企图用“纯技术的观点来解释社会现象，从而掩盖了资产阶级社会腐朽没落的根本原因”；爱因斯坦被说成是“自然科学中最大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而相对论，则是“彻头彻尾的形而上学唯心主义的”；大爆炸宇宙论和现代宇宙学是“学术领域唯心主义的典型”，是“供给宗教和科学以新的论证”的伪科学，等等。

中共几十年来杀人、搞运动都有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就是为了建立所谓共产

（西方人）不肯。可是看到学生脖子上的一面五星红旗，“老板眼里闪出亮光”，非要用面包换红旗。留学生大义凛然，拂袖而去，老板于是深受教育。政治课宣讲“一个中国”，“不排除使用武力”，语文课则从台湾没有雪讲起，最后用老师的话题：“那里（北京）的小朋友正盼着你们去和他们一起玩呢！”

这套新近出版的小学语文课本从第二册开始，系统灌输“红领巾”、“十月一日——祖国妈妈的生日”，用故事讲述中共的台湾政策、民族政策、外交政策、经济政策，等等，思想单纯的少年儿童在不知不觉中吸收了大量党文化内容。

现在的语文课本加入了很多有时代气息的作品，但我们必须看到，语文课仍然承担着相当重要的灌输党文化的功能。这是因为，第一，党魁文章仍然占据一定篇幅。第二，与众多文学名篇并置在一起，党文化篇目也自然获得了文学名篇的地位，也就是被“经典化”了。当学生用这些党文化篇目学习文法和修辞的时候，已经把内容当成自然、当然、甚至必然的东西，毫无戒备地吸收了。第三，目前应试教育中的技术至上化倾向把学生的注意力吸引到大量无谓的细节，对文章内容既无兴趣又无能力探究。

当然，语文课是和其他课程配合发生作用的，语文课在一定程度上的“去政治化”，从另一方面表明党文化的强大吸纳力和高度欺骗性。就像“人权入宪”、江泽民提出“以德治国”、胡锦涛高呼“和谐社会”一样，没准儿哪一天，“坚持发扬儒释道国粹”也会写入党章和宪法，继续为“伟光正”和“与时俱进”提供注脚。

中共教育体制下的其它课程，象地理、音乐、自然科学等等，都同样担负着灌输党文化的使命。窥一斑可见全豹，这里就不详细阐述了。

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党文化教育危害最大的不是灌输的具体内容，而是灌输给学生的认识世界、解释世界的认知框架。学生把这个认知框架内化以后，从此对该框架无法处理的信息或者采取极端排斥的态度、对该框架无法解释的现象视而不见、不闻不问，或者用中共灌输的扭曲思维方式对这些信息进行加工，最后得出有利于中共统治的结论。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今天的中国人一方面很有思想、能言善辩，另一方面极端偏狭固执，对自己不喜欢的事物深拒固闭，满足于一种“有选择性的无知状态”。

中国自古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说法，社会对教育普遍非常重视。对于为数众多的农家孩子来说，考大学更是除参军以外改变自己农民身份的唯一途径。可是，中共掌控了一切国家资源，孩子们要么不受教育，要么就只能受党文化的教育。几十年来，中共把本来应是天下公器的教育变成贩售自家私货的作坊，一代代中国人被迫吞咽下党文化教育的苦果。

5、利用多种文艺形式灌输党文化

共产党认为文艺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只能为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中共夺取政权以后，从经济上把文艺演出团体收归国有，从组织上把文艺界人士变成“体制内人”并对他们实行思想改造，在创作上对文艺界耳提面命严密控制，在短时间内把所有的文艺形式，如电影、戏剧、歌舞、曲艺等，都变成国家机器的一部分和灌输党文化的工具。

1) 利用电影灌输党文化

（1）“电影是最重要的艺术”

二十世纪初兴起的电影作为一种全新的艺术和娱乐形式，与传统艺术形式相

在给 学生灌输党文化方面,如果说政治课唱的是白脸,那语文课唱的就是红脸。政治课是疾风暴雨地灌,语文课是春风化雨地灌,方式不同,目的一样。

中小学语文课本的文章选择,很有学问。中共党魁的文章或关于他们的文章要占到一定比例,中共的所谓“英雄人物”(王二小、刘胡兰、江姐、邱少云、董存瑞、黄继光、狼牙山五壮士等)也不能缺席。为了图解中共的阶级斗争理论,语文课要正面表现古今中外的被压迫阶级,再把几个脸谱化的地主、资本家(周扒皮等)点缀其间。关于西方国家的课文,要体现出“资本主义糟”的特点。小音乐家扬科、万卡、我的叔叔于勒……或者悲惨地死去,或者黯淡地收场。世界名著不得不选,但要选与中共教条合拍的。因为毛用阶级斗争的观点读《红楼梦》,所以中学教材要选“葫芦僧判断葫芦案”,以显示封建统治阶级自私残暴,草菅人命。

中学语文课本收录最多的是毛泽东和鲁迅的文章。毛说:“反对自由主义”,鲁迅说,五千年历史,满本写着两个字,“吃人”,要“痛打落水狗”,“费厄泼赖应当缓行”。这些篇章,很多部分都要背诵。

(2) 老师的教法

不管这些课文的意思多么单纯明确,但任何文本在理论上都可以用多种方式解读。为了杜绝这种可能,中共的教育部门要求语文老师在讲解完字词句段章之后,再“画龙点睛”地指出课文的“中心思想”,强制学生重复这些党文化话语。比如上文提到的《小音乐家扬科》是小学五年级的课文,其中心思想是“旧社会剥削制度的罪恶”,老师要引导学生“懂得穷人的理想不可能实现,即使有才能,也要被埋没”,要“激发学生憎恨剥削制度,同情劳动人民的思想情感”。

(3) 考试的导向

升学考试是各级教育的指挥棒。考试的命题趋势对于教师和学生具有巨大的导向作用。也就是说,教学的重点受试题引导,而试题直接受制于中共政策。以高考作文题为例,1958 年的全国题目是“大跃进中激动人心的一幕”,1977 年的北京题目是“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上海题目是“在抓纲治国的日子里”。近年的作文题目中这种赤裸裸的党文化题减少了,代之以比较隐蔽的党文化,比如“一分为二”的所谓的“辩证法”。1990 年的“玫瑰花有刺”又让国人重温了一把中共的经典自辩词:“主流是好的”,“成绩是主要的”,“成绩是九个指头,失误是一个指头”,“太阳和黑子”。而 1991 年的“近墨者黑”和“近墨者未必黑”,其潜台词是改革开放并不违背四个坚持,预示着 1992 年邓小平南巡重新启动跛足经济改革。

升学考试对于各级教育具有绝对的导向作用。中共控制了考试的命题权,就是支配了学生学习时间的分配和脑力的运用。中共把要强制灌输的东西作为考试重点,学生不得不花十几倍、甚至几十倍于学习其他内容的时间记忆那些党文化内容。结果就是,党文化象刀刻一般深深地写进入了学生的心灵。

(4) 新近的趋势

曾几何时,小学生的人生第一课就是“毛主席万岁”,“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太阳升”。现在的课本“进步”多了,到了小学一年级下册才羞答答地推出“邓小平爷爷植树”。杜甫的名句,“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不是直接写诗人对孩子的想念,反而说小孩子还不懂得想念父亲,角度新颖、情味隽永。现在的语文课本,很多课文都是用这个技巧编造的。小学生不需要喊“四个伟大”了,却要和“乡亲们”深情地回忆,“吃水不忘挖井人,时刻想念毛主席”。以前鼓吹自己是“世界革命中心”,现在讲述这样的故事:留学生海外漂流遇险,想拿大衣换一块面包,老板

主义“人间天堂”。然而被中共冠以“科学”的经典——“共产主义理论”——实际上却恰恰是违背自然规律的歪理邪说。按照共产主义理论,所谓共产主义是人类社会的“最高形态”,其理论基础是通过生产力高度发展,物质财富极大丰富,达到“按需分配”的天下大同。然而不幸的是,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而自然资源却是有限的。

由全球专家组成的民间智囊组织罗马俱乐部在 1972 年发表了著名的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指出人类的生产不可能无限制的增长下去,首次在全球范围唤起了人类对环境与发展问题的极大关注。早在上个世纪 80 年代,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发表了影响全球的题为《我们共同的未来》的报告就指出:环境危机、能源危机和发展危机不能分割;地球的资源 and 能源远远不能满足人类发展的需要。据此,报告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换句话说,说由于人类发展的需要和地球有限的资源之间的矛盾,达到共产主义所谓“按需分配”的物质财富极大丰富是不可能的。马克思提出共产主义理论的时候,人类正处于工业化时代的初期,对于人类与环境的关系认识远远不足,共产党却把马克思 100 多年前提出的“共产主义”理论当作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这本身就是愚昧和盲从的态度。

6) 科学家信神并不妨碍其作出科研成就

江泽民在访问美国时问当时的美国总统克林顿:为什么美国科学这么发达,还有那么多人信仰宗教?这是中共党魁本身的愚昧无知的典型代表。其实,每一个中国人也应该问一问中共,中共动用政府力量竭力灌输现代科学、宣传所谓“科学无神论”几十年,为什么堂堂 13 亿人口的大国还没有出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而海外那些获得诺贝尔奖的华人反而恰恰都没有经历过中共的灌输?其实这正是因为,中共灌输现代科学,并不是为了发展中国的科技,其实质是为了压制信仰,钳制思想自由,而科学创造所需要的正是自由的思想环境。中共的灌输方式,却极力把科学和信仰对立起来,在民众头脑中形成一种僵化的思维定势,以为对神的信仰必定导致“愚昧”、导致“反科学”,把宗教信徒都描绘为一群没有多少文化而寻求心灵安慰的受骗者。

事实上,翻开历史我们就会看到,科学发展鼎盛时期的伟大科学家,包括哥白尼、笛卡尔、伽利略和牛顿等均称自己绝对信仰造物主神,认为这个世界——神的杰作是有矩可循的,正待科学家们去发现证实。科学研究和个人对神的信仰根本就不是如共产党所宣扬的水火不容的关系。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有一大批名垂史册的大科学家是有宗教信仰的“有神论”者,比如现代天文学的奠基人开普勒、近代化学的开创者波义耳、电解原理的发现者法拉第、电报的发明者莫尔斯、热功当量的发现者之一焦耳、电磁理论的集大成者麦克斯韦、被誉为原子理论之父的道尔顿、现代遗传学的奠基人孟德尔、青霉素的发明者弗来明、微生物学的创始者巴斯德等等,都是虔诚的宗教信徒。

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经典物理学巨匠牛顿。牛顿是个虔诚的基督徒,中共无法掩盖这一举世公认的事实,于是在教科书中刻意把牛顿说成是晚年涉身宗教,并因此无所创造,误导人以为其早年众多的科学发现是在“无神论”的世界观指导下做出的,而晚年其宗教信仰阻碍了科学创造。然而事实是,牛顿成为虔诚的基督徒远早于其从事科学研究,并且对神的信仰终生未变。牛顿早在剑桥大学读书时,就已经是个虔诚的基督徒了。他经常在笔记本或课本的空白处写下他的祷告,至今仍有许多保存在大英博物馆中。他更经常和室友魏金斯在校外分发圣经给穷人,向他们传

福音;因此购买要分发的圣经成为牛顿学生生涯中除了房租与伙食费外最大的花费。甚至牛顿对科学的思索也与他的祷告生活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他常在信仰的思索里想到科学,在科学的思索里想到信仰。以至于后来纽约大学历史系教授曼纽在其所著的《牛顿传》中都说:“近代的科学是源自牛顿对上帝的默想。”

根据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哈瑞特·乍克曼博士 1977 年在其著作《科技英才——美国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中的统计材料,自从 1901 年设立诺贝尔奖以来,美国获得该项科学奖的 286 位科学家中,73%的获奖者是基督徒,19%是犹太教徒。著名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费曼曾说“许多科学家确实既相信科学,也相信上帝一启示的上帝,而两者可以完美地一致”。现代航天科学之父冯·布劳恩曾写过这样一段话,也许可以视作对费曼的注解:“宇宙的无边神奇只能证实我们关于造物主确定性的信仰。我发现理解一个不承认在宇宙后面存在超理性的科学家和领会一个否认科学进步的神学家一样困难。”

7) 实证科学并不是探索宇宙规律的唯一方式

1994 年 3 月 1 日,秦始皇兵马俑二号坑正式开始挖掘。考古学家在二号坑内发现了一批青铜剑,剑身上共有 8 个棱面。考古学家用游标卡尺测量,发现这 8 个棱面误差不足一根头发丝。已经出土的 19 把青铜剑,剑剑如此。更令人称奇的是,它们在黄土下沉睡了 2000 多年,出土时依然光亮如新,锋利无比。科研人员测试后发现,剑的表面有一层 10 微米厚的铬盐化合物,这一发现立刻轰动了世界,因为这种“铬盐氧化”处理方法,是近代才出现的先进工艺,德国在 1937 年,美国在 1950 先后发明,并申请了专利。

无独有偶,在考古人员清理秦皇一号坑的第一过洞时,发现一把青铜剑被一尊重达 150 公斤的陶俑压弯了,其弯曲的程度超过 45 度,当人们移开陶俑之后,令人惊诧的奇迹出现了:那又窄又薄的青铜剑,竟在一瞬间反弹平直,自然恢复。当代冶金学家梦想的“形状记忆合金”,竟然出现在 2000 多年前的古代墓葬里。“形状记忆合金”目前用途很广,连女人的胸罩都用上了,也就是“记形罩杯”,可是有谁想到过,上世纪 80 年代的科技文明,为什么竟然会出现在公元前 200 多年以前?

让我们来做一个假设。假设上述神奇的铸造技术并没有留下实物而是记载在中国古籍之中的,并且我们是在上世纪初现代人类尚未发明类似技术的情况下发现这些古籍的记载的。按照中共党文化所谓“批判地继承”中国古代文明的观点,现代人都不可能实现的技术出现在古籍中,那一定是“迷信”或“艺术想像”。同时御用“反伪”、“打假”的打手们也一定会引经据典,论证其荒谬。

实际上,这正是中共长期灌输现代科学,致使人们而把现代实证科学奉为唯一真理的僵化思维表现。受这种思维影响的人,对现代科学尚未探索的领域、所不能解释的现象一概排斥,甚至扣上“伪科学”、“迷信”的帽子而大打出手。

中国古代科技并没有走上西方实证科学的路,但能不能据此而将其视为荒谬呢?由前面的假设中我们不难想到,华夏祖先数千年来留下的文化遗产中那许许多多被视为“迷信”的部分中,一定也有现代科学所不能认识的古代文明精粹。古代中医发现了经络、发明了针灸,如今现代科学已经采用测量皮肤电阻等方法证实了经络和穴位的客观存在,中医的作用也已为世界卫生组织承认并高度评价。人体经络、穴位实际上是一种生命特征,只体现在活人身上,经络运行受人的精神作用的影响,而且几乎没有解剖结构特征。按照实证科学之路,采用西医的解剖方法,是根本无法发现的。特别是古人还用天干地支的五行生克发现了穴位开合与能量流注随

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切实提高参与现代社会生活的能力,逐步树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初步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为终身发展奠定思想政治素质基础。”

看来,中共真的想一条道走到黑了。

2) 历史课:自欺欺人

(1) 政治挂帅,历史就像政治的分支学科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亡。世界各大文明国家都保存了大量的史料,人们可以从历史中获得丰富的教益,为个人的立身处世和民族的发展提供宝贵的借鉴。一个不了解自己历史的民族,就像一个失忆的人一样,处境是十分可悲的。

可是,中共的历史并不光彩,真实的历史是共产党的大敌。为了论证其统治的合法性,中共必须垄断历史的解释权。御用学者们使出浑身解数,把中国历史嵌入虚幻的“发展五阶段”,得出“历史选择了共产党”的结论。通读中共的中国史教材,得到的突出印象是:农民战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从陈胜吴广开始,中国人民就眼巴巴地盼望着掌握了历史真理的革命政党出现,好把他们从水深火热中拯救出来,这一盼就是两千年。终于“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共产党来了。

事实真相是,人类历史发展五阶段是纯粹的虚构,跟中国历史更是完全对不上号。如果说,中国从战国时期进入封建制,那怎么解释秦始皇的废封建置郡县?孔子说“吾从周”,汲汲奔走于六国之间,要恢复三代的礼乐制度,在中共眼里,是“奴隶主阶级”的代言人。可是,为什么孔子的儒家思想反而成了“封建时代”的正统思想?谎编大了就难以说圆。这套体系被戳得体无完肤,中共只恨当年不曾把二十五史烧掉。

(2) 掩盖、篡改、断章取义,把真实历史碎片化

中共的教育部门编历史教材的指导原则是:“唯物史观”解释不了的一概不讲;共产党的丑事恶行一概不讲;历史上的圣贤君子、明君贤相要挑着讲,讲的时候一定要指出其“历史局限性”;“反动阶级的罪恶”要大讲特讲;“农民起义”要大讲特讲;共产党的“光辉历程”要大讲特讲。

中共的历史书也讲孟子,讲的是“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以显示其“剥削阶级”的本性;讲国民党要污蔑他们“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却从来不敢说真抗日的恰恰是国民政府,中共自己“一分抗日,两分应付国民党、七分发展壮大自己”;讲基督教不讲“爱人如己”的教化,要强调“宗教战争”和“宗教是殖民主义的工具”;讲资本主义国家要强调“资产阶级民主的虚伪性”和“经济危机的内在矛盾无法克服”。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青年学生意识到中共对历史的篡改,想通过自己的阅读和研究了解历史真相,可是由于被先入为主地灌输了一套中共的邪恶史观,很难有根本上的突破。在近现代方面,中共垄断史料、封锁言路,目前在中国大陆几乎没有可能全面了解中共起家以后的真正历史。由于中共对历史的系统篡改,要了解中国的历史真相,不光要有能力看破中共就具体事件编造的谎话,更要有能力从中共的理论框架里跳出来,站在整个人类文明史的高度看待共产邪灵祸乱人间的近一个世纪。在这方面,《九评共产党》一书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范例。

3) 语文课:寓骗于乐

(1) 课文的选择

学完社会发展史,问老师,“既然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那资本家不顺应历史潮流,他们是真糊涂呢?还是装糊涂?”

大学的哲学史以马克思划线,马克思以前的西方哲学被称为古典哲学,不是机械唯物主义的就是唯心主义的,总之尚未发现真理;马克思以后的被称为现代哲学,全部带着垂死的资本主义的腐朽没落气息。中国的传统思想,如果还有一点合理成分,那也是辩证法或唯物主义的“萌芽”,是先民们“天才地猜测”到的。各种《哲学史参考资料》一类的书,按照这种结论阉割史料,把丰富的历史剪裁成“两条路线”的斗争史。学了这样的哲学,让人似乎觉得“天不生马列,万古如长夜”,令人纳闷既然马恩列斯毛一劳永逸地发现了真理,何不把其他的书一把火烧掉。

(3) 最有中共特色的教学内容——时事政治

中共是一个毫无原则的流氓党,其立场原则不断变化,即使那些善于紧跟形势的人,也不一定知道应该对某一件事新近发生的事情持什么态度。“时事政治”教育解决了这个难题。在高考和其他一些大型考试中,总有一定比例(一般是10%)的试题是关于时事政治内容的,强迫学生按照中共当局对事件的解释作答。2000年的高考政治卷中,就有一道诋毁法轮功的选择题。

(4) 灌输仇恨和歪理,培养愤青和政治冷漠

人权说白了就是老百姓的基本权利。可是经过多年灌输,“人权”这个词在绝大部分中国人心目中成了一个贬义词,至少是一个可疑的词。听到这个词,人们的第一反应是:“说话的人没准有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我可得多加小心。”

中共知道青少年最没有辨别力,因此仇恨教育一贯“从娃娃抓起”。1999年以后,灌输对法轮功的仇恨的内容堂而皇之地进入大、中、小学教材,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的高中三年级“思想政治”教材的第四课里,赫然印着诽谤法轮功的“教学内容”。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年11月第三次印刷的小学《思想品德》(第十册)十二课中,不但专门假借刘思影之口使大陆小学生落入“天安门自焚”骗局煽动的仇恨,而且让所有小学生把诽谤与仇恨法轮功当成“理所当然”的正面思想行为。很多家长虽然自己对中共的迫害政策不以为然,但为了保护孩子的纯真,不跟孩子谈有关话题。不料家长的好心却恰恰使孩子毫无保护地陷入中共的一言堂宣传之中。

除了前面引用的直接灌输某一结论的题目外,政治考试里还有一类题,必须扭曲自己的思维,才能给出正确答案。难怪有人说,“辩证法就是变戏法。”长期训练以后,学生们学会了“悬搁”自己的正常逻辑思维,进入出题者的变异论理方式。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或者完全习得这套邪恶论理方式,成为“左棍”、“愤青”,或者彻底放弃理解这些推理的努力,满足于一种“人格分裂”的状态。这些学生答题可以毫不含糊,但从此对“哲学”、“人生观”、“政治”等产生深刻的厌恶和冷漠,最终成为不会危及到中共统治的原子化个人。

(5) 政治课绝不放松

近年来,中共教育部对某些科目教材编写的控制慢慢松动。但对于政治课,却绝不放松。据说,“六四”后每次高校公共政治课内容的重大修改都要经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讨论、批准。一个2004年春出笼的“高中思想政治课程标准”这样写道:

“高中思想政治课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基本观点教育,……引导学生……领悟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

时间变化的规律,以此应用于临床治疗可获得显著的疗效,这更是以解剖为基础的西医难望其项背的。实际上中国古人是通过打坐修炼而体察到经络的运行的,明代李时珍在其所著《奇经八脉考》中就说“内景隧道,惟返观者能照察之”。中国古代科学讲究天人合一,是把人的物质身体、人的精神和整个宇宙视为有机的一体,直接进行整体研究的。

很显然,一旦需要把人类本身的精神活动也纳入研究对象的整体环境时,实证科学所要求的重复试验过程、分解还原等等手段都不再适用。从这一点来看,那些抡起实证科学的大棒子打击中国传统修炼文化的人,自以为真理在握,实际上恰恰是被党文化一叶障目,把现代科学宗教化、权威化,甚至政治化了。

8) 实证科学的局限

由于现代科学已经渗透人类生活相关的几乎所有领域,这使得中共很容易就采用僵化的思维方式来灌输现代科学,以至于许多人不自觉地把现代科学等同于真理,而“不科学”的也就成了谬误的代名词。实际上科学(Science)一词来源于拉丁文“Scientia”,原意是“学问”的意思,和真理根本不是一回事。广义上讲,科学是探索和不断接近宇宙规律的方法以及由此形成的知识体系。现代科学是以形式逻辑和实证方法为基础的认识和探索物质世界规律的一套方法及其知识体系,在这里我们称之为实证科学。从这个意义上讲,实证科学并不等同于终极真理,它应当随时准备接受新的事实检验,并伴随着人们认识能力和事物本身的发展而发展;同时我们也不能保证现代实证科学的探索方法就是探索宇宙真理的唯一方法。

现代科学在高速发展的同时,已经逐渐给人类带来许多头疼的难题。一批有远见的科学家已经开始认识到现代科学的局限了。来自西方的实证科学的哲学基础,是把一个完整的世界划分为两个独立的范畴:物质与精神,由此而建立的自然观把人和自然、人和世界、心与物分割开来。其后果就是不能实证精神活动的本质,精神与物质的关系、精神对物质的作用,而人的生命恰恰是精神与物质的一体。

这样一来,精神活动游离于现代实证科学的视野之外,道德更是没有物质基础的纯粹说教,人和自然也不再是完整的一体,其后果之一,就是人与自然的对立;由人主导的科学发展却有着很大的盲目性。瓦特发明了蒸汽机,由此引发的工业革命带来大规模利用化石燃料的能源新时代,谁也没想到200年后的人类会因此陷入温室气体带来的窘境;杜邦引以为傲的发明——氟利昂,作为当时最理想的制冷剂,给人类带来无数便利,谁也没想到几十年后由于它对臭氧层的破坏而几乎成为毁灭人类的杀手;可卡因是临床上局部麻醉的良药,因为发现了它,才有更多的生命从无影灯下被拯救,然而今天,可卡因的吸食者以千万计算,我们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可卡因毁灭的生命比它拯救的还要多;爱因斯坦发现质能方程($E=MC^2$)的时候,绝不会想到几十年后“核威胁”成为人类头上挥之不去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爱因斯坦说过,“科学是一种强有力的工具。怎样用它,究竟是给人类带来幸福还是带来灾难,全取决于自己,而不取决于工具。”在爱因斯坦看来,科学对人类是福还是祸,不能由科学本身来解决,只能由人自己来解决,在这一点上他想不出,除了传统宗教之外,还有什么能与之相媲美。他说“如果我们从先知者们所建立的犹太教和耶稣基督所教导出来的基督教中,把所有后来附加上去的东西,特别是那些传教士所附会上去的那些东西统统除掉,那就留下了能够医治人类社会一切弊病的教义。”在此,爱因斯坦已经认识到了现代科学由于将精神和物质分离而带来的

局限。

尽管普通民众,特别是许多受中共党文化灌输而相信现代科学无所不能的大众,尚不能认识现代科学发展给人类带来的种种危机,许多清醒的科学家已经意识到这一问题了。1992年,联合国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了有各国首脑参加的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一封有120多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签名的信送到了大会,引起反响。信中说道:“人类与自然已经处于强烈冲突之中。人类活动导致了环境和关键资源的严重破坏,而这种破坏经常是不可再恢复。如若不进行检讨,我们的许多活动将把我们所希望的人类社会和动植物王国的将来置于极其危险的境地,而且可能把这个生命世界变成不能维持任何我们所知道的生命方式的世界。为了避免将要到来的冲突,本质上改变(人类活动)已迫在眉睫。”

需要说明的是,我们无意指责现代科学。在这里指出现代科学的局限,是为了澄清党文化造成的误区,揭示中共灌输现代科学的真实目的——压制信仰、灌输无神论,最终达到思想改造的目的。

※※※※

中华五千年文化是从天地、神明和人的关系而确立的自上而下的价值体系,敬畏神明、相信天命和善恶报应、讲求顺应天道、返本归真是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中共高举“崇尚科学”、“破除封建迷信”的大旗,把这些的核心价值一概贬为“封建糟粕”,同时通过灌输未经证实的进化论和灌输片面化、宗教化的现代实证科学为手段,以残酷的政治斗争为暴力依托,而达到其推行无神论和斗争哲学的目的。虽然今天的中共出于装点门面也不得不表现出推崇传统文化的样子,但因为其无神论的基础已在中国确立,对神的信仰几乎已成为人人皆可嘲笑的“愚昧迷信”,无论其装修多少庙宇、建立多少“孔子学院”、提出多少诸如“八荣八耻”、“构建和谐社会”之类动听的口号,中华文化的神韵早已被中共抹杀。这种失去了内核价值的文化形式只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中共借暴力之威强行用“无神论”改造人们的思想,敬天敬神、道法自然的传统文化几乎被中共连根拔起,以至于今天的社会秩序仅仅是靠着老年人遗留下来的一点传统道德观念维持着,而缺乏信仰的道德与文化显得如此苍白和弱不禁风,随时会被横流的物质主义、功利主义和纵欲主义所彻底湮灭。当华夏的美德被洗劫一空,当善恶有报的信仰被贬得一钱不值的时候,人们不再探寻生命的价值,也无须追求人格的完善,人们心中没有任何顾忌,所剩下的只是“活在当下”的“潇洒”、感官的满足和对欲望的无度追求。中共思想改造的结果,使中国人的心灵没有了归宿,使中华民族丧失了立命的根基。

第三章 灌输手段

文化是一个人群的稳定的心理和行为模式,一种文化的形成往往要经过漫长的历史过程。可是中共



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中共在青少年的心灵上恣意涂抹,教育成了中共灌输党文化的重要阵地。

从所谓“解放区”教育开始,中共就开始建立系统的政治课程。取得政权以后,中共教育部门逐渐将政治教育法规化,强制各级学校实行。50年代高校设立的政治课程包括:“马列主义基础”、“社会发展史”、“中国革命史”、“政治经济学基础”等等。在非运动时期,这类课程可以占到大学授课总时数的十分之一到五分之一。政治运动到来之际,这种按部就班的讲授就显然达不到要求了。反右、四清中,各种运动、政治学习、听报告、军训、学工学农等形形色色的政治教育,加上课堂讲授,几乎吞噬了学生一大半的在校时间。饶是如此,毛泽东仍然认为,1966年以前“资产阶级知识份子统治了我们的学校”。1967年,中共中央《关于小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通知(草案)》提出:小学一至四年级学生只要求学习毛主席语录,兼学识字,学唱革命歌曲,学习一些算术和科学常识。五、六年级学习毛主席语录、“老三篇”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学习“十六条”,学唱革命歌曲。这还只是这场被称为“教育革命”的闹剧的小小一部分。

这场历时十年以上的全民强化洗脑在社会道德和民族心理上留下了巨大的恶果。现在我们再来看看,在“改革开放”以来的“正常时期”,中共是怎么向学生灌输党文化的。

1) 政治课:骗你没商量

(1) 课程多、课时长、覆盖面宽、要求严

古时候的学童,开蒙学习的是洒扫应对进退的礼节、礼乐射御书数的常识,用的教材里面本身就包含着做人的道理。西方近代以来,儿童除文化课以外,还上公民课,学习内容是民主社会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可是中共把教育当作阶级斗争的工具,教育的目的不是培养人格健全的个人或理性负责的公民,而是“听党的话,跟党走”的接班人。教学目的不同决定了教学手段和内容都不同。

从小学到大学(这是概括的说法,其实灌输从幼儿园就开始了,一直到博士班),中国的学生一直要上一门政治课,课时之长,课程之多,要求之严,古今中外仅见。

在不同的阶段,这门课有不同的名称和侧重点。小学时叫“思想品德”,初中叫“思想政治”、“社会发展史”、“国情教育”、高中叫“青少年修养”、“哲学常识”、“经济常识”、“形势任务”,大学里叫“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史”、“社会主义建设”、“法律常识”等等。这些课程,虽然名称不同,但宗旨只有一个,那就是证明“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些课程估计占学生总上课时数的近五分之一。

需要指出的是,这些课程不是可有可无的选修课,而是不折不扣的必修课,核心课,列入各级考试必考科目中。在某些升学考试里,政治不及格者一概不予录取。

(2) 把党文化装扮成“德育”、“常识”、“原理”、“基础”

党文化是无中生有的骗人的玩意儿,可是要想让人无抵抗地接受,就要把它打扮成自然而然、自古已然、天下同然,“放之四海而皆准,衡之古今无不通”。于是,反人性的阶级仇恨教育被称为“德育”,反常识被称为“常识”,歪理被称为“原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被称为“基础”,好像全世界人民都在学习这一套东西。毫无抵御能力的青少年学生完整地把这一套虚假而扭曲的世界观、人生观接受下来,从此变得狭隘而偏执,以为所有正常人都这么思考问题的,而共产中国才是世界的样板,动辄贬斥不同观点为“反动”、“沉渣泛起”、“亡我之心不死”。某中学生

暗示如果不和“党”同流合污,就只能用玩世不恭确证个体价值;与各种性乱现象一起造成性伦理在中国的全面失控的色情文学,则给人以“党天下”言论自由的假相。

今天中国的文化生态,呈现出极端复杂的面貌。只有真正认清中共的真实面目,才能以简驭繁,不为各种假相所迷惑。中共为了维护自身的存在,无所不用而又毫无底线。它可以“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拥护”,但它也可以反对敌人反对的,拥护敌人拥护的,只要“敌人”不反对它的存在。它可以豪言壮语、粗言恶语、也可以温言软语、甜言蜜语。一边是主旋律,一边是多样化;一边是“四个坚持”,一边是“双百方针”。“一切依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列宁语)登上权力巅峰时,它说:“胜利者不应被谴责。”(斯大林)在惴惴不安中苟延残喘时,它又会说:“面对强大的敌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即使倒下,也要成为一座山,一道岭”,把自己打扮成具有崇高动机的悲剧英雄。

“我必须对历史负责……我承认,对手可能比我强大得多,可对方已经宝剑出鞘了,我可不亮剑吗?我想试试运气,就算属于我的那个时代已经结束,但总要去画个句号吧?”(《亮剑》)

“生存是什么?生存就是不择手段地活着。你可以卑鄙,你可以无耻,你还可以下流。只要能在这个世界上活下去就好。……吃草的未必是仁慈,吃肉的未必是残忍,我是一只狼,注定了是一只狼,一只锋牙利爪的狼,鲜血与死亡是我生命的源泉。”(《狼》)

任何时代的文学都以或直接或曲折的方式反映着那个时代。这两段中国大陆畅销小说中的话,一段抢占“失败英雄”这一最后的宣传制高点,另一段做赤裸裸的权力宣示。这些现象表明,党文学不但没有退出历史舞台,反而扩散到种类繁多的作品当中,更加难以辨别,难以抵御。

经过几十年中共恶党控制的文人的灌输,中国人接受了中共的那一套价值观,仇恨变成了崇高,杀人放火变成了正义,暴君、小人、流氓和暴徒成了崇拜对象,残忍的党性代替了人与人互相关爱的善良本性,敬天信神成了迷信愚昧……善恶的标准被颠倒了,文学丧失了陶冶情操的功用,变成了中共可以肆意美化自己罪行、掩盖罪恶的遮羞布。从这种意义上说,邪党的文人无疑是中共杀人的同谋和帮凶。

4、利用教科书灌输党文化

一个人对事物的判断主要由两个因素决定:一个是他掌握的信息,另一个是处理信息的方式,即思维方式。对于现代人来说,新闻媒体是最重要的信息来源,学校教育是塑造思维方式的最主要力量。因此,中共灌输党文化,必然极端重视新闻媒体和学生的教科书。前者我们在第一节已经谈到,这里重点谈中共教科书的灌输作用。

1949年以前的中国教育,包括国立、私立和教会办三种模式。1949年以后,所有学校被收归国有,中共当局通过“党委负责制”、制订法规、行政命令等方式掌握学校权力,通过组织清理、思想改造的方式驯服教职员工,用教科书给刚刚成长起来的青少年系统洗脑。毛泽东说,“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



攫取政权以后,在短短的几十年时间里,给中国人的思维、语言和行为模式打上了鲜明的烙印,制造了一个遍及中国一切方面、一切角落的党文化。它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

共产党是人类历史的异类,其指导思想有违人的本性,不可能从任何正统文化中自然推演出来。也就是说,一个受传统文化滋养长大的人,不可能自动地具有共产党所宣扬的变异观点。党文化的形成,是中共长期灌输的结果。

这种灌输是强制的、全面的、彻底的、高强度的、不间断的,又是狡猾的、伪善的、隐蔽的、不断变形的,以暴力为依托、以利益为诱饵的,利用一切可能的工具,在一切可能的场合,用一切可行的方法。

中共视宣传灌输为自己的生命线,几十年来发展出系统的理论、繁复的制度、精致的技术和大量的“人才”,再辅以周期性的政治运动强化。其主要手段包括:紧紧抓住宣传机器,推行党文化,造假宣传;强制人民读马恩列斯毛的书;控制邪党的文人歌功恶党,改变中国人的善恶标准;用学生的教科书歌功恶党,让人们从小学到大学都泡在党文化中;利用电影、戏剧、歌舞、曲艺等多种文艺形式,正面烘托党代表人物,贬低传统文化和传统人物,等等。这种灌输是如此系统,如此精致,如此无所不在,以至于很多时候人们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思想被灌输、被洗脑,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言语、行为和思维都与中共的灌输密切相关。

系统反思中共集大成的灌输手段有助于我们认清党文化的建立过程、本质特点和画皮千变的内在机制,深入剖析中共的灌输手段是解体党文化的重要一步。

1、紧抓宣传机器推行党文化

枪杆子和笔杆子是共产党的两大生命线,列宁曾经把这种斗争手段概括为“恐怖主义”加上“意识形态”。中共继承了苏共的邪恶基因,把“骗”字诀用得更加得心应手。刘少奇在1951年一次讲话中直言不讳地说:“我们党从最初建立起,就是全党做宣传的。……以后,更要这样做。”中共的宣传机器在中共对民众进行洗脑灌输、建立党文化的过程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1) 政治运动与常规时期

(1) 在政治运动中灌输

发动不间断的政治运动是中共政权与正常的人类政权最大的区别之一。这是因为共产党的所谓“党性”是和人性截然对立的,一旦环境宽松、控制减弱、与外部正常社会接触增多,党员和人民群众中就会出现人性复苏的情况,中共则面临着“党心”涣散、难以维持的局面。因此,对于中共来说,周期性的政治运动也就成为必然。

因此,中共利用宣传机器灌输党文化也可以分政治运动和常规时期两种情况。无论是在哪种情况下,中共的核心领导层都把控制宣传机器(报刊、广播、电视等)当作“头等大事”、“重中之重”,只不过具体操作方式略有不同。文化大革命中,中宣部曾被称为“阎王殿”受到冲击,全国范围内表面上一度出现“无政府”、“天下大乱”的景象,但掌握实际权力的中共核心集团从未放松对重要的宣传机器(如被称为“两报一刊”的《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的控制。

在常规时期,中共的宣传灌输遵循如下模式:党魁定调—政治局决议—中宣部

贯彻一各级职能部门和喉舌执行。而在危机时期,中共党魁往往绕开一般性的程序,一手操控媒体,一手紧握屠刀(军队、警察、特务系统),先斩后奏,造成既成事实,过后则以“党性”要挟全党,统一思想,统一舆论,于是党性一次次战胜人性、一步步灭绝人性,直至“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都屈服于党的变态意志之下。

毛、邓、江分别在不同时期,跳到前台,直接捉刀或授意喉舌报刊发表社论,为政治运动定调。1957年反右运动“引蛇出洞”以后,毛泽东亲自为《人民日报》撰写社论,开始了对数百万知识份子的严厉整肃,这场被毛称为“阳谋”的“反右运动”彻底摧毁了中国知识份子的独立思想和自由意志。为1989年学生运动定性的“4.26”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也是在当时实际掌握权力的邓小平直接授意下出笼的。1999年10月25日,中共恶首江泽民接受法国《费加罗报》采访,将法轮功称为×教,第二天《人民日报》就发表文章《“法轮功”就是×教》,江泽民失去理智的咒骂从此凌驾于宪法法律之上。

中共在政治运动中的宣传灌输往往伴随着狂热的政治动员和铺天盖地的舆论攻势。这种大规模的舆论攻势切断了人的正常信息来源,使人们根本无法进行独立的思考判断。很多人由此接受中共舆论的“引导”,并以为那是自己的独立思考的结果。即使有少数头脑比较清醒的人,面对中共暴力机器和“群众专政”的巨大压力,常常也只能保持沉默。

今天的中国人都会觉得中共前几十年的政治运动荒谬可笑。可是,如果从灌输党文化这个角度来看,这些运动非常“成功”地达到了它们的目的。这是因为,经过相当长一段时间的灌输,人们无法正确分辨哪些是自己的正常思想,哪些是中共灌输的观念。人们“告别革命”,只是告别了革命的表面形式,而革命的党文化内涵却几乎原封不动地留存下来。今天人们固然不再唱“语录歌”、跳“忠字舞”、热衷于大鸣大放、文攻武卫,可是中共的政治运动强化灌输的无神论、唯物论、进化论和斗争哲学仍然被中国人当成放之四海而皆准、根本无须证明的普适“真理”,敬天信神被称为“封建迷信”,被抽去了精神内涵的传统文化或者被当成装点门面的饰物、或者被当成赚取钞票的工具,人们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妥。中共的“思想改造”成功了。

十年文革使国民经济到达“崩溃的边缘”,中共被迫在经济领域和文化领域作出些许让步。但在关系到中共集团生存目标的意识形态领域,它从来没有放松过。邓小平曾说,“在这样的问题上,我们从来就没有‘放’,当然也谈不上‘收’。”就在2005年提起被封闭得像高压锅一般的共产流氓小国古巴和北韩,胡锦涛还羡慕不已,说他们“在意识形态上一贯是正确的”。在新的形势下,中共一方面继续严防死守、围追堵截,另一方面不得不“与时俱进”,变换花招,其宣传策略变得更精致、更灵活、更有欺骗性了。虽然从80年代到现在,中共又接连发动了“整党”、“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批判六四民主运动”、镇压法轮功等一系列的运动,可是人们并不觉得自己身处政治运动之中,仿佛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中共的党文化灌输已经达到了让被灌者不知不觉、心甘情愿、甚至乐此不疲的程度。

(2) 常规时期的灌输由中宣部统筹实施

英文里的“宣传”(propaganda)一词,和洗脑、欺骗联系在一起,是个不折不扣的贬义词。只有在法西斯和共产党的词典里,“宣传”一词才具有正面的意义。遍寻往古来今的政治体系,也只有在法西斯和共产党政权体系当中,才有“宣传部”

所谓文学,绝无可能和真正高水平的世界文学名著媲美。妒忌的丑女人无法把自己变美,就只好设计害死美丽的白雪公主。中共建政以后,有计划地毁书、禁书。文革中,凡是跟美有关的事物,都被贴上“资产阶级”的标签,中国人的文化饥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饥渴难耐之下,人们不得不饮鸩止渴,党文学于是乘虚而入。

(4) 用重复增强瘾好效应

人并不需要以酒为生;对于不喝酒的人来说,酒的味道也并不可口。可是为什么就有人嗜酒如命呢?这就是瘾好效应。长期浸泡在一种文化里面,人们会养成一种期待心理。一部作品满足了这种期待,就像搔到痒处一样,使人产生满足感。所谓美感,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就是对瘾好的满足感。懂得了这一点,就不难明白,美感有时候是非理性的,可以被人为地制造出来,而人的审美心理也可能被人操控利用。

中共也利用了这一点。“党”的教条被包装成一句口号、一首歌、一幅画、一个比喻、一个形象,而后被用各种方式不断重复加强,硬生生给中国人制造出一种变异的“美感”。被称为“山大王的诗”的“毛诗词”、粗野不文的“毛文体”、飞扬跋扈的“毛体书法”被重复、模仿、崇拜,有人还以为它们是二十世纪中国艺术的顶峰。今天,所谓“红色经典”还在中国大行其道,这一事实表明,中共长期以来刻意培植的民众对其邪恶文艺的心理依赖仍然没有失效。

4) 从“看得见的黑手”到“看不见的黑手”

透视中共党文学,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中共建政后的党文学,可以以文革为界划分为两个阶段。前一个阶段从1949年到文革;后一个阶段从文革结束到现在。前一个阶段“党”上足了发条,拼命革文化的命,专文艺的政,紧箍越箍越紧,圈子越划越小,是一个“收”的过程。而文革之后,“文学为阶级斗争服务”的口号弃置不用,“突破禁区”、“解放思想”,束缚作家创作的条条框框越来越少,似乎是一个放的过程。现在的中国文坛,美女作家、“痞子文学”、“下半身写作”,光怪陆离,真是“解放”得够可以的了,在这种情况下,怎么理解中共对文学的操控利用呢?

人口学上一般把二十五岁左右当作一代人的时间。从1949年到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一共二十九年。1920年代以前出生的人,即在1949年中共建政以前30岁以上、世界观已经形成的人,到1978年的时候已经60岁或更老,过了退休年龄。那时候活跃在各行各业的人,基本上是喝中共毒汁长大的;换句话说,到1970年代末的时候,党文化已经基本确立了。于是中共变换策略,从一些领域做有限度的撤退,从以前那个无所不在的“看得见的黑手”变成幕后的“看不见的黑手”,在整体上“宏观调控”党文化对民众进行回流灌溉。(当然,如果有需要,“黑手”可以随时伸出来。)

党文化确立的证据就是:不待“党”的直接领导,经过“思想解放”,“放”出来的文学,仍然完全符合中共的政治需要。文革后有名的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对文革的解释和中共政策如出一辙——犯错误的是林彪四人帮、“极左思潮”,“党”还是伟光正的,不光勇于承认错误,还善于改正错误。

寻根寻出来的是“党”按照进化论那一套推出来的不存在的蛮荒时代,诱导人们把“党的错误”归结为“封建遗毒沉渣泛起”;“意识流”流动的是打散重排的“向党交心”和忆苦思甜;写实写的是市井小民的卑微生活,替“党”告诉大家:“人生就是烦恼、命运不可捉摸”,所以不要再对“党”说三道四、吹毛求疵了,大家都不容易,“活着确实不容易”,“活着就好”,“要珍惜来之不易的大好局面”;以调侃和嘲讽为能事的文学作品实际上是在用另一种语言垃圾反对党语言的垃圾,

作品；反之，一部作品如果表现了阶级性（对阶级敌人的仇恨、对阶级兄弟的友爱），那就是好的、进步的作品。表现父子之情、母子之情、爱情、友情、同情心、普遍的“人类之爱”的作品被贬斥，而表现党性战胜人性、“无产阶级觉悟”的作品被表彰。

按照这种逻辑塑造出来的英雄人物普遍“高”、“大”、“全”（有一部作品的主人公就叫“高大泉”），形象高大，智勇双全，不食人间烟火，对党忠心耿耿，对敌人刻骨仇恨。而反面人物形象猥琐，凶残狡诈。正面人物要姓“高”、“梁”，反面人物要姓“刁”。

一篇短篇小说，描写某地区严重缺盐。年轻的母亲为了把咸菜当作“党费”交给地下党，把瘦得“细长的脖子挑着瘦脑袋”的妞儿（小女孩）手里的一根腌豆角拿走，把孩子弄得哇地哭了。这位母亲把“党”置于家庭和亲情之上，于是获得了党文学的肯定。

中共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往往毫无性别特点，苦大仇深、意志如钢。爱情被贴上资产阶级的标签，在中共的文学作品里或者完全缺席，或者经过处理，被用来衬托“革命事业”的“壮丽和伟大”。如果男（女）主人公爱情萌动，另一方往往要壮烈牺牲，于是主人公化悲愤为力量，继续投身革命的“滚滚洪流”。主人公因爱而结合是革命文学作品的大忌，因为一旦组成家庭，琐碎的日常生活就会“腐蚀革命者的斗志”，中共也就无法“继续革命”、“不断革命”了。

因为中共的御用文人信奉“主题先行”的创作原则，所以每次中共有什么新的需要，应景的文学作品就会被批量生产出来。以上只是举了几个小小的例子。

3) 中共利用党文学进行灌输的几个特点

党文化是附着在中国文化之上的一种附体文化。中共极善于利用传统文化、民间文化的形式和元素，达到增强宣传效果的目的。

(1) 全方位盗用民族文化形式

中共对人类文化的态度从来是为我所用，只要对其统治有利，就一概拿来，决不手软，亦不吝惜。在文学方面，旧体诗词、白话诗、各体民歌、中短篇小说，长篇小说、章回体小说、散文、话剧、戏曲等等，全部被用来承载党文化的内容，美其名曰“旧瓶装新酒”，“民族形式，社会主义内容”。

这样做当然是有原因的。人的审美心理就有一定的稳定性。经过长期积淀而形成的审美习惯不会轻易改变，那么与其另起炉灶用新瓶装新酒，就不如利用人们固有的审美习惯，把党文化的内容偷偷夹带进去。这种承载了党文化内容的民族形式，既给人亲切感，又给人新奇感，最大限度地达到了中共的宣传效果。于是，人们在吟咏诗词、哼唱小调、读小说、看话剧的时候，不知不觉地成了党文化的俘虏。

(2) 善于利用文学技巧

虽然“党”几乎是文化的反义词，几乎等于“武化”、“粗鄙野蛮化”、“反文化”，可是另一方面，“党”又非常善于利用文化，“党”是利用文化反文化。

中共的御用文人，为了更好地达到党文学的宣传效果，的确费了一番苦心。白描、衬托、悬念、包袱、呼应、波澜、心理描写、典型性格、个性化的语言……东西方古典文学中成功的技法，几乎都被拿来使用。

因为中共文艺重视“普及”，即主要针对文化不高的工农群众，所以炮制出来的文学作品虽然水平有限，但还是相当成功地达到了灌输党文化的目的。

(3) 用禁书加强文化饥渴

对于饥饿的人，随便什么食物都是美味珍馐。中共知道，御用文人们炮制出来的

的一席之地。“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共，出于维护自己国际形象的需要，把宣传部的英文名称改为“公共信息部”（Publicity Department），但其性质没有丝毫改变。作为中共中央直属机构的中宣部，是中共对中国媒体和全民精神控制的专门机构。

几十年来，中共始终把完全控制意识形态领域作为其党生死攸关的头等大事。中共通过中宣部掌控全中国的舆论导向，贯彻传达“党”的意志，通过国家宣传机器，对民众进行反复洗脑宣传，把全民思想统一到中共中央的意图上来。中国的两千多家报纸、近万种期刊、上千家广播电台和电视台，几十万个网站，均由中宣部和各级宣传部负责管理。

众所周知，中宣部并没有自己的意志。它以中共中央的意志为意志，以中共的集团生存为目标，以共产党的利益为根本利益。中宣部的工作，说来简单，那就是一面封杀真实，一面制造虚假以取代真实。

我们首先看看中宣部是如何封杀真实的。2002年6月中宣部下发给新闻媒体的一道禁令，共列举了三十五个“不许”，下面只是其中一部分：

“不许擅自报导农村税费改革”，“不许对重大疫情、病情进行渲染报导转载”，“不许对重大安全事故随意报导”，“不许报导私营企业主入党”，“不许报导和转载状告各级党委的政府事件”、“不许过度渲染贫困和暴富分红”，“不许报导希望工程存在的问题”，“不许在媒体运用‘封杀’一词”，“不许提新闻舆论是第四种力量或权力”、“不许刊发错误言论和不正确观点”，“不许集中进行批评性和负面报导”，“不许对民族宗教等领域进行随意报导”，……



中宣部每年向各省市区传媒下发至少一百多条（次）通知或禁令。省、市一级宣传部每年平均向媒体发出的通知、禁令超过二百三十条（次），其中发禁令最多的上海、广东、四川、山东、湖北、湖南、河南，这些省市的宣传部每年向辖内各媒体发出的各种禁令通知书超出三百一十条（次）。就是说，这些地方的媒体几乎每天收到一条禁令。

为加强对传媒的控制，中宣部设新闻阅评协调小组，监控中央和地方主要传媒的动向，并定期向上报告。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宣传部或新闻局聘用大批“新闻审读员”，专门负责监控传媒文章、音像制品等的“政治问题”。由中宣部新闻局负责审读的出版物仅报纸类就达一百余份。

可能有人会说，以中国之大，除了这些禁忌话题以外，可供报导的事件还有很多。可是，中共惯于“攻其一点，不计其余”，朝颁夕改，无限上纲，所有党不喜欢的言论都可能被贴上“错误”的标签。这些禁令正因为措辞模糊、没有规律可循（“不许随意评点……”、“不许过度吹捧……”、“不许刊发错误言论和不正确观点”），所以具有更大的威慑作用。媒体从业人员唯恐触犯雷区，于是只好自我设限、宁左勿右，每个人都充当自己的新闻检查员。那些有幸通过检查的新闻，已经“政治正确”得几乎没有任何阅读价值了。

中宣部同时不遗余力地制造出另一种“真实”，通过给百姓虚幻的满足感和安全感来维护其党的稳定。和谐、反腐、爱国、小康、五个一、三个代表、八荣八耻、学习、

加强、成绩、高举、里程碑、先进性、阔步前进、伟大胜利……铺天盖地的党文化造假宣传,把民众和中国的真正现实几乎全面隔绝开来。失业工人和进城农民工的悲惨处境、被强制拆迁而无家可归的城市居民、贪污腐败、官商勾结、警匪勾结、生态环境的严重恶化、迅速下滑的道德状况和不断恶化的人权状况,这些严重威胁民族生存的可怕现实,或者被完全挡在人民的视野之外,或者被刻意淡化,美其名曰“发展中的问题,只能在进一步发展中解决”。

自由信息是自由思想和独立判断的来源。中宣部的各种禁令和设限导致信息完全被中共过滤,民众无法从中得到真实的消息,进行独立的思考。同时人们不得不时时吸食被中共党文化浸泡的信息,顺着党文化的思路进行反应和批判。久而久之,人们对这种灌输习以为常,根本不相信自已已经被党文化洗脑了。

2) 主要的宣传机器

获得真实的资讯是人类维持生存的必要条件。古时候,人们通过口耳相传就能够掌握足够应付生活需要的资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兴起,人类活动的规模和尺度不断加大,世界日益变成“地球村”,发生在万里之外的事也可能对一个人的生活产生巨大的影响,这时口耳相传就远远不够了,大众媒体于是应运而生。

大众媒体的出现,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的信息环境。通过媒体,分散的个体愈加紧密地和社会发生联系,人们需要关心的事越来越多,个人的精神世界变得更加丰富复杂。今天的人类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从媒体获得的信息对外部环境做出判断,进而做出趋利避害的选择。

由于媒体在社会生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西方民主国家,媒体被称为独立于立法、司法、行政之外的第四种权力,记者被称为“无冕之王”,拥有巨大的社会影响力。

中共惯于攻击“资本主义国家新闻自由的虚伪性”,很多中国人也未经思考就重复中共的话。其实,新闻自由并不意味着任何一个特定的媒体都不具有倾向性,而意味着法律保障具有不同倾向性的媒体自由竞争,也保障个人或团体自由创建自己的媒体。在这种制度下,多家媒体并存并互相补充,使人们有机会综合不同的观点,做出自己的判断和选择。如果有人对所有现有媒体都不满意,那么他也可以依法成立自认为更中立、客观的媒体。与此相反,中国的媒体却全属中共“官办”,“独此一家,别无分号”。中央电视台可以在美国播出,美国的电视台却不能在中国播出。

中共的严密思想控制意味着媒体正常的传播真实资讯功能的死亡。在共产党统治下,报纸、电视、广播、互联网等大众传播工具必然沦为“党的喉舌”和党文化灌输的工具。

(1) 报刊

据1991年台北出版的《中共地下党时期报刊调查研究》一书统计,1949年以前,全力颠覆当时合法政权的中共利用国民党统治下相对宽松的舆论环境,除了在所谓“解放区”把持宣传工具以外,还在国统区创办或操控报刊达一千种以上。中共利用这些报刊,鼓吹“民主”,美化自己,打击国民党,为其夺权立下“奇功”。

可是,夺权成功以后,所有媒体一夜之间“共产”到“党”的手里,如果这时再向“党”要求新闻自由,“党”的标准答案是:不存在超阶级的新闻自由。著名民主人士储安平曾预见到:“在国民党统治下,这个‘自由’还是一个‘多’、‘少’的问题,假如共产党执政了,这个‘自由’就变成一个‘有’、‘无’的问题了。”其实,连“民主有和无的问题”也不存在,毛泽东直言不讳:就是要“剥夺反动派的

文人写崇拜物质、崇拜暴力的文学作品,另一方面操控御用学者篡改、阉割、曲解有神论文学。于是,宗教成为“精神鸦片”,天堂地狱变成“封建迷信”,神话传说成为原始社会生产力不发达时期人们对自然力的恐惧的形象反映,孙悟空和《失乐园》里的撒旦变成了无产阶级和受压迫者的代表。

(2) 破除传统观念,灌输阶级仇恨

中国传统的诗教讲究“怨而不怒,哀而不伤”,即使在哀怨伤感的时候,还要控制自己的情绪,使其归于平和中正。中国古典文学里,充满了描写忠孝节义、美好的亲情友情的作品。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的作用是宣泄和净化,古罗马文学家贺拉斯则认为文学的功用在于教育和娱乐。世界各国的文学作品即使写到仇恨,也多是从惩恶劝善的角度写,描写和煽动仇恨和传统文学的特点是不相容的。

然而,按照中共的理解,“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因此,灌输和煽动阶级仇恨就成了中共党文艺的首要任务。仇恨,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成为一个具有正面意义的词语。

“这个十八岁的女奴,一双黑亮、火辣辣的大眼睛里燃烧着刻骨的仇恨!”

这是电影剧本《红色娘子军》的开篇。在此剧本基础上改编的舞剧剧本变本加厉,对仇恨的渲染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她昂首挺胸,双眼迸射着仇恨的烈火”,“她们紧握双拳,倾诉着满腔愤恨”,“心中燃起了强烈的阶级仇恨”,“军事操练在充满阶级仇恨的刺杀声中结束”,“苦大仇深”,“血海深仇”,“报仇雪恨”……舞剧的主人公大多是二十岁不到的花季少女,就这样被描写成了毫无人性的杀人机器。

更可怕的是,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人的精神生活极度匮乏,这些人物是少女们群起效仿的偶像。文革中的女中学生能够把老师用皮带活活抽死,在广西大地上“阶级敌人”被剖心挖肝吃掉而吃人者毫无罪恶感,很大程度上就是拜了这种仇恨文学之赐。

(3) 美化历史上的暴君、小人、流寇和暴徒

共产党要把自己粉饰成“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中国人民的必然选择”,就需要全面篡改历史,把历史上的暴君、小人、流寇和暴徒打扮成“历史前进的动力”。于是,中国历史上有定评的大奸大恶之人,被中共恭恭敬敬地捧上神坛。暴虐的商纣王、秦始皇、刻薄寡恩的商鞅,都成了中共歌功颂德的对象。中共奉农民战争头领为先驱,残忍嗜杀、暴虐无度的黄巢、张献忠、洪秀全成为中共文学殿堂里的正面形象。这里仅举一个小小的例子。

明末匪首之一张献忠嗜杀成性,当时的四川一省人口几乎被他以各种方式屠戮殆尽,富庶的天府之国变成人间地狱。

获1982年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第一卷下册开篇,以田园诗般的优雅笔调写道:“不断遭受战乱的谷城一带,自从张献忠的农民军驻扎在这里以后,稍稍有一些太平气象。”

当然,美化这些历史人物不是目的。美化完这些历史人物之后,中共就开始堂而皇之地美化自己了。

(4) 贬低人性,歌颂党性

阅读中共的文艺理论著作,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那就是“人性”一词被当作贬义词来使用。一部作品如果表现了“人性”,那就是一部失败的、甚至是反动的

权之上。中共邪灵入侵之后,文学不幸沦为中共制造党文化、灌输党文化的可耻工具。肯对中共俯首听命的无行文人飞黄腾达,不愿放弃自己人格尊严的作家诗人即使免遭迫害,也被剥夺了写作或发表的机会,只能在社会边缘郁郁而终。

共产党的文艺思想,由马恩开其端,列宁承其绪,毛泽东总其成。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公开宣称:共产党“就是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这段杀气腾腾的讲话,拉开了中共利用其文人建立党文化、操控中国人精神世界的序幕。从此,“政治标准第一,文学标准第二”,“文学为阶级斗争服务”,“全党办文艺,全民办文艺”,“主题先行”等等,成为中共御用作家创作的指导原则。

1) 用文学作品图解中共的理论和政策

纵观中国现当代史,不难发现,几乎每一次中共发动的政治运动,都从批判某一部文艺作品或某一个文艺思潮开始。

四十年代的整风运动从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开刀,五十年代一系列思想改造运动,从批判电影《武训传》、“红楼梦研究”和所谓“胡风集团”开始,文化大革命用吴晗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祭旗,而批判电视片《河殂》则是“六四”镇压后的思想整肃的重要步骤。

另一方面,中共麾下的文人随着中共的指挥棒翩翩起舞,用文艺作品图解和吹捧中共的理论和政策,满足不同时期中共的政治需要。

为了适应中共“土地改革”(剥夺地主土地)和后来的“合作化运动”(剥夺所有农民土地)的需要,文人们创作了《暴风骤雨》、《三里湾》、《创业史》,替中共掩盖其在政治运动中残酷的杀人整人、明火执仗的抄家和抢劫行为;为了丑化国民党,把中共发起的内战装扮成“解放战争”,文人们创作了《林海雪原》、《保卫延安》、《红岩》;中共需要美化“抗美援朝”,文人就写《谁是最可爱的人》;中共需要图解对资本家的“和平”改造,文人就创作《上海的早晨》;中共需要渲染中国人民“选择”了共产党,文人就创作《红旗谱》;中共需要引导“小资产阶级的知识份子”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文人就创作《青春之歌》;中共要讴歌“大跃进”,全国就跃进出数以百万计的伪民歌。

有人看了中共抹黑法轮功的电视剧后,说:“看了这个电视剧,我才知道为什么要禁法轮功。”言外之意,不看这部电视剧,他还不知道为什么要禁法轮功。中共的文艺捏造竟成了其“政策正当性”的依据,可见舆论灌输在这场最新的镇压运动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其实,历史上中共煽动消灭“剥削阶级”,用的是同样的手法。虽然人们在生活中见到的地主(其实就是普通的土地拥有者)大多是勤勉诚实、热心公益的厚道人,但经过中共灌输,一提起地主,人们想到的一定是周扒皮、刘文彩、黄世仁、南霸天——这些用艺术手段捏造的地主形象。中共当年在其占领区用歌舞和戏剧教育士兵,很多战士都是在看完《白毛女》等剧作以后,“激起了阶级敌忾,燃起了复仇火焰”(周扬语),被中共“教育”成了“有觉悟的无产阶级战士”。

2) 灌输中共的世界观、历史观、人生观

(1) 批判对神的信仰,灌输无神论

无神论是中共思想的基础,而各大正统文化都相信神的存在,很多深刻、杰出的文学作品都是描写神、讴歌神、追寻神的,像希腊罗马神话、但丁《神曲》、弥尔顿《失乐园》、班扬的《天路历程》、中国的《西游记》等等。因此,中共一方面操控

发言权,只让人民有发言权。”谁是人民,谁是反动派?只有毛一个人说了算。

“舆论一律”,“新闻报导的党性原则”,“政治家办报”,“文化工作服务于政治任务”……在这些口号的指导下,所有报纸刊物都乖乖地成了中共的喉舌。“党”要反右,报纸就会说“右派要翻天,我们贫下中农不答应”;“党”要“跃进”,报纸就会说“亩产三十万斤”;党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报纸就会说,这是“保证社会主义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党”要迫害法轮功,报纸就会说“崇尚科学,反对迷信”。尽管现在的人们都说,中共机关报《人民日报》上只有日期是真实的,可是媒体的力量是巨大的,况且除了“党的喉舌”以外,根本就没有任何独立新闻来源,于是人们不得不或多或少把中共操控的大小小的媒体当作可靠的信息来源,区别只是被骗程度大小而已。

八十年代以来,参照台湾开放党禁、报禁,最终建立民主制度的经验,一批有良知的新闻从业人员为争取新闻自由付出了艰苦的努力。如今,中共在经济领域实行“权贵资本主义”,教育、医疗等部门都已经高度市场化,可是,新闻出版仍然被当局牢牢抓在手里。一些试图摆脱“喉舌”地位的媒体,都难逃被整肃的命运。远的有“六四”以前的《世界经济导报》,近的有《冰点》周刊。为了避免激起民愤,中共现在学乖了,对于影响大的报刊,他们不是像以前一样勒令停刊,而是把主编、编辑等人换上“政治上可靠”的人。报刊还叫以前的名字,可是灵魂已死,而大众还被蒙在鼓里。

人的眼耳口鼻、神经末梢的正常工作,使人能够对外部环境做出恰当的反馈。假如有人感觉器官出了问题,明明火焰在灼烧皮肤,不但没有痛感反而觉得愉快,那么这个人的处境就相当危险。60年代初发生大饥荒时,到处都在饿死人,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惨剧,报纸还在竞相夸口又创高产,循循诱导人们吃得太多对身体不好。2006年春北京一场强沙尘暴过后,电视台竟然津津乐道于“洗车业创收猛增”,暗示沙尘暴可以刺激经济增长。中共的喉舌们为了从天灾人祸和民怨沸腾中挖掘“正确的舆论导向”,已经到了口不择言的地步。

(2) 广播、电视、互联网

除了紧紧抓住报刊以外,中共对新兴媒体同样高度重视。广播电台、电视台、互联网这些新兴媒体全都在中共的掌握之中。据《中国新闻出版报》2003年5月公布的数字,2002年中国拥有广播电台306家,电视台360家,广播电视台1300家。广播人口覆盖率93.21%,电视人口覆盖率达94.54%。据调查,十五岁到六十四岁的城市居民中近90%每天收看电视。电视和广播在灌输党文化方面起的作用应该说已经超过了——虽然还不能完全取代——报纸杂志。

今天四十岁以上的人应该不会忘记文革时期遍布城乡的高音喇叭播放的高亢、激越的“最高指示”和长篇政论。文革以后,播音员的调门降低了,“政治觉悟”却丝毫不能降,只不过改用更精良的技术和比较贴近人性的方式灌输党文化。

电视作为一种传播方式,形象、直观、承载的信息量大、具有强烈的现场感,对观众的影响极为深刻。1979年以后,中国电视业开始快速发展。中共紧紧抓住这一媒体,灌输党文化的技术随着电视技术的进步而一路水涨船高。

大部分广播电视节目都以不同方式承载着



党文化的内容。以电视为例,1978年1月1日开播的《新闻联播》是中共造假宣传的最重要阵地。半小时长的节目几十年如一日的遵循如下模式:前二十五分钟的节目无例外地是隆重召开、亲切会见、深刻领会、贯彻实施、光辉历程、伟大成就;有人说只有后五分钟的国际新闻可看,其实这五分钟也是经过中共剪裁、歪曲,有意误导观众的。

专题节目(如《焦点访谈》)、谈话节目(如《实话实说》)、电视剧(如《生死抉择》)、综艺节目(如“春节联欢晚会”)等等,无不经过精心设计,既要讨好大众,又要让党满意——讨好大众是手段,让党满意是目的。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曾经以“敢言”声誉鹊起,可是一位观众一语道破:“什么‘焦点访谈’,创建初期播出的事件算是高射炮打蚊子,现在播出的完全是显微镜找细菌。从不披露大案要案,重大案件也是大事化小、轻描淡写。”中央电视台的工作人员自我解嘲说,“我是党的一条狗,坐在党的大门口。党叫咬谁就咬谁,让咬几口咬几口。”电视剧更是主旋律的天下,反腐片、改革片、伦理片、古装片,说穿了表达的都是热爱党、理解党、相信党、原谅党。所有的“反腐电视剧”都遵循一个模式,那就是腐败的都是副职、下级,虽然给“党”的事业造成了一定的损失、影响了“党群关系”、“干群关系”,但关键时刻,“党”的化身——正职、贪官的上级等等,就像西方戏剧美学里批判的“机械降神”一样,毅然挺身而出,惩办了贪官,化解了矛盾,给“党”挽回了面子。现实生活中人们都知道,腐败的绝不仅仅是副职和底层官员,如果说基层官员对国库是“蚕食”的话,那么党国大员、太子党对国库才是“鲸吞”。即便如此,荧屏上活灵活现的清官形象还是让观众深深沉醉在对“党的好干部”的期待之中。

1983年开始的“春节联欢晚会”是中共用文艺形式灌输党文化的集大成之作。从歌舞、相声、小品到主持人的串场词、朗诵贺电、驻外使领馆组织留学生拜年,全都在刻意混淆“党”和国家、“党”和民族的概念,利用人们的亲情、民族感情、爱国之情巩固中共对他们的心灵控制。东北口音的或者西北口音的小品除了直接抹黑“党的敌人”以外,还塑造自欺欺人、苦中作乐的小人物形象,把观众的注意力从造成他们人生苦难的社会政治原因引开;或者用低级的噱头把所有人都描写成无差别的低俗人格,仿佛从来如此、举世皆然,从而掩盖中共统治下道德大滑坡的社会现实。2004年中国大陆共发生七万四千起群体抗争事件、四川汉源农民抗争发生大规模流血、爱滋病村惨状触目惊心、黄河源头断流、淮河严重污染致使河水失去水功能、矿难频发、天灾不断……就在这种情况下,2005年的“春晚”被命名为“盛世大联欢”,真应了一句流行的话:“把欺骗进行到底!”

由于互联网上站点众多,不利于中共“主动出击”式地灌输党文化,所以中共当局对互联网的主要策略是“封堵”,不让中共禁止的言论流传开来。中共监控网络的主要方式包括:封锁海外网站、关闭国内网站、抓捕网络作家、过滤电子邮件、布置网警、网特等。这方面最有名的举措是于1998年立项、计划于2006年全部完成、前期投资八亿美元的所谓“金盾工程”。这项工程名义上是公安自动化系统,实为一个包括网络各个环节的全方位网络封锁和监视系统,是一个涉及到技术、行政、公安、国安、宣传等多个部门的系统工程。

网络世界的信息爆炸给了很多中国人“言论自由”的错觉。事实上,人们看到的,都是中共让他们看到的;中共不想让他们看到的,他们一概看不到。谎言可以自由流通,真相却被极力掩盖,这就是中国网络的真实状况。

3) 常用的灌输手法

之一。

为便于意识形态掌控,中共于五十年代进行高等院校的“院系调整”,把很多学校的哲学系合并一处。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等被称为资产阶级学科,被彻底取消,直到八十年代才逐渐恢复。从中央到地方的党校、社科院、大专院校机构臃肿,人员众多,打着“科学研究”的幌子,千方百计地替中共论证合法性。

经过组织收编、思想改造、暴力震慑、利益引诱、逆向淘汰(“反右”流放百万敢言知识份子)等步骤,中共把所有知识份子攥在手掌心,少数正直而清醒的最多做到敢怒不敢言,胆小懦弱的只好随风倒,奸佞谄媚的便主动投怀送抱,充当邪党的爪牙和羽翼。

中共在哲学界、史学界、文学界、科学界、宗教界内都栽培了一些主要的代理人 and 吹鼓手。这些人平时装模作样,炮制出一篇篇文章、一本本“著作”,论证“马克思主义是真正的科学”、“社会发展五阶段是普遍真理”、“自然科学具有阶级性”、“宗教是真理,社会主义也是真理”,充实党文化的基本武库。运动来了,这些人就如鱼得水,用紧跟形势向“党”表忠心,用胡编乱造歌功恶党、用断章取义、深文罗织、无限上纲打击中共的“敌人”,靠出卖人格从党主子那里讨一点残羹剩饭。文化大革命中的梁效(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两校学者组成的写作班子)、八九民运后的何新、镇压法轮功中的何祚庥、于光远、潘家铮等人,皆属此类。

邪党文人的代表,前有郭沫若,后有何祚庥。

被中共称为“文化旗手”的风派文人郭沫若比变色龙还善于变化。中共让他检讨他就检讨,让他批武训、批胡适、批胡风,他就批得比谁都起劲,让他给哪个历史人物翻案就给哪个历史人物翻案。然而,原则立场不断变化的中共让郭沫若都觉得无所适从。文革初,郭沫若嗅出风向的变化,马上检讨说:“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没有学好毛泽东思想,没有用毛泽东思想来武装自己。”

“政治院士”何祚庥,文革中为了谄媚毛泽东和共产党,提出“毛子”和“无子”的概念,2001年又提出“量子力学的规律符合江泽民的三个代表精神”。就这样一个科学痞子,成为中共打击法轮功的主要“理论来源”。

正信、真理、和人类正统的道德体系都有稳定不变的特点。可以随世俗权力起舞的道德根本就不配称为道德,不断“与时俱进”的真理从来不曾有资格被称为真理,对一个不断变化的东西的信念根本就不是信念。邪党文人的朝三暮四、出尔反尔必然会破坏掉人们残存的对人性和美德的最后一点信心,鼓励人们抛弃一切道德准则,以中共的好恶为好恶,把维护中共政权的存在当作第一需要。

本书一二章已经对学术界、宗教界、科学界的党文人做了相当的揭露,我们在本节将重点剖析文学领域的邪党文人是怎么歌功恶党、改变中国人的善恶标准的。

广义的文学包括各种文献和著述,也包括狭义的文学作品。由于语言在人类文化系统里具有非同寻常的重要性,各大正统文化对语言和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历来非常重视。

中国文化是一种半神文化。古人相信,文章来源于至高无上的天道,因此说“文以载道”;文学可以提高道德、涵养性情,因此说“修辞立其诚”、“诗者持也,持人情志”。历代的文人墨客,把文学创作当作“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以庄重诚敬的心态,创作了大量的优秀文学作品,这些作品其实正是他们清静高尚的内心世界的反映。

中共作为一个控制人思想的邪教,对意识形态的重视,超越于往古来今一切政

时至今日,在中国很多地方,还能看到刷在墙上的毛时代的标语口号。这些标语口号固然无法解释现实,但是从林昭、遇罗克到张志新,跟共产党较真的人从来没有什么好下场,人们对此记忆犹新,思之仍然不寒而栗。于是,被运动惯了的人们不再较真,“认认真真走过场”,见风使舵、麻木苟全。

第四,伴随着每一次政治运动,是共产党的禁书、烧书、毁书,人民的精神生活极度匮乏,只好阅读被中共允许的少量著作。文化革命爆发以后,中国的印刷厂都在忙着印刷毛语录和毛选,正常的出版印刷几乎全部停工。文革开始的那几年中,中国的出版业几乎是一片空白。大量图书被当作“封资修”垃圾、四旧烧毁,图书馆关门,书店也只卖领袖著作。那时的很多家庭,除了“红宝书”以外,几乎没有任何书籍。很多良心犯、知青、下放右派,都有把《毛选》翻来复去读十几遍、甚至几十遍的经历。

第五,中共在教育领域里实行政治挂帅,大中小学课本里充斥着马恩列斯毛的文章和为马恩列斯毛歌功颂德的文章。只要上学,就逃不过中共的洗脑和灌输。很多篇目被要求背诵。青少年记忆力强但缺乏分析能力,从小就被灌输了一大套共产党的荒谬理论,其中很多观念和思维习惯会左右人一生。

经过近半个多世纪的刻意经营,中共用马恩列斯毛邓江本人的和为数众多的文人的书,在中国布下了一张铺天盖地的罗网。组成这张罗网的是一个概念、判断和推理,这些概念、判断和推理试图用自己的方式解释天、地、人,人类社会和人的思想,彻底隔绝人和真实世界的接触,彻底代替根植于自然和人性的对事物的认识和判断,最终制造出对中共邪党惟命是听的无根人。今天,这张大网虽然已经朽烂不堪,但由于人们思维具有一定的惯性,暂时它还在束缚禁锢着一些人的思想。随着《九评》的传播和党文化的破除,人们终于会迎来彻底冲决网罗的一天。

3、利用邪党的文人歌功恶党

《九评之一》指出:“所有的非共党政权社会,无论其如何专制和极权,社会都有一部分自发组织和自主成分。……共产党政权中,所有这些自发组织和自主成分被彻底铲除,取而代之的是彻底的自上而下的集权结构。”共产党极端严厉的社会管制造成的后果之一是独立的知识份子阶层的消失。中共除了把一部分知识份子在肉体上消灭以外,把其他人编进各种各样的“单位”之中。单位实际上是中共在城市对人民进行全方位管制的基本组织形式。知识份子丧失了不受政权控制的谋生方式和自由言论空间,无奈地沦为中共的附庸,在强大压力下和走投无路中,他们中的大部分不得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从各个角度、以各种方式歌颂邪党,来保全性命并且养家糊口。中国社会素有“尊师重道”的传统,中共政权利用民众对文化人的信任和敬重,通过文人的著作和言论间接向民众灌输党文化,改变中国人的善恶标准。建立并维持一个“伪知识份子”阶层,一方面使中共摆脱了“清议”和舆论的制约,另一方面使它能够随时随地伪造出貌似公允的“科研成果”和“社会舆论”,为其邪恶统治辩护。

中共收编文人的主要方式包括:直接吸收他们入党并加入政权(政府、人大、政协),比如郭沫若曾任中共国务院副总理,历史学家吴晗曾任北京市政协副主席、北京市副市长;把他们安置在民主党派内;把他们安置在科学院(社科院)、大学或文史馆等机构,或者安置在作家协会、戏剧家协会、文联等部门。在文革中和妻子双双自杀的翻译家傅雷是中共建政以后极少数不属于任何“单位”的自由职业者

(1) 铺天盖地,让人和真实世界彻底绝缘

美国影片《真人活剧》(一译《楚门的世界》)的主人翁楚门生活在一个精心构建的虚假世界,这个世界是一部肥皂剧的场景,而肥皂剧的剧情就是楚门二十四小时的生活。这个虚假的剧中世界包括一切真实世界的元素,而楚门从出生起就生活在这里,因此直到长大成人,他都没能对这个世界的真实性提出质疑。

在政治学术语里,中共这种对社会进行全方位控制的政权被称为“全权式政权”。这种全权式政权能够维持存在的一个先决条件就是必须有一个利于该政权的虚假信息环境。中共深谙此道,多年来创造并维持了一个无所不包的虚假的信息环境。在这个环境里,人们和真实的世界彻底绝缘,失去了据以判断真伪、善恶的参照系统。可以说,中共统治下的中国人都生活在“楚门式”的虚假世界里。

中共也可以在短时间迅速制造一个虚假的信息环境,以达到它的政治目的。99年7月20日以后,中共开动宣传机器栽赃抹黑法轮功,在短短半年时间内,中共报刊在海内外对法轮功的诬陷报导和批判文章,竟然多达三十余万篇。其他宣传工具同样开足马力,广播、电视、舞台、课堂、各种会议、集会、墙报、标语,除非你闭目塞听,否则绝没有可能逃脱中共的洗脑宣传。

(2) 不断重复,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成了真理

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有句名言,“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成了真理。”中共是这句话的忠实信徒。“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老三篇,天天读。”文革时期“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梁效”,现在则有“统一口径”、“转发新华社通稿”。中共谎言经过千百遍的重复,成为人们根深蒂固的观念,而他们还以为这些观念是自己思考得来的。

宣传和重复往往招致反感和讽刺。可是,中共并不害怕人们的反感和讽刺。持续使用这种看似初级的灌输手段,让人产生“中共骗术,不过如此,何必小题大做,与它一般见识”的心理。那些敢于嘲讽中共的人,一定自视老练通达,不轻信,有主见。可是,通过重复,中共的词汇、概念、标语口号和思维方式,被强力压进人的潜意识里,替代了人自发的情感和判断。只要你还在用这种词汇、概念思考,得出的结论只能是“党”允许你得出的结论。只要你把民运人士称为“民运分子”,你对他们就决不会有好感;只要你还在用着“解放”、“新中国”这类词,你对中共总有点儿感恩戴德;只要你还把中共亲昵地简称为“党”,你就承认了这个恶党盘踞中国自然而然、合理合法;只要你还把文革叫作“浩劫”,你就是在接受中共暗示,相信造成文革灾难的是某种超自然的神秘力量而忽略了文革和中共暴政的必然联系;只要你还在把失业工人称为“下岗工人”,你就是自愿配合中共的宣传策略,暗示社会主义制度下只存在下岗,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工人才会失业,失业总是和破产、流浪、饥饿、自杀联系在一起,下岗却总有重新上岗的一天。

听听中国人说的话,看看遍布中文网络论坛的愤青们的原教旨党语言,就会知道中共的重复灌输多么有效。

(3) 伪造民意、诉诸权威,发动心理攻势

中共剥夺了人民的真实声音以后,进而宣称自己是最大多数的民意的代表,从而占据宣传制高点,利用人们的从众心理,强迫人民接受它灌输的歪理和谎言。1957年反右运动中,充斥报纸杂志的都是这种标题:“工人阶级说话了”,“全国各民主党派都和共产党站在一起,共伐右派”,“全军指战员愤怒声讨”,“少数右派陷入人民群众的重围”,“右派是一小撮败类,绝大多数知识份子与党同心同德”……霎

时间“右派份子”感到被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所包围，“只能老老实实，不能乱说乱动”。每次中共发动政治运动，都会发动党、政、军、工会、团委、妇联、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宗教界、教育界、科技界、文艺界、法律界、“各族同胞和海外侨胞”、“港澳台同胞”、乃至普通工人、农民（其实是中共在这些团体内部的代理人）“揭批”、“声讨”、“控诉”，伪造出全民表态支持的假象。那些有独立见解的人被置于“少数派”的心理劣势之中，即便有不同意见，也不敢讲出来，甚至都不敢相信自己了。中共在迫害法轮功运动中发起的所谓“百万人签名”，与以往的“伪造大多数”、“伪造民意”的手法如出一辙。

除了“伪造民意”以外，中共的心理战还包括“诉诸权威”的手法。老百姓或多或少都有“崇拜权威”的心理，“专家”、“教授”、“学者”的话要比市井小民的话有份量得多，也显得比中共官员的话中立、客观。可是中共统治下并不存在中立、客观的专家，即使有，也走不上中共的媒体。御用“理论家”、“科学家”衣冠楚楚地走上屏幕，把“党”要宣传的内容用学术语言包装得冠冕堂皇。人民大众看不懂“党”和“专家”演的这场双簧，成为党文化宣传的牺牲品。

（4）公开撒谎，蒙骗世界

公开撒谎这一招也可以算是中共经典，从毛泽东到江泽民，从唐家璇到李肇星，从张文康到秦刚，中共对这招宝爱有加，屡屡使用。

毛泽东宣称：“秦始皇算什么？他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千个儒。有人骂我们是独裁统治、是秦始皇，我们一概承认，合乎实际。可惜的是，你们说得还不够，还得要我们加以补充。”这种“我是流氓我怕谁”的“气概”，还真的把很多人镇住了。善良的人们往往认为，一个说话理直气壮的人，其行动一定是光明磊落的。所以，毛的“雄文四卷”里，尽管多的是这种“流氓耍赖、泼妇骂街”的段落，可是人们得出的结论却是：这表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磊落襟怀”和“大无畏的英勇气概”。



江泽民以一国元首的身份，当着国际媒体的面污蔑法轮功。没有见识过中共厚黑术的西方记者，怎么能想到一国领袖会在光天化日之下信口雌黄呢？

2006年3月9日，沈阳苏家屯集中营活体盗取法轮功学员器官兽行被曝光。3月28日，中共部署已毕，派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在新闻发布会上对指控矢口否认，甚至“邀请”媒体前去调查。这个“障眼法”虽不甚高明，还是颇迷惑了一些人。“赴中国大陆全面调查法轮功受迫害真相委员会”调查员迅速反应，分别到澳大利亚、德国和美国的中国领馆申请去中国调查的签证，三次申请，三次被拒绝。悉尼总领馆的工作人员显然也不相信秦刚的谎话，对调查员说：“那你就找秦刚要邀请函去！”可见，中共祖传的骗术连自己人也不太相信了。

对在“新闻战线”工作的中共党员来说，撒谎就是他们的职业，撒谎时脸不变色心不跳是他们的基本职业素养。他们每天披着“职业人士”的外衣所做的，和毛泽东、江泽民、秦刚其实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

（5）贼喊捉贼，一边撒谎，一边反对撒谎

改、或者被扭曲、或者干脆被禁绝。马列主义的谬种流传，毒害了一代代的中国人。

那么，中共是怎么强制人民读马恩列斯毛的书的呢？

第一，利用组织手段，通过“组织生活”、“政治学习”，强迫党团员学习马恩列斯毛邓江的著作和中共文件。曾参加过中共组织的人都知道，中共定期的“组织生活”、“政治学习”雷打不动，参加这些会议的人被要求阅读马列著作和中共文件，经常被要求写出学习体会、思想汇报上交。

第二，定期的整党整风，强迫党员定期学习马恩列斯毛邓江的书和中共文件，否则就面临着整肃或处分。40年代的整风，50年代的反右，60、70年代的文革，80年代初的整党整风，80年代中期的“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刚刚告一段落的“保先”运动，每隔几年或十几年，中共对人的控制力变弱的时候，中共就会来上一回“党性”教育，重新确认“党组织”对党员的思想控制。

2004年底《九评共产党》一书发表以后，中共意识到前所未有的统治危机。2005年1月，中共中央发起“保先运动”，计划从2005年1月开始，用一年半左右的时间，在全党开展“以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党员被要求学习文件，重温誓词，重新登记注册，写出长篇的思想汇报和学习心得。

虽然2006年6月29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总结会吹嘘，保先运动“主题鲜明，领导有力，措施得当，工作扎实，……取得了显著的实践成果、制度成果、理论成果”，可是，干部、党员对保先极其反感，这完全是公开的秘密。人们私下里发牢骚、说怪话、怨声载道，另一方面无可奈何地做官样文章。

重复意识形态高调，虽然讨人嫌，但仍然可以产生潜移默化的作用。1964年，在一次关于教育的谈话中，毛泽东说，“考试可以交头接耳，甚至冒名顶替。冒名顶替的也不过是照人家的抄一遍，我不会，你写了，我抄一遍，也可以有些心得。”中共看准了，“抄一遍”、重复一遍，党员和群众就会加深一些对谎言的印象。这些谎言储存在人们的记忆里，在另外一些时候，他们很可能就会不自觉地重复这些谎言和高调，间接地毒害别人。另一方面，对于那些人性和良知未泯的党员，也可以达到侮辱其人格操守的目的。撒一个谎也是撒谎，妥协一次也是妥协，时间长了，这些人只好放弃对自己人格的坚守，开始随波逐流。中共这么做，同时也是在刻意培养人们的政治厌倦。在对自己有利的时候，中共煽动人们的政治热情，鼓吹“要关心国家大事”，批判政治落后分子，批判“逍遥派”。现在，中共又在暗示人们不要参与政治，否则就要被贴上“搞政治”的标签。每一次政治运动从上到下制度性地做假、走过场，使中国人产生了一种“政治就是那么黑暗”、“谁去趟那个浑水”等心理，于是全民向钱看，人们变得自私、冷漠、世故，怀疑一切，不相信世界上竟然有好人，哪个团体被中共打压，那也是不懂明哲保身，咎由自取。就在这种被刻意制造的政治厌倦中，中共再一次坐稳了江山，继续疯狂掠夺国民的财产，并阴毒地迫害那些还有良知和善念的人们。

第三，马恩列宁的著作数目庞大，不可能让那些文化水平不高的党员通读这些著作。于是从读马列到读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毛主政二十七年，毛著发行了约五、六十亿册），从读《毛选》到读《毛语录》、《老三篇》，原本驳杂的主义越来越变成简单粗暴、荒谬可笑的标语口号。“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一句话，造反有理。”在文革中，出现了这样可笑的一幕幕：半夜三更，人们被高音喇叭惊醒，原来是传达“最高指示”；买东西的时候，人们会说：“‘要斗私批修！’这肉多少钱一斤？”售货员则答曰：“‘为人民服务！’一毛八！”

百分之六十的可能性会被过滤掉;如果要谈“法轮功”,有百分之七十五的可能性会被过滤掉;而登了《九评共产党》的网站被过滤掉的比例是百分之九十多。自私冷漠、萎靡放荡、脑子里塞满了信息垃圾因而无法对社会大局做出理性判断的人,是最有利于中共当前的统治的,因此它就要刻意制造出这样的个人。

谎言和宣传的出口和出口转内销。毛泽东曾说,出《参考消息》就是种牛痘,“增强干部和群众在政治上的免疫力”。今天的中共已经不满足于从浩如烟海的国外报刊上找对它有利的片言只语了。它一方面出口谎言,毒害其他国家的民众,另一方面直接收买境外媒体(中文的和外文的)和作者,替自己粉饰涂抹。中共恶首江泽民因迫害法轮功在二十几个国家被告上法庭,为了从四面楚歌中挽回颓势,收买完全不懂中文、但在中国有生意的花旗银行执行董事库恩,与其他枪手合作,出版“我们观点的《江传》”。在法轮功问题上,一些国家的媒体和通讯社抵制不住诱惑,换一种口吻重复新华社的谎言,中共再拿这些谎言去蒙骗中国民众。

有打有拉,区别对待。89年以后,中共开始有意拉拢收买知识份子、公务员和军队。除了加薪、默许这些群体拥有某些特权和灰色收入以外,还给他们一定的知情权和言论权,以此获得他们的谅解和效忠。这点有限的言论自由被严格限制在小圈子里(如学者沙龙),绝不允许进入大众媒体。这些人获得了一种中共渐渐放松言论管制的虚假印象,因而乐于为中共辩护,中共也乐于让他们的辩护言论进入大众媒体,误导普通民众。

中共的宣传策略还包括:把谎撒到大得离谱的地步,人们从常识和经验出发,无法相信一个政权竟然会如此无耻荒唐,于是不得不姑且相信他们的说法;撒弥天大谎的时候在细节上不厌其详,因为细节最能打动人心,打消疑问;邀请不明真相的外国人登上荧幕,诱导他们说中共想要他们说出的话;为了更好地兜售其货色,在技术和形式上“和世界接轨”,现场直播、热线电话、深度报导、“民意”调查,……花样翻新,应有尽有。

中共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宣传机构。在这些机构供职的人,即便良知未泯、想要为国为民做一些好事,可是在中共的严密控制之下,他们完全身不由己。只要中共中央的“方针政策”定下来,这支大军就会各尽所能,批量生产各种谎言。中共开动庞大的谎言机器,向中国人民灌输了几十年无神论、唯物论、斗争哲学和形形色色的歪理邪说。这些歪理邪说“融化在血液里,落实在行动上”,当每一个个体都下意识地用它们来思考问题的时候,党文化的收获季节就已经到了。

2、强制人民读马恩列斯毛的书

在西方民主国家,虽然对很多普通人来说,共产主义是“邪恶”的同义语,但同其他书籍一样,马恩列斯毛的著作,仍然可以自由出版、流通和阅读。虽然马列的暴力革命学说受到人们的普遍鄙弃,但学者们仍然将其理论作为社会学或者政治学的一个流派进行研究。大学鼓励学生进行自由地思考和写作,教授从不规定学生必须信奉什么。在社会上,从保守到激进的各种不同的思想流派自由竞争,人们的选择多,有比较,心态开放,不会轻易地盲从什么。

马恩列斯毛被人宽容,不意味着他们也会宽容别人。共产党攫取了国家政权以后,把意识形态定于一尊,实行邪教的政教合一,利用暴力和组织手段强制人民读马恩列斯毛的书,灌输邪教教义。几十年来,在中共的思想体系里,马克思集西方文明的大成,毛泽东思想是“最高最活的马克思主义”,一切正统的传统思想,或者被篡

今天的中国人对党八股太熟悉了,反而不容易觉察其中的矛盾和悖谬之处。毛泽东说,“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可是,如果群众都不相信党了,我们应当相信谁呢?

刘少奇说,“新闻报导要客观、真实、公正。”说得很好,对吧?民主国家的媒体也追求这些目标。可是他接着说,“同时要考虑利害关系,看看对人民和无产阶级事业是否有利。”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利害关系和真实原则发生冲突的时候以哪个为重呢?再说,对“无产阶级事业”有利但对人民有害怎么办?

他接着给出了例证。“例如,斯大林犯了许多错误,在肃反斗争中杀错了一些人,是真实的。但是,如果报导了,就对当前的斗争很不利,这是立场问题。”

斯大林杀了多少人呢?据不完全统计,从1929年到1953年总共有1950万到两千二百万苏联公民成为斯大林镇压的牺牲品(不包括战争年代),相当于当时苏联人口的十分之一。

为了中共的一党利益,两千万条人命可以被漠视,这就是刘少奇的“客观、真实、公正”。当然,这和刘的一贯立场是吻合的。早在40年代,他就曾经说过:“所谓好坏之分,应从党的工作,党的利益出发,吹牛拍马不好,但对工作有利就是好的,就要做。”

今天中共的新闻机构,一边“反对假新闻”,一边“严把政治关”;一边重申“一切从实际出发”,一边抓捕敢说真话的记者;一边制度性撒谎,一边攻击资本主义国家新闻的“虚伪性”。要想了解真实的中共,不能只听其言,更要观其行。

4) 灌输手段“与时俱进”

文革以后,虽然中共发动宣传机器,把其党令人发指的滔天大罪说成个别领导人不可避免的“错误”,但毕竟“我党一贯正确”的流氓要不灵了。于是中共与时俱进,引进了许多更精致、更有欺骗性的宣传手法。

以真乱假。如果说49年以前,中共的宣传策略是“以假乱真”,把一种没有根基的邪说描绘成历史发展的规律,那么,49年以后,其策略可以被称为“弄假成真”——中共强行在城乡各阶层间挑起矛盾,于是其斗争哲学好像是“客观”地反映了社会现实。改革开放以后,它的策略又调整成了“以真乱假”,把事实掺杂在谎言里,虚虚实实,让人们根本无从判断究竟哪些是真话,哪些是假话。

小骂大帮忙。就像反腐败“打苍蝇不打老虎”一样,现在的中共喉舌也暴露一些阴暗面,制造媒体公正和言论自由的假相。但对于那些可能危及中共统治的黑幕却坚决封杀。一些媒体用报导小来小去的负面新闻积累一定的信度,在中共发动又一次政治运动的时候大打出手。央视的“焦点访谈”、“实话实说”节目或以敢于报导不触动中共根本利益的负面消息或以风格比较新颖取信于民,但在“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的大事上,比如对法轮功的迫害中,就被中共拉到前台,利用其积累的一点人气来造谣污蔑,充当了可耻的舆论打手。

以大量低级下流琐碎无聊的新闻充斥媒体,让真实的信息淹没在文字垃圾之中。一位西方记者在中国做过访问后说,十几年前人们不知道民运人士魏京生,是因为中共把他的名字从信息环境中抹掉了;现在的人们不知道魏京生,是因为娱乐明星的性感迷人。中共一贯“打非”不“扫黄”,浏览中共所谓“门户网站”,就会发现那里充满了下流的色情消息和鸡毛蒜皮的社会新闻。有学者做过统计,海外的网站,如果登了色情图片的话,只有百分之十的可能性被过滤掉;如果组一个反对党,有

百分之六十的可能性会被过滤掉;如果要谈“法轮功”,有百分之七十五的可能性会被过滤掉;而登了《九评共产党》的网站被过滤掉的比例是百分之九十多。自私冷漠、萎靡放荡、脑子里塞满了信息垃圾因而无法对社会大局做出理性判断的人,是最有利于中共当前的统治的,因此它就要刻意制造出这样的个人。

谎言和宣传的出口和出口转内销。毛泽东曾说,出《参考消息》就是种牛痘,“增强干部和群众在政治上的免疫力”。今天的中共已经不满足于从浩如烟海的国外报刊上找对它有利的片言只语了。它一方面出口谎言,毒害其他国家的民众,另一方面直接收买境外媒体(中文的和外文的)和作者,替自己粉饰涂抹。中共恶首江泽民因迫害法轮功在二十几个国家被告上法庭,为了从四面楚歌中挽回颓势,收买完全不懂中文、但在中国有生意的花旗银行执行董事库恩,与其他枪手合作,出版“我们观点的《江传》”。在法轮功问题上,一些国家的媒体和通讯社抵制不住诱惑,换一种口吻重复新华社的谎言,中共再拿这些谎言去蒙骗中国民众。

有打有拉,区别对待。89年以后,中共开始有意拉拢收买知识份子、公务员和军队。除了加薪、默许这些群体拥有某些特权和灰色收入以外,还给他们一定的知情权和言论权,以此获得他们的谅解和效忠。这点有限的言论自由被严格限制在小圈子里(如学者沙龙),绝不允许进入大众媒体。这些人获得了一种中共渐渐放松言论管制的虚假印象,因而乐于为中共辩护,中共也乐于让他们的辩护言论进入大众媒体,误导普通民众。

中共的宣传策略还包括:把谎撒到大得离谱的地步,人们从常识和经验出发,无法相信一个政权竟然会如此无耻荒唐,于是不得不姑且相信他们的说法;撒弥天大谎的时候在细节上不厌其详,因为细节最能打动人心,打消疑问;邀请不明真相的外国人登上荧幕,诱导他们说中共想要他们说出的话;为了更好地兜售其货色,在技术和形式上“和世界接轨”,现场直播、热线电话、深度报导、“民意”调查,……花样翻新,应有尽有。

中共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宣传机构。在这些机构供职的人,即便良知未泯、想要为国为民做一些好事,可是在中共的严密控制之下,他们完全身不由己。只要中共中央的“方针政策”定下来,这支大军就会各尽所能,批量生产各种谎言。中共开动庞大的谎言机器,向中国人民灌输了几十年无神论、唯物论、斗争哲学和形形色色的歪理邪说。这些歪理邪说“融化在血液里,落实在行动上”,当每一个个体都下意识地用它们来思考问题的时候,党文化的收获季节就已经到了。

2、强制人民读马恩列斯毛的书

在西方民主国家,虽然对很多普通人来说,共产主义是“邪恶”的同义语,但同其他书籍一样,马恩列斯毛的著作,仍然可以自由出版、流通和阅读。虽然马列的暴力革命学说受到人们的普遍鄙弃,但学者们仍然把其理论作为社会学或者政治学的一个流派进行研究。大学鼓励学生进行自由地思考和写作,教授从不规定学生必须信奉什么。在社会上,从保守到激进的各种不同的思想流派自由竞争,人们的选择多,有比较,心态开放,不会轻易地盲从什么。

马恩列斯毛被人宽容,不意味着他们也会宽容别人。共产党攫取了国家政权以后,把意识形态定于一尊,实行邪教的政教合一,利用暴力和组织手段强制人民读马恩列斯毛的书,灌输邪教教义。几十年来,在中共的思想体系里,马克思集西方文明的大成,毛泽东思想是“最高最活的马克思主义”,一切正统的传统思想,或者被篡

今天的中国人对党八股太熟悉了,反而不容易觉察其中的矛盾和悖谬之处。毛泽东说,“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可是,如果群众都不相信党了,我们应当相信谁呢?

刘少奇说,“新闻报导要客观、真实、公正。”说得很好,对吧?民主国家的媒体也追求这些目标。可是他接着说,“同时要考虑利害关系,看看对人民和无产阶级事业是否有利。”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利害关系和真实原则发生冲突的时候以哪个为重呢?再说,对“无产阶级事业”有利但对人民有害怎么办?

他接着给出了例证。“例如,斯大林犯了许多错误,在肃反斗争中杀错了一些人,是真实的。但是,如果报导了,就对当前的斗争很不利,这是立场问题。”

斯大林杀了多少人呢?据不完全统计,从1929年到1953年总共有1950万到两千二百万苏联公民成为斯大林镇压的牺牲品(不包括战争年代),相当于当时苏联人口的十分之一。

为了中共的一党利益,两千万条人命可以被漠视,这就是刘少奇的“客观、真实、公正”。当然,这和刘的一贯立场是吻合的。早在40年代,他就曾经说过:“所谓好坏之分,应从党的工作,党的利益出发,吹牛拍马不好,但对工作有利就是好的,就要做。”

今天中共的新闻机构,一边“反对假新闻”,一边“严把政治关”;一边重申“一切从实际出发”,一边抓捕敢说真话的记者;一边制度性撒谎,一边攻击资本主义国家新闻的“虚伪性”。要想了解真实的中共,不能只听其言,更要观其行。

4) 灌输手段“与时俱进”

文革以后,虽然中共发动宣传机器,把其党令人发指的滔天大罪说成个别领导人不可避免的“错误”,但毕竟“我党一贯正确”的流氓要不灵了。于是中共与时俱进,引进了许多更精致、更有欺骗性的宣传手法。

以真乱假。如果说49年以前,中共的宣传策略是“以假乱真”,把一种没有根基的邪说描绘成历史发展的规律,那么,49年以后,其策略可以被称为“弄假成真”——中共强行在城乡各阶层间挑起矛盾,于是其斗争哲学好像是“客观”地反映了社会现实。改革开放以后,它的策略又调整成了“以真乱假”,把事实掺杂在谎言里,虚虚实实,让人们根本无从判断究竟哪些是真话,哪些是假话。

小骂大帮忙。就像反腐败“打苍蝇不打老虎”一样,现在的中共喉舌也暴露一些阴暗面,制造媒体公正和言论自由的假相。但对于那些可能危及中共统治的黑幕却坚决封杀。一些媒体用报导小来小去的负面新闻积累一定的信度,在中共发动又一次政治运动的时候大打出手。央视的“焦点访谈”、“实话实说”节目或以敢于报导不触动中共根本利益的负面消息或以风格比较新颖取信于民,但在“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的大事上,比如对法轮功的迫害中,就被中共拉到前台,利用其积累的一点人气来造谣污蔑,充当了可耻的舆论打手。

以大量低级下流琐碎无聊的新闻充斥媒体,让真实的信息淹没在文字垃圾之中。一位西方记者在中国做过访问后说,十几年前人们不知道民运人士魏京生,是因为中共把他的名字从信息环境中抹掉了;现在的人们不知道魏京生,是因为娱乐明星的性感迷人。中共一贯“打非”不“扫黄”,浏览中共所谓“门户网站”,就会发现那里充满了下流的色情消息和鸡毛蒜皮的社会新闻。有学者做过统计,海外的网站,如果登了色情图片的话,只有百分之十的可能性被过滤掉;如果组一个反对党,有

时间“右派份子”感到被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所包围，“只能老老实实，不能乱说乱动”。每次中共发动政治运动，都会发动党、政、军、工会、团委、妇联、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宗教界、教育界、科技界、文艺界、法律界、“各族同胞和海外侨胞”、“港澳台同胞”、乃至普通工人、农民（其实是中共在这些团体内部的代理人）“揭批”、“声讨”、“控诉”，伪造出全民表态支持的假象。那些有独立见解的人被置于“少数派”的心理劣势之中，即便有不同意见，也不敢讲出来，甚至都不敢相信自己了。中共在迫害法轮功运动中发起的所谓“百万人签名”，与以往的“伪造大多数”、“伪造民意”的手法如出一辙。

除了“伪造民意”以外，中共的心理战还包括“诉诸权威”的手法。老百姓或多或少都有“崇拜权威”的心理，“专家”、“教授”、“学者”的话要比市井小民的话有份量得多，也显得比中共官员的话中立、客观。可是中共统治下并不存在中立、客观的专家，即使有，也走不上中共的媒体。御用“理论家”、“科学家”衣冠楚楚地走上屏幕，把“党”要宣传的内容用学术语言包装得冠冕堂皇。人民大众看不懂“党”和“专家”演的这场双簧，成为党文化宣传的牺牲品。

（4）公开撒谎，蒙骗世界

公开撒谎这一招也可以算是中共经典，从毛泽东到江泽民，从唐家璇到李肇星，从张文康到秦刚，中共对这招宝爱有加，屡屡使用。

毛泽东宣称：“秦始皇算什么？他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千个儒。有人骂我们是独裁统治、是秦始皇，我们一概承认，合乎实际。可惜的是，你们说得还不够，还得要我们加以补充。”这种“我是流氓我怕谁”的“气概”，还真的把很多人镇住了。善良的人们往往认为，一个说话理直气壮的人，其行动一定是光明磊落的。所以，毛的“雄文四卷”里，尽管多的是这种“流氓耍赖、泼妇骂街”的段落，可是人们得出的结论却是：这表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磊落襟怀”和“大无畏的英勇气概”。



江泽民以一国元首的身份，当着国际媒体的面污蔑法轮功。没有见识过中共厚黑术的西方记者，怎么能想到一国领袖会在光天化日之下信口雌黄呢？

2006年3月9日，沈阳苏家屯集中营活体盗取法轮功学员器官兽行被曝光。3月28日，中共部署已毕，派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在新闻发布会上对指控矢口否认，甚至“邀请”媒体前去调查。这个“障眼法”虽不甚高明，还是颇迷惑了一些人。“赴中国大陆全面调查法轮功受迫害真相委员会”调查员迅速反应，分别到澳大利亚、德国和美国的中共领馆申请去中国调查的签证，三次申请，三次被拒绝。悉尼总领馆的工作人员显然也不相信秦刚的谎话，对调查员说：“那你就找秦刚要邀请函去！”可见，中共祖传的骗术连自己人也不太相信了。

对在“新闻战线”工作的中共党员来说，撒谎就是他们的职业，撒谎时脸不变色心不跳是他们的基本职业素养。他们每天披着“职业人士”的外衣所做的，和毛泽东、江泽民、秦刚其实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

（5）贼喊捉贼，一边撒谎，一边反对撒谎

改、或者被扭曲、或者干脆被禁绝。马列主义的谬种流传，毒害了一代代的中国人。

那么，中共是怎么强制人民读马恩列斯毛的书的呢？

第一，利用组织手段，通过“组织生活”、“政治学习”，强迫党团员学习马恩列斯毛邓江的著作和中共文件。曾参加过中共组织的人都知道，中共定期的“组织生活”、“政治学习”雷打不动，参加这些会议的人被要求阅读马列著作和中共文件，经常被要求写出学习体会、思想汇报上交。

第二，定期的整党整风，强迫党员定期学习马恩列斯毛邓江的书和中共文件，否则就面临着整肃或处分。40年代的整风，50年代的反右，60、70年代的文革，80年代初的整党整风，80年代中期的“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刚刚告一段落的“保先”运动，每隔几年或十几年，中共对人的控制力变弱的时候，中共就会来上一回“党性”教育，重新确认“党组织”对党员的思想控制。

2004年底《九评共产党》一书发表以后，中共意识到前所未有的统治危机。2005年1月，中共中央发起“保先运动”，计划从2005年1月开始，用一年半左右的时间，在全党开展“以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党员被要求学习文件，重温誓词，重新登记注册，写出长篇的思想汇报和学习心得。

虽然2006年6月29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总结会吹嘘，保先运动“主题鲜明，领导有力，措施得当，工作扎实，……取得了显著的实践成果、制度成果、理论成果”，可是，干部、党员对保先极其反感，这完全是公开的秘密。人们私下里发牢骚、说怪话、怨声载道，另一方面无可奈何地做官样文章。

重复意识形态高调，虽然讨人嫌，但仍然可以产生潜移默化的作用。1964年，在一次关于教育的谈话中，毛泽东说，“考试可以交头接耳，甚至冒名顶替。冒名顶替的也不过是照人家的抄一遍，我不会，你写了，我抄一遍，也可以有些心得。”中共看准了，“抄一遍”、重复一遍，党员和群众就会加深一些对谎言的印象。这些谎言储存在人们的记忆里，在另外一些时候，他们很可能就会不自觉地重复这些谎言和高调，间接地毒害别人。另一方面，对于那些人性和良知未泯的党员，也可以达到侮辱其人格操守的目的。撒一个谎也是撒谎，妥协一次也是妥协，时间长了，这些人只好放弃对自己人格的坚守，开始随波逐流。中共这么做，同时也是在刻意培养人们的政治厌倦。在对自己有利的时候，中共煽动人们的政治热情，鼓吹“要关心国家大事”，批判政治落后分子，批判“逍遥派”。现在，中共又在暗示人们不要参与政治，否则就要被贴上“搞政治”的标签。每一次政治运动从上到下制度性地做假、走过场，使中国人产生了一种“政治就是那么黑暗”、“谁去趟那个浑水”等心理，于是全民向钱看，人们变得自私、冷漠、世故，怀疑一切，不相信世界上竟然有好人，哪个团体被中共打压，那也是不懂明哲保身，咎由自取。就在这种被刻意制造的政治厌倦中，中共再一次坐稳了江山，继续疯狂掠夺国民的财产，并阴毒地迫害那些还有良知和善念的人们。

第三，马恩列宁的著作数目庞大，不可能让那些文化水平不高的党员通读这些著作。于是从读马列到读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毛主政二十七年，毛著发行了约五、六十亿册），从读《毛选》到读《毛语录》、《老三篇》，原本驳杂的主义越来越变成简单粗暴、荒谬可笑的标语口号。“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一句话，造反有理。”在文革中，出现了这样可笑的一幕幕：半夜三更，人们被高音喇叭惊醒，原来是传达“最高指示”；买东西的时候，人们会说：“‘要斗私批修！’这肉多少钱一斤？”售货员则答曰：“‘为人民服务！’一毛八！”

时至今日,在中国很多地方,还能看到刷在墙上的毛时代的标语口号。这些标语口号固然无法解释现实,但是从林昭、遇罗克到张志新,跟共产党较真的人从来没有什么好下场,人们对此记忆犹新,思之仍然不寒而栗。于是,被运动惯了的人们不再较真,“认认真真走过场”,见风使舵、麻木苟全。

第四,伴随着每一次政治运动,是共产党的禁书、烧书、毁书,人民的精神生活极度匮乏,只好阅读被中共允许的少量著作。文化革命爆发以后,中国的印刷厂都在忙着印刷毛语录和毛选,正常的出版印刷几乎全部停工。文革开始的那几年中,中国的出版业几乎是一片空白。大量图书被当作“封资修”垃圾、四旧烧毁,图书馆关门,书店也只卖领袖著作。那时的很多家庭,除了“红宝书”以外,几乎没有任何书籍。很多良心犯、知青、下放右派,都有把《毛选》翻来复去读十几遍、甚至几十遍的经历。

第五,中共在教育领域里实行政治挂帅,大中小学课本里充斥着马恩列斯毛的文章和为马恩列斯毛歌功颂德的文章。只要上学,就逃不过中共的洗脑和灌输。很多篇目被要求背诵。青少年记忆力强但缺乏分析能力,从小就被灌输了一大套共产党的荒谬理论,其中很多观念和思维习惯会左右人一生。

经过近半个多世纪的刻意经营,中共用马恩列斯毛邓江本人的和为数众多的文人的书,在中国布下了一张铺天盖地的罗网。组成这张罗网的是一个概念、判断和推理,这些概念、判断和推理试图用自己的方式解释天、地、人,人类社会和人的思想,彻底隔绝人和真实世界的接触,彻底代替根植于自然和人性的对事物的认识和判断,最终制造出对中共邪党惟命是听的无根人。今天,这张大网虽然已经朽烂不堪,但由于人们思维具有一定的惯性,暂时它还在束缚禁锢着一些人的思想。随着《九评》的传播和党文化的破除,人们终于会迎来彻底冲决网罗的一天。

3、利用邪党的文人歌功恶党

《九评之一》指出:“所有的非共党政权社会,无论其如何专制和极权,社会都有一部分自发组织和自主成分。……共党政权中,所有这些自发组织和自主成分被彻底铲除,取而代之的是彻底的自上而下的集权结构。”共产党极端严厉的社会管制造成的后果之一是独立的知识份子阶层的消失。中共除了把一部分知识份子在肉体上消灭以外,把其他人编进各种各样的“单位”之中。单位实际上是中共在城市对人民进行全方位管制的基本组织形式。知识份子丧失了不受政权控制的谋生方式和自由言论空间,无奈地沦为中共的附庸,在强大压力下和走投无路中,他们中的大部分不得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从各个角度、以各种方式歌颂邪党,来保全性命并且养家糊口。中国社会素有“尊师重道”的传统,中共政权利用民众对文化人的信任和敬重,通过文人的著作和言论间接向民众灌输党文化,改变中国人的善恶标准。建立并维持一个“伪知识份子”阶层,一方面使中共摆脱了“清议”和舆论的制约,另一方面使它能够随时随地伪造出貌似公允的“科研成果”和“社会舆论”,为其邪恶统治辩护。

中共收编文人的主要方式包括:直接吸收他们入党并加入政权(政府、人大、政协),比如郭沫若曾任中共国务院副总理,历史学家吴晗曾任北京市政协副主席、北京市副市长;把他们安置在民主党派内;把他们安置在科学院(社科院)、大学或文史馆等机构,或者安置在作家协会、戏剧家协会、文联等部门。在文革中和妻子双双自杀的翻译家傅雷是中共建政以后极少数不属于任何“单位”的自由职业者

(1) 铺天盖地,让人和真实世界彻底绝缘

美国影片《真人活剧》(一译《楚门的世界》)的主人翁楚门生活在一个精心构建的虚假世界,这个世界是一部肥皂剧的场景,而肥皂剧的剧情就是楚门二十四小时的生活。这个虚假的剧中世界包括一切真实世界的元素,而楚门从出生起就生活在这里,因此直到长大成人,他都没能对这个世界的真实性提出质疑。

在政治学术语里,中共这种对社会进行全方位控制的政权被称为“全权式政权”。这种全权式政权能够维持存在的一个先决条件就是必须有一个利于该政权的虚假信息环境。中共深谙此道,多年来创造并维持了一个无所不包的虚假的信息环境。在这个环境里,人们和真实的世界彻底绝缘,失去了据以判断真伪、善恶的参照系统。可以说,中共统治下的中国人都生活在“楚门式”的虚假世界里。

中共也可以在短时间迅速制造一个虚假的信息环境,以达到它的政治目的。99年7月20日以后,中共开动宣传机器栽赃抹黑法轮功,在短短半年时间内,中共报刊在海内外对法轮功的诬陷报导和批判文章,竟然多达三十余万篇。其他宣传工具同样开足马力,广播、电视、舞台、课堂、各种会议、集会、墙报、标语,除非你闭目塞听,否则绝没有可能逃脱中共的洗脑宣传。

(2) 不断重复,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成了真理

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有句名言,“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成了真理。”中共是这句话的忠实信徒。“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老三篇,天天读。”文革时期“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梁效”,现在则有“统一口径”、“转发新华社通稿”。中共谎言经过千百遍的重复,成为人们根深蒂固的观念,而他们还以为这些观念是自己思考得来的。

宣传和重复往往招致反感和讽刺。可是,中共并不害怕人们的反感和讽刺。持续使用这种看似初级的灌输手段,让人产生“中共骗术,不过如此,何必小题大做,与它一般见识”的心理。那些敢于嘲讽中共的人,一定自视老练通达,不轻信,有主见。可是,通过重复,中共的词汇、概念、标语口号和思维方式,被强力压进人的潜意识里,替代了人自发的情感和判断。只要你还在用这种词汇、概念思考,得出的结论只能是“党”允许你得出的结论。只要你把民运人士称为“民运分子”,你对他们就决不会有好感;只要你还在用着“解放”、“新中国”这类词,你对中共总有点儿感恩戴德;只要你还把中共亲昵地简称为“党”,你就承认了这个恶党盘踞中国自然而然、合理合法;只要你还把文革叫作“浩劫”,你就是在接受中共暗示,相信造成文革灾难的是某种超自然的神秘力量而忽略了文革和中共暴政的必然联系;只要你还在把失业工人称为“下岗工人”,你就是自愿配合中共的宣传策略,暗示社会主义制度下只存在下岗,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工人才会失业,失业总是和破产、流浪、饥饿、自杀联系在一起,下岗却总有重新上岗的一天。

听听中国人说的话,看看遍布中文网络论坛的愤青们的原教旨党语言,就会知道中共的重复灌输多么有效。

(3) 伪造民意、诉诸权威,发动心理攻势

中共剥夺了人民的真实声音以后,进而宣称自己是最大多数的民意的代表,从而占据宣传制高点,利用人们的从众心理,强迫人民接受它灌输的歪理和谎言。1957年反右运动中,充斥报纸杂志的都是这种标题:“工人阶级说话了”,“全国各民主党派都和共产党站在一起,共伐右派”,“全军指战员愤怒声讨”,“少数右派陷入人民群众的重围”,“右派是一小撮败类,绝大多数知识份子与党同心同德”……霎

党文化的内容。以电视为例,1978年1月1日开播的《新闻联播》是中共造假宣传的最重要阵地。半小时长的节目几十年如一日的遵循如下模式:前二十五分钟的节目无例外地是隆重召开、亲切会见、深刻领会、贯彻实施、光辉历程、伟大成就;有人说只有后五分钟的国际新闻可看,其实这五分钟也是经过中共剪裁、歪曲,有意误导观众的。

专题节目(如《焦点访谈》)、谈话节目(如《实话实说》)、电视剧(如《生死抉择》)、综艺节目(如“春节联欢晚会”)等等,无不经过精心设计,既要讨好大众,又要让党满意——讨好大众是手段,让党满意是目的。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曾经以“敢言”声誉鹊起,可是一位观众一语道破:“什么‘焦点访谈’,创建初期播出的事件算是高射炮打蚊子,现在播出的完全是显微镜找细菌。从不披露大案要案,重大案件也是大事化小、轻描淡写。”中央电视台的工作人员自我解嘲说,“我是党的一条狗,坐在党的大门口。党叫咬谁就咬谁,让咬几口咬几口。”电视剧更是主旋律的天下,反腐片、改革片、伦理片、古装片,说穿了表达的都是热爱党、理解党、相信党、原谅党。所有的“反腐电视剧”都遵循一个模式,那就是腐败的都是副职、下级,虽然给“党”的事业造成了一定的损失、影响了“党群关系”、“干群关系”,但关键时刻,“党”的化身——正职、贪官的上级等等,就像西方戏剧美学里批判的“机械降神”一样,毅然挺身而出,惩办了贪官,化解了矛盾,给“党”挽回了面子。现实生活中人们都知道,腐败的绝不仅仅是副职和底层官员,如果说基层官员对国库是“蚕食”的话,那么党国大员、太子党对国库才是“鲸吞”。即便如此,荧屏上活灵活现的清官形象还是让观众深深沉醉在对“党的好干部”的期待之中。

1983年开始的“春节联欢晚会”是中共用文艺形式灌输党文化的集大成之作。从歌舞、相声、小品到主持人的串场词、朗诵贺电、驻外使领馆组织留学生拜年,全都在刻意混淆“党”和国家、“党”和民族的概念,利用人们的亲情、民族感情、爱国之情巩固中共对他们的心灵控制。东北口音的或者西北口音的小品除了直接抹黑“党的敌人”以外,还塑造自欺欺人、苦中作乐的小人物形象,把观众的注意力从造成他们人生苦难的社会政治原因引开;或者用低级的噱头把所有人都描写成无差别的低俗人格,仿佛从来如此、举世皆然,从而掩盖中共统治下道德大滑坡的社会现实。2004年中国大陆共发生七万四千起群体抗争事件、四川汉源农民抗争发生大规模流血、爱滋病村惨状触目惊心、黄河源头断流、淮河严重污染致使河水失去水功能、矿难频发、天灾不断……就在这种情况下,2005年的“春晚”被命名为“盛世大联欢”,真应了一句流行的话:“把欺骗进行到底!”

由于互联网上站点众多,不利于中共“主动出击”式地灌输党文化,所以中共当局对互联网的主要策略是“封堵”,不让中共禁止的言论流传开来。中共监控网络的主要方式包括:封锁海外网站、关闭国内网站、抓捕网络作家、过滤电子邮件、布置网警、网特等。这方面最有名的举措是于1998年立项、计划于2006年全部完成、前期投资八亿美元的所谓“金盾工程”。这项工程名义上是公安自动化系统,实为一个包括网络各个环节的全方位网络封锁和监视系统,是一个涉及到技术、行政、公安、国安、宣传等多个部门的系统工程。

网络世界的信息爆炸给了很多中国人“言论自由”的错觉。事实上,人们看到的,都是中共让他们看到的;中共不想让他们看到的,他们一概看不到。谎言可以自由流通,真相却被极力掩盖,这就是中国网络的真实状况。

3) 常用的灌输手法

之一。

为便于意识形态掌控,中共于五十年代进行高等院校的“院系调整”,把很多学校的哲学系合并一处。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等被称为资产阶级学科,被彻底取消,直到八十年代才逐渐恢复。从中央到地方的党校、社科院、大专院校机构臃肿,人员众多,打着“科学研究”的幌子,千方百计地替中共论证合法性。

经过组织收编、思想改造、暴力震慑、利益引诱、逆向淘汰(“反右”流放百万敢言知识份子)等步骤,中共把所有知识份子攥在手掌心,少数正直而清醒的最多做到敢怒不敢言,胆小懦弱的只好随风倒,奸佞谄媚的便主动投怀送抱,充当邪党的爪牙和羽翼。

中共在哲学界、史学界、文学界、科学界、宗教界内都栽培了一些主要的代理人和吹鼓手。这些人平时装模作样,炮制出一篇篇文章、一本本“著作”,论证“马克思主义是真正的科学”、“社会发展五阶段是普遍真理”、“自然科学具有阶级性”、“宗教是真理,社会主义也是真理”,充实党文化的基本武库。运动来了,这些人就如鱼得水,用紧跟形势向“党”表忠心,用胡编乱造歌功恶党、用断章取义、深文罗织、无限上纲打击中共的“敌人”,靠出卖人格从党主子那里讨一点残羹剩饭。文化大革命中的梁效(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两校学者组成的写作班子)、八九民运后的何新、镇压法轮功中的何祚庥、于光远、潘家铮等人,皆属此类。

邪党文人的代表,前有郭沫若,后有何祚庥。

被中共称为“文化旗手”的风派文人郭沫若比变色龙还善于变化。中共让他检讨他就检讨,让他批武训、批胡适、批胡风,他就批得比谁都起劲,让他给哪个历史人物翻案就给哪个历史人物翻案。然而,原则立场不断变化的中共让郭沫若都觉得无所适从。文革初,郭沫若嗅出风向的变化,马上检讨说:“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没有学好毛泽东思想,没有用毛泽东思想来武装自己。”

“政治院士”何祚庥,文革中为了谄媚毛泽东和共产党,提出“毛子”和“无子”的概念,2001年又提出“量子力学的规律符合江泽民的三个代表精神”。就这样一个科学痞子,成为中共打击法轮功的主要“理论来源”。

正信、真理、和人类正统的道德体系都有稳定不变的特点。可以随世俗权力起舞的道德根本就不配称为道德,不断“与时俱进”的真理从来不曾有资格被称为真理,对一个不断变化的东西的信念根本就不是信念。邪党文人的朝三暮四、出尔反尔必然会破坏掉人们残存的对人性和美德的最后一点信心,鼓励人们抛弃一切道德准则,以中共的好恶为好恶,把维护中共政权的存在当作第一需要。

本书一二章已经对学术界、宗教界、科学界的党文人做了相当的揭露,我们在本节将重点剖析文学领域的邪党文人是怎么歌功恶党、改变中国人的善恶标准的。

广义的文学包括各种文献和著述,也包括狭义的文学作品。由于语言在人类文化系统里具有非同寻常的重要性,各大正统文化对语言和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历来非常重视。

中国文化是一种半神文化。古人相信,文章来源于至高无上的天道,因此说“文以载道”;文学可以提高道德、涵养性情,因此说“修辞立其诚”、“诗者持也,持人情志”。历代的文人墨客,把文学创作当作“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以庄重诚敬的心态,创作了大量的优秀文学作品,这些作品其实正是他们清静高尚的内心世界的反映。

中共作为一个控制人思想的邪教,对意识形态的重视,超越于往古来今一切政

权之上。中共邪灵入侵之后,文学不幸沦为中共制造党文化、灌输党文化的可耻工具。肯对中共俯首听命的无行文人飞黄腾达,不愿放弃自己人格尊严的作家诗人即使免遭迫害,也被剥夺了写作或发表的机会,只能在社会边缘郁郁而终。

共产党的文艺思想,由马恩开其端,列宁承其绪,毛泽东总其成。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公开宣称:共产党“就是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这段杀气腾腾的讲话,拉开了中共利用其文人建立党文化、操控中国人精神世界的序幕。从此,“政治标准第一,文学标准第二”,“文学为阶级斗争服务”,“全党办文艺,全民办文艺”,“主题先行”等等,成为中共御用作家创作的指导原则。

1) 用文学作品图解中共的理论和政策

纵观中国现当代史,不难发现,几乎每一次中共发动的政治运动,都从批判某一部文艺作品或某一个文艺思潮开始。

四十年代的整风运动从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开刀,五十年代一系列思想改造运动,从批判电影《武训传》、“红楼梦研究”和所谓“胡风集团”开始,文化大革命用吴晗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祭旗,而批判电视片《河殂》则是“六四”镇压后的思想整肃的重要步骤。

另一方面,中共麾下的文人随着中共的指挥棒翩翩起舞,用文艺作品图解和吹捧中共的理论和政策,满足不同时期中共的政治需要。

为了适应中共“土地改革”(剥夺地主土地)和后来的“合作化运动”(剥夺所有农民土地)的需要,文人们创作了《暴风骤雨》、《三里湾》、《创业史》,替中共掩盖其在政治运动中残酷的杀人整人、明火执仗的抄家和抢劫行为;为了丑化国民党,把中共发起的内战装扮成“解放战争”,文人们创作了《林海雪原》、《保卫延安》、《红岩》;中共需要美化“抗美援朝”,文人就写《谁是最可爱的人》;中共需要图解对资本家的“和平”改造,文人就创作《上海的早晨》;中共需要渲染中国人民“选择”了共产党,文人就创作《红旗谱》;中共需要引导“小资产阶级的知识份子”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文人就创作《青春之歌》;中共要讴歌“大跃进”,全国就跃进出数以百万计的伪民歌。

有人看了中共抹黑法轮功的电视剧后,说:“看了这个电视剧,我才知道为什么要禁法轮功。”言外之意,不看这部电视剧,他还不知道为什么要禁法轮功。中共的文艺捏造竟成了其“政策正当性”的依据,可见舆论灌输在这场最新的镇压运动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其实,历史上中共煽动消灭“剥削阶级”,用的是同样的手法。虽然人们在生活中见到的地主(其实就是普通的土地拥有者)大多是勤勉诚实、热心公益的厚道人,但经过中共灌输,一提起地主,人们想到的一定是周扒皮、刘文彩、黄世仁、南霸天——这些用艺术手段捏造的地主形象。中共当年在其占领区用歌舞和戏剧教育士兵,很多战士都是在看完《白毛女》等剧作以后,“激起了阶级敌忾,燃起了复仇火焰”(周扬语),被中共“教育”成了“有觉悟的无产阶级战士”。

2) 灌输中共的世界观、历史观、人生观

(1) 批判对神的信仰,灌输无神论

无神论是中共思想的基础,而各大正统文化都相信神的存在,很多深刻、杰出的文学作品都是描写神、讴歌神、追寻神的,像希腊罗马神话、但丁《神曲》、弥尔顿《失乐园》、班扬的《天路历程》、中国的《西游记》等等。因此,中共一方面操控

发言权,只让人民有发言权。”谁是人民,谁是反动派?只有毛一个人说了算。

“舆论一律”,“新闻报导的党性原则”,“政治家办报”,“文化工作服务于政治任务”……在这些口号的指导下,所有报纸刊物都乖乖地成了中共的喉舌。“党”要反右,报纸就会说“右派要翻天,我们贫下中农不答应”;“党”要“跃进”,报纸就会说“亩产三十万斤”;党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报纸就会说,这是“保证社会主义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党”要迫害法轮功,报纸就会说“崇尚科学,反对迷信”。尽管现在的人们都说,中共机关报《人民日报》上只有日期是真实的,可是媒体的力量是巨大的,况且除了“党的喉舌”以外,根本就没有任何独立新闻来源,于是人们不得不或多或少把中共操控的大小小的媒体当作可靠的信息来源,区别只是被骗程度大小而已。

八十年代以来,参照台湾开放党禁、报禁,最终建立民主制度的经验,一批有良知的新闻从业人员为争取新闻自由付出了艰苦的努力。如今,中共在经济领域实行“权贵资本主义”,教育、医疗等部门都已经高度市场化,可是,新闻出版仍然被当局牢牢抓在手里。一些试图摆脱“喉舌”地位的媒体,都难逃被整肃的命运。远的有“六四”以前的《世界经济导报》,近的有《冰点》周刊。为了避免激起民愤,中共现在学乖了,对于影响大的报刊,他们不是像以前一样勒令停刊,而是把主编、编辑等人换上“政治上可靠”的人。报刊还叫以前的名字,可是灵魂已死,而大众还被蒙在鼓里。

人的眼耳口鼻、神经末梢的正常工作,使人能够对外部环境做出恰当的反馈。假如有人感觉器官出了问题,明明火焰在灼烧皮肤,不但没有痛感反而觉得愉快,那么这个人的处境就相当危险。60年代初发生大饥荒时,到处都在饿死人,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惨剧,报纸还在竞相夸口又创高产,循循诱导人们吃得太多对身体不好。2006年春北京一场强沙尘暴过后,电视台竟然津津乐道于“洗车业创收猛增”,暗示沙尘暴可以刺激经济增长。中共的喉舌们为了从天灾人祸和民怨沸腾中挖掘“正确的舆论导向”,已经到了口不择言的地步。

(2) 广播、电视、互联网

除了紧紧抓住报刊以外,中共对新兴媒体同样高度重视。广播电台、电视台、互联网这些新兴媒体全都在中共的掌握之中。据《中国新闻出版报》2003年5月公布的数字,2002年中国拥有广播电台306家,电视台360家,广播电视台1300家。广播人口覆盖率93.21%,电视人口覆盖率达94.54%。据调查,十五岁到六十四岁的城市居民中近90%每天收看电视。电视和广播在灌输党文化方面起的作用应该说已经超过了——虽然还不能完全取代——报纸杂志。

今天四十岁以上的人应该不会忘记文革时期遍布城乡的高音喇叭播放的高亢、激越的“最高指示”和长篇政论。文革以后,播音员的调门降低了,“政治觉悟”却丝毫不能降,只不过改用更精良的技术和比较贴近人性的方式灌输党文化。

电视作为一种传播方式,形象、直观、承载的信息量大、具有强烈的现场感,对观众的影响极为深刻。1979年以后,中国电视业开始快速发展。中共紧紧抓住这一媒体,灌输党文化的技术随着电视技术的进步而一路水涨船高。

大部分广播电视节目都以不同方式承载着



加强、成绩、高举、里程碑、先进性、阔步前进、伟大胜利……铺天盖地的党文化造假宣传,把民众和中国的真正现实几乎全面隔绝开来。失业工人和进城农民工的悲惨处境、被强制拆迁而无家可归的城市居民、贪污腐败、官商勾结、警匪勾结、生态环境的严重恶化、迅速下滑的道德状况和不断恶化的人权状况,这些严重威胁民族生存的可怕现实,或者被完全挡在人民的视野之外,或者被刻意淡化,美其名曰“发展中的问题,只能在进一步发展中解决”。

自由信息是自由思想和独立判断的来源。中宣部的各种禁令和设限导致信息完全被中共过滤,民众无法从中得到真实的消息,进行独立的思考。同时人们不得不时时吸食被中共党文化浸泡的信息,顺着党文化的思路进行反应和批判。久而久之,人们对这种灌输习以为常,根本不相信自已已经被党文化洗脑了。

2) 主要的宣传机器

获得真实的资讯是人类维持生存的必要条件。古时候,人们通过口耳相传就能够掌握足够应付生活需要的资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兴起,人类活动的规模和尺度不断加大,世界日益变成“地球村”,发生在万里之外的事也可能对一个人的生活产生巨大的影响,这时口耳相传就远远不够了,大众媒体于是应运而生。

大众媒体的出现,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的信息环境。通过媒体,分散的个体愈加紧密地和社会发生联系,人们需要关心的事越来越多,个人的精神世界变得更加丰富复杂。今天的人类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从媒体获得的信息对外部环境做出判断,进而做出趋利避害的选择。

由于媒体在社会生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西方民主国家,媒体被称为独立于立法、司法、行政之外的第四种权力,记者被称为“无冕之王”,拥有巨大的社会影响力。

中共惯于攻击“资本主义国家新闻自由的虚伪性”,很多中国人也未经思考就重复中共的话。其实,新闻自由并不意味着任何一个特定的媒体都不具有倾向性,而意味着法律保障具有不同倾向性的媒体自由竞争,也保障个人或团体自由创建自己的媒体。在这种制度下,多家媒体并存并互相补充,使人们有机会综合不同的观点,做出自己的判断和选择。如果有人对所有现有媒体都不满意,那么他也可以依法成立自认为更中立、客观的媒体。与此相反,中国的媒体却全属中共“官办”,“独此一家,别无分号”。中央电视台可以在美国播出,美国的电视台却不能在中国播出。

中共的严密思想控制意味着媒体正常的传播真实资讯功能的死亡。在共产党统治下,报纸、电视、广播、互联网等大众传播工具必然沦为“党的喉舌”和党文化灌输的工具。

(1) 报刊

据1991年台北出版的《中共地下党时期报刊调查研究》一书统计,1949年以前,全力颠覆当时合法政权的中共利用国民党统治下相对宽松的舆论环境,除了在所谓“解放区”把持宣传工具以外,还在国统区创办或操控报刊达一千种以上。中共利用这些报刊,鼓吹“民主”,美化自己,打击国民党,为其夺权立下“奇功”。

可是,夺权成功以后,所有媒体一夜之间“共产”到“党”的手里,如果这时再向“党”要求新闻自由,“党”的标准答案是:不存在超阶级的新闻自由。著名民主人士储安平曾预见到:“在国民党统治下,这个‘自由’还是一个‘多’、‘少’的问题,假如共产党执政了,这个‘自由’就变成一个‘有’、‘无’的问题了。”其实,连“民主有和无的问题”也不存在,毛泽东直言不讳:就是要“剥夺反动派的

文人写崇拜物质、崇拜暴力的文学作品,另一方面操控御用学者篡改、阉割、曲解有神论文学。于是,宗教成为“精神鸦片”,天堂地狱变成“封建迷信”,神话传说成为原始社会生产力不发达时期人们对自然力的恐惧的形象反映,孙悟空和《失乐园》里的撒旦变成了无产阶级和受压迫者的代表。

(2) 破除传统观念,灌输阶级仇恨

中国传统的诗教讲究“怨而不怒,哀而不伤”,即使在哀怨伤感的时候,还要控制自己的情绪,使其归于平和中正。中国古典文学里,充满了描写忠孝节义、美好的亲情友情的作品。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的作用是宣泄和净化,古罗马文学家贺拉斯则认为文学的功用在于教育和娱乐。世界各国的文学作品即使写到仇恨,也多是从惩恶劝善的角度写,描写和煽动仇恨和传统文学的特点是不相容的。

然而,按照中共的理解,“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因此,灌输和煽动阶级仇恨就成了中共党文艺的首要任务。仇恨,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成为一个具有正面意义的词语。

“这个十八岁的女奴,一双黑亮、火辣辣的大眼睛里燃烧着刻骨的仇恨!”

这是电影剧本《红色娘子军》的开篇。在此剧本基础上改编的舞剧剧本变本加厉,对仇恨的渲染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她昂首挺胸,双眼迸射着仇恨的烈火”,“她们紧握双拳,倾诉着满腔愤恨”,“心中燃起了强烈的阶级仇恨”,“军事操练在充满阶级仇恨的刺杀声中结束”,“苦大仇深”,“血海深仇”,“报仇雪恨”……舞剧的主人公大多是二十岁不到的花季少女,就这样被描写成了毫无人性的杀人机器。

更可怕的是,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人的精神生活极度匮乏,这些人物是少女们群起效仿的偶像。文革中的女中学生能够把老师用皮带活活抽死,在广西大地上“阶级敌人”被剖心挖肝吃掉而吃人者毫无罪恶感,很大程度上就是拜了这种仇恨文学之赐。

(3) 美化历史上的暴君、小人、流寇和暴徒

共产党要把自己粉饰成“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中国人民的必然选择”,就需要全面篡改历史,把历史上的暴君、小人、流寇和暴徒打扮成“历史前进的动力”。于是,中国历史上有定评的大奸大恶之人,被中共恭恭敬敬地捧上神坛。暴虐的商纣王、秦始皇、刻薄寡恩的商鞅,都成了中共歌功颂德的对象。中共奉农民战争头领为先驱,残忍嗜杀、暴虐无度的黄巢、张献忠、洪秀全成为中共文学殿堂里的正面形象。这里仅举一个小小的例子。

明末匪首之一张献忠嗜杀成性,当时的四川一省人口几乎被他以各种方式屠戮殆尽,富庶的天府之国变成人间地狱。

获1982年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第一卷下册开篇,以田园诗般的优雅笔调写道:“不断遭受战乱的谷城一带,自从张献忠的农民军驻扎在这里以后,稍稍有一些太平气象。”

当然,美化这些历史人物不是目的。美化完这些历史人物之后,中共就开始堂而皇之地美化自己了。

(4) 贬低人性,歌颂党性

阅读中共的文艺理论著作,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那就是“人性”一词被当作贬义词来使用。一部作品如果表现了“人性”,那就是一部失败的、甚至是反动的

作品；反之，一部作品如果表现了阶级性（对阶级敌人的仇恨、对阶级兄弟的友爱），那就是好的、进步的作品。表现父子之情、母子之情、爱情、友情、同情心、普遍的“人类之爱”的作品被贬斥，而表现党性战胜人性、“无产阶级觉悟”的作品被表彰。

按照这种逻辑塑造出来的英雄人物普遍“高”、“大”、“全”（有一部作品的主人公就叫“高大泉”），形象高大，智勇双全，不食人间烟火，对党忠心耿耿，对敌人刻骨仇恨。而反面人物形象猥琐，凶残狡诈。正面人物要姓“高”、“梁”，反面人物要姓“刁”。

一篇短篇小说，描写某地区严重缺盐。年轻的母亲为了把咸菜当作“党费”交给地下党，把瘦得“细长的脖子挑着瘦脑袋”的妞儿（小女孩）手里的一根腌豆角拿走，把孩子弄得哇地哭了。这位母亲把“党”置于家庭和亲情之上，于是获得了党文学的肯定。

中共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往往毫无性别特点，苦大仇深、意志如钢。爱情被贴上资产阶级的标签，在中共的文学作品里或者完全缺席，或者经过处理，被用来衬托“革命事业”的“壮丽和伟大”。如果男（女）主人公爱情萌动，另一方往往要壮烈牺牲，于是主人公化悲愤为力量，继续投身革命的“滚滚洪流”。主人公因爱而结合是革命文学作品的大忌，因为一旦组成家庭，琐碎的日常生活就会“腐蚀革命者的斗志”，中共也就无法“继续革命”、“不断革命”了。

因为中共的御用文人信奉“主题先行”的创作原则，所以每次中共有什么新的需要，应景的文学作品就会被批量生产出来。以上只是举了几个小小的例子。

3) 中共利用党文学进行灌输的几个特点

党文化是附着在中国文化之上的一种附体文化。中共极善于利用传统文化、民间文化的形式和元素，达到增强宣传效果的目的。

(1) 全方位盗用民族文化形式

中共对人类文化的态度从来是为我所用，只要对其统治有利，就一概拿来，决不手软，亦不吝惜。在文学方面，旧体诗词、白话诗、各体民歌、中短篇小说，长篇小说、章回体小说、散文、话剧、戏曲等等，全部被用来承载党文化的内容，美其名曰“旧瓶装新酒”，“民族形式，社会主义内容”。

这样做当然是有原因的。人的审美心理就有一定的稳定性。经过长期积淀而形成的审美习惯不会轻易改变，那么与其另起炉灶用新瓶装新酒，就不如利用人们固有的审美习惯，把党文化的内容偷偷夹带进去。这种承载了党文化内容的民族形式，既给人亲切感，又给人新奇感，最大限度地达到了中共的宣传效果。于是，人们在吟咏诗词、哼唱小调、读小说、看话剧的时候，不知不觉地成了党文化的俘虏。

(2) 善于利用文学技巧

虽然“党”几乎是文化的反义词，几乎等于“武化”、“粗鄙野蛮化”、“反文化”，可是另一方面，“党”又非常善于利用文化，“党”是利用文化反文化。

中共的御用文人，为了更好地达到党文学的宣传效果，的确费了一番苦心。白描、衬托、悬念、包袱、呼应、波澜、心理描写、典型性格、个性化的语言……东西方古典文学中成功的技法，几乎都被拿来使用。

因为中共文艺重视“普及”，即主要针对文化不高的工农群众，所以炮制出来的文学作品虽然水平有限，但还是相当成功地达到了灌输党文化的目的。

(3) 用禁书加强文化饥渴

对于饥饿的人，随便什么食物都是美味珍馐。中共知道，御用文人们炮制出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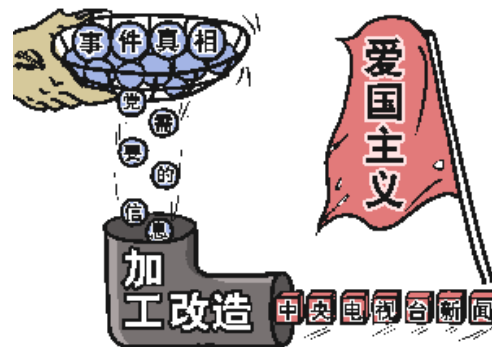
的一席之地。“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共，出于维护自己国际形象的需要，把宣传部的英文名称改为“公共信息部”（Publicity Department），但其性质没有丝毫改变。作为中共中央直属机构的中宣部，是中共对中国媒体和全民精神控制的专门机构。

几十年来，中共始终把完全控制意识形态领域作为其党生死攸关的头等大事。中共通过中宣部掌控全中国的舆论导向，贯彻传达“党”的意志，通过国家宣传机器，对民众进行反复洗脑宣传，把全民思想统一到中共中央的意图上来。中国的两千多家报纸、近万种期刊、上千家广播电台和电视台，几十万个网站，均由中宣部和各级宣传部负责管理。

众所周知，中宣部并没有自己的意志。它以中共中央的意志为意志，以中共的集团生存为目标，以共产党的利益为根本利益。中宣部的工作，说来简单，那就是一面封杀真实，一面制造虚假以取代真实。

我们首先看看中宣部是如何封杀真实的。2002年6月中宣部下发给新闻媒体的一道禁令，共列举了三十五个“不许”，下面只是其中一部分：

“不许擅自报导农村税费改革”，“不许对重大疫情、病情进行渲染报导转载”，“不许对重大安全事故随意报导”，“不许报导私营企业主入党”，“不许报导和转载状告各级党委的政府事件”、“不许过度渲染贫困和暴富分红”，“不许报导希望工程存在的问题”，“不许在媒体运用‘封杀’一词”，“不许提新闻舆论是第四种力量或权力”、“不许刊发错误言论和不正确观点”，“不许集中进行批评性和负面报导”，“不许对民族宗教等领域进行随意报导”，……



中宣部每年向各省市区传媒下发至少一百多条（次）通知或禁令。省、市一级宣传部每年平均向媒体发出的通知、禁令超过二百三十条（次），其中发禁令最多的上海、广东、四川、山东、湖北、湖南、河南，这些省市的宣传部每年向辖内各媒体发出的各种禁令通知书超出三百一十条（次）。就是说，这些地方的媒体几乎每天收到一条禁令。

为加强对传媒的控制，中宣部设新闻阅评协调小组，监控中央和地方主要传媒的动向，并定期向上报告。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宣传部或新闻局聘用大批“新闻审读员”，专门负责监控传媒文章、音像制品等的“政治问题”。由中宣部新闻局负责审读的出版物仅报纸类就达一百余份。

可能有人会说，以中国之大，除了这些禁忌话题以外，可供报导的事件还有很多。可是，中共惯于“攻其一点，不计其余”，朝颁夕改，无限上纲，所有党不喜欢的言论都可能被贴上“错误”的标签。这些禁令正因为措辞模糊、没有规律可循（“不许随意评点……”、“不许过度吹捧……”、“不许刊发错误言论和不正确观点”），所以具有更大的威慑作用。媒体从业人员唯恐触犯雷区，于是只好自我设限、宁左勿右，每个人都充当自己的新闻检查员。那些有幸通过检查的新闻，已经“政治正确”得几乎没有任何阅读价值了。

中宣部同时不遗余力地制造出另一种“真实”，通过给百姓虚幻的满足感和安全感来维护其党的稳定。和谐、反腐、爱国、小康、五个一、三个代表、八荣八耻、学习、

贯彻一各级职能部门和喉舌执行。而在危机时期,中共党魁往往绕开一般性的程序,一手操控媒体,一手紧握屠刀(军队、警察、特务系统),先斩后奏,造成既成事实,过后则以“党性”要挟全党,统一思想,统一舆论,于是党性一次次战胜人性、一步步灭绝人性,直至“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都屈服于党的变态意志之下。

毛、邓、江分别在不同时期,跳到前台,直接捉刀或授意喉舌报刊发表社论,为政治运动定调。1957年反右运动“引蛇出洞”以后,毛泽东亲自为《人民日报》撰写社论,开始了对数百万知识份子的严厉整肃,这场被毛称为“阳谋”的“反右运动”彻底摧毁了中国知识份子的独立思想和自由意志。为1989年学生运动定性的“4.26”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也是在当时实际掌握权力的邓小平直接授意下出笼的。1999年10月25日,中共恶首江泽民接受法国《费加罗报》采访,将法轮功称为×教,第二天《人民日报》就发表文章《“法轮功”就是×教》,江泽民失去理智的咒骂从此凌驾于宪法法律之上。

中共在政治运动中的宣传灌输往往伴随着狂热的政治动员和铺天盖地的舆论攻势。这种大规模的舆论攻势切断了人的正常信息来源,使人们根本无法进行独立的思考判断。很多人由此接受中共舆论的“引导”,并以为那是自己的独立思考的结果。即使有少数头脑比较清醒的人,面对中共暴力机器和“群众专政”的巨大压力,常常也只能保持沉默。

今天的中国人都会觉得中共前几十年的政治运动荒谬可笑。可是,如果从灌输党文化这个角度来看,这些运动非常“成功”地达到了它们的目的。这是因为,经过相当长一段时间的灌输,人们无法正确分辨哪些是自己的正常思想,哪些是中共灌输的观念。人们“告别革命”,只是告别了革命的表面形式,而革命的党文化内涵却几乎原封不动地留存下来。今天人们固然不再唱“语录歌”、跳“忠字舞”、热衷于大鸣大放、文攻武卫,可是中共的政治运动强化灌输的无神论、唯物论、进化论和斗争哲学仍然被中国人当成放之四海而皆准、根本无须证明的普适“真理”,敬天信神被称为“封建迷信”,被抽去了精神内涵的传统文化或者被当成装点门面的饰物、或者被当成赚取钞票的工具,人们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妥。中共的“思想改造”成功了。

十年文革使国民经济到达“崩溃的边缘”,中共被迫在经济领域和文化领域作出些许让步。但在关系到中共集团生存目标的意识形态领域,它从来没有放松过。邓小平曾说,“在这样的问题上,我们从来就没有‘放’,当然也谈不上‘收’。”就在2005年提起被封闭得像高压锅一般的共产流氓小国古巴和北韩,胡锦涛还羡慕不已,说他们“在意识形态上一贯是正确的”。在新的形势下,中共一方面继续严防死守、围追堵截,另一方面不得不“与时俱进”,变换花招,其宣传策略变得更精致、更灵活、更有欺骗性了。虽然从80年代到现在,中共又接连发动了“整党”、“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批判六四民主运动”、镇压法轮功等一系列的运动,可是人们并不觉得自己身处政治运动之中,仿佛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中共的党文化灌输已经达到了让被灌者不知不觉、心甘情愿、甚至乐此不疲的程度。

(2) 常规时期的灌输由中宣部统筹实施

英文里的“宣传”(propaganda)一词,和洗脑、欺骗联系在一起,是个不折不扣的贬义词。只有在法西斯和共产党的词典里,“宣传”一词才具有正面的意义。遍寻往古来今的政治体系,也只有在法西斯和共产党政权体系当中,才有“宣传部”

所谓文学,绝无可能和真正高水平的世界文学名著媲美。妒忌的丑女人无法把自己变美,就只好设计害死美丽的白雪公主。中共建政以后,有计划地毁书、禁书。文革中,凡是跟美有关的事物,都被贴上“资产阶级”的标签,中国人的文化饥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饥渴难耐之下,人们不得不饮鸩止渴,党文学于是乘虚而入。

(4) 用重复增强瘾好效应

人并不需要以酒为生;对于不喝酒的人来说,酒的味道也并不可口。可是为什么就有人嗜酒如命呢?这就是瘾好效应。长期浸泡在一种文化里面,人们会养成一种期待心理。一部作品满足了这种期待,就像搔到痒处一样,使人产生满足感。所谓美感,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就是对瘾好的满足感。懂得了这一点,就不难明白,美感有时候是非理性的,可以被人为地制造出来,而人的审美心理也可能被人操控利用。

中共也利用了这一点。“党”的教条被包装成一句口号、一首歌、一幅画、一个比喻、一个形象,而后被用各种方式不断重复加强,硬生生给中国人制造出一种变异的“美感”。被称为“山大王的诗”的“毛诗词”、粗野不文的“毛文体”、飞扬跋扈的“毛体书法”被重复、模仿、崇拜,有人还以为它们是二十世纪中国艺术的顶峰。今天,所谓“红色经典”还在中国大行其道,这一事实表明,中共长期以来刻意培植的民众对其邪恶文艺的心理依赖仍然没有失效。

4) 从“看得见的黑手”到“看不见的黑手”

透视中共党文学,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中共建政后的党文学,可以以文革为界划分为两个阶段。前一个阶段从1949年到文革;后一个阶段从文革结束到现在。前一个阶段“党”上足了发条,拼命革文化的命,专文艺的政,紧箍越箍越紧,圈子越划越小,是一个“收”的过程。而文革之后,“文学为阶级斗争服务”的口号弃置不用,“突破禁区”、“解放思想”,束缚作家创作的条条框框越来越少,似乎是一个放的过程。现在的中国文坛,美女作家、“痞子文学”、“下半身写作”,光怪陆离,真是“解放”得够可以的了,在这种情况下,怎么理解中共对文学的操控利用呢?

人口学上一般把二十五岁左右当作一代人的时间。从1949年到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一共二十九年。1920年代以前出生的人,即在1949年中共建政以前30岁以上、世界观已经形成的人,到1978年的时候已经60岁或更老,过了退休年龄。那时候活跃在各行各业的人,基本上是喝中共毒汁长大的;换句话说,到1970年代末的时候,党文化已经基本确立了。于是中共变换策略,从一些领域做有限度的撤退,从以前那个无所不在的“看得见的黑手”变成幕后的“看不见的黑手”,在整体上“宏观调控”党文化对民众进行回流灌溉。(当然,如果有需要,“黑手”可以随时伸出来。)

党文化确立的证据就是:不待“党”的直接领导,经过“思想解放”,“放”出来的文学,仍然完全符合中共的政治需要。文革后有名的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对文革的解释和中共政策如出一辙——犯错误的是林彪四人帮、“极左思潮”,“党”还是伟光正的,不光勇于承认错误,还善于改正错误。

寻根寻出来的是“党”按照进化论那一套推出来的不存在的蛮荒时代,诱导人们把“党的错误”归结为“封建遗毒沉渣泛起”;“意识流”流动的是打散重排的“向党交心”和忆苦思甜;写实写的是市井小民的卑微生活,替“党”告诉大家:“人生就是烦恼、命运不可捉摸”,所以不要再对“党”说三道四、吹毛求疵了,大家都不容易,“活着确实不容易”,“活着就好”,“要珍惜来之不易的大好局面”;以调侃和嘲讽为能事的文学作品实际上是在用另一种语言垃圾反对党语言的垃圾,

暗示如果不和“党”同流合污,就只能用玩世不恭确证个体价值;与各种性乱现象一起造成性伦理在中国的全面失控的色情文学,则给人以“党天下”言论自由的假相。

今天中国的文化生态,呈现出极端复杂的面貌。只有真正认清中共的真实面目,才能以简驭繁,不为各种假相所迷惑。中共为了维护自身的存在,无所不用而又毫无底线。它可以“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拥护”,但它也可以反对敌人反对的,拥护敌人拥护的,只要“敌人”不反对它的存在。它可以豪言壮语、粗言恶语、也可以温言软语、甜言蜜语。一边是主旋律,一边是多样化;一边是“四个坚持”,一边是“双百方针”。“一切依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列宁语)登上权力巅峰时,它说:“胜利者不应被谴责。”(斯大林)在惴惴不安中苟延残喘时,它又会说:“面对强大的敌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即使倒下,也要成为一座山,一道岭”,把自己打扮成具有崇高动机的悲剧英雄。

“我必须对历史负责……我承认,对手可能比我强大得多,可对方已经宝剑出鞘了,我可不亮剑吗?我想试试运气,就算属于我的那个时代已经结束,但总要去画个句号吧?”(《亮剑》)

“生存是什么?生存就是不择手段地活着。你可以卑鄙,你可以无耻,你还可以下流。只要能在这个世界上活下去就好。……吃草的未必是仁慈,吃肉的未必是残忍,我是一只狼,注定了是一只狼,一只锋牙利爪的狼,鲜血与死亡是我生命的源泉。”(《狼》)

任何时代的文学都以或直接或曲折的方式反映着那个时代。这两段中国大陆畅销小说中的话,一段抢占“失败英雄”这一最后的宣传制高点,另一段做赤裸裸的权力宣示。这些现象表明,党文学不但没有退出历史舞台,反而扩散到种类繁多的作品当中,更加难以辨别,难以抵御。

经过几十年中共恶党控制的文人的灌输,中国人接受了中共的那一套价值观,仇恨变成了崇高,杀人放火变成了正义,暴君、小人、流氓和暴徒成了崇拜对象,残忍的党性代替了人与人互相关爱的善良本性,敬天信神成了迷信愚昧……善恶的标准被颠倒了,文学丧失了陶冶情操的功用,变成了中共可以肆意美化自己罪行、掩盖罪恶的遮羞布。从这种意义上说,邪党的文人无疑是中共杀人的同谋和帮凶。

4、利用教科书灌输党文化

一个人对事物的判断主要由两个因素决定:一个是他掌握的信息,另一个是处理信息的方式,即思维方式。对于现代人来说,新闻媒体是最重要的信息来源,学校教育是塑造思维方式的最主要力量。因此,中共灌输党文化,必然极端重视新闻媒体和学生的教科书。前者我们在第一节已经谈到,这里重点谈中共教科书的灌输作用。

1949年以前的中国教育,包括国立、私立和教会办三种模式。1949年以后,所有学校被收归国有,中共当局通过“党委负责制”、制订法规、行政命令等方式掌握学校权力,通过组织清理、思想改造的方式驯服教职员工,用教科书给刚刚成长起来的青少年系统洗脑。毛泽东说,“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



攫取政权以后,在短短的几十年时间里,给中国人的思维、语言和行为模式打上了鲜明的烙印,制造了一个遍及中国一切方面、一切角落的党文化。它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

共产党是人类历史的异类,其指导思想有违人的本性,不可能从任何正统文化中自然推演出来。也就是说,一个受传统文化滋养长大的人,不可能自动地具有共产党所宣扬的变异观点。党文化的形成,是中共长期灌输的结果。

这种灌输是强制的、全面的、彻底的、高强度的、不间断的,又是狡猾的、伪善的、隐蔽的、不断变形的,以暴力为依托、以利益为诱饵的,利用一切可能的工具,在一切可能的场合,用一切可行的方法。

中共视宣传灌输为自己的生命线,几十年来发展出系统的理论、繁复的制度、精致的技术和大量的“人才”,再辅以周期性的政治运动强化。其主要手段包括:紧紧抓住宣传机器,推行党文化,造假宣传;强制人民读马恩列斯毛的书;控制邪党的文人歌功恶党,改变中国人的善恶标准;用学生的教科书歌功恶党,让人们从小学到大学都泡在党文化中;利用电影、戏剧、歌舞、曲艺等多种文艺形式,正面烘托党代表人物,贬低传统文化和传统人物,等等。这种灌输是如此系统,如此精致,如此无所不在,以至于很多时候人们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思想被灌输、被洗脑,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言语、行为和思维都与中共的灌输密切相关。

系统反思中共集大成的灌输手段有助于我们认清党文化的建立过程、本质特点和画皮千变的内在机制,深入剖析中共的灌输手段是解体党文化的重要一步。

1、紧抓宣传机器推行党文化

枪杆子和笔杆子是共产党的两大生命线,列宁曾经把这种斗争手段概括为“恐怖主义”加上“意识形态”。中共继承了苏共的邪恶基因,把“骗”字诀用得更加得心应手。刘少奇在1951年一次讲话中直言不讳地说:“我们党从最初建立起,就是全党做宣传的。……以后,更要这样做。”中共的宣传机器在中共对民众进行洗脑灌输、建立党文化的过程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1) 政治运动与常规时期

(1) 在政治运动中灌输

发动不间断的政治运动是中共政权与正常的人类政权最大的区别之一。这是因为共产党的所谓“党性”是和人性截然对立的,一旦环境宽松、控制减弱、与外部正常社会接触增多,党员和人民群众中就会出现人性复苏的情况,中共则面临着“党心”涣散、难以维持的局面。因此,对于中共来说,周期性的政治运动也就成为必然。

因此,中共利用宣传机器灌输党文化也可以分政治运动和常规时期两种情况。无论是在哪种情况下,中共的核心领导层都把控制宣传机器(报刊、广播、电视等)当作“头等大事”、“重中之重”,只不过具体操作方式略有不同。文化大革命中,中宣部曾被称为“阎王殿”受到冲击,全国范围内表面上一度出现“无政府”、“天下大乱”的景象,但掌握实际权力的中共核心集团从未放松对重要的宣传机器(如被称为“两报一刊”的《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的控制。

在常规时期,中共的宣传灌输遵循如下模式:党魁定调—政治局决议—中宣部

局限。

尽管普通民众,特别是许多受中共党文化灌输而相信现代科学无所不能的大众,尚不能认识现代科学发展给人类带来的种种危机,许多清醒的科学家已经意识到这一问题了。1992年,联合国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了有各国首脑参加的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一封有120多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签名的信送到了大会,引起反响。信中说道:“人类与自然已经处于强烈冲突之中。人类活动导致了环境和关键资源的严重破坏,而这种破坏经常是不可再恢复。如若不进行检讨,我们的许多活动将把我们所希望的人类社会和动植物王国的将来置于极其危险的境地,而且可能把这个生命世界变成不能维持任何我们所知道的生命方式的世界。为了避免将要到来的冲突,本质上改变(人类活动)已迫在眉睫。”

需要说明的是,我们无意指责现代科学。在这里指出现代科学的局限,是为了澄清党文化造成的误区,揭示中共灌输现代科学的真实目的——压制信仰、灌输无神论,最终达到思想改造的目的。

※※※※

中华五千年文化是从天地、神明和人的关系而确立的自上而下的价值体系,敬畏神明、相信天命和善恶报应、讲求顺应天道、返本归真是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中共高举“崇尚科学”、“破除封建迷信”的大旗,把这些的核心价值一概贬为“封建糟粕”,同时通过灌输未经证实的进化论和灌输片面化、宗教化的现代实证科学为手段,以残酷的政治斗争为暴力依托,而达到其推行无神论和斗争哲学的目的。虽然今天的中共出于装点门面也不得不表现出推崇传统文化的样子,但因为其无神论的基础已在中国确立,对神的信仰几乎已成为人人皆可嘲笑的“愚昧迷信”,无论其装修多少庙宇、建立多少“孔子学院”、提出多少诸如“八荣八耻”、“构建和谐社会”之类动听的口号,中华文化的神韵早已被中共抹杀。这种失去了内核价值的文化形式只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中共借暴力之威强行用“无神论”改造人们的思想,敬天敬神、道法自然的传统文化几乎被中共连根拔起,以至于今天的社会秩序仅仅是靠着老年人遗留下来的一点传统道德观念维持着,而缺乏信仰的道德与文化显得如此苍白和弱不禁风,随时会被横流的物质主义、功利主义和纵欲主义所彻底湮灭。当华夏的美德被洗劫一空,当善恶有报的信仰被贬得一钱不值的时候,人们不再探寻生命的价值,也无须追求人格的完善,人们心中没有任何顾忌,所剩下的只是“活在当下”的“潇洒”、感官的满足和对欲望的无度追求。中共思想改造的结果,使中国人的心灵没有了归宿,使中华民族丧失了立命的根基。

第三章 灌输手段

文化是一个人群的稳定的心理和行为模式,一种文化的形成往往要经过漫长的历史过程。可是中共



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中共在青少年的心灵上恣意涂抹,教育成了中共灌输党文化的重要阵地。

从所谓“解放区”教育开始,中共就开始建立系统的政治课程。取得政权以后,中共教育部门逐渐将政治教育法规化,强制各级学校实行。50年代高校设立的政治课程包括:“马列主义基础”、“社会发展史”、“中国革命史”、“政治经济学基础”等等。在非运动时期,这类课程可以占到大学授课总时数的十分之一到五分之一。政治运动到来之际,这种按部就班的讲授就显然达不到要求了。反右、四清中,各种运动、政治学习、听报告、军训、学工学农等形形色色的政治教育,加上课堂讲授,几乎吞噬了学生一大半的在校时间。饶是如此,毛泽东仍然认为,1966年以前“资产阶级知识份子统治了我们的学校”。1967年,中共中央《关于小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通知(草案)》提出:小学一至四年级学生只要求学习毛主席语录,兼学识字,学唱革命歌曲,学习一些算术和科学常识。五、六年级学习毛主席语录、“老三篇”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学习“十六条”,学唱革命歌曲。这还只是这场被称为“教育革命”的闹剧的小小一部分。

这场历时十年以上的全民强化洗脑在社会道德和民族心理上留下了巨大的恶果。现在我们再来看看,在“改革开放”以来的“正常时期”,中共是怎么向学生灌输党文化的。

1) 政治课:骗你没商量

(1) 课程多、课时长、覆盖面宽、要求严

古时候的学童,开蒙学习的是洒扫应对进退的礼节、礼乐射御书数的常识,用的教材里面本身就包含着做人的道理。西方近代以来,儿童除文化课以外,还上公民课,学习内容是民主社会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可是中共把教育当作阶级斗争的工具,教育的目的不是培养人格健全的个人或理性负责的公民,而是“听党的话,跟党走”的接班人。教学目的不同决定了教学手段和内容都不同。

从小学到大学(这是概括的说法,其实灌输从幼儿园就开始了,一直到博士班),中国的学生一直要上一门政治课,课时之长,课程之多,要求之严,古今中外仅见。

在不同的阶段,这门课有不同的名称和侧重点。小学时叫“思想品德”,初中叫“思想政治”、“社会发展史”、“国情教育”、高中叫“青少年修养”、“哲学常识”、“经济常识”、“形势任务”,大学里叫“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史”、“社会主义建设”、“法律常识”等等。这些课程,虽然名称不同,但宗旨只有一个,那就是证明“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些课程估计占学生总上课时数的近五分之一。

需要指出的是,这些课程不是可有可无的选修课,而是不折不扣的必修课,核心课,列入各级考试必考科目中。在某些升学考试里,政治不及格者一概不予录取。

(2) 把党文化装扮成“德育”、“常识”、“原理”、“基础”

党文化是无中生有的骗人的玩意儿,可是要想让人无抵抗地接受,就要把它打扮成自然而然、自古已然、天下同然,“放之四海而皆准,衡之古今无不通”。于是,反人性的阶级仇恨教育被称为“德育”,反常识被称为“常识”,歪理被称为“原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被称为“基础”,好像全世界人民都在学习这一套东西。毫无抵御能力的青少年学生完整地把这一套虚假而扭曲的世界观、人生观接受下来,从此变得狭隘而偏执,以为所有正常人都这么思考问题的,而共产中国才是世界的样板,动辄贬斥不同观点为“反动”、“沉渣泛起”、“亡我之心不死”。某中学生

学完社会发展史,问老师,“既然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那资本家不顺应历史潮流,他们是真糊涂呢?还是装糊涂?”

大学的哲学史以马克思划线,马克思以前的西方哲学被称为古典哲学,不是机械唯物主义的就是唯心主义的,总之尚未发现真理;马克思以后的被称为现代哲学,全部带着垂死的资本主义的腐朽没落气息。中国的传统思想,如果还有一点合理成分,那也是辩证法或唯物主义的“萌芽”,是先民们“天才地猜测”到的。各种《哲学史参考资料》一类的书,按照这种结论阉割史料,把丰富的历史剪裁成“两条路线”的斗争史。学了这样的哲学,让人似乎觉得“天不生马列,万古如长夜”,令人纳闷既然马恩列斯毛一劳永逸地发现了真理,何不把其他的书一把火烧掉。

(3) 最有中共特色的教学内容——时事政治

中共是一个毫无原则的流氓党,其立场原则不断变化,即使那些善于紧跟形势的人,也不一定知道应该对某一件事新近发生的事情持什么态度。“时事政治”教育解决了这个难题。在高考和其他一些大型考试中,总有一定比例(一般是10%)的试题是关于时事政治内容的,强迫学生按照中共当局对事件的解释作答。2000年的高考政治卷中,就有一道诋毁法轮功的选择题。

(4) 灌输仇恨和歪理,培养愤青和政治冷漠

人权说白了就是老百姓的基本权利。可是经过多年灌输,“人权”这个词在绝大部分中国人心目中成了一个贬义词,至少是一个可疑的词。听到这个词,人们的第一反应是:“说话的人没准有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我可得多加小心。”

中共知道青少年最没有辨别力,因此仇恨教育一贯“从娃娃抓起”。1999年以后,灌输对法轮功的仇恨的内容堂而皇之地进入大、中、小学教材,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的高中三年级“思想政治”教材的第四课里,赫然印着诽谤法轮功的“教学内容”。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年11月第三次印刷的小学《思想品德》(第十册)十二课中,不但专门假借刘思影之口使大陆小学生落入“天安门自焚”骗局煽动的仇恨,而且让所有小学生把诽谤与仇恨法轮功当成“理所当然”的正面思想行为。很多家长虽然自己对中共的迫害政策不以为然,但为了保护孩子的纯真,不跟孩子谈有关话题。不料家长的好心却恰恰使孩子毫无保护地陷入中共的一言堂宣传之中。

除了前面引用的直接灌输某一结论的题目外,政治考试里还有一类题,必须扭曲自己的思维,才能给出正确答案。难怪有人说,“辩证法就是变戏法。”长期训练以后,学生们学会了“悬搁”自己的正常逻辑思维,进入出题者的变异论理方式。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或者完全习得这套邪恶论理方式,成为“左棍”、“愤青”,或者彻底放弃理解这些推理的努力,满足于一种“人格分裂”的状态。这些学生答题可以毫不含糊,但从此对“哲学”、“人生观”、“政治”等产生深刻的厌恶和冷漠,最终成为不会危及到中共统治的原子化个人。

(5) 政治课绝不放松

近年来,中共教育部对某些科目教材编写的控制慢慢松动。但对于政治课,却绝不放松。据说,“六四”后每次高校公共政治课内容的重大修改都要经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讨论、批准。一个2004年春出笼的“高中思想政治课程标准”这样写道:

“高中思想政治课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基本观点教育,……引导学生……领悟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

时间变化的规律,以此应用于临床治疗可获得显著的疗效,这更是以解剖为基础的西医难望其项背的。实际上中国古人是通过打坐修炼而体察到经络的运行的,明代李时珍在其所著《奇经八脉考》中就说“内景隧道,惟返观者能照察之”。中国古代科学讲究天人合一,是把人的物质身体、人的精神和整个宇宙视为有机的一体,直接进行整体研究的。

很显然,一旦需要把人类本身的精神活动也纳入研究对象的整体环境时,实证科学所要求的重复试验过程、分解还原等等手段都不再适用。从这一点来看,那些抡起实证科学的大棒子打击中国传统修炼文化的人,自以为真理在握,实际上恰恰是被党文化一叶障目,把现代科学宗教化、权威化,甚至政治化了。

8) 实证科学的局限

由于现代科学已经渗透人类生活相关的几乎所有领域,这使得中共很容易就采用僵化的思维方式来灌输现代科学,以至于许多人不自觉地把现代科学等同于真理,而“不科学”的也就成了谬误的代名词。实际上科学(Science)一词来源于拉丁文“Scientia”,原意是“学问”的意思,和真理根本不是一回事。广义上讲,科学是探索和不断接近宇宙规律的方法以及由此形成的知识体系。现代科学是以形式逻辑和实证方法为基础的认识和探索物质世界规律的一套方法及其知识体系,在这里我们称之为实证科学。从这个意义上讲,实证科学并不等同于终极真理,它应当随时准备接受新的事实检验,并伴随着人们认识能力和事物本身的发展而发展;同时我们也不能保证现代实证科学的探索方法就是探索宇宙真理的唯一方法。

现代科学在高速发展的同时,已经逐渐给人类带来许多头疼的难题。一批有远见的科学家已经开始认识到现代科学的局限了。来自西方的实证科学的哲学基础,是把一个完整的世界划分为两个独立的范畴:物质与精神,由此而建立的自然观把人和自然、人和世界、心与物分割开来。其后果就是不能实证精神活动的本质,精神与物质的关系、精神对物质的作用,而人的生命恰恰是精神与物质的一体。

这样一来,精神活动游离于现代实证科学的视野之外,道德更是没有物质基础的纯粹说教,人和自然也不再是完整的一体,其后果之一,就是人与自然的对立;由人主导的科学发展却有着很大的盲目性。瓦特发明了蒸汽机,由此引发的工业革命带来大规模利用化石燃料的能源新时代,谁也没想到200年后的人类会因此陷入温室气体带来的窘境;杜邦引以为傲的发明——氟利昂,作为当时最理想的制冷剂,给人类带来无数便利,谁也没想到几十年后由于它对臭氧层的破坏而几乎成为毁灭人类的杀手;可卡因是临床上局部麻醉的良药,因为发现了它,才有更多的生命从无影灯下被拯救,然而今天,可卡因的吸食者以千万计算,我们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可卡因毁灭的生命比它拯救的还要多;爱因斯坦发现质能方程($E=MC^2$)的时候,绝不会想到几十年后“核威胁”成为人类头上挥之不去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爱因斯坦说过,“科学是一种强有力的工具。怎样用它,究竟是给人类带来幸福还是带来灾难,全取决于自己,而不取决于工具。”在爱因斯坦看来,科学对人类是福还是祸,不能由科学本身来解决,只能由人自己来解决,在这一点上他想不出,除了传统宗教之外,还有什么能与之相媲美。他说“如果我们从先知者们所建立的犹太教和耶稣基督所教导出来的基督教中,把所有后来附加上去的东西,特别是那些传教士所附会上去的那些东西统统除掉,那就留下了能够医治人类社会一切弊病的教义。”在此,爱因斯坦已经认识到了现代科学由于将精神和物质分离而带来的

福音;因此购买要分发的圣经成为牛顿学生生涯中除了房租与伙食费外最大的花费。甚至牛顿对科学的思索也与他的祷告生活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他常在信仰的思索里想到科学,在科学的思索里想到信仰。以至于后来纽约大学历史系教授曼纽在其所著的《牛顿传》中都说:“近代的科学是源自牛顿对上帝的默想。”

根据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哈瑞特·乍克曼博士 1977 年在其著作《科技英才——美国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中的统计材料,自从 1901 年设立诺贝尔奖以来,美国获得该项科学奖的 286 位科学家中,73%的获奖者是基督徒,19%是犹太教徒。著名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费曼曾说“许多科学家确实既相信科学,也相信上帝一启示的上帝,而两者可以完美地一致”。现代航天科学之父冯·布劳恩曾写过这样一段话,也许可以视作对费曼的注解:“宇宙的无边神奇只能证实我们关于造物主确定性的信仰。我发现理解一个不承认在宇宙后面存在超理性的科学家和领会一个否认科学进步的神学家一样困难。”

7) 实证科学并不是探索宇宙规律的唯一方式

1994 年 3 月 1 日,秦始皇兵马俑二号坑正式开始挖掘。考古学家在二号坑内发现了一批青铜剑,剑身上共有 8 个棱面。考古学家用游标卡尺测量,发现这 8 个棱面误差不足一根头发丝。已经出土的 19 把青铜剑,剑剑如此。更令人称奇的是,它们在黄土下沉睡了 2000 多年,出土时依然光亮如新,锋利无比。科研人员测试后发现,剑的表面有一层 10 微米厚的铬盐化合物,这一发现立刻轰动了世界,因为这种“铬盐氧化”处理方法,是近代才出现的先进工艺,德国在 1937 年,美国在 1950 先后发明,并申请了专利。

无独有偶,在考古人员清理秦皇一号坑的第一过洞时,发现一把青铜剑被一尊重达 150 公斤的陶俑压弯了,其弯曲的程度超过 45 度,当人们移开陶俑之后,令人惊诧的奇迹出现了:那又窄又薄的青铜剑,竟在一瞬间反弹平直,自然恢复。当代冶金学家梦想的“形状记忆合金”,竟然出现在 2000 多年前的古代墓葬里。“形状记忆合金”目前用途很广,连女人的胸罩都用上了,也就是“记形罩杯”,可是有谁想到过,上世纪 80 年代的科技文明,为什么竟然会出现在公元前 200 多年以前?

让我们来做一个假设。假设上述神奇的铸造技术并没有留下实物而是记载在中国古籍之中的,并且我们是在上世纪初现代人类尚未发明类似技术的情况下发现这些古籍的记载的。按照中共党文化所谓“批判地继承”中国古代文明的观点,现代人都不可能实现的技术出现在古籍中,那一定是“迷信”或“艺术想像”。同时御用“反伪”、“打假”的打手们也一定会引经据典,论证其荒谬。

实际上,这正是中共长期灌输现代科学,致使人们而把现代实证科学奉为唯一真理的僵化思维表现。受这种思维影响的人,对现代科学尚未探索的领域、所不能解释的现象一概排斥,甚至扣上“伪科学”、“迷信”的帽子而大打出手。

中国古代科技并没有走上西方实证科学的路,但能不能据此而将其视为荒谬呢?由前面的假设中我们不难想到,华夏祖先数千年来留下的文化遗产中那许许多多被视为“迷信”的部分中,一定也有现代科学所不能认识的古代文明精粹。古代中医发现了经络、发明了针灸,如今现代科学已经采用测量皮肤电阻等方法证实了经络和穴位的客观存在,中医的作用也已为世界卫生组织承认并高度评价。人体经络、穴位实际上是一种生命特征,只体现在活人身上,经络运行受人的精神作用的影响,而且几乎没有解剖结构特征。按照实证科学之路,采用西医的解剖方法,是根本无法发现的。特别是古人还用天干地支的五行生克发现了穴位开合与能量流注随

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切实提高参与现代社会生活的能力,逐步树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初步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为终身发展奠定思想政治素质基础。”

看来,中共真的想一条道走到黑了。

2) 历史课:自欺欺人

(1) 政治挂帅,历史就像政治的分支学科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亡。世界各大文明国家都保存了大量的史料,人们可以从历史中获得丰富的教益,为个人的立身处世和民族的发展提供宝贵的借鉴。一个不了解自己历史的民族,就像一个失忆的人一样,处境是十分可悲的。

可是,中共的历史并不光彩,真实的历史是共产党的天敌。为了论证其统治的合法性,中共必须垄断历史的解释权。御用学者们使出浑身解数,把中国历史嵌入虚幻的“发展五阶段”,得出“历史选择了共产党”的结论。通读中共的中国史教材,得到的突出印象是:农民战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从陈胜吴广开始,中国人民就眼巴巴地盼望着掌握了历史真理的革命政党出现,好把他们从水深火热中拯救出来,这一盼就是两千年。终于“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共产党来了。

事实真相是,人类历史发展五阶段是纯粹的虚构,跟中国历史更是完全对不上号。如果说,中国从战国时期进入封建制,那怎么解释秦始皇的废封建置郡县?孔子说“吾从周”,汲汲奔走于六国之间,要恢复三代的礼乐制度,在中共眼里,是“奴隶主阶级”的代言人。可是,为什么孔子的儒家思想反而成了“封建时代”的正统思想?谎编大了就难以说圆。这套体系被戳得体无完肤,中共只恨当年不曾把二十五史烧掉。

(2) 掩盖、篡改、断章取义,把真实历史碎片化

中共的教育部门编历史教材的指导原则是:“唯物史观”解释不了的一概不讲;共产党的丑事恶行一概不讲;历史上的圣贤君子、明君贤相要挑着讲,讲的时候一定要指出其“历史局限性”;“反动阶级的罪恶”要大讲特讲;“农民起义”要大讲特讲;共产党的“光辉历程”要大讲特讲。

中共的历史书也讲孟子,讲的是“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以显示其“剥削阶级”的本性;讲国民党要污蔑他们“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却从来不敢说真抗日的恰恰是国民政府,中共自己“一分抗日,两分应付国民党、七分发展壮大自己”;讲基督教不讲“爱人如己”的教化,要强调“宗教战争”和“宗教是殖民主义的工具”;讲资本主义国家要强调“资产阶级民主的虚伪性”和“经济危机的内在矛盾无法克服”。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青年学生意识到中共对历史的篡改,想通过自己的阅读和研究了解历史真相,可是由于被先入为主地灌输了一套中共的邪恶史观,很难有根本上的突破。在近现代方面,中共垄断史料、封锁言路,目前在中国大陆几乎没有可能全面了解中共起家以后的真正历史。由于中共对历史的系统篡改,要了解中国的历史真相,不光要有能力看破中共就具体事件编造的谎话,更要有能力从中共的理论框架里跳出来,站在整个人类文明史的高度看待共产邪灵祸乱人间的近一个世纪。在这方面,《九评共产党》一书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范例。

3) 语文课:寓骗于乐

(1) 课文的选择

在给 学生灌输党文化方面,如果说政治课唱的是白脸,那语文课唱的就是红脸。政治课是疾风暴雨地灌,语文课是春风化雨地灌,方式不同,目的一样。

中小学语文课本的文章选择,很有学问。中共党魁的文章或关于他们的文章要占到一定比例,中共的所谓“英雄人物”(王二小、刘胡兰、江姐、邱少云、董存瑞、黄继光、狼牙山五壮士等)也不能缺席。为了图解中共的阶级斗争理论,语文课要正面表现古今中外的被压迫阶级,再把几个脸谱化的地主、资本家(周扒皮等)点缀其间。关于西方国家的课文,要体现出“资本主义糟”的特点。小音乐家扬科、万卡、我的叔叔于勒……或者悲惨地死去,或者黯淡地收场。世界名著不得不选,但要选与中共教条合拍的。因为毛用阶级斗争的观点读《红楼梦》,所以中学教材要选“葫芦僧判断葫芦案”,以显示封建统治阶级自私残暴,草菅人命。

中学语文课本收录最多的是毛泽东和鲁迅的文章。毛说:“反对自由主义”,鲁迅说,五千年历史,满本写着两个字,“吃人”,要“痛打落水狗”,“费厄泼赖应当缓行”。这些篇章,很多部分都要背诵。

(2) 老师的教法

不管这些课文的意思多么单纯明确,但任何文本在理论上都可以用多种方式解读。为了杜绝这种可能,中共的教育部门要求语文老师在讲解完字词句段章之后,再“画龙点睛”地指出课文的“中心思想”,强制学生重复这些党文化话语。比如上文提到的《小音乐家扬科》是小学五年级的课文,其中心思想是“旧社会剥削制度的罪恶”,老师要引导学生“懂得穷人的理想不可能实现,即使有才能,也要被埋没”,要“激发学生憎恨剥削制度,同情劳动人民的思想情感”。

(3) 考试的导向

升学考试是各级教育的指挥棒。考试的命题趋势对于教师和学生具有巨大的导向作用。也就是说,教学的重点受试题引导,而试题直接受制于中共政策。以高考作文题为例,1958 年的全国题目是“大跃进中激动人心的一幕”,1977 年的北京题目是“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上海题目是“在抓纲治国的日子里”。近年的作文题目中这种赤裸裸的党文化题减少了,代之以比较隐蔽的党文化,比如“一分为二”的所谓的“辩证法”。1990 年的“玫瑰花有刺”又让国人重温了一把中共的经典自辩词:“主流是好的”,“成绩是主要的”,“成绩是九个指头,失误是一个指头”,“太阳和黑子”。而 1991 年的“近墨者黑”和“近墨者未必黑”,其潜台词是改革开放并不违背四个坚持,预示着 1992 年邓小平南巡重新启动跛足经济改革。

升学考试对于各级教育具有绝对的导向作用。中共控制了考试的命题权,就是支配了学生学习时间的分配和脑力的运用。中共把要强制灌输的东西作为考试重点,学生不得不花十几倍、甚至几十倍于学习其他内容的时间记忆那些党文化内容。结果就是,党文化象刀刻一般深深地写进入了学生的心灵。

(4) 新近的趋势

曾几何时,小学生的人生第一课就是“毛主席万岁”,“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太阳升”。现在的课本“进步”多了,到了小学一年级下册才羞答答地推出“邓小平爷爷植树”。杜甫的名句,“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不是直接写诗人对孩子的想念,反而说小孩子还不懂得想念父亲,角度新颖、情味隽永。现在的语文课本,很多课文都是用这个技巧编造的。小学生不需要喊“四个伟大”了,却要“乡亲们”深情地回忆,“吃水不忘挖井人,时刻想念毛主席”。以前鼓吹自己是“世界革命中心”,现在讲述这样的故事:留学生海外漂流遇险,想拿大衣换一块面包,老板

主义“人间天堂”。然而被中共冠以“科学”的经典——“共产主义理论”——实际上却恰恰是违背自然规律的歪理邪说。按照共产主义理论,所谓共产主义是人类社会的“最高形态”,其理论基础是通过生产力高度发展,物质财富极大丰富,达到“按需分配”的天下大同。然而不幸的是,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而自然资源却是有限的。

由全球专家组成的民间智囊组织罗马俱乐部在 1972 年发表了著名的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指出人类的生产不可能无限制的增长下去,首次在全球范围唤起了人类对环境与发展问题的极大关注。早在上个世纪 80 年代,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发表了影响全球的题为《我们共同的未来》的报告就指出:环境危机、能源危机和发展危机不能分割;地球的资源 and 能源远远不能满足人类发展的需要。据此,报告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换句话说,说由于人类发展的需要和地球有限的资源之间的矛盾,达到共产主义所谓“按需分配”的物质财富极大丰富是不可能的。马克思提出共产主义理论的时候,人类正处于工业化时代的初期,对于人类与环境的关系认识远远不足,共产党却把马克思 100 多年前提出的“共产主义”理论当作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这本身就是愚昧和盲从的态度。

6) 科学家信神并不妨碍其作出科研成就

江泽民在访问美国时问当时的美国总统克林顿:为什么美国科学这么发达,还有那么多人信仰宗教?这是中共党魁本身的愚昧无知的典型代表。其实,每一个中国人也应该问一问中共,中共动用政府力量竭力灌输现代科学、宣传所谓“科学无神论”几十年,为什么堂堂 13 亿人口的大国还没有出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而海外那些获得诺贝尔奖的华人反而恰恰都没有经历过中共的灌输?其实这正是因为,中共灌输现代科学,并不是为了发展中国的科技,其实质是为了压制信仰,钳制思想自由,而科学创造所需要的正是自由的思想环境。中共的灌输方式,却极力把科学和信仰对立起来,在民众头脑中形成一种僵化的思维定势,以为对神的信仰必定导致“愚昧”、导致“反科学”,把宗教信徒都描绘为一群没有多少文化而寻求心灵安慰的受骗者。

事实上,翻开历史我们就会看到,科学发展鼎盛时期的伟大科学家,包括哥白尼、笛卡尔、伽利略和牛顿等均称自己绝对信仰造物主神,认为这个世界——神的杰作是有矩可循的,正待科学家们去发现证实。科学研究和个人对神的信仰根本就不是如共产党所宣扬的水火不容的关系。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有一大批名垂史册的大科学家是有宗教信仰的“有神论”者,比如现代天文学的奠基人开普勒、近代化学的开创者波义耳、电解原理的发现者法拉第、电报的发明者莫尔斯、热功当量的发现者之一焦耳、电磁理论的集大成者麦克斯韦、被誉为原子理论之父的道尔顿、现代遗传学的奠基人孟德尔、青霉素的发明者弗来明、微生物学的创始者巴斯德等等,都是虔诚的宗教信徒。

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经典物理学巨匠牛顿。牛顿是个虔诚的基督徒,中共无法掩盖这一举世公认的事实,于是在教科书中刻意把牛顿说成是晚年涉身宗教,并因此无所创造,误导人以为其早年众多的科学发现是在“无神论”的世界观指导下做出的,而晚年其宗教信仰阻碍了科学创造。然而事实是,牛顿成为虔诚的基督徒远早于其从事科学研究,并且对神的信仰终生未变。牛顿早在剑桥大学读书时,就已经是个虔诚的基督徒了。他经常在笔记本或课本的空白处写下他的祷告,至今仍有许多保存在大英博物馆中。他更经常和室友魏金斯在校外分发圣经给穷人,向他们传

一跨世纪的浩大工程，“全面展示改革开放成就”，展示中共驾驭自然的能力，为自己执政的合法性作注解。于是反对工程上马的著名水利专家黄万里教授有意没被邀请参加工程论证。黄万里数次给中共领导人写信，痛述三峡工程将造成的危害。他还指出，公布的论证报告错误百出，必须悬崖勒马、重新审查。中共对此没有任何回应。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即将结束时，正赶上1989年64事件，有的三峡工程反对人士被牵连入狱，另一些反对派也因而受到压制。当时生态环境论证组报告的结论是：三峡工程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是“弊大于利”；此外中国科学院环境科学委员会、科学院三峡领导小组办公室，也有一批专家反对三峡工程上马。这当然不为中共所喜，于是可行性论证领导小组技术负责人潘家铮于1990年7月6日，在国务院召开的三峡工程论证汇报会上，将三峡工程论证生态环境组的“弊大于利”的结论改为模棱两可的“三峡工程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是广泛而深远的”。随后长江水利委员会又以原生态环境论证组的报告的大纲未报国家环保局审批的程序瑕疵为借口，否定了该报告。短短的6个月后，在重新编写的报告中，结论却成了“利大于弊”。1991年3月，中共党魁江发出批示：“看来对三峡可以下毛毛雨，进行点正面宣传了，也应该开始做点准备。”1991年底和1992年初起，中国媒体大量正面报导三峡工程，反对的声音则被完全压制下去。

2000年5月17日，力主工程上马的张光斗教授在发现三峡工程的实际防洪库容不可能达到设计标准的错误后，一再叮嘱三峡委办公室主任“这件事在社会上公开是万万不行的”（《三峡探索》总第二十七期）。

此外，海内外专家指出，三峡工程对生态环境的破坏，远远大于三峡工程的经济效益，仅仅是三峡水库蓄水导致水流减缓、水体自净能力减弱、水质变坏而造成的损失，就将超过三峡工程的发电的经济收入。三峡工程论证中的环保主审人张光斗在工程上马后的2000年却发现三峡库区污染造成严重问题，曾建议拨款治理，他估计需3000亿元人民币（《三峡探索》总第二十七期）——需要注意的是三峡工程总投资是1800亿元。由于工程问题太多，以至于后来中共没人愿意承担责任，2006年5月这个跨世纪大工程竣工，现任中共领导人竟无人出席典礼。

在中共那里，“科学”和“科学家”都不过是听从政治需要的奴婢，不需要的时候，可以打倒在地，任意践踏；需要的时候又成了打击异己的棍子。一方面，敢讲真话、有独立人格的科学家如黄万里，在中共治下却只能抱憾终生；另一方面，又有一批善于迎合中共胃口的“科学家”，如前面的讲的潘家铮、张光斗等，都因为“听话”而得到重用。当中共需要“科学界”支持镇压法轮功等民间信仰的时候，两人又都摇身变成了所谓“中国反邪教协会”的发起人。

中宣部有个科学处，主管科学领域的意识形态问题，今天中共的“反伪科学”旗手何祚庥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就曾是该处的一员“大将”。上个世纪中宣部科学处发起所谓批判“伪科学”运动一个接一个，几乎波及到自然科学的所有学科。例如：对摩根基因学说的批判、对孟德尔遗传学的批判、对梁思成建筑学的批判、对马寅初人口学的批判、对量子力学一些理论的批判、对相对论的批判、对控制论的批判等等。典型的批判如，控制论被说成是企图用“纯技术的观点来解释社会现象，从而掩盖了资产阶级社会腐朽没落的根本原因”；爱因斯坦被说成是“自然科学中最大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而相对论，则是“彻头彻尾的形而上学唯心主义的”；大爆炸宇宙论和现代宇宙学是“学术领域唯心主义的典型”，是“供给宗教和科学以新的论证”的伪科学，等等。

中共几十年来杀人、搞运动都有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就是为了建立所谓共产

（西方人）不肯。可是看到学生脖子上的一面五星红旗，“老板眼里闪出亮光”，非要用面包换红旗。留学生大义凛然，拂袖而去，老板于是深受教育。政治课宣讲“一个中国”，“不排除使用武力”，语文课则从台湾没有雪讲起，最后用老师的话题：“那里（北京）的小朋友正盼着你们去和他们一起玩呢！”

这套新近出版的小学语文课本从第二册开始，系统灌输“红领巾”、“十月一日——祖国妈妈的生日”，用故事讲述中共的台湾政策、民族政策、外交政策、经济政策，等等，思想单纯的少年儿童在不知不觉中吸收了大量党文化内容。

现在的语文课本加入了很多有时代气息的作品，但我们必须看到，语文课仍然承担着相当重要的灌输党文化的功能。这是因为，第一，党魁文章仍然占据一定篇幅。第二，与众多文学名篇并置在一起，党文化篇目也自然获得了文学名篇的地位，也就是被“经典化”了。当学生用这些党文化篇目学习文法和修辞的时候，已经把内容当成自然、当然、甚至必然的东西，毫无戒备地吸收了。第三，目前应试教育中的技术至上化倾向把学生的注意力吸引到大量无谓的细节，对文章内容既无兴趣又无能力探究。

当然，语文课是和其他课程配合发生作用的，语文课在一定程度上的“去政治化”，从另一方面表明党文化的强大吸纳力和高度欺骗性。就像“人权入宪”、江泽民提出“以德治国”、胡锦涛高呼“和谐社会”一样，没准儿哪一天，“坚持发扬儒释道国粹”也会写入党章和宪法，继续为“伟光正”和“与时俱进”提供注脚。

中共教育体制下的其它课程，象地理、音乐、自然科学等等，都同样担负着灌输党文化的使命。窥一斑可见全豹，这里就不详细阐述了。

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党文化教育危害最大的不是灌输的具体内容，而是灌输给学生的认识世界、解释世界的认知框架。学生把这个认知框架内化以后，从此对该框架无法处理的信息或者采取极端排斥的态度、对该框架无法解释的现象视而不见、不闻不问，或者用中共灌输的扭曲思维方式对这些信息进行加工，最后得出有利于中共统治的结论。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今天的中国人一方面很有思想、能言善辩，另一方面极端偏狭固执，对自己不喜欢的事物深拒固闭，满足于一种“有选择性的无知状态”。

中国自古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说法，社会对教育普遍非常重视。对于为数众多的农家孩子来说，考大学更是除参军以外改变自己农民身份的唯一途径。可是，中共掌控了一切国家资源，孩子们要么不受教育，要么就只能受党文化教育。几十年来，中共把本来应是天下公器的教育变成贩售自家私货的作坊，一代代中国人被迫吞咽下党文化教育的苦果。

5、利用多种文艺形式灌输党文化

共产党认为文艺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只能为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中共夺取政权以后，从经济上把文艺演出团体收归国有，从组织上把文艺界人士变成“体制内人”并对他们实行思想改造，在创作上对文艺界耳提面命严密控制，在短时间内把所有的文艺形式，如电影、戏剧、歌舞、曲艺等，都变成国家机器的一部分和灌输党文化的工具。

1) 利用电影灌输党文化

（1）“电影是最重要的艺术”

二十世纪初兴起的电影作为一种全新的艺术和娱乐形式，与传统艺术形式相

比,具有很大的优势,迅速在社会上普及开来。嗅觉灵敏的共产党很早就注意到电影。列宁说:“电影是教育群众的最强有力的工具之一”,“在所有的艺术中,电影对于我们是最重要的”。1949年8月,中共宣传部发布了《关于加强电影事业的决定》,指出:“电影艺术具有最广大的群众性与最广大的宣传效果,必须加强这一事业,以利于在全国范围内,及在国际上更有力地进行我党及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宣传工作。”1951年,中共夺权后第一个思想改造运动从批判电影《武训传》开始,毛泽东亲自捉刀,对《武训传》进行高调批判。毛泽东此举预示着其后的中共历任党魁都对电影这一艺术形式格外重视。1953年,对电影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全部完成,早于对其他民族工业的改造,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中共把电影生产纳入第一个五年计划,对电影进行行政指令性管理。

从1949年到1966年间,中共总共拍摄了700多部故事片,全面编造“历史选择了中共”的谎言、图解中共各个时期的政策、正面烘托党代表人物、贬低传统文化和传统人物。这个时期的代表作品有《白毛女》、《钢铁战士》、《南征北战》、《青春之歌》、《红旗谱》、《地雷战》、《地道战》、《李双双》、《红日》、《小兵张嘎》、《英雄儿女》、《野火春风斗古城》、《霓虹灯下的哨兵》等。

在这些影片里,中共领导人、中共的所谓“英雄模范人物”、甚至心理阴暗、行为下贱的中共特务都成为被歌颂的对象。电影这种媒体形式使中共能够“逼真地造假”,俊美的男女演员、诗情画意的环境氛围、传奇般的或史诗性的情节设计,最大限度地达到了烘托党代表人物的作用。人们心理上觉得艺术作品里的人物形象更“本质”、更具有普遍性,更有资格代表“党”,殊不知他们看到的只是“党”的假面具而已。

1949年以前,电影主要是一种城市艺术。为了扩大电影的宣传范围,中共以行政区为单位进行电影发行,系统建立电影放映队,把宣传触角伸向农村和厂矿基层。1949年全国电影放映单位为646个,到1957年增加到9965个,其中电影院1030个,电影放映队6692个。工会放映队在1954年一年放映114000多场,观众达1.1亿人次。这种电影放映队一直活跃到八十年代中期,对普及党文化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90%以上的“十七年”(1949年到1966年)电影被打成毒草,文艺领域成了样板戏的天下。1979年,“十七年”影片被大量解禁,当年全民平均观看电影28次,全国电影观众达293亿人次之多。这种现象其实反映了中共的一个统治策略。在经济上把人民剥夺到一无所有,所以只要经济状况略有好转,人们就对中共感恩戴德;在文艺领域把人民剥夺到一无所有,人们就会对灌输党文化的宣传品甘之如饴。

传媒研究发现,一种媒体越是诉诸人的多种感官,越是容易取得较好的效果。电影作为一种艺术,综合了文学、音乐、美术、表演等等,全面诉诸人的各种感官,是一种非常强有力的宣传形式。中共在电影里塑造了大量的党代表人物,他们的说话声调、面部表情、肢体语言等等,成为人们、尤其是青少年模仿的对象,比如毛泽东在地图前“指挥若定”的形象,苏联影片中列宁的演讲动作等等。很多电影中的语汇进入人们的日常语言之中,例如电影《英雄儿女》中王成的台词“为了胜利,向我开炮”就一直流行到今天。电影以“潜移默化”的方式改变着人们的心理和行为模式,其效果之巨难以估量。

中共对电影的重视程度超过对文学的重视程度,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似乎越来越是如此。1989年之后,中共在意识形态上趋于收紧,1990年到1992年之间,在

信仰,容不得在“党中央”之上还有至高无上的神。

虽然中共通过灌输进化论和现代科学来确立其理论根本——无神论,甚至还造了一个唬人耳目的词语叫“科学无神论”。然而就科学发展本身而言,它并没有证实无神论。按照正统宗教的观点,人是神造的,人否定神的存在,就如同实验室培养皿中的细菌企图否认人的存在一样是徒劳的。因为从现代科学的实证方法来讲,对于无神论的证实,必须要求在整个宇宙所有的空间和时间范围否认神的存在,这当然包括人类远未认识到的空间和时间范围。宇宙如此之宏大、多样、复杂,谁能保证,从浩瀚的宏观到无限微观,只有人是高级生命呢?甚至谁能保证,生命的存在形式只能依赖于我们所知道的蛋白质、氨基酸的形式呢?进一步讲,现代宇宙学认为人类无法观测的暗物质占宇宙的2/3,就是说即便穷尽人类现有的观测技术尚有2/3的宇宙属于未知;现代理论物理更提出膜世界理论,认为我们的宇宙不仅仅只是我们所能感受到的三维空间,认为许许多多空间是以多层膜的形式存在于一个多层超空间上。就是说还可能存在着另外的空间。那么谁能保证另外的空间没有高级生命呢?如果另外空间存在高级生命,如果他们具备远远超越人类的大慈悲,具备了悟宇宙真理的大智慧和超凡的能力,那对人类而言他们不就是佛、道、神么?因而不论从逻辑上和技术上讲,从科学的角度证实无神论是不可操作的。

需要指出的是,这里并不反对任何个人信奉“无神论”。作为个人而言,信神与不信神都应当是无可非议的自由选择。在正常的社会里有神和无神的信仰完全可以并存不悖。但是当政府以强制手段在全社会灌输无神论,压制对神的信仰而造成整个社会的信仰迷失,必然会使原有的传统社会价值体系丧失依托,从而导致全社会滑向物质主义、纵欲主义的泥沼。

5) 中共不讲“科学”,马克思主义反自然

尽管中共把自己打扮成科学的卫道士,而且还特别豢养一批御用的“反伪科学”专家,“反对迷信、反对伪科学”由政府出资大力宣传,其高调甚至超过科学发达的任何一个西方国家,但却无法掩盖中共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处处违背自然规律的实质。

2006年是唐山大地震30周年,长篇调查报告《唐山警世录》在1月甫出不久即被中共宣传部门悄悄下令封杀。因为书中披露,在大地震前中国的科技工作者多次准确预测了将要到来的灾难。

然而当时中共政局紊乱,政治稳定高于一切,无人敢上报或公布对地震的预测。唯一例外的,是河北青龙县科委有人在一次非正式场合得到国家地震局一位技术人员关于震情的预测通报,并将震情通知到县里每一个人。因此,距唐山仅115公里的河北省青龙县,在1976年的大地震中无一人伤亡。这一奇迹作为特别案例被联合国公众管理和灾害科学全球整合计划记录下来。

即使到了今天,中共政治挂帅,违背自然规律,犯下危害百姓生命财产的罪行仍然不断。2003年全球流行的萨斯(SARS),2002年11月最先在中国广东省爆发,但当时中共内部正面临党魁江泽民16大退位问题的争执,为了政权稳定而将疫情瞒下,最后错过春运前控制疫情扩散的机会,导致SARS全球爆发。这里哪有一点科学态度的影子?

几十年来中共好大喜功,为了狂热的政治目标做出无数违背自然规律的蠢事,最后遭殃的却都是中国百姓。比如三峡工程的上马就是中共导演的一个政治高于一切的“科学决策”表演。1986年,中共决定对三峡工程进行“论证”,以期通过这

漠视的心态,不仅在中共高官中普遍存在,就连普通百姓也常常深受其害而不自知。中共建政以来,造成中国人非正常死亡达8千万。然而许多中国人即使明白了这一历史事实,仍然觉得那一条条逝去的生命不过是个数字而已。这种漠视生命的心态,和中共灌输进化论不无关系。

中共不断灌输进化论的另一个恶果,是使人们觉得“优胜劣汰、弱肉强食”是理所当然的法则。这样,在“国家”、“民族”这样美丽的口号下,对弱势者的劫掠便有了冠冕堂皇的辩辞:为了所谓的“发展”、为了所谓的“稳定”就无法避免牺牲。因此便有了何院士“谁叫你不幸生在中国”的豪言,便有了邓小平64时“杀20万,保20年稳定”的壮语。当这种法则被社会普遍接受的时候,人心对社会公义就失去了期望,随之而来的是社会道德水平的整体下滑。

4) 灌输现代科学的真实目的——压制信仰

自刚刚建政开始,中共就在全中国范围不断开展所谓“破除封建迷信”的运动。近几年又加入了“崇尚科学”的口号。几十年来学校教材都按照中共制定的教学大纲编写,确保课本知识只能成为中共的“社会发展史”、“辩证唯物主义”的佐证,而不会发生冲突。中共还设有专门的“科学技术普及法”,几乎所有的城市都设立了由政府出资的“科技馆”、“科普站”,其重要任务之一是配合“中央”在基层进行大规模的“科普”活动,举行“破除迷信”、“反对邪教”展览等等。几十年的灌输,使大多数人头脑中不但牢固树立了科学至上的观念,而且更将其上升到政治高度。于是“反科学”、“搞封建迷信”不仅仅是个人信仰的选择问题,而是祸国殃民,甚至应当全民共诛的“罪行”。

事实上在现代科学更发达的西方国家,政府也从来没有用科学的棒子去批判任何信仰。在各大大学里,学生有充分的自由组织各种信仰团体,政府和校方不但不会干涉,反而鼓励多元文化的繁荣。西方国家虽然也有政府支持的科普活动,但与扫除“迷信”、反对“伪科学”等毫不相干。这些活动往往是普及灾难逃生常识等等,如从幼稚园、小学生开始就设有灾难逃生等课程,经常演习训练个人在火灾、飓风、地震、海啸等灾害发生时的应变技能。可是不但在中共的教学大纲中没有这些内容,甚至在灾害频发的地区,这些内容也不是当地的科技馆、科普站的重点。这是因为中共灌输现代科学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强国富民,而是为了压制信仰。本来一个人的信仰完全是个人的行为,即使中共自己制定的宪法也不得不承认公民的信仰自由。但是中共祭起“科学”的大旗,就可以“名正言顺”的给各种宗教信仰扣上“迷信”、“反科学”,扣上导致人民“愚昧”、“落后”的政治帽子。这样铲除信仰就披上了科学“卫道士”的外衣,甚至于还可以和爱国主义联系起来,因为“迷信”会导致国家“落后”。

中共建政之初,1950年开始便在全国各地大规模解散“迷信”组织,诸如基督教、天主教、道教(特别是一贯道)、佛教等组织。要求这些教会、佛堂、帮派的成员到政府登记并悔过自新。如不按期登记,一经查明,定予严惩。1951年政府明文颁布,对继续会道门活动者处于死刑或无期徒刑。据不完全统计,共有不下三百万教徒、帮会成员被抓被杀。

1999年中共开始镇压民间信仰法轮功,也是以“崇尚科学、破除迷信”的口号为其撑腰,以“反邪教”的名义对法轮功进行镇压之后,又进一步对其他气功门派、地下教会进行镇压。警察抓捕基督教地下教会信徒的理由往往直接就是“信神就是反党”。究其根本原因,以无神论为基础的中共独裁政权的确容不得民间对神的

电影上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主旋律”高峰。

(2) 主旋律与多样化

八十年代以来,随着中共的经济改革,电影界也尝试引入企业管理和竞争模式。目前中共大陆上映的国产影片中,大约25%是所谓“主旋律”影片,70%是娱乐片,5%为艺术片。然而,电影的宣传功能并没有被削弱,它只不过采取了更为复杂精致的形式。

首先,主旋律电影仍然承负重要的灌输党文化的职能。中共政策保证了主旋律电影的高投入、大制作、红头文件发行,各级组织观看。《大决战》投资数千万元,拍摄地区涉及十三个省,参拍群众多达十五万余人次,中共对此的重视可见一斑。中宣部、中组部、国家教委、广播电影电视部、文化部、全国总工会、全国妇联、共青团中央等单位多次就主旋律影片的发行放映发出联合通知,要求各级单位组织观看。《开国大典》、《焦裕禄》、《毛泽东和他的儿子》等影片的观众数量都相当巨大。

其次,主旋律电影向高科技化、精致化、人情化发展。八十年代以后,由于国门打开,观众的辨别力加强,中共从前编造的赤裸裸的谎言行不通了。中共的御用电影人揣摩观众心理,发展出一套复杂的主旋律策略。在所谓“革命历史题材”的影片里,创作者刻意制造出记录片的假相,把具有倾向性的对历史的陈述假扮成客观的历史。战争影片注重大场面的表现,以逼真的战争幻像冲击观众的理性判断,使其不愿去分辨历史与叙事。影片中的“革命领袖”被塑造成有血有肉的个人,以对他们的亲情、爱情、友情等的呈现,拉近与观众的距离。“党的敌人”也不复是以前电影中那副庸碌无能的模样,他们被表现为有一定才华和人格高度的人物,但在历史的较量中,败在中共手下,以此烘托中共领导人的棋高一招。

《江泽民其人》中记录了一件事,可以佐证中共主旋律电影手法的精致。江泽民曾应邀观看电影《开国大典》。影片中的一些镜头让他十分好奇,因为看起来像是极为珍贵的记录片。江泽民问导演那些镜头是从哪里找到的。导演回答说,那些镜头根本就不是找的,而是他们刚刚拍摄的,经过特殊技术处理后,看起来就像记录片一样。江十分满意,看完电影后总结说:“真的和假的糅合在一起——我都被骗过去了。”

中共的经典宣传片的基调是伟光正、人物形象高大全。随着它历史上越来越多的罪恶被揭露出来,并且陷入一个又一个现实的困境,中共必须采取不同的宣传策略为自己辩护。在有些影片中,中共领袖被塑造成虽具有崇高人格、但在无情而必然的历史进程面前也无能为力的悲剧型人物,以求得观众对他们在历史上犯下的罪行的谅解,同时使观众体会到普通人的快乐,从而更安于现存的社会秩序。

另外一个被广泛采用的手段是“煽情”。电影《邓小平》的导演声称:“我们必须把邓小平的一系列伟大革命创举,变成巨大的情感冲击波,把一切理性的事件化为感性的情绪!”《焦裕禄》和《孔繁森》中都有大段的群众性葬礼场面,用荧幕上群众的哀哭感染剧院中的观众,使观众在被影片主人翁的“高尚道德”感动之余,认同他们所代表的“党”的形象。

第三,娱乐片也同样承担着灌输党文化的职能。《电影通讯》1991年第五期评论员文章说:“作为一种创作精神,它(主旋律)不是一个量的概念,不是指多数作品与少数作品的关系,不是指这一题材与那一题材的关系,不仅不排斥任何创作,反而要求渗透于一切作品的创作指导之中。”

一些影片因为有娱乐片的外包装,其中的党文化非常隐蔽,观众在欣赏历史传奇、爱情故事、或感叹视觉奇观时,不知不觉地被灌输了党文化的观念和趣味。电影《英雄》耗资 2.5 亿人民币,以美轮美奂的电影语言,讴歌独裁强权和暴力征服;《漂亮妈妈》把下岗工人的悲惨遭遇归咎于生理原因(女主人翁的儿子耳聋),间接掩盖了中共政策失当造成城市工人大面积失业的事实;更多的影片编造故事,替中共煽动民族主义情绪。

第四,中共利用电影贬低传统文化和传统人物。经过长时间的党文化宣传灌输,绝大多数中国人已经不知道传统文化和传统社会的本来面目。八十年代以来,很多电影人虽然力图反抗党文化,但因为他们本身就是在共产党的统治下长大,因此只能用党文化的逻辑推想传统社会的真实样貌,因此很多影片中的传统中国社会集封闭、压抑、野蛮于一身,似乎还没有中共统治之后的社会开化、进步。其实,这也是按照进化论那套逻辑推出来的,是在用另一种方式重复党文化。

第五,无所不在的党文化成为电影的审美风格元素,渗透于一切影视作品之中,利用观众的怀旧情绪,巩固党文化对人心灵的桎梏。

与其他艺术式样相比,电影有自己的特点。比如,文学、美术、音乐表现什么、不表现什么,有很大的自由空间,而电影必须全面表现故事发生时的物质环境。因此电影画面的背景和道具,都要经过精心布置,使它们能再现故事发生年代的典型环境。比如,表现文革时期的环境,要有毛像、大字报、绿军装、红宝书等。1949 年以后的中国,是共产党一党的天下。要想表现这一时期的典型环境,只能使用带有浓重党文化色彩的物品、声音和场面。这些场景往往唤起观众的怀旧情绪,使观众觉得虽然那个时代有很多缺点,但毕竟自己曾经拼搏过一回,就像普希金说的,“那过去了的,就会成为美好的回忆”,过去的日子不管多么痛苦和荒谬,但人们那时还年轻,现在回想起来不免有一种浪漫的感觉。

充满说教意味的影片在今天一般会招致反感,所以这种“顺手捎带”的方式,就成了影视作品在客观上帮助中共灌输党文化的主要形式之一。这种勾起人怀旧情绪的电影元素往往是电影要表现的故事的背景;惟其如此,这些符号携带的信息才不会引起人们的警戒心理,畅通无阻地进入观众的头脑之中。

影视(《激情燃烧的岁月》)、歌舞、文学、时尚、甚至广告(北京中关村曾经有一个巨型广告,仿照文革宣传画风格,上书“Internet 就一定要实现”)、旅游(“红色旅游”)等等都在加入这个“怀旧情绪”的大合奏,其实都是在帮助中共巩固党文化对中国人心灵的桎梏。

2) 利用戏剧、歌舞、曲艺等多种文艺形式灌输党文化

中共的文艺宣传形式,很多是从苏联生搬硬套来的。但是,因为灌输党文化的对象是所有中国人,中共必然利用一切民族文化资源,以适应不同人群的口味,使灌输效果最大化。歌舞、京剧、话剧、评剧、豫剧、吕剧、越剧、粤剧、秦腔、秧歌、黄梅戏、花鼓戏、二人转、京韵大鼓、河北梆子、山东快书、相声、评书,中共无所不盗,党文化附体在这些传统文艺形式上,流毒可谓广而且深。我们这里重点探讨几个相关的问题。

(1) 附体在民族文化之上

既然中共给人民带来了那么多的灾难,为什么有那么多“民歌”歌颂共产党、毛泽东?这难道不是中共得民心的体现吗?其实不然。

“芝麻油,白菜心,要吃豆角嘛抽筋筋。三天不见想死个人,呼儿嗨哟,哎呀我的三哥哥。”

根据进化论的概念,人类是由最原始的水生动物,慢慢爬上陆地,从两栖生物、爬行类、哺乳类,最后进化到猿,再下到地上进化成人类,中间的过程经历了几亿年。生物学家按照生命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等到高等,画出了进化时间表。

然而许多考古学家的发现都直接地反驳了进化论支持者的论点,这包括在世界各地陆续发现了远古不同时期的人类的直接证据,从几万年前至几亿年前的人类脚印到人体的骨骼化石,都无法被归纳到进化时间表。例如,据一九九七年十一月六日《中国地质矿产报》报导,在中国云南富源县三叠纪岩石上面发现有四个人的脚印。据考证,这些岩石已有二亿三千五百万年的历史;一八五一年的六月号《科学美国人》刊载的一篇文章上提到在马萨诸塞州道契斯特(Dorchester)进行的爆破中,一个金属花瓶因被炸成两半而飞出岩石,将炸裂的两半合而为一后,拼成了一个钟形花瓶,花瓶由锌银合金制成,它自地下 15 英尺处破石而出,据估计有十万年历史。

就考古学发现而言,令进化论者头疼的另一个问题是,进化过程中确凿的过渡类型,严格地讲并没有发现。例如在从猿到人的问题上,科学家们发现了一些化石,归类为“古猿”、“类人猿”、“猿人”、“智人”,唯独没有“类猿人”。寻找过渡物种“类猿人”,被列入了科学的“十大悬案”。数次宣布的人类始祖,很快就被否定了。例如 1892 年发现的人和猿之间的过渡化石“嘉伯人”,是一块猿的头骨和相距 40 英尺的一根人的腿骨拼凑出来的,学术界否定了“嘉伯人”,科教方面却还在宣传。直到 1984 年“嘉伯人”才被新发现的猿人化石“露茜”代替。但后来的鉴定中,露茜同样被大部分学者否定了,科学家已经确定了露茜是一种绝种的猿——南方古猿,和人无关。

假如进化论是真的,过渡类型化石就应该很容易找到,为什么没有呢?大家沿用达尔文的解释:“化石记录不完全”。深入想一想:从宏观上看,化石的形成是普遍和随机的,为什么单单漏掉了过渡类型呢?

观察、假设、验证的“三步曲”,至今还是实证科学的科学家们发现自然规律和抽象科学定理所奉行的准绳。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只完成了前两步;然而经过几代人一个多世纪的努力,这至关重要的最后一步——“验证”,迄今尚没有得到令人信服的结果,并且从当前各学科的发展趋势和进化论自身的局限来看,进化论走完这三步曲中的最后一步,已经变得越来越渺茫了。

3) 灌输进化论的后果

中共灌输进化论和其推行无神论的目标是一致的。按照进化论的观点,人是自然界随机产生的。人的产生无目的,存在也无目的。这样,一切对神的信仰也就成了“虚无缥缈”的了。并且,人不过是进化了的猿,和其他动物并无本质的不同。动物和植物,生物与非生物,也没有不可逾越的界限。所以按照恩格斯的看法,生命也不过是“蛋白质存在的一种形式”而已。按照这样的观点来看,中国传统文化中对生命的尊重就成了不必要的“迷信”了。的确,从进化论的观点来看,砍掉一棵树与打死一只狗,杀掉一只猴子与杀死一个人,只有程度的差别,并无本质的不同,都只不过是改变了一些蛋白质存在的形式而已。

2003 年 3 月,SARS 蔓延到香港。香港媒体连续报导疫情发展。博鳌论坛秘书长、中共前对外经贸部副部长龙永图责怪说:“香港的报纸连续十天、二十天、三十天头版报导肺炎事件,谁还敢来?”“如果六百万人中有五十万人得了这个病,我觉得应该恐慌,但现时才三百多个就搞成这个样子了,我觉得有问题。”这种对生命极度

达尔文时代,近代西方科学正处于奠基阶段,对生命现象的认识还很肤浅。那时的人看到了家养动物的诸多杂种变异,就认为物种也能这样变成其他种,这就是进化。后来,随着基因的发现和深入研究,学者们才意识到如果基因不发生根本的变化,不管后代表面与祖先有什么差异,也没有进化意义。然而基因又是极其稳定的,只有不正常的“基因突变”才能使之发生改变,那么“基因突变”也就成了现代进化论的核心了。这是现代所有的进化论者公认的。这里,我们就集中分析这个核心理论。

物种基因的稳定性极难逾越

基因的稳定性是物种保持自身稳定所必需的,同一物种不同个体的基因交流,并不能使此物种变成其他物种。动植物育种专家都知道,一个物种的变化范围是有限的。最终,培育出的品种不是不育,就是又变成原来的亲本。哈佛大学的梅尔教授称之为基因体内平衡。最常见的就是狗再怎么杂交育种还是狗。这说明进化论有一个无法跨越的障碍。在理论上,人们把突破这个障碍的可能性寄望于基因突变,这是唯一的可能了。

理论和实际上,基因突变产生高级性状的机率几乎是零

基因突变,是一种在基因复制或修复损伤等过程中发生的随机错误,所以又叫随机突变,本身就是一种病态现象。它发生的机率非常低,大约在万分之一到十亿分之一之间。低等原核生物的突变率较高,大约为千分之一,而高等类型的生物中,许多基因的突变率是十万分之一到一亿分之一。

基因突变能否产生具有生存优势的高级特征(性状)呢?我们知道一个基因的核心是由几百到几千个碱基排列而成,如同一个复杂精密的计算机程序,随意的改动一两个字符能够产生更高级的程序吗?当然不能。基因突变也是这样,单个碱基的变化结果往往是各种缺陷、畸形、致死,在自然条件下具有生存优势的没有发现一例。

概率计算表明,生物进化的可能性小到了绝对不可能的程度

现代进化论以基因突变为其核心,但是如前所述,基因突变本质上是一种随机错误,因此概括地讲所谓从猿进化到人的过程,其实质就是有一部分古猿在数百万年里,因为一系列的基因发生“阴差阳错”的突变,“恰好”使得古猿前额逐渐增高,眉骨变小,吻部后缩,脑容量增大,脊椎变直……最终成为现代人类。

很显然,自然选择的过程只能决定最终哪些物种存留下来,却不会增加整个过程发生的概率。许多学者进一步的计算表明,这样一连串的“阴差阳错”要想每一步都发生,其可能性微乎其微。美国生物化学家贝希以血液凝固的一系列生物化学机制为例,讲述如此复杂精密的生命现象不可能是进化出来的。其中一个蛋白(TPA)产生的机率是十分之一的十八次方,经过计算至少需要一百亿年才能发生(目前科学家认为太阳系的年龄约为 50 亿年)。如果同时进化出和它相互作用的蛋白,机率就是十分之一的三十六次方。他说:“很可惜,宇宙没有时间等待。”

对于生命的产生,现代进化论认为也是一个自然过程,认为简单的有机物和无机物在某种特殊条件下碰撞而成复杂的生命大分子,各种复杂的大分子进一步组合演化形成原始生命。读到这么多串连的“理想化”过程,读者恐怕会考虑其中的机率问题了,英国科学家霍伊尔曾表示:“上述事情发生的可能性正如利用席卷整个废料厂的飓风来装配七四七喷射机一样。”

(3) 进化论的尴尬——关于进化时间表的种种疑问

1943 年,这首陕北高原上传唱数百年的情歌被重新填词改编成《东方红》,芝麻、白菜和豆角被置换成了东方、太阳和毛泽东,从此在中国大地上唱响,成为党文化的“主打歌曲”之一。

类似的“借尸还魂”的例子数不胜数,比较有名的有把惩恶扬善、扶危济困的白毛仙姑变成苦大仇深的白毛女,演绎“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主题。民歌刘三姐中的唱词“塘边洗手鱼也死,路过青山树也枯”原来是讽刺忘恩负义的狠心人,被篡改成“莫夸财主家豪富,财主心肠比蛇毒。塘边洗手鱼也死,路过青山树也枯”,把刘三姐变成阶级斗争的先行者。形形色色的“新编历史剧”利用古人的嘴,宣扬中共的世界观和历史观,如《逼上梁山》,林冲“从恨高俅个人到恨整个剥削阶级”:“要把这世界翻转了,那须得枪对枪来刀对刀。”

经过三十年的文化灭绝运动、把优秀民族文化破坏殆尽以后,中共向人民和世界宣称:它代表了正统的中华文化,同时更加肆无忌惮地打着传统文化的幌子贩卖党文化的邪恶货色。它所以敢更加肆无忌惮,是因为世界还不了解中国,人民多忘记了传统。失去了敬神向善内涵的伪飞天、伪千手观音和伪民歌民乐,伴着邪党文人花言巧语、似是而非的诠释,给中共的黑暗统治装饰了一道华丽的花边,同时更隐蔽、更彻底地摧毁人们对神佛的正信、变异了人们的道德观念和艺术品味。

(2) 八亿人八个样板戏

传统戏曲对忠孝节义等美好情操进行形象化解说,对于维系社会的道德水准起到了极大的作用。二十世纪以来,激进知识份子对所谓“封建礼教”横加批判,传统戏曲也被大加挞伐。鲁迅在论及戏曲改革时说:“(改革)不久也就沉寂,戏剧还是那样旧,旧垒还是那样坚。”这恰恰从反面说明,戏曲的形式和内容是一个整体,是传统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如果大肆改动,也就不是戏曲了。

1949 年以后,中共“改制、改人、改戏”,戏曲界被摧残得百花凋零。才子佳人、帝王将相、因果报应被批判,只有经过改编、能够承载起中共灌输党文化的职能的戏剧,才被允许存在。剧作家吴祖光愤而指出,中共“把拥有几万出戏的古典戏曲生生挤兑得只剩寥寥几出戏在舞台上苟延残喘”,“党趁早别领导艺术工作。”文革中推出的“样板戏”是中共利用文艺形式灌输党文化的登峰造极之作。

样板戏一般是指现代京剧《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海港》和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以及钢琴伴唱《红灯记》、钢琴协奏曲《黄河》、交响音乐《沙家浜》。这些京剧和舞剧,有些在文革前就被创作出来了。在江青直接指挥下,以“三突出”(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为指导原则,把这些戏剧改造提纯,使之更符合中共意识形态需要。文革中,绝大部分电影和戏曲作品被作为毒草禁映禁演,样板戏和样板戏拍成的电影几乎是仅有的合法文艺形式。十年中它们反复上演、播出,强制性地让群众收听观看。今天四十岁以上的中国人,对样板戏都有刻骨铭心的记忆。

样板戏从创作到演出集中了当时戏剧界最优秀的人才,在技术上的确有可圈可点之处。可是,样板戏大肆篡改历史、渲染暴力、歌颂仇恨、颠覆传统价值观、对中共领袖和所谓“英雄人物”进行无限神化和吹捧,这一切都说明它们是为了一个邪恶的目的服务。那么,其技术越精良,危害就越大。

文革后,样板戏在舞台上消失了一段时间。可是,听惯了样板戏的八亿人民为样板戏的复活提供了土壤。时至今日,样板戏中的某些唱段仍然为人津津乐道,某些样

板戏被吹捧为“经典”，重新走上舞台，或者被改编成电视剧公开放映。可见样板戏的阴魂不散，样板戏灌输的党文化也已经在几代中国人的心里生根发芽了。

今天的人们可能会觉得样板戏这种宣传方式，非常简单粗陋，人人都能一眼识破，因此不会对人的心理造成很大的影响。可是，中共的宣传也是量体裁衣的。八十年代以前的中国人，生活和思想都相对简单，也许绝大部分人都能意识到杨子荣、阿庆嫂、李玉和、柯湘等人的形象经过了艺术夸张，但却多半不会想到，他们反映的，是完全颠倒、扭曲了的历史。

文革以后，戏曲人才和戏曲观众纷纷老去。随着新的媒体形式和审美习惯的兴起，戏曲逐渐被边缘化，中共宣传部门对戏曲也不再像以往那么重视了。

（3）审美习惯具有滞后性

人的审美习惯具有滞后性，也就是说，形成或者改变一种审美习惯，往往比形成或者改变一种理性思维更加困难。因此，中共利用文艺形式灌输党文化虽然似乎见效比较慢，不像杀人、搞政治运动那样能够立竿见影地制造出恐怖气氛，也不像舆论宣传那样能够迅速达到统一思想的目的，但文艺宣传诉诸人的感情，培养一种独特的审美习惯，入人心深、危害隐蔽而持久。

2004年“七一”之前，中共在全国各地推出了一系列所谓“红色经典”演出，节目包括歌剧《洪湖赤卫队》、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歌剧《江姐》及歌舞等。据说“很受群众欢迎”，“票房很好”。一位观众在接受采访时说，“这部作品曾经伴随我们走过了人生最重要的年代，我们是唱着‘洪湖水浪打浪’的歌声走过来的，在七一这样特殊的日子，重看这样的经典歌剧让我似乎回到从前。”

这位观众也许并没有说假话。可是，艺术和审美并不是存在在真空之中。在共产中国这样一个高度政治化的社会里，大量的歌曲都带有强烈的党文化色彩，否则就难以理解为什么“党”那么热衷于在各种节日、纪念日办“歌咏比赛”和“文艺汇演”。

过去的人们一张嘴就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烽烟滚滚唱英雄”、“一条大河波浪宽”，现在则是“一位老人在南海边划了一个圈”、“继往开来的领路人，带领我们走进新时代”。《东方红》、《歌唱祖国》、《长征组歌》、《唱支山歌给党听》、《党啊，亲爱的妈妈》、《大海航行靠舵手》、《毛主席来到咱农庄》、《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毛主席的话儿记心上》……这些歌大多运用民歌风格，曲调优美上口，使人百唱不厌。对领袖的忠诚、对“党”的热爱，就在人们摇头晃脑之际被悄悄压进了他们的潜意识。就灌输党文化的效果而言，这些歌曲起的作用绝不亚于四卷《毛选》。

有过出国经历的人，只要想一想改变自己的饮食口味多么困难，就知道清除共产党培植的邪恶审美心理有多么不易了。

（4）利用移情作用

“移情作用”，简单地讲，就是爱屋及乌，因为喜爱欣赏事物甲，连带着也喜爱欣赏事物乙丙丁。商业广告经常请娱乐明星推荐某个品牌的商品，追星族们因为崇拜该明星，对他/她推荐的商品也不加别择地接受，这就是移情作用的效果。

“洪湖水，浪打浪，洪湖岸边是家乡。清早船儿去撒网，晚上回来鱼满舱。四季野鸭和菱藕，秋收满舱稻谷香。

人人都说天堂美，怎比我洪湖鱼米乡！洪湖水，长又长，太阳一出闪金光。共产党的恩情比那东海深，渔民的光景，一年更比一年强。”

石论证其进化的过程，却又需要依赖于进化的模式。比如中国著名猿人“元谋人”的确定，是从仅有的3颗人类牙齿推断来的；蓝田猿人的确定，仅凭一个下颌骨；丁村人，三颗牙齿，一小块头盖骨；马坝人，一个不完整的头盖骨……把它们确定成什么，要完全套用进化模式。这里边暴露了一个逻辑问题：从进化论来的东西，再去证明进化论，显然是循环论证。所谓西方古猿（尼布拉斯加人）的发现，就充分暴露出这种论证逻辑的缺陷。一九二二年，生物学家奥斯本宣布发现了一颗牙齿，这颗牙齿同时具备猩猩、猿人及类人猿特征。他给这颗牙齿的主人取了一个名字——尼布拉斯加人。接着，相信进化论的人士画出了这个猿人的想像图，仅仅凭着一颗牙齿。但一九二七年，经过更深入的研究后发现，这颗牙齿的主人是一种绝种了的美洲野猪！

那么进化论是归纳法吗？不是，太多事实归纳不进去。

有人曾说进化论是归纳法，这种逻辑思路稍微难一些，其实也好理解。归纳法就是提出一个命题，如果能把涵盖的所有问题都归纳进去，那这个命题就是真理。然而对于进化论，太多的事实归纳不进去。从前面的史前文明证据来看，从进化的速度、物种爆发式的产生的方式、进化的概率等等许许多多不但归纳不进去，而且都在否定进化论，可见进化论的论证作为归纳法是不能成立的，其实还是循环论证。

似是而非的“循环论证”贯穿了整个进化论，人们似乎都对此习以为常了。然而当我们严格的分析起来，都会大吃一惊。

中学生物课本上有一张胚胎发育图，显示鱼、蝾螈、乌龟、鸡、猪、牛、兔、人等动物在胚胎发育不同阶段的侧面，其原版收藏在伦敦大学的Bodleian图书馆，它的作者是十九世纪德国Jena大学的生物学教授海克尔。从这张图得出的结论是，虽然这些动物成年后形态各不相同，但在胚胎发育过程中均有一个形态相似的阶段，包括人类，各种动物在胚胎发育的某个阶段，其形态会重演一个类似鱼的形态，表明它们的共同祖先是水生动物，它们祖先的特征在胚胎发育过程中重演了。这就是支持进化论的三大证据之一“胚胎重演律”。

其实，用重演律证明进化论，也可形式地表述为：“假如进化论成立，胚胎发育会重演进化的过程；因为观察发现胚胎发育会重演进化的过程，所以进化论成立。”逻辑上讲，这仍然是用假说证明假说的“循环论证”。

1997年，英国科学家理察逊和多家实验室合作，收集更多种系的动物，观察它们在各个胚胎发育期的形态。他们发现海克尔的图谱不是基于事实的描述，“我们的研究严重削弱了海克尔图形的可信性，海克尔图形与其说是显示脊椎动物胚胎发育过程中一个相似时期，不如说是按固定程序设计的胚胎。”权威的《科学》杂志于1997年专门就此事发表了一篇综述（Science 1997, 277:5331）。那么，为什么海克尔和理察逊的研究结论差异如此之大呢？原来，海克尔有意选择形态上比较相近的动物胚胎，比如他用水生的蝾螈代表两栖类，而不用青蛙，因为蝾螈本身更像鱼。又如早期鸡的胚胎其眼球是没有色素的，但海克尔把它涂黑，使得鸡的胚胎和其他动物胚胎更相似。海克尔特别对人的胚胎图作了艺术加工，去掉了人胚胎的内脏部分和腿，就成了一个有尾巴，类似鱼的胚胎。

随着遗传学的出现和分子生物学的发展，特别是对基因的深入研究，重演论在理论上面临着空前的危机。现在公认基因突变是进化的原因。既然过去的基因已经突变成新基因了，怎么还重现过去的特征呢？

（2）概率计算否定了进化论的核心——基因突变机制

就可以为强行灌输无神论铺平道路,以便于把自己打扮成至高无上的人间救主;另一方面是因为进化论可以为“阶级斗争”的理论提供支持。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清楚的说明进化论与信仰的关系:“现在我们以进化的概念来看宇宙,再也没有空间容纳一位创造者或统治者了。”(《马克思、恩格斯论宗教》)马克思又说,“达尔文的著作非常重要,它从自然科学的角度支持了人类历史上的阶级斗争,完全符合我的观点。”恩格斯也说,“(进化论是)十九世纪三大科学发现之一……优越的无产阶级将赢得这场生存斗争。”

人类自有了理性思考以后,就一直在追寻“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这样一个永恒的根本问题。在消灭各种宗教信仰之后,进化论就成了中共唯一能够用来解释生命起源的学说。在网上做一个搜索,往往会发现许多中学教师对于生物教材中“生命起源和生物进化”一章这样分析:“对于学生形成生物进化的观点,树立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有重要意义。”因而中共在铲除中国敬畏天命的传统文化的同时,把进化论作为解释生命起源的“唯一真理”,以“科学”的名义在中国强行灌输。今天的许多中国人在谈到信仰的时候,都会不假思索的声称,“我是信仰无神论的,我是相信进化论的。”抛开无神论、进化论本身的是非对错之争不谈,事实上对于绝大部分中国人来说,对于无神论的“信仰”,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信仰。信仰是自由心灵的选择,是相对于“不信仰”而言的,但在中共的强权之下,谁不信仰“无神论”,谁不信进化论就面临着“封建迷信”、“愚昧”、“误国误民”、“反科学”等等可怕的政治帽子,就面临着被划离“广大人民群众”而成为“一小撮”另类的“改造对象”。在这种环境下,根本谈不上自由抉择的权利,还有什么信仰可言呢?

2) 进化论是未经证实的假说

一八五九年,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根据一些零散的事例,唐突的提出了生物进化的假说,认为今天复杂的生物界是从简单的原始生物一步步进化而来。然而随着科学深入广泛的发展,大量的事实发现对进化论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1) 脆弱的逻辑基础

许多人都很熟悉“返祖现象”。在人民教育出版社网站的“初中生物教学资源”中这样写道,“在人类,偶然会看到有短尾的孩子、长毛的人、多乳头的女子等等,这些现象表明,人类的祖先可能是有尾的、长毛的、多乳头的动物。所以返祖现象也是生物进化的一种证据。”要按这种逻辑,婴儿无脑的畸形更多,那人的祖先就没有大脑了?先天肢体残缺的、多长手指、脚趾的也常见,那么人的肢体就是从各种畸形进化来的?跳出进化论的思想框框一想,就会发现所谓的“返祖现象”只是畸形或缺陷而已,是基因病变的反映,和人类祖先联系在一起是没有道理的。

科学上,如果一个理论的证明违背逻辑,这个理论就不能成立,但是人们对进化论的逻辑错误却不深究,也是因为深究起来,就没有证据可言了。许多人听到这话感到很惊讶。其实,问题的揭示会使人更惊讶。

比较解剖学证据是进化论的三大主要证据之一。按照比较解剖学,哺乳类中老鼠的爪子、蝙蝠的翅膀、海豚的鳍足和人的手,均有相似的骨骼结构,因此达尔文推断它们从同一远祖遗传而来,只是进化过程中因为功用不同而分化出不同的外形。很显然,用比较解剖学证据来论证进化论,存在逻辑上的漏洞,因为从同一祖先的假设,逻辑上可以推断出四肢骨骼结构相似的结论,但反过来却不一定。正如冰箱制冷可以使水结冰,不等于水结冰一定是由于冰箱制冷。

古生物化石也是进化论的三大主要证据之一。然而进化论支持者以古生物化

中华大地的山川秀丽、物产丰饶跟共产党并没有什么关系,如果有,也是被破坏的关系。可是这么一唱,毫无逻辑关系的两件事物之间被强行扯上了关系,人们因为热爱祖国的自然风物,好像也对共产党充满了好感和感恩情绪。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5) 相声、曲艺、小品的独特作用

中共发动政治运动不是从摆事实、讲道理开始(因为如果能够摆出事实、讲出道理的话,它也就不需要发动政治运动了),而是往往首先进行人身攻击,用粗鄙的想像编造迎合人的阴暗心理的妖魔化故事,从而达到挑起仇恨的目的。实践证明,这种栽赃法,十分有效,屡试不爽。

比如文革时,很多人根本不懂得为什么刘少奇是叛徒、内奸、工贼,于是中共散布谣言,说刘的老婆王光美为了自己的皮肤好用牛奶洗澡。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能喝上牛奶都是了不得的,而刘少奇的家属用牛奶洗澡!于是人们根本不需要知道为什么刘少奇是叛徒、内奸、工贼,就可以对他切齿痛恨、鄙夷不屑了。

基于同样的道理,戏曲、相声和小品等文艺形式在贬低传统人物和传统文化、打击中共的敌人方面,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五十年代的很多相声都是讲破除“封建迷信”的,很多传统文化中的观念和风俗都在被讽刺挖苦之列,比如婚俗、阴阳的观念、宗教信仰等。很多人都会记得,在一个流传极广的相声里,一位老太太请来一尊神像,邻家的小伙子问:“您是多少钱买的?”老太太教训他:“不能用买,要说请。”小伙子改口说,“那您是多少钱请的?”老太太心疼地说,“噫,就他妈这么个玩意儿,八毛!”善男信女被丑化为庸俗功利的愚夫愚妇。

2001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有一个小品《卖拐》,就是间接地诽谤法轮功的。小品演出后,各地报纸纷纷发表文章,藉机打击法轮功。比如《检查日报》上《从春节晚会小品〈卖拐〉看“法轮功”伎俩》,《云南日报》评论春晚,中间提到《卖拐》,说“鞭答法轮功,表演很到位”,被大量转载的网络文章《由赵本山〈卖拐〉看心理暗示》也落脚到揭批法轮功上。

这种手法的危害在于,它不是说某一事物或观点是错的,而是把它荒诞化、漫画化,使人根本没有机会去理智思考这一事物的是非对错。被抹黑者的辩白被淹没在观众的哄堂大笑之中。

(6) 中共文艺作品里渗透着强烈的激情和战斗性

孔子曾说过,“郑声淫。”意思是说,郑这个地方的音乐,溢出了人的情志以外,是一种夸张虚伪的艺术,对人的道德有负面影响。中国古人重视艺术对世道人心的作用,讲究用理性节制情欲,用艺术辅助和谐的人生。

中共的理论宣传和文艺作品里渗透着强烈的激情和战斗性:样板戏的原则是“三突出”;塑造人物要“高、大、全”;革命歌曲的风格是“高、快、响”,犹嫌不够,在歌谱上还要加上“豪迈地”、“激昂地”、“意气风发地”等风格提示。就像总喝烈性酒的人,无法体味茶的隽永;听惯了重金属摇滚乐的耳朵,很难欣赏优雅的古琴曲,习惯了中共艺术的人们,也失去了对艺术的正常品味,以为中共艺术里那种强烈的激情和战斗性是人类的常态,殊不知那恰恰是人的魔性的体现。

另外一个例子是颜色的运用。红色是血的颜色。在传统艺术里或在生活里,红色只能作为点缀,不能够大面积使用,因为它会使别的颜色都显不出来。可是在中共的舞台艺术里,红色的服装、红色的布景、红旗、红灯笼、红道具,整个舞台一片红通

通。其实,中共在激发、诱导人的魔性,在使人适应这种魔性的状态。

这种不理性的状态是中共得以存在的社会心理条件。中共虽然现在不提“不断革命”的理论了,但它的本质决定了它从斗争中吸取能量,把革命当成常态,拿运动当饭吃,把穷折腾当日子过,一旦遇到危机,首先想到的是制造一个敌人,再煽动人们和这个假想敌斗争。如果中国人都平和理性地决定自己做什么不做什么,没人跟中共瞎跑,中共就没戏可唱了。由此可见,让观众心血冲头、激情澎湃,是党文艺的重要职能之一。

以上简单分析了中共利用多种艺术形式灌输党文化所涉及到的一些问题。相信每个读者都会举一反三,自己举出大量的例子。

结语

综上所述,中共灌输党文化具有强制性、制度性、系统性、伪善性等特点。让我们再一起分析一下中共灌输手段的三个主要特征。

第一,党文化是一个由中共在总体上掌控的自我调适系统,因此中共的灌输手段也具有自我调适的特征。中共只要政权在握,设定极少的初始条件,党文化宣传品就可以按部就班地自动生成出来。

毛泽东在 1964 年说过一段话:“要把唱戏的,写诗的,文学家,戏剧家赶出城,统统都轰下去……不下去写不出东西来,谁不下去不给他开饭,下去了再开饭。”中共的文艺理论书可谓汗牛塞屋,哪本书也没有这段话说得透彻:谁不听话不给谁饭吃。中共掌握了一切生产生活资料,掌握了中国人民的生杀予夺大权,所有人都必须俯首听命。知识份子和艺术家被编在文联、作家协会、戏剧家协会、曲艺家协会、美术家协会、音乐家协会里,在人屋檐下,不得不低头。所以“党”并不需要自己动手制造党文化,党只要决定“坚持某某,反对某某”,党文化宣传品就可以被源源不断地制造出来。同理,每次国内外形势发生变动,中共不得不调整政策时,只需对宣传部门发布一些简单的指令,宣传部门就可以“创造性”地实现长官的意图。高等院校的传播学院、新闻学院、艺术学院等,更是可以大批量制造出“社会主义新闻学”、“马列主义舆论学”、“中国特色的文艺学”等等,为中宣部支招和辩护。

第二,中共的党文化灌输是以暴力为依托、以利益为诱饵的。对顺从的人中共动辄施以小恩小惠,可是对于那些思想独立、不愿与“党”保持一致的人,中共的政策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在中共统治下,人们时时刻刻都能感受到“无产阶级铁拳”的巨大威胁,因此如果听信和中共宣传口径不同的话,就得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另一方面,一个人如果接受了真相,一定会想做点什么以改变现状,可往往又没有那么大勇气,这种矛盾心理就会使他十分痛苦。在中共的恩威并施下,为了自我保全和心理平衡,人们只好从真相退却,主动把自己闭锁在中共的谎言圈套里。因此,很多时候人们不是看不破中共的谎言,也不是没有机会了解真相,而是不敢接受真相,毋宁相信中共的谎言,配合中共欺骗自己的良心,来换取一点可怜的安全感和良心的虚假安稳。

第三,党文化是一种附体文化,因此中共的灌输手段具有民族文化的某些表面形式。上文已经探讨过,党文化是如何附体在民族文化之上,增加欺骗性、增强宣传效果的。附体的另外一个效果是,当中共的罪恶越来越多地被揭露出来,中共可以方

愿意看到战争,对穆斯林女学生勇敢地穿着民族服装而感到骄傲。女侍者一离开,女学生就哭了……一位巴勒斯坦裔医生说,911 之后的第一个星期五,他去清真寺祷告,内心的疑惧却挥之不去,害怕被人辱骂,等他到了清真寺,发现门口集结着五十多个基督教的牧师与教徒,他们打着表示团结和联合的横幅……这位巴勒斯坦医生说:“他们令我感到安慰和看到了和平。美国的强大不在于她的军事和科学的领先,而在于珍藏于这个国家大多数人民心中的伟大精神。”

美国人这种爱国方式,或许能给我们一点启示。在中共党文化熏陶下,许多人心目中的“爱国”,已经和“仇恨”画上了等号。一个简单的常识是,不论仇日或仇美,都不可能是中华民族强大的精神来源。美国作为一个多民族的移民国家,也许优势就来源于其对各种不同的文化的兼容并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传统文化中的美德。摒弃“战天、斗地、整人”的党文化,回归和谐相处之道,这才是民族强大的精神之源。

4、灌输进化论与现代科学

1) 灌输进化论的真实目的——推行无神论和斗争哲学

一九六八年的一个夏天,一位名叫威廉·米斯特的美国业余化石专家在位于犹他州附近,也是以三叶虫化石闻名的羚羊泉敲开了一片化石,赫然发现一个完整的鞋印就踩在一只三叶虫上。三叶虫是一种生长于六亿年前至二亿多年前的生物,换句话说,在这久远的历史时期之前,是不是有着和我们一样的人类文明存在?

一八四四年,以发现反射偏光“布鲁斯特法则”闻名的布鲁斯特爵士在英国科学发展协会发表了一篇报告(Report of Meeting of the British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 Vol. 14.),引起了很大的轰动。报告中提到,在英国北部靠近 Inchyra 的 Kindgoodie 采石场挖掘出的一块沙石岩中,居然有一枚钉子的一半埋在里面。这枚钉子虽已被腐蚀了,但仍然能辨别出来。1985 年,这块沙石岩经测定后发现至少有四千万年历史。那么是谁在古老岩层里留下的钉子呢?

在 2001 年进行的一次关于人类起源和发展的盖洛普民意调查中,1000 名美国人被要求选择与自己看法最接近的观点。调查显示,45%的人选择了“上帝在过去 1 万左右年创造了今天的人类”,37%的人选择了“人类从比较原始的形态经过上百万年的演化而来,而上帝主导着这一过程”,12%选择了“人类从比较原始的形态经过上百万年的演化而来,并且上帝与这一过程无关”,剩下 6%的人表示没有观点或无任何倾向。在另一项由美国裴优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于 2005 年 7 月进行的调查表明,63%的美国人愿意接受学校在教授进化论的同时,也教授宗教的创世论,38%的人干脆主张学校只教授创世论,不教进化论。

许多来自中国大陆的读者都会对上述调查结果感到非常惊讶。其实在信仰自由的西方国家,不接受进化论的大有人在,而与中共党文化的思维定势相反,这并没有导致这些国家落后、愚昧。事实上这些国家的文明发展恰恰与其开放宽容的自由思想氛围密切相关。进化论来自于西方,但当今相信进化论的人中,比例最大的是中国、前苏联和原来的东欧前共产国家。这些国家的共同特点是:国家权力被用来禁止对神的信仰和灌输无神论。中共自从 1949 年以后就一直在持续地压制和迫害各种宗教信仰的同时,强制性地灌输“进化论”,以至于许多国人不仅自己把“进化论”奉为金科玉律,而且当然地认为普世皆然。

中共向民众灌输进化论,一方面是出于维护自己的极权统治的目的,因为这样

族领袖共同请求为唐太宗上尊号“天可汗”。历史上吐蕃（今藏族）曾经是一个剽悍好战的游牧民族，与中原时有征战发生。然而唐朝几次战胜吐蕃以后，反而派出文成公主和亲。文成公主将农业和佛教传播到吐蕃，此后数十年中，吐蕃与大唐和睦相处，这不能不说是文教之功。很显然，赶尽杀绝只会加剧仇怨，边疆地区仍不安定，战争还会再起。正是唐朝对突厥的宽容政策、对回纥、粟末靺鞨、南诏等族首领所采取的册封政策、及对吐蕃的和亲政策赢得了人心，一时间四夷宾服，诸国来朝，即使远如波斯、昭武九姓国、阆国等等都自愿纳地成为唐朝府州。在文化上，唐朝尊道、礼佛、崇儒，实行开明的“三教”并立政策。也正是这种宽松、自由的思想环境，造就了唐代恢宏的文化气象。

中华民族向来讲究“和为贵”，推崇中庸之道。我们的祖先赋予自己以教化天下，即所谓“平天下”的神圣历史使命。从根本上说，实现“平天下”的理想所要仰赖的不是武功，而是文治；它所要实行的也不是霸道，而是王道。所谓“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在5千年的中华历史中，尽管华夏民族也曾历经各种灾难，但它在同化周边各族群的过程中，毕竟已将它们凝聚、融合而为“泛中华”的文化大国。历史上蒙古族、满族都曾入侵、统治过中原，然而最终却被强大的中华文化所同化，蒙古族、满族如今都成了中华民族的一部分，清朝的康熙皇帝自己就说要做中华的千古一帝。

党文化不但在纵向割断了中华民族祖辈承传的智慧，同时也在横向以敌视的态度对待西方的优秀文明。这就使得受其熏陶的中国人只能相信党文化中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机关枪、大炮是最有权威的东西”（恩格斯），“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摧毁”（马克思）。中国人有句古话，可以马上得天下，不可以马上治天下。历史上用枪杆子夺取政权的例子不少，但用枪杆子对付本国的百姓以维持政权，并最终使得民众彼此内斗，使得社会中的个体都自然而然的把暴力作为解决矛盾的第一手段，这恐怕是中共的“独创”了。

尽管中共今天也提出所谓“和谐社会”，但其真实目的，其实是希望社会底层民众不要再上访、不再为自己应有的权利合法抗争，希望民众不要对中共的腐败而发出批评意见，其根本目的还是维护中共的统治。这种党文化包装下的所谓“和谐”不过是中共装点门面的需要，与传统文化中的“和为贵”截然不同。

事实上，采用暴力的手段来解决人类的社会矛盾，往往最终付出的社会成本大于收益。几十年的流血斗争，已经给中国社会带来难以愈合的创伤。矛盾的双方除了你死我活的斗争关系，还可以表现为共生关系、和谐关系，而斗争关系是最有破坏性的一种。上世纪60年代美国的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所领导的民权运动，并未用一枪一炮，却争取到了黑人、乃至一切白人、有色人种的平等权利，改变了美国历史；被印度人尊为国父的圣雄甘地，用和平理性的方式争取了印度民族的独立，为人类留下了很好的典范。

美国受到911恐怖攻击之后，一些地方出现了袭击和骚扰阿拉伯裔移民的个案。马里兰州的清真寺被人抹上涂鸦，一高中女教师便联络几个朋友在这座清真寺外为伊斯兰教徒站了一个礼拜的夜岗；俄亥俄州的伊斯兰中心收到了非穆斯林美国公民的捐款；许多不同肤色的妇女，穿上了穆斯林妇女的披肩和头巾上街，以表达她们对不同宗教信仰和不同文化的族群的尊敬和支持；911事件之后四天，一名穆斯林女学生戴着头巾和两个非阿拉伯裔的同学到先付款的自助餐厅吃饭，落座不久，女侍者走过来，二十三岁的穆斯林女学生以为“她要赶我们走”，原来女侍者是来退还三十美元的餐费，并告知餐厅决定给她们提供免费餐。女侍者还说自己不

便地把责任一股脑推到传统文化上，比如让所谓“封建遗毒”为文化大革命负责。这就好像张三杀死了李四，然后披着李四的衣服去犯罪，结果人们误以为做坏事的是李四，于是把李四掘坟鞭尸，却让真正的坏人逍遥法外。

我们不得不遗憾地承认，中共灌输党文化的巨大工程十分成功。这是因为，第一，中共的灌输以暴力手段做后盾，它的所谓思想改造不仅仅改造思想，很多时候，它还会去改造人的肉体（批斗、劳改、判刑、直至杀害）；第二，中共垄断了一切社会资源，在中共统治下，要想出人头地、取得成就，就不能不对中共俯首听命，因此各行各业的优秀人才大多被中共网罗来为其统治服务；第三，中共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制造了一个封闭的环境（现在是半封闭），人们无从获得完备的外部信息；第四，它的“思想政治工作”不仅仅停留在书本上，而是把所有人都推进“革命的大熔炉”里，用频繁的政治运动给他们留下刻骨铭心的印象；第五，中共按照马列毛那一套制造了一个社会现实，反过来显得那套理论是正确的。比如斗争的观念就是经过几十年几乎不间断的残酷斗争建立起来的，斗争成了中国老百姓的生活现实，所以斗争哲学也好像是对的。

人之为人，是因为有人的道德准则、行为规范和思想感情。共产党劫持整个国家的力量，千方百计扼杀人先天的纯真善良，向人们灌输变异邪恶的思想情感。如果把一个人的思想比作一个瓶子的话，那么瓶子的性质取决于其内容：灌进去蜂蜜就是一瓶蜂蜜，灌进去毒药就是一瓶毒药。每个中国人都不妨反思一下：在人生重大问题上，决定你的选择的，是自己的本性，还是被中共灌输的观念？那些邪党灌输的观念将把你带向什么样的未来？

常言道，“故土难离”。长期生活在一个环境中的人，会对那个环境产生一种眷恋。同理，长期浸泡在党文化中的人们，对这种文化也会产生一种精神依附和感情依附。当我们指出这种文化的虚假和邪恶，并且开始清除它的时候，有人甚至觉得怅然若失。

可是，党文化是中共赖以存在的人文环境。今天，当我们看清了中共历史上对中华民族犯下的滔天大罪，看到了中共正在把整个民族拖进万劫不复的深渊，我们不能不悚然惊觉，继而叩问自己的良知：是什么样的弱点使我们容忍了中共在中国的肆虐？现在的情形还允许我们继续容忍下去吗？这个问题，对于我们民族的未来，对于我们每个人的未来，都至关重要。

反思党文化，解体党文化，我们才能走向美好的明天。

第四章 被改造思想后人们的表现

站在未来回首今天的人类历史,人们会真实地看到共产邪灵肆虐中华大地的那一幕幕触目惊心、喧嚣闹腾和血雨腥风。在短短几十年里,在神州的土地上,共产党以一次一次的杀头,一轮一轮的批判,一波一波的灌输,构建起了一个同我们的传统格格不入的“党文化”部落。在这个部落里,共产党宣传无神论,宣传唯物论,否定传统的神传文化,宣传马恩列斯毛的伟大,从而系统的替代传统文化;在这个部落里,共产党批判儒释道,批判传统观念,灌输斗争思想、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邪说,为其政治目的而灌输进化论与现代科学,从而进行系统的思想改造;在这个部落里,共产党更是利用无所不在的灌输手段,从宣传机器到教科书,从犬儒文人到各种文艺形式,彻底把人洗脑了。呜呼!血染神州,山河色变。五千年神传文化之根被切断了,人们不再认华夏始祖,而是甘做马列子孙,在短短的时间内,共产党真的把人们的思想彻底改造了。

有一个笑话说大学考试题目是“请谈谈对世界一些国家粮食短缺的个人看法”,结果美国的考生不知道什么叫“短缺”,北韩的考生不知道什么叫“粮食”,而中国的考生不知道什么叫“个人看法”。这个笑话反映出我们中国民众在中共几十年的宣传和高压以及运动实践中,“个人思想”成了稀有物。

思想控制着人的语言、人的行为和人的再思想。被改造思想后人们的表现当然就同原来的本性大相径庭了——人们习惯于用恶党的思想思考问题,用恶党教会的语言说话;不信神,做什么事都不计后果,什么坏事都敢做;天不怕地不怕,满嘴脏话,行为低下;目前的中国,人,去掉党文化,都已经不会讲正常人的话,不会用正常人的思维了。

有人想,这是不是说得太过分了?至少,共产党自己都在嘲笑过去,现在同过去应该是有很大的不同了吧?

1979 年是个分水岭。谈论起前三十年的历史,人们会觉得那时真是荒唐可笑,说起现在,觉得已经很正常了。是的,人们不再相信共产主义了,人们不再讲“磨一手老茧,滚一身泥巴”了,人们甚至也高喊要恢复“传统文化”了……但是,党文化本身并没有改变,而是更臻成熟。党文化的理论体系无神论、唯物论、进化论和斗争哲学,依然是中共的基石和被思想改造后人们的“科学共识”,党文化依赖的灌输手段依然没有收敛,随着电视的推广,变得更加容易用“声情并茂”来改造人们的思想,而面对互联网的普及,中共比任何时候都更热衷于封网、过滤和监控。中共的所谓恢复“传统文化”,是在抽掉传统文化的内涵之后,今天又按照党文化的无神论、唯物论等思维模式来盗用传统,完全是为了现在人们追逐经济利益和国际认同这个根本目的来恢复的,这恢复的当然不是我们真正的传统文化,相反,这是继第一次对传统文化的神韵施行阉割之后,对传统文化的表面内容进行的第二次阉割。

所以,无论过去,还是现在,被改造思想后的人们都有着同样的表现。



亲人被定为“党的敌人”后,家属必须表明立场,不能含混。章伯钧被打成右派以后,他的儿子、妹妹都在报纸上发表文章进行批判。另一个毛泽东亲自指定的右派储安平的儿子则这样教训自己的父亲:“我要给储安平先生一句忠言:希望你及时悬崖勒马,好好地倾听人民的意见,挖掘自己反社会主义思想根源,彻底交待自己的问题,以免自绝于人民。”

于是乎,一方面人们在一次次斗争中被强灌斗争思想,另一方面又正是在这样一次次“触及灵魂”的斗争中,为了生存,人们被迫学会了用厚厚的冷漠包裹自己的良知,学会了唯有打击、整垮别人,才能保全自己,不少人由此认定“弱肉强食,适者生存”便是真实的生活的法则。

被中共禁演的电影《蓝风筝》里有这样一个基于真实故事的情节:反右开始了。主人翁铁头的父亲林少龙的单位摊上了一个右派指标,大伙不得不讨论决定这顶帽子该给谁戴上,完不成指标就别想散会。但少龙却在这个关键的时刻起身离场——他要去上厕所,在那一刻,也许他认为上厕所比开会更重要。于是,等他推门回来的时候,已经被“推举”为右派了。

既然在“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中,人们已经练就了完全越过道德底线,践踏别人、保全自己的厚黑术,那么今天在同样“你死我活”的商战中,腐败贪污、假冒伪劣、毫无顾忌地损害他人等等行为迅速充斥其中也就毫不奇怪了。因为这其中的哲学依据都是一样的,即“弱肉强食,适者生存”。

今天的人们习惯于用“成功”与否作为衡量个人价值的唯一标准,而不论其采用了何种手段。所以攀上“款爷”、“老总”是女人的目标,身边簇拥着漂亮女人是男人的风光,孩子考上名牌大学是家长唯一的期望。在这种斗争哲学里,“成功”是建立在他人的“失败”基础上。这里没有良知与公义,也没有是与非、善与恶,剩下的只是成与败:成功便是好的,失败便是劣的,于是人人都想争做“老大”。是故血泪工厂比比皆是,民工待遇惨不忍睹;有毒变质商品充斥市场,“为富不仁”被视为理所当然;能够弄权枉法仍逍遥法外者,则被视为“背景硬”、“关系铁”……在党文化“弱肉强食、适者生存”邪说的灌输下,中国人互相争斗、彼此猜忌,整个社会成为一盘散沙,一群无凝聚力的民众更便于中共的极权统治。

3) 回归和谐相处之道

2005 年“狼文化”风靡全国。跟风“狼文化”的一本书,《狼魂》中说:“不学狼不行吗?不行。为什么呢?因为,在你死我活的生存竞争中,在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市场角逐中,如果心存善良,对竞争对手一味地心慈手软,那么就会被对方毫不留情地吃掉”。这可以说是深得党文化斗争思想之精髓了。

这里有一个例子可以与上述思想作为对比。林肯作为美国总统,他对政敌的友好态度曾引起了一位官员的不满。他批评林肯不应该试图跟那些人做朋友,而应该消灭他们。“当他们变成我的朋友时,”林肯十分温和地说,“难道我不是在消灭敌人吗?”

中国人有句古训,“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中华历史上最强盛的盛唐时期,在思想、文化、国力、疆土等方面几乎都达到了鼎盛,这和大唐文化包容一切的气度是分不开的。唐初突厥曾经为患北方多年,唐高祖为了国家安宁都不得不向突厥称臣。然而唐太宗打败突厥后,并未赶尽杀绝以雪父耻,反而极其包容地任用了一百多名曾经与大唐为敌的突厥降将,担任五品以上的将军和中郎将,约占朝廷武官之半。同时唐朝还允许归降的突厥人迁入中原。这些举措深得各少数民族的信任,西北各

不畏权贵秉公执法，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尽管历来受百姓尊重和爱戴，但是因为海瑞属于“剥削阶级”，“是地主阶级利益忠心的保卫者”，所以中共认为他为百姓所做的一切好事都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因而文革一开始就被批倒批臭；国民政府在南京修建的“航空烈士公墓”，安葬了抗日战争中牺牲于全国各地的一百多名空军烈士，以及为中国抗战献身的美国教官、苏联飞行员。但因为他们为“反动政府”效命，文革一开始，毛泽东的红卫兵便开到公墓，将烈士墓彻底捣毁。烈士的骸骨从此全部被丢弃失散。

对于共产党来说斗争性就是革命性。矛盾和冲突的存在是好事而不是坏事，因为它们“是革命的种子”，而历史就是在斗争中前进的（不过今天的中共，则开始害怕人民用革命一词。）。但是斗争性并不是人的先天本性，所以共产党认为群众的“革命觉悟”需要启发，要不断“教育”以提高他们的“革命觉悟”，并为此不惜采用欺骗手段故意制造矛盾和冲突。

比如“白毛女”原本是民间传说中的一个惩恶扬善的仙姑，为了“教育”人民而被塑造成为“苦大仇深”的被压迫阶级典型。戏中贯穿复仇思想——“千年的仇要报，万年的冤要伸”，由于它的煽动性太强，竟然发生过士兵观看演出的时候举枪差点打死“黄世仁”的事件。

所谓“启发阶级觉悟”，所谓“培养阶级感情”，实际上就是灌输斗争思想、宣传仇恨，在过去中共毫不隐讳的宣传：“血债要用血来偿”，“仇恨入心要发芽”，“牢记血泪史，不忘阶级仇”。随着国门的开放，这种在文明社会被普遍唾弃的仇恨宣传不能再明目张胆的进行了。虽然中共不再搞“痛说家史”，“忆苦思甜”，但这并不意味中共放弃这一手段了，而是它改变了面目，并利用现代科技进行了精致的包装。比如2001年8月14日，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在联合国会议上发表正式声明，指出中共反复宣传的所谓“天安门自焚案”就是一个精心包装的骗局，目的就是为了煽动民众对法轮功的仇恨。

在中共历史上一个接一个的运动中，在一波接一波的疯狂宣传中，人们不知不觉地充满了对共产党划分的敌人的“刻骨仇恨”，这敌人是“地主”、“资本家”、“富农”，“反革命”，“右派”，“走资派”，“民运分子”，“邪教分子”……“革命觉悟”就体现在对“敌人”的刻骨仇恨上，学习雷锋精神，要对敌人像严冬一样冷酷无情，这叫做“阶级感情”，它超越于人类一切感情。毛泽东讲：“对打人也要进行阶级分析，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好人光荣；好人打好人误会。”毛的这一讲话文革中在“红卫兵”中曾广为流传。既然对“阶级敌人”的暴力是他们“活该”，暴力和血腥于是很快就遍布中原大地了。

按照“革命者”的阶级感情，刘少奇既然反对人民的“大救星”，那你就“死有余辜”，张志新既然替死有余辜的刘少奇翻案，她就“活该”被狱警轮奸，被割断喉管，被处决就是“罪有应得”——雷锋的“对敌人的残酷无情”在这里有了最真实的写照。

北京“红八月”里那些被自己教过的学生亲手打死的老师，也许没有想到，正是自己按照“党”的要求教学生们“对敌人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夺过鞭子抽敌人”的时候，告诉学生对阶级敌人怎么做都不过分的时候，埋下了自己灭顶的种子。

在群众批斗场合，人人争先恐后表现自己的阶级性。一个人越是表现出有“刻骨仇恨”便越是说明爱憎分明、阶级觉悟高，反之则有“阶级立场不稳”的可怕嫌疑。

1、用恶党的思想思考问题，用恶党教会的语言说话

虽然替代传统文化和改造人们思想是中共几十年一以贯之的政策，但是，中共在不同时期的思想和语言却是变化无常的。从“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到不得不“摸着石头过河”，从“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到“不管白猫黑猫”，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呀，就是好”到“旗帜鲜明地制止‘动乱’”，从“越穷越光荣”到“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笑贫不笑娼”，从歌颂“张铁生交白卷”到现在学术界为求名利而大行其道的“学术腐败”，从昔日的“禁欲主义”到今天的“纵欲主义”……中共政策之出尔反尔，真可谓令人眼花缭乱。

但是，人们的思想被党文化改造之后的表现就是，不管党的思想怎么变，人们总是盲目地跟着变，总是用恶党的思想思考问题，用恶党教会的语言说话，从而总是维护着恶党的统治。

在那“一句顶一万句”的时代，说用恶党的思想思考问题，人们是相信的。“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人民公社好”，“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斗私批修”，“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抓革命，促生产”，“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走狗”……那时就一个声音，人们觉得当然就只会跟随恶党的思想和语言来思考来说话。

现在信息传递这么快，这么多，言论也比起过去不知宽松了多少，老百姓都敢骂几声共产党了，人们都在做独立思考状，怎么能说还是用恶党的思想思考问题呢？

今天谁还能控制人们的思想吗？

那么我们看看今天的人们都在想什么：“没有共产党，中国怎么办”，“中国不能搞民主，一搞就乱”，“不要揪住共产党的过去不放，要一切向前看”，“给共产党时间，民主自由早晚会到来”，“人权就是温饱权，饭还吃不饱，讲什么人权”，“什么宗教信仰，哪有神，要破除迷信，崇尚科学”，“坏事都是个别人的素质问题，党本身是好的”，“国家这么大，换谁不一样？”，“谁反对共产党，那就是搞政治，就是被人利用”，“胳膊拧不过大腿，闹什么闹？”，“稳定压倒一切”，“把经济搞上去再说”……等等，人们普遍认为这些观点是自己独立理性的思考，而非来自中共的片面灌输。

人们真的是在做独立理性的思考吗？其实不然。大家想想，上面那些观点，一个不落的都是共产党为维持统治而宣传灌输、处心积虑地要让人们去接受的东西。只不过“造反有理”变成了“（党的）稳定压倒一切”。可以说，在人们认为已经摆脱了盲目崇拜，并觉得对共产党的思想控制有了免疫力的时候，党文化正牢牢地掌握着人们的思维模式，只是在前三十年，人们的思想更多的是被党直接灌输所致，而今天的人们经过多年的折腾后，不再“盲目”，觉得自己能“独立”、“理性”地思考了。

从被动灌输到主动思考后自律——骂着拥护共产党

不幸的是，在这个思考过程中，思考的理论体系仍然是共产党给予的，思考的信息来源仍然是共产党控制的，所谓的“独立”不过是在党文化框框中的“独立”，所谓的“理性”也不过是在党文化理论体系中的“理性”，很显然，这样思考后得出的结果当然就是共产党所期望得的结果。

为什么人们“独立”地思考独立不起来呢？有下面几个因素。

1) “独立思考”中的党妈妈情结

“党就是一切、党就是母亲”，“命是党给的”，“饭是党给的”，这种“母子情”数十年来早已深入人心。虽然现在不像过去那样露骨的高唱“党啊，亲爱的妈妈”，但是，党无处不在、至高无上的威权，对人们衣食饭钵的控制，依然让人觉得“国家就是党的”，“饭碗是党给的”，“共产党是中华民族的唯一选择”，把党、国家、民族等概念混在一起，整个生活环境似乎都是党建造、赐予、维持的。这成为了人们思考中国问题的一个底线，就是不能越过共产党，想像不出没有党的日子该怎么过了。外界的人很难理解这种心态，孩子大了，不就远走高飞了吗？可是，党文化的封闭式高压式环境是让人可以老，思想却长不大，那孩子能离开母亲吗？

2) “独立思考”的理论基础

人们思考问题的理论基础仍然是无神论、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进化论、斗争哲学和所谓的科学社会主义，让人不相信在党之外还有“神和天”的存在。人们思考所依赖的基本词汇或者话语系统，仍然被赋予了党文化的含义，都是中共教会的语言，这就使得人们只能在党文化中打转转，人们甚至对于超越了“没有了共产党”这个底线的思维方式感到莫名的恐惧。同时，政治运动依然不断，比如，最近二十几年的反自由化、镇压“六四”和迫害法轮功，每一场这种全国性的政治运动，都是对党文化理论的又一次全面地强化复习。

3) “信息不完整”影响思考过程

人们思考问题的信息来源仍然受到共产党的严密控制，就连负面消息都是在党的精心操控下，有效地转化为维护党天下的素材。俗话说“兼听则明”，一个人得到两个相反的观点，并且认为都有道理的话，他就必须开始自己真正的独立的理性的思考来做取舍。而中共的一言堂和信息封锁、过滤造成“信息严重不完整”，实际上切断了人们做出正确判断的必要条件。再聪明的大脑，再有独立思考的愿望，也逃不出“无米之炊”的尴尬，这样的思考也就谈不上是真正“独立理性”的思考。

4) “强权论”让人的思考不了了之

“共产党是强权，党是残酷的，跟党作对绝没有好下场。”这是人们从几十年的运动得到的共识。就算是痛恨共产党的人，也因为畏惧强权政治，使得在思考的心理上很难越过共产党，觉得“你能把共产党怎么样？”，从而反过来以看破中共红尘的心态去附和中共，也跟着感慨“没有共产党，中国怎么办？”。人们普遍认为的言论宽松的象征——在私底下可以骂共产党了——其实，都是在党文化里骂，在骂中来理解党，最终维护现状，变相地拥护共产党。

影响人们独立思考的因素还很多。这种经过“思考”后仍然跟党一致的现象，比过去的直接灌输更有危害性。一旦认为那些想法是自己的独立“思想”，就会更加相信那些观点，客观上造成更主动跟党一致，自然更便于中共来统治人民。如果说过去是一个被动地被塑造的过程，那么今天就是党文化发酵成熟和人们主动自律的过程。人们从过去的强行灌输到今天的主动自律、配合理解党的政策，“骂着拥护共产党”，正是共产党长期改造人民思想的典型结果。

今天嘲笑昨天用党的思想思考问题的人，明天又会一样嘲笑自己的今天

一个很具讽刺的现象就是，如果把中共的历史分成一个个时代，人们总是站在“现在”的时间点，对党的政策给以拥护，而对“过去”的时间点上的很多事情，给以嘲笑，觉得那时怎么那么荒唐。如果把时间的坐标往过去移动，会发现那个站在今

依靠暴力夺权上台执政的中共，为了给自己贴上“合法政权”标签，常常说“历史选择了中国共产党”，而人民决定历史，所以这也是人民的选择。中共说“历史选择了”它，其隐含的逻辑就是“弱肉强食、适者生存”，因为中共造反成功，而胜利者代表了“历史发展的潮流”。这正是中共热衷于灌输其斗争邪说的原因之一。遗憾的是，这样混淆是非、倒因为果的邪说，无疑等于是说从300多年前中原的汉人“选择了”满族的入侵和清朝的建立，700多年前汉人“选择了”蒙古的入侵。中共的执政历史，也不过才50多年，说历史的选择未免太早了点。

辩证法的思想，并不是马克思的创造。马克思自己也承认其唯物辩证法来源于黑格尔，而後者的思想则是受中国古代辩证思维的启发。事实上中国古代的《易经》、八卦、河图、《黄帝内经》、《孙子兵法》等，无不充满辩证思维的智慧。一部《易经》，就是通过六十四卦，淋漓尽致的展现了在人类所能认识到的宇宙层次中，事物中相对立的两种因素之间相互制约、转化和依存的关系，以及由此而演绎的事物发展规律。这里不仅有事物运动发展中动静之变化，阴阳之消长，五行相生相克等等因素的阐述，还有事物自“潜龙勿用”、“见龙在田”而最终到“飞龙在天”而“亢龙有悔”（《易经·乾卦》）的完整发展历程描述，更有剥复循环、否极泰来的转变规律。马克思在其唯物辩证法中所论述的事物的普遍联系、变化发展、量变质变、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等等，只不过是不同的提法而已。而周易中不但有定性的描述，更有定量的把握。以周易为基础实际运用于人体的中医、运用于军事的古代兵法则具体显示了古代东方的高超智慧。

马克思对于辩证法的所谓“发展”，不过是其特别强调和夸大了斗争性，强化矛盾的对立冲突方面。他主张“对立面的统一是有条件的、暂时的、易逝的、相对的；而相互排斥的对立面的斗争则是绝对的”。所以共产党的理论家们认为斗争性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革命灵魂”。以此为基础，处理社会矛盾的办法，只有斗争，通过斗争而消灭对立面。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之所以热衷于强调斗争性，其实是为了给共产党暴力夺取政权提供理论依据。而其历史唯物主义则认为，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动力，暴力革命是“新社会”的助产婆，把暴力夺权美化成社会的进步因素。毛泽东曾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这句话实际上点到了实处。正因为如此，嗜血好斗的党文化，也是所有共产极权国家动荡不安、冲突不断的根源。当今中国社会人心冷漠、彼此猜忌、无法相互信任和包容也与党文化中的斗争哲学息息相关。

2) 政治斗争中的灌输

中共依靠斗争哲学发家，也依靠斗争哲学维护统治。实际上，正是在中共发起的一次又一次不断的政治斗争中，民众头脑中的斗争思想不断强化。这终于使得原本讲究中庸之道、遵从以和为贵的中华民族，人人都不得不将斗争视作社会常态；将人与人之间充满戒心视为常态；将你争我夺、尔虞我诈视为社会竞争的生存之道。

1951年，中共刚刚建政、立稳脚跟，就开始了所谓知识份子“思想改造”运动。批判电影《武训传》就是中共夺权成功后“思想改造”运动的序幕。这场运动确实基本上按照毛的希望达到了改造知识份子思想的作用。中国人的思想由此而产生了巨大的变异，从此认为衡量善恶的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阶级斗争”。清末行乞办学的武训尽管一生受尽屈辱、节衣缩食只为兴办义学，使贫寒人家的孩子能读书，但就因为他“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毛泽东语），“站错”了阶级立场而被中共批倒批臭；明朝的海瑞

在乔治·奥威尔的名著《动物庄园》中，一群动物不堪人类的“剥削”而起来革命造反，最终赶走了人而建立了一个由动物自己当家作主的“动物庄园”。率先领导动物们进行“革命”的领袖们——猪——不久就取得了单独享用牛奶和苹果的特权。面对当初怀抱“所有动物一律平等”的信念而参加革命的其他动物们的疑惑，斯奎拉（负责宣传的猪）解释说，“我们食用这些东西的唯一目的是要保护我们的健康。……庄园的全部管理和组织工作都要依靠我们。我们夜以继日地为大家的幸福费尽心机。因此，这是为了你们，我们才喝牛奶，才吃苹果的。你们知道吧，万一我们猪失职了，那会发生什么事情呢？琼斯会卷土重来！是的，琼斯会卷土重来！真的，同志们！”琼斯是原来的庄园主，也即“旧社会”的统治者。尽管个别动物还依稀记得琼斯在的时候动物们生活状况似乎不比目前更差，但是经过日复一日的宣传，对于琼斯卷土重来的恐惧，已经条件反射般的深入每个动物的头脑中，因此大家对于猪的特权也就无话可说了。很快地，猪的特权越来越多。而另一方面，如何防范“亡我之心不死”的琼斯卷土重来，特别是揪斗、屠杀与琼斯勾结、破坏庄园建设的动物“叛徒”，则成了动物们日常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在这样的“头等大事”面前，其他的不满和异议都成了不重要的琐事了。而时刻“提高警惕”、“准备战斗”则成了超越一切社会生活最重要的内容了。

奥威尔以寓言的形式，形象而深刻的描绘了极权统治者鼓吹斗争哲学的实质：通过在人们头脑中塑造和保持一个无时不在的敌人，通过时刻强调敌人的危险，强调“团结一致”的必要性，使人们不得不“暂时忍受”极权统治者的一切暴虐行为，以为这种暴行出自于一个良好的愿望，并最终将给民众带来幸福。然而这种斗争总是“长期的、复杂的、艰巨的”，所以人们的“暂时忍受”也就永远没完。

作为中国人，我们都很熟悉这种时刻存在的“危险”，这种“危险”曾经来自于“一小撮蒋帮特务”，来自于“一小撮妄图复辟翻天的地、富、反”，来自于“一小撮猖狂进攻社会主义的右派份子”，来自于“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来自于“一小撮牛鬼蛇神”……这些“危险的敌人”，曾经是我们身边的亲朋、好友、长者、导师、街坊邻居。按照中共“你死我活”的斗争理论指导，他们中一小撮一小撮的被“消灭”，算起来大约已有至少4千万中国人死于非命。

随着岁月的流逝，随着共产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破产，今天中共已经无法向百姓解释清楚，当初这些“人民的敌人”到底危险在哪里？然而不知不觉中，人们发现新的“危险”仍然来自于身边，在民众意识中斗争依旧是必要的。只不过如今“危险的敌人”的罪名悄悄从已经过时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换成了所谓的“危害国家安全”、“颠覆政府”、“反华势力”、“从事X教活动”等等。

这正是中共几十年来向民众灌输斗争思想的结果。实际上几乎在传统的文化被打倒、批臭的同时，当中国人几千年来一贯承传的传统善恶价值观被彻底颠覆的同时，中共就已经开始向民众灌输党文化的是非价值观了。这种价值观的核心之一，便是其“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斗争哲学。

共产党的世界观是建立在阶级斗争的理论上的，其哲学思想是唯物辩证法，主张世界的矛盾性、对立性、斗争性；主张事物内部通过斗争，从量变到质变，事物由此从低级向更高的阶段发展和转化。这种思想应用到人类历史，就是所谓历史唯物主义，即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阶级斗争的历史；斗争的核心是国家政权；国家政权依靠暴力来获得，也依靠暴力来运行和维持。说白了，也就是把达尔文的进化论运用于人类社会，阶级之间通过残酷的斗争，最终弱肉强食，适者（所谓“先进阶级”）生存。

天嘲笑昨天用恶党的思想思考问题的人，站在昨天的位置又是觉得一切都很正常，照样拥护那时党的政策，很可能还在那里嘲笑前天的行为。今天认为共产党可以迫害法轮功的人，倒退三十前，他一样觉得共产党应该发动文化大革命，再往前，他一样觉得大跃进是如何英明正确。

说起“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人们都会嘲笑那时的荒唐。其实，今天的人们一样在用这种逻辑思考问题，只是表现形式不同，自己觉察不到而已。

在连续几年取得农业发展之后，《人民日报》1958年8月27日发表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一文，这是中共中央办公厅派赴山东寿张县了解情况的人写回来的信。文章为了说明亩产万斤“一点也不神秘”，有声有色地描述道，只要足水足肥加深耕加密植，“亩产万斤就成一个现实的事物了。”更有科学家出来根据植物对太阳光能的利用，论证亩产潜力可高达5.85万斤。如今回首当时的言论和行为，都觉得不可思议。

今天，中共的跛足改革使经济有了一些发展，于是在中共的宣传和灌输之下，人们对于中国的未来有了个直线外推的思考模式：现在制造玩具出口，将来就能制造飞机出口；现在是贫富差距，将来是共同富裕；现在有腐败、社会不公、教育和医疗福利等各种问题，将来都会解决；现在环境被污染，将来自然会被治理；现在能源不够，将来一定会有；现在是群体抗争不断，犹如火山要爆发，将来一定会成为“和谐社会”；现在人们的道德日益败坏，将来一定会高尚起来；现在是经济发展，将来一定会有民主自由的制度发展……“二十一世纪将是中国的世纪”，“中国将在本世纪成为雄霸世界的超级大国”——其实，这就是新时代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翻版。

在那个年代，“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造成了“共产风”、“浮夸风”和“瞎指挥风”，把大跃进变成了大后退，人民公社变成了人民空社。今天这种思想的危害绝不亚于当初，而且由于更隐蔽，人们不容易觉察，更重要的是，当初的思想是被灌输的，而今天人们的这种思想却是自己“思考”出来的，危害也就更甚。

其实，“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句话本身很“唯心主义”，不过是表达一种气魄和决心。但是，一旦普通的哲学内涵被灌进了党文化，就变得极具毁灭性了。在极端唯物主义看来，这不再是表达决心，而是要变成实实在在的物件，要的就是亩产指标，层层夸大的指标，是亩产万斤的高产卫星。不信神的共产党，追求的是“敢叫日月换新天”的大无畏精神，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一种莫名的东西冲昏了人们的头。党文化扭曲人性之甚，可见一斑。

昔日“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号角鼓动人们不顾客观规律和现实，要亩产万斤，亩产十多万斤。今天“全面崛起”的鼓噪同样激励着人们面对中国的危机熟视无睹，盲目相信中共。二十几年来的跛足改革带给中国巨大的危机，但人们不去监督中共，不去批评中共，不去反思中共，不去解体中共，而是不作为，甚至反对别人作为，盲目地把一切期望都寄托在造成这一危机的中共身上，期望中共有意愿解决，期望中共有能力解决，认认真真地重新演绎着二十一世纪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人有多大的期望，中共就能有多大的希望”。

对中共的期望悖论：期望等于没有希望

中共历史上几次重大政策的调整，都是因为来自党内党外的巨大压力，感受到了“亡党”的危机才不得已开始了改革。也就是说，只有给中共压力，中共才会改良。光是有期望而不反思中共的历史，不揭露中共现在的恶行，放任中共，附和中共，纵

容中共,中共就不会改良。于是,期望等于没有希望。

可以这么说,在人们盲目的“期望”中,所谓给中共三十年时间的幻想中,社会危机可能已经把中国破坏好几个来回。

更重要的是,“改良”对今天的中共来说,已经太奢侈了,因为中共积累的原罪使它根本不愿、不敢、不会改良了。维护统治地位成为中共保住集团和个人利益的一切底线,在中国警察网上有一句醒目的口号,就是“维护党的执政地位”,如此明目张胆地把警察当作党的家奴,可见共产党是铁了心地“不会从良”,而人们的盲目期望更是给中共增加不愿顺应历史潮流的能量。很显然,今天的中共已经成为理性讨论和解决中国问题的基本障碍,只有把中共解体掉,让中国人民没有后顾之忧地来发挥一切聪明才智,自由讨论国家的方向和前途,民族才真正有希望。

下面我们举一些典型例子来说明今天的人们是如何用恶党的思想和恶党教会的语言来思考问题的。现在人们对共产党的一个最大情结就是这二十几年的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的巨大变化。在这种冲击之下,人们对如何认识共产党,共产党变没变,有没有希望等都变得非常困惑了。

1) 经济表面繁荣带来的视觉冲击:“把经济搞上去再说”

视觉和感官对人的冲击是巨大的。被共产党整怕了、弄穷怕了的中国民众,在生活有了一些改善之后,就很容易满足了。再经过中共一年复一年的“好日子”、“盛世大联欢”的宣传,好像又闹起“赶英超美”,把人们整得飘飘然了,中共乘机浑水摸鱼,用经济的发展来为其执政合法性寻找依据。其实,经济发展同中共毫无关系,功劳属于勤劳的中国人民。有人说,只要有外商投资,只要有智慧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只要有吃苦耐劳的工人和忍辱负重的农民,就是放到非洲小国,也能在二十几年堆出一个繁荣的物质世界。

但是,这样的跛足发展符合民族的长远利益吗?发展的顺序问题,什么先,什么后,相互依赖关系等等,是现代管理中最基本的问题之一。

看看在中国表面繁华的后面是怎样一幅景象。政治改革的停滞,经济体制的畸形,社会的不公,官场的腐败,贫富的差别,道德的堕落,环境的破坏,资源的短缺,对人权、信仰和宗教团体的严厉压制,对民主自由的敌视,对言论和媒体自由的根本钳制,银行坏帐,金融危机,黑社会,娼妓,占大多数人口的弱势群体没有声音等等,以及盘根错节的社会矛盾,风起云涌的民间维权和快速增长的群体性抗争(2005年达8万多起),等等,更别提天有不测风云的大自然的惩罚和报复。在表面繁荣之下的中共政权,犹如坐在火山口上一样。所谓的经济高速增长实际上是以破坏环境和浪费能源为代价的,如果算上环境代价,中国这些年的实际GDP是负增长。

对于中共急功近利的经济畸形发展带来的潜在危机和可能的民族灾难,人们不愿去想,不愿去面对。一是屈服于中共的强权,觉得想也没用,还自找麻烦,二是觉得现在生活总是好了些,哪管这种发展能不能持续,只顾“闷声发大财”。而那些只为赚钱的外商和政客们,看到的只是想要如何从这世界上最后一块市场大饼中分得一杯羹。虽然外界认为经济的发展会给中国带来民主和自由,这二十几年的事实证明外商不但没能把民主和自由带进中国,反而成为中共腐败食物链中的添加剂。

有学者把中国分成三个世界,第一世界住在别墅里享受着别有洞天,第二世界在为住房、医疗和子女教育而不敢消费,第三世界正在温饱线上苦苦挣扎。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撰写的《中国现代化报告2005》一书,认为中国经济落后美国100年,如果维持9%左右的经济成长率100年,才能进入世界前10

中共通过诋毁孔子,随之否定了儒家的“中庸”思想、“仁义礼智信”、“克己复礼”、“温良恭俭让”等。许多人在看到这些字眼的时候,想到的不是其本身的内涵,而是高分贝的广播、铺天盖地的大帽子、大字报,以及被批判者的悲惨下场,从而出于恐惧而自觉与这些思想“划清界限”。

儒家讲“仁”,就是要关怀他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对“仁”的批判导致“己所不欲、要施于人”。

中国人崇尚“中庸”。“中庸”绝非中共所解释的“和稀泥”、滑头、左右逢源、两面派,其本意是“常守中道”,即遵循天命,“不可须臾离也”。其中包含学习方式“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处理好“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的关系,达到“至德”,完全是修身治国之道。在中共那里,完全扭曲了“中庸”的本义,变成了为了保护自已而放弃原则的犬儒。

3、灌输斗争思想、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邪说

2005年中共少将朱成虎在香港面对西方记者曾说过:一旦中美开战,中国“准



备西安以东的所有城市被摧毁。当然,美国人将必须准备好数以百计,或两百个,甚至更多的城市被中国人夷为平地。”这是中共党文化斗争思想的一个典型反映。实际上在党文化中斗争和流血已经成为常态,而和谐、包容反倒不正常了,因为按照马克思主义,后者缺乏“革命性”。

在这种斗争思想指导下的生存逻辑,就是为了发展、为了生存,就必然要有牺牲。当然被牺牲

的首先是无能力、也无权进行自由选择的弱势者。朱将军虽然没有明言中美开战时自己将身处何地,但可以肯定的是,像朱将军这样的“国家栋梁”,自然有着比平头百姓大得多的选择自由。早年因鼓吹“自然科学的阶级性”而得到中宣部科学处处长的赏识,后来又仗《红旗》杂志推荐之力而成为中科院院士的何祚庥,在2005年底接受媒体采访时谈到中国矿难频频的问题时,就脱口道:“谁叫你不幸生在中国了?”“中国要发展,某些代价是不可避免。”其实,相当一部分年轻人也是这样看待当今中国底层民众的不幸与苦难——大概他们本人都与“何院士”、“朱将军”一样,以精英自居,并无打算把自己作为发展的代价。

党文化中的斗争思想,经过中共几十年灌输,早已不仅局限于政治领域,而且贯穿于中国整个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种斗争思想,说白了就是把达尔文的进化论应用于人类社会,主张“弱肉强食,适者生存”。它推崇的是禽兽的丛林规则。在这种规则之下,是与非、善与恶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不择手段在竞争中取胜——无论是官场、商场或情场。

在一个鼓吹生存竞争、弱肉强食、崇拜狼性的社会里,人与人之间必然是紧张的争斗、撕咬、充满戒心。这也就不难理解充斥整个社会的假药、假酒、假酱油,毒大米、毒面粉、毒瓜子,更有注水肉、地沟油、大头婴儿奶粉……不但文凭可以轻易造假,桥梁、大坝都可以造假,甚至结了婚的不敢相信婚姻,女人怕丈夫背叛,男人则怀疑孩子跟自己没有血缘关系……而见死不救、落井下石都已经司空见惯。很难想像,付出这样代价的“发展”会使这个民族最终走向强大。

1) 中共灌输斗争思想的目的

德行的认可和尊敬。这些德行深入人心,流传数千年,并从汉地流向少数民族地区和其他国家。

在中国人的观念中,道德和学识是使人获得声望和地位的来源。孔子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一个人的人品成为选官的重要指标。汉代的时候实行察举制,荐举标准为:“德行高妙,志节清白;学通行修,经中博士;明达法令,足以决疑……”另外还要具有“质朴,敦厚,逊让,节俭”的美德。至魏晋,官府实行九品中正制,道德也成为选官的重要因素。至隋唐开科取士,对于儒家道德的理解程度也同样是应试者能够写出好文章并由此登上仕途的先决条件。

到了中共建政时,德高望重的乡绅、行会首领和知识份子反而成了镇压和打击的对象,而一个人的出身是否“根红苗正”才是获得社会资源的最重要考量。每个人的道德本来取决于其个人的思想行为,而到了中共那里,道德成为一个阶级的群体性标志。“谁受穷谁光荣,谁致富谁狗熊”,贫穷代表了天然的正确和正义,代表了受压迫者、代表了“造反有理”、代表了“革命”最坚决最彻底。

一个人的贫穷和富贵本来是不定的,也可能因为勤奋肯干和抓住机遇而致富,也可能会因为挥霍而败家。也可能某人田连阡陌,但数年后却讨饭为生。而中共实行“一刀切”,以它夺取政权的那一刻来划分阶级。

对于富贵的仇视,导致中国人在几十年的时间里,以贫穷作为傲视他人的资本。在另一方面,中共在打倒某人时,只需称此人是地主或者资本家,余下的话就不用多说了,富贵代表了“剥削”,代表了“镇压”,代表了“罪恶”。

几十年后,共产党自己颠倒乾坤,号召大家去发家致富。今天的人们不再以富贵为罪恶,转而以贫穷为可耻。此时评判一个人的好与坏、成功与否也和道德脱钩,而以人的富裕程度来衡量,谁有钱谁就有本事,哪管这钱是偷来、抢来、骗来、贪污受贿来的、出卖肉体来的或者出卖灵魂来的。“笑贫不笑娼”的结果是让大家更加不择手段地捞取财富,之后便沉迷声色之中,以既得利益者的身份认同中共的统治。

6) 宣扬粗鄙的党文化

中共治下的许多人以文雅为耻,以粗鄙为荣。

中华民族向来被称为礼仪之邦,人与人之间讲文明,重礼仪,人与人见面拱手作揖,文质彬彬。但中共却号召人们“滚一身泥巴,磨一手老茧,养一身革命虫”。“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才是最革命。知识份子讲礼貌,中共则宣传“大老粗”。在文明与野蛮之间,中共毫不犹豫地选择了野蛮。

今天的中国人,不讲礼貌,随地吐痰,公共场合大声说话,不管有钱没钱,都要说几句粗话、讲几个黄段子。出国以后,许多中国人在禁烟区吸烟;在宗教场所嬉戏游玩,不尊重当地民俗;在飞机、宾馆、车船等地高声接打电话;在大庭广众之下脱去鞋袜、挽起裤腿;穿着睡衣出家门;排队加塞儿等等,以至于在许多国家的旅游场所,当地人都特意在厕所里贴上中文的“便后冲水”的提示。这都是中共破坏传统文化带来的恶果。

7) 其他受到批判的观念

中共的批判常常不是理性的批判,而是将思想批判转变成人身攻击。然后用“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反对”的歪理邪说将被批判者的思想一概骂倒。而对于思想者的人身攻击,也仅仅是非常简单地扣上“奴隶主阶级”、“地主阶级”、“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等帽子而已。

名。维持 9%左右的经济成长率 100 年,可能吗?有人评论到,下一个世纪远远不是“中国的世纪”。但在大城市橱窗式的繁荣之下,一个真正的中国被掩盖起来了。经济表面繁荣带来的视觉冲击,一“俊”遮百丑,帮助中共披上了一层迷惑人的面纱。短期利益和盲目展望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抑制了人们对现实的全面认识,“不识庐山真面目”,更谈不上对共产党的历史反思和理性思考。

我们都知道做诗的功夫在诗外。同样,要把经济真正搞上去,就要首先解决信仰、道德、法律、言论自由、媒体监督等一系列非经济因素。这些问题不解决,经济也就不可能“搞上去”。“把经济搞上去再说”只是共产党拖延体制改革的借口而已,但现在人们竟然毫无察觉,还以为是真理。其实就是陷入了党文化思维,按照中共的思想思考问题。中国人民现在有很多自由,但都集中在私生活、体育和娱乐上面,其他方面依然是禁区。其他国家在发展过程中,人民是积极参与政治和制度的改良,争取自己的各种权利,而中国人民现在不是这样,对于那些敢于要求权利反中共迫害的民众,许多人不但理解,还反对别人去争取权利,他们愿意把一切都交给共产党,幻想共产党的自动改良和恩赐。

2003 年中国大陆出现了一部引发广泛争议的电视剧,它就是电视连续剧《走向共和》,后遭禁播。该剧真实地揭示了清王朝改革开放必然失败的命运,这一点对中共来讲具有刺激性。清王朝在改革开放之前是没有电灯、电报、电话的,也没有火车和汽车。短短的几十年,上海滩成了世界四大明珠之一,成了帝国主义冒险家的乐园,它的三大条马路上的一栋栋花园洋房,它的浦江岸边的一栋栋的高楼大厦,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早期橱窗。可是这个成就它挽救了清王朝灭亡的命运吗?没有。1905 年孙中山先生说:单单是引进铁路、火车、电话、电报这样一些西方的物质文明措施,却不进行政治改革,只能为国内的贪污腐败敲诈勒索,打开更加广阔的门路。

其实,今天的人们也不是不懂得要各方面协调发展的基本常识,都知道越往后,修正的成本越高。关键就是在党文化的氛围之中,屈从中共的淫威,迎合中共的利益,觉得发展经济至少对眼前短期有利,就跟着一点点的叫喊要“把经济搞上去再说”,而对中共的杀人放火都可放任不管。

2) “稳定压倒一切”

经历过政治运动的中国人,对“稳定”有特别的渴求。所以,“稳定压倒一切”在老百姓中很有共鸣,成为中共新时期维护统治的主打口号。

说起共产党,人们联想到的就是暴力革命和政治动乱,怎么现在的中共却祭起“稳定”的大旗了呢?说起来很矛盾,其实,也很简单。就是中共可以“动乱”人民,而一旦人民要“动乱”中共,中共就要高唱“稳定”了。几十年来肆无忌惮地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把人民“动乱”得民不聊生,而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兴起的民主自由浪潮和人民的觉醒,眼见要把中共“动乱”掉了,这时中共就高喊起要“稳定”了。

显然,中共说的稳定只是中共政权的稳定,而非国家和社稷的稳定。在中共的跛足改革中,那些既得利益者,尤其是那些不受制约的权势者,最需要“稳定”,以便“稳定”地捞取利益。由于他们最维护既定秩序,因此就成了最坚定的“稳定”力量,最可靠的“稳定”因素。这种“稳定”可以高于良知和道义,老百姓是死是活也可以不顾了。当矿井工人死于矿下,中共以“稳定”掩盖死者的冤屈;当拆迁户被逼上梁山,不得不冒死上访,幻想着找回公道,中共又以“稳定”为名进行截访,甚至用“破坏稳定”对遭受不公者进行迫害打击……这样的稳定是假的,社会不公和矛

盾积蓄到一定时候,就会像火山一样爆发。共产党宣传的“(党的)稳定压倒一切”就是积累社会矛盾等待总爆发的过程,一旦危机爆发,我们今天拥有的财富都会化为乌有,民族又会遭到生灵涂炭。

大家知道,经济的运行有自己的周期,不可能是“稳定”的,动荡不可避免。越如此,越需要有合理的制度作基础,来保障社会的稳定。真正的稳定,需要自由的秩序,法治的秩序和公正的秩序。英国是最早实行宪政民主的国家,三百多年来保持高度稳定,人民自由,经济繁荣。有矛盾要及时疏导而不是强行压下,中共利用人们在各种运动中整怕了、希望稳定的心理,偷梁换柱,把它自己统治的稳定强加给民众。这种稳定是不稳定。

中共“稳定压倒一切”带来的代价,就是现在转型更难了,成本更高,风险更大。在社会矛盾越来越尖锐的今天,中共只知道一味的打压维权和异见人士,镇压信仰团体,封锁、过滤消息。中共在维护集团和个人既得利益的过程中,原罪越来越大,已不可能指望着它有一天会心血来潮,大发慈悲,主动开展政治改革,实行自由民主。可以说中共本身才是最大的不稳定因素。

3) “别人也一样”

中共很喜欢用“国情”来作借口。别人有民主,中国不能有,别人能有言论自由,中国不能有,别人有信仰权利,中国不能有,为什么呢?因为国情不同。但是,如果别人有什么坏事,中共这时就不讲“国情”了,而是强调“普世价值”,告诉人民原来“天下乌鸦一般黑”,然后就要老百姓认可、理解、原谅中共的劣行。

说腐败,它会说哪个国家没有腐败?说镇压民众,它会说美国也对民众开过枪;说民主,它会说印度搞民主,也没搞出什么名堂;说和平演变,它会说俄罗斯演变后是如何糟糕;说选举,它会说台湾的选举是多么混乱;说中国现在资源浪费,贫富差距大,它说那是资本的原始积累,哪个发达国家没有经历过?说没有言论自由,它说西方哪个媒体不是被财团控制?说天安门抓访民,它说你到白宫去抗议试试,看抓不抓你;说中共人权不好,它抓住美军虐囚大做文章,说美国自己都不好,哪有资格说中共?……

这些似是而非的言论有时比那些严肃的说教更有迷惑性。但是,这种类比本身却是错误的,是欺骗误导民众。

首先,人都有人的弱点。所以,哪个国家都有贪污,都有人权问题。我们无意去为其他国家的行为辩护,我们只是要指出中共“因为别人杀了人,所以我就可以杀人”的这种颠倒是非的逻辑。其次,中共在报导宣传那些类比例子时,常常对事情发生的背景、经过和处理方式断章取义,有意隐瞒不利中共的东西。我们知道,出问题是一回事,对问题的反应和处理是另一回事。而中共重在渲染问题的发生,而回避民主国家从政府、媒体到公众反应和处理问题的姿态。

美军虐囚事件一出来,中共就大加炒作,无非是想说,美国人权也好不到哪里去,中共的人权不好有什么关系呢?但是,如果我们对比美国政府和中共在这种事情上的处理态度,就会发现区别很大。事实上,案发之后,美国自己是举国震动,不但美国媒体上大量曝光,就连总统也得马上回应,立即着手调查。中共引用的资料基本上也都是来自美国媒体的公开报导。而中共对自己的人权恶行,却是从上到下地一味掩盖,还不准别人去揭露。

对于中共在天安门抓访民,甚至“六四”屠杀,有个说法,就是你到美国白宫前面抗议看抓不抓你。中共在这里混淆了一个根本区别。中共说是可以申请游行示威,

失地农民、拆迁户、下岗工人的残酷镇压,实则为斗争精神的延续,利用屠杀营造“伪和谐社会”。而在另一方面,由于斗争已经成为中共赖以存在的主要支柱,一旦寻求对话与和解,中共自身就会解体。

4) 批判传统社会秩序

中国人从天尊地卑的自然状态,以及《易经》中“乾坤”与“阴阳”的对应扩展出一套家庭和社会伦理,再从这套伦理中派生出社会秩序。

“尊卑”是中国传统观念中的重要部分。按照正统文化,“卑”不一定是坏事。道家一直推崇水的美德,因为水总是“处下”。“处下”的一方是被爱护和保护的一方,处上的一方则是付出的一方。男为强,女为弱;男为刚,女为柔;但刚强不一定意味着好事,道家有“兵强则灭”、“木强则折”、“柔弱胜刚强”的说法。

中共一直打乱秩序,谎称要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但是社会不存在中共意义上的平等。

在社会生活中,一个国家、企业、社团或家庭,总要有人负责任去协调一些事情,有人提出计划,有人具体执行,这是一种正常的社会状态,也是每个人的智力、体力等综合因素决定的。而中共将其极端化了,将其描述成阶级压迫和阶级斗争。所以中共要打乱一切尊卑和秩序,这事实上是无法做到的,这种所谓的“解放”实为制造“混乱”。

举例来说,倡导男女平等的人也无可否认,在遇到灾祸、疫病、饥荒、战争的时候,妇女儿童都是首先要保护的对象。如果倡导男女平等,似乎妇女应该和男子受到同样的对待,这显然是不对的。当年泰坦尼克号沉没的时候,妇女和儿童是最先上救生艇的人,即使她们的丈夫也必须以一个男子汉的担当和轮船一起沉没。无人对此决定持有异议,这反映出在我们的内心深处并无男女的绝对平等。

推广到社会生活中,一个企业或者国家需要有决策者,决策者的决议需要执行者去执行;一支军队需要司令官,下面的各级军官和士兵负责执行命令;如果从社会职能来看,确实存在“尊卑”的问题,但“尊卑”并不必然意味着剥削和压迫,它也需要上下之间的“仁”和“忠”的美德来维系。

推广到家庭中,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传统的伦理自然承载起一个和谐有序的家庭和社会。

而“平等”从根本上来说,是佛法中的“众生平等”,是道家的“天道无亲”,是儒家的“有教无类”,是西方的“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是机会的平等,而绝非结果的平等。

中共对于“平等”的歪曲宣传导致了社会的极度失序和混乱;对于“男女平等”的歪曲解释实则为对妇女的迫害,强迫她们去做力不胜任或者不适合妇女做的工作。例如中共1976年4月出版的《同旧传统观念彻底决裂》一书中列出了15位女青年的文章,她们所从事的行业即为本应男子所做的送煤工、屠宰工、装卸工等,“紧握杀猪刀,能顶半边天”成了歌颂的对象。

中共治下的社会同时也是极其不平等的社会。由于中共垄断了一切资源,虽然它号称人民公仆,实际上人民都被当作奴隶,无论是政治权利和经济权利,官民毫无平等可言。

5) 以财产为衡量道德的重要依据

翻开中国正史的第一章,《五帝本纪》中记载了五帝的德行以及百姓对这些

2) 批判命运与善恶报应

中国人从对“天”的敬畏中派生出“天命”观,以及“善恶有报”。

“认命”是中国常说的一句话,被中共解释为面对困境的消极与无可奈何。事实上,“认命”的真正意义是“尽人事而听天命”或“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孔子提出“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却仍然在 54 岁时辞去鲁国大司寇的职位,周游列国十四年,推行王道,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里并无消极避世的含义。

在个人的生活中,“认命”的思想并不否认个人的奋斗,仅仅是对人生中不可抗力的解释。更进一步说,传统观念中认为人的命运取决于前半生、乃至数世行善或行恶所承受的善报或恶报。因此“命运”也常常与“善恶有报”、“福报”、“恶报”联系起来。

《易经》有云:“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这种观念让人努力行善,为自己今后的生活,乃至子孙后代积累功德。“善恶有报”也基于“头上三尺有神灵”,“人间私语,天闻如雷;暗室亏心,神目如电”等观念。

相信命运与报应,让人能够努力行善,看淡欲望,顺天而行,不会为逞一时之快而不计后果。这种思想更让人相信冥冥之中自有天意,“人心生一念,天地必相知,善恶若无报,乾坤必有私。”

对朝代更替来说,中国自有文字以来就不断留下对后代历史大事的预言,其准确程度令人十分惊奇和赞叹。这种“奉天承运”的天命观也是帝王执政合法性的来源。

中共将“命运”与“报应”批判为“封建迷信”,并禁演宣传这类题材的戏剧。其依据为无法证实的“进化论”及“历史唯物主义”假说。中共非常清楚的是,如果一个人恐惧于报应,是绝对不敢一直跟着中共行恶的。

3) 批判柔顺与忍让

“柔顺利贞,君子攸行”——《易经》以“坤”卦来描述大地。大地有“柔顺”之德。这种柔顺并非无原则地逆来顺受,而是顺应天道而行。

“柔顺”中含“忍让”之德,“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韩信受辱于胯下的典故流传了两千多年,这都反映出中国人对“忍”的推崇。

中共则鼓吹斗争,“共产党的哲学是斗争的哲学”、“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解决问题的方法不是靠协商与对话,而是靠暴力和镇压,并将敢于报复描述为勇敢。

苏东坡曾经说过,受了侮辱后就立刻拔剑而起与别人打起来,这是匹夫,根本谈不上勇敢,真正勇敢的人,在突然面临侵犯时,总是镇定不惊。而且即使是遇到无端的侮辱,也能够控制自己的愤怒。这是因为他的胸怀博大,修养深厚,志向高远。

“忍”在传统文化中是自持、宽容、不记他人之过,但绝不是懦弱和无原则的退让。

中共主张的“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实为心胸狭窄、睚眦必报的表现。这非常符合其“斗争”精神。这种思路让社会上的人冤冤相报,人人为敌,这也是造成今天人际关系紧张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国人看到乾为刚、坤为柔,刚柔相济,万物咸亨,由是领悟和谐之道。传统观念中非常重视“和”。皇宫三大殿,分别叫“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即反映出对和谐、和睦的推崇。

中共的发言人现在也常常把“对话”、“协商”、“合作”等等挂在嘴边,这种谎言是镇压的另外一面。近者如汕尾事件、汉源事件、陕北油田事件以及对上访人士、

但根本不会批准申请,对申请人还要打击报复,更别提你要申请到天安门示威。而在美国,民众可以很容易地申请去白宫前面抗议,而且有些抗议人士就是故意要让警察抓走制造新闻效应的,美国警察常常会主动问抗议者要不要被逮捕。根本就不是象中共宣传的那样,美国白宫前不容许抗议,要象中共一样抓人什么的。就算抗议者有过激行为,那也是按法律制度来处理。

还有人说美国也对民众开过枪啊。是有,那是 1932 年美国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退伍军人补助金事件,一万多名失业的退伍军人在美国国会大厦前集会。当时的胡佛总统下令联邦军队进驻华府,驱散示威民众,造成两名退伍军人死亡,多人受伤。根据美国公开出版的百科全书、记录片、历史书、回忆录等记载,他们并不是死于美国军队,而是被华盛顿的警察误杀。不论这件事本身的是非,我们来看看美国朝野对这件事情的反应。首先,美国政府遭到新闻媒体的无情鞭答,《纽约时报》以头版头条的长篇通讯报导了事件经过,胡佛总统也向美国人民承认自己的责任。在当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中,人民更是用选票把胡佛赶下台去,动用军队的教训之深,成为后来美国总统的前车之鉴。1971 年在白宫附近发生大规模的反越战示威,尼克松对前来请示的助手说:“让他们在那里好了。”对比之下,至今中共也没有对“六四”事件有一个自我反省的说法,中国立法机构也没有提出过如何接受镇压民众的教训,以及如何避免将来犯类似错误的提案。

还有一个很流行的讽刺西方言论自由的例子,就是说你写篇文章,看西方报纸是不是给你发表,如果没有发表,那肯定证明言论自由是假的。很多中国人因为这么一个例子,似乎一下就看穿了西方言论自由的虚伪,也就认为中共控制言论也就顺理成章了。这其实是中共给人们制造的歪理。报纸怎么可能来什么都给发表呢?真要如此,那也只能是头几个人有份,版面有限啊。事实上,言论自由并不是说每个媒体都要做到“绝对公正”。每个媒体都有自己的理念,他们后面当然也有自己的政治经济势力,也就是说,媒体作为个体来说,除了职业道德之外,当然有自己的喜好,对稿件和报导角度都有自己的选择,这并不是媒体界要掩盖的什么秘密。言论自由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对媒体本身,它可以自由地发表它想要发表的内容(出格了会通过法律途径解决),二是对读者而言,他的自由体现在可以获得任何意见的媒体,你既可以看反共的报纸,也可以看亲共的报纸,还可以看中共的喉舌报纸,你也有自由去办自己的媒体去发表你的意见,这才是媒体自由的真谛。新闻自由最关键的尺度是权力者有多大权力控制资讯。在美国,政府常常处于媒体的批评之下,即使政府想动用权力制止,也无能为力。但在中国,如果共产党不想民众在媒体上看到什么消息,动不动就给予封杀。把言论自由当作任何媒体都必须发表你的言论,根本就不现实。用西方报纸都有自己的立场来否定言论自由,不过是为中共钳制媒体找借口。中共自己是知道西方言论自由的妙处的,所以中共才在海外极力渗透、操控,并大肆发展自己的亲共媒体。

海外的民主选举出现的争端,也常常成为中共笑话民主自由、用来劝说人民拥护中共独裁的素材。很多人也由此而相信中共的说法,帮助中共维护一党专制。民主也许不是最好的办法,但是,相比中共的黑箱斗争和可能带来的动乱,民主的透明、媒体的监督和军队的独立毕竟是一种可借鉴的出路。大家都注意到,民主国家不管选举争端多厉害,国家很难陷入动乱和战争,这就是民主对社会的制衡作用,根本不是中共宣传的那样像个洪水猛兽。

俄罗斯和平演变之后,中共就一直害怕俄罗斯好起来,所以总是宣传俄罗斯如何如何惨。俄罗斯固然有其自身的“国情”,问题多多,但是,中共把俄罗斯作为民

主化后的反例宣传的确是在误导民众。一些中国人到海外听到俄罗斯的外汇储备跃居世界第三时（2006年7月的报导），竟大吃一惊，觉得俄国人不是连饭都吃不上吗？印度的民主也一直是中共嘲笑的对象，是民主失败的经典样板。但是，印度自1991年拉奥政府正式开始经济改革至今，其年增长率达7%，这一经济增长率已非常接近中国的水平。印度的金融业和资本市场比较发达，经营效率较高，银行坏账率低于10%。印度的经济结构跟一些发达国家相似，再加上印度有大量优秀且成本低廉的技术人才，因此有人预言印度将在未来成为“世界的办公室”。实际上，印度如今已成为世界的主要研发中心之一。我们无意为俄罗斯和印度说好话，他们都有自己的严重问题和发展变数，但是我们不应该被中共为了维护其既得利益、不愿全面改革所做的片面报导而误导，不加分辨地重复中共的论调，按照中共的说法去思考问题。事实上，共产党在俄罗斯仍然是合法组织，如果俄国人民真喜欢共产党，完全可以在大选中把共产党选回去，人们不走这条路，显然共产党不受欢迎。

对于中国现在遇到的掠夺瓜分社会财富的问题，有人用“资本的原始积累”来形容，意思是西方世界现代化过程中也走过这么一个阶段，所以，也就是正常的了。我们不去说这个原始积累的对和错，我们至少看到西方在原始积累之后，资本很快进入了再生产，同时有产阶级在政治上有了明确诉求，参政，办媒体，搞教育，做慈善等，成为巩固社会秩序的重要力量。而中共治下的原始积累就是捞钱，捞个没完，然后外逃，享乐，根本无意去影响政府和共产党，同西方当时的情况根本不一样，怎么能指望出现“原始积累”后的良性循环呢？

还有一个听起来最彻底的类比：如果你去颠覆国家和政府，你看哪个国家不镇压你？这是一个很“巧妙”的偷换概念的问题，很有迷惑性。其实，这个说法本身就是中共反复宣传灌输造成的概念混淆的典型表现。“煽动和颠覆国家罪”是中共继过去的“反革命罪”以后的替代罪名，这个罪名把普通的人权和言论自由有关的活动归到“煽动和颠覆国家”，本身就是对人权的侵犯。被中共称为“煽动和颠覆国家”、“泄漏国家机密”等等的许多行动，在西方民主国家根本就是受到宪法保障的基本权利，民主政府怎么会镇压呢？办报骂政府，在中国，这就是颠覆国家的“惊天大案”，而在西方是很正常的事，同颠覆国家根本无关，除非是囤积武器或者搞恐怖主义暴动。

对于一些少数极端宗教组织在世界上引起的恐怖和战乱作为，也是中共用来否定宗教自由，为中共的无神论开路的反面教材。而对世界上作为主流的那么多的正教正信带来的对社会道德和人性的正面意义，中共却尽力回避。很多不明就里的人，因此而跟着中共对信仰一概进行批判，排斥别人争取信仰自由的努力。

这样似是而非的类比还很多。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些对于中共不利的东西，中共就不类比了，而是强调中国特色和国情。“国情”成了中共逆世界潮流的一柄尚方宝剑。其实，这不能学，那不能学就是因为触动了共产党的既得利益而已。

4) “说我没做好，你自己要先做好”

“说我没做好，你自己要先做好”，这是人们反驳别人批评的常用语。其实不对。生活中人人都可以对电影明星、足球运动员指手画脚一番，并不要求自己一定要比对方更会演戏，更会踢球。

但是，中共很喜欢用这句话来为自己的恶行狡辩。当美国批评中共人权问题时，中共的回应就是美国的人权也有问题，而且也要出一本指责美国的人权报告，从而认为自己的人权问题就无所谓了。而中共出的美国人权报告，其内容都来自美国媒

体的妖魔化中，在政治暴力的威胁中，在中共险恶地安排代理人从内部进行颠覆中，中共完成了对儒释道的系统批判和取代。今天，大多数中国人已经不知道儒释道为何，只要一句“封建迷信”，就足以让人们条件反射式的避而远之。口号式批判即可，无需证明。

2、批判传统观念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易经》最开始的两卦即点出中国人对天地的态度，君子顺天道而行才能自强不息，以柔顺而深厚的道德去承载万物。对人则讲诚信和睦，推己及人，把对自家老人的尊重和对孩子的爱护推广到所有的老人和孩子身上，即所谓“讲信修睦”、“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地人”三才既定，传统观念的根本也就定下来了。

中国人敬天、敬地、敬神、敬祖，并由此形成一套日常生活中的处世之道，代代相传。

而共产党就“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共产党宣言》）。它对传统观念的批判，是其从中国人的生活中彻底清除传统文化以及信仰的必要步骤。

中共建政伊始，就系统的通过“社会发展史”教育向全民洗脑，把中国近百年来遭受列强侵略的原因统统归结为传统文化的“落后”、“愚昧”，把传统社会描绘成“腐朽、没落”的“旧社会”，把传统观念中的信仰部分标为“愚昧和迷信”，把其中的道德部分标为“吃人的礼教”。这样，利用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理和自强的愿望，中共在全社会发动所谓破除“封建迷信”的运动，打着所谓“移风易俗”的口号，杜绝一切与传统信仰相关的民间活动；同时中共还把传统观念批为替“封建统治者”麻醉人民的政治工具，“使他们安于被剥削的生活”，把传统社会秩序批判成压迫百姓的“封建宗族制度”，是和“封建专制制度”相呼应的，把根除传统文化的运动上升到政治高度，这样就可以通过大规模的群众运动，“监督”、“检举”、“揭发”民间仍然保持传统观念的言语和行为，达到彻底根除的目的。

在此试举数例被中共批判的传统观念。

1) 批判对天的敬畏

中国人一直保持着对天的敬畏。即使那些没有明确信仰的人，也相信“老天爷”。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天虽然无形无象，但却无所不知、无处不在。

当王朝末世或者社会普遍道德堕落的时候，天就会降下灾难，之前也会有警告，即所谓“天垂象，见吉凶，圣人则之。”帝王登基后，要行祭天之礼；每年正月十五和冬至，皇帝都要到天坛祭天，这都体现出对天的尊崇。

在政治生活中，“天”昭示了治国的法则，孔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在日常生活中，“密室私语，天闻如雷”；兵法、建筑、乐器等都体现着天的规则，即使造反也要打出“替天行道”的大旗。

对“天”，传统观念中从来都只有敬畏，而只有共产党才对“天”斗争。

对天的敬畏维护了人的道德，“人命关天”的观念维护了对生命的珍视，“天人合一”的观念则有效的保护了自然。这些都是共产党杀人和毁坏环境的障碍，而中共却需要依靠杀人来让人在恐惧中臣服于它，需要“战天斗地”的豪言壮语激起人们对它的崇拜，和破坏自然的决心。

毛泽东说“我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这本来是贬义的“无法无天”变成了褒义的勇敢，并鼓动人参与到“无法无天”的政治斗争和环境破坏中。

每周进行政治学习。与其他中共干部唯一不同的是,这些人穿着袈裟或道袍而已。其心不在方外,四大不再皆空,寺观仅仅是其工作单位而已。

伪宗教自由的另一个表象就是建立大量的庙宇,组织各种宗教大会,修佛像、印佛经等等,给人中共在极力扶持宗教的假象。然而这些事情却跟真正修行的实质没有任何关系。

《九评之六》写道“再以寺院为例,这本是个晨钟暮鼓、青灯礼佛的修行场所,或是给红尘中人忏悔礼拜的地方。修行讲究的是清静无为,忏悔礼拜也要求环境庄严肃穆,然而现在却成了发展经济的旅游胜地。真正来到寺院的,有多少是沐浴更衣后,带着虔诚敬佛的心来反省自己的过失呢?修复门面,毁去内涵,这也是中共迷惑世人的策略。无论是佛教、其他宗教还是派生文化,中共就是要使他们沦落到这步田地。”

如今中国的禅宗祖庭少林寺已经成为旅游和拍摄电影的场所,少林寺方丈贩卖少林文化,近期决定花费 3.5 亿元人民币将清静佛地变为休闲区,被讽刺为少林寺的“CEO”。他推崇“少林寺也应该有企业的观念”,于是开着豪华越野车,乘坐飞机周游世界,策划各种大型表演,每日周旋于企业老总、政府官员、国际友人等各类社会人士之间。他生活中最多的时间,是用于接待来宾和处理事务。达摩老祖所传的“壁观”修法需要清静的环境,如今荡然无存。

2006 年 8 月,江西省化成禅寺监寺圣观法师因为“六四”为天安门死难者举行佛教超度仪式,而被当局威胁、逼迫离开寺庙。桂阳县宗教局何局长对圣观法师说:“你吃、喝、嫖、赌都行,就是不能反对共产党。”

伪宗教自由让许多不明真相的人加入到中共把持的宗教场所,他们研习的经典被中共歪曲,他们的正信被中共用世俗的利益所侵蚀,这都是中共系统破坏佛、道教的圈套。

伪宗教自由同时让一大批听命于共产党的品行恶劣之人成为寺院、道观的住持以及各级宗教协会的负责人,一方面他们积极配合中共需求在国际上为中共的伪自由涂脂抹粉,另一方面拼命敛财,乃至吃、喝、嫖、赌。例如广州两座寺庙里的和尚到三元里集体嫖娼;光孝寺、法幢寺和南山寺等三大古寺的和尚集体嫖妓;广东佛教协会的会长、光孝寺的方丈明生和尚,在寺院内开了一个“甘露坊”素食馆,弄了几个妓女模样的人站在寺院门口招揽顾客……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求神拜佛的传统,但必须指出的是,到寺庙烧香许愿都是相信眼下的不如意乃因果报应所致,以虔诚忏悔之心许愿未来要做多少好事加以弥补,希望神佛给以一时之方便,解脱目前的困境。伪宗教人士则把求神拜佛歪曲成给寺观布施钱财即可获得保佑,全然不管这些钱是否是偷抢或贪污来的。此时求神拜佛从“忏悔”变成了“花钱收买佛,与佛做交易”。

“贪官拜佛,和尚嫖娼”这种伪宗教自由对正教的破坏力最大,许多人因此而批判宗教为虚伪、敛财和淫乱的场所,这种自发的批判比中共的直接诋毁具有更深远的影响。

必须强调的是,中共对儒释道的批判是多层面的,包括理论层面的批判;把科学宗教化,用所谓“科学”的大棒对儒释道思想进行批判;收编宗教界,在宗教内部对儒释道进行批判;在党内进行思想清理;对儒释道进行妖魔化。这种批判是长时间的持续批判,贯穿在教育、生活中,辅以定期的政治运动强化,人人写文章,或抄文章,强行洗脑。同时,这种批判也是全面否定式的,没有任何可以让人对传统思想进行保留的余地。在中共狂热的无神论、唯物论意识形态宣传中,在恶毒的对儒释道

体的公开报导和美国政府关注的案例,中共为什么要劳民伤财去多此一举呢?就是为了出一口“气”,非为改善美国人权(实际是希望美国人权丑闻越多越好,方便中共做文章),实为侵犯自己人民的人权罪行强词夺理。

中共为自己狡辩,那是它坏到那个份上了。可是,不少普通老百姓也附和中共的说辞,甚至认为中共的回应理由是多么“为国争了光”,这就是糊涂了。且不管美国的人权怎么样,美国批评中共的人权,客观上是帮助中国人民,因为在中共的人权迫害下,被害的不就是中国人民自己吗?别人呼吁中共改善人权,不是中国人民自己受惠吗?遗憾的是,因为党文化的影响,认为批评中共,就是批评全体中国人民,触及了被中共灌输的狭隘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自尊心,结果盲目维护中共的面子。有人为中共找理由,说别人批评中共的后面一定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是在用人权要挟中共。就算如此,如果我们不买中共的托辞,坚持要中共停止迫害自己的人民,那么,中共改善自己的行为后,别人不就没有办法要挟了吗?这样,既为中国人民带来实惠利益,又打击了别人“不可告人”的目的,一举两得,不是更明智吗?

所以,正常的思维是,不管对方做得怎么样,只要指出的是事实,就应该听取并改正。有人说“正人要先正己”。这又是一种误解。这话应该是批评者自我勉励的话,那是批评者境界高,为了更有说服力,严格要求自己的表现。但是,不能作为被批评者抵触别人意见的理由,不是有句话叫“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吗?

在外国元首要跟中共谈论人权问题时,有一个很典型的被认为是“机智”的回答,就是“你没有资格跟我们说中国人权,因为一百多年前你们严重侵犯过中国人民的人权”。在说起中共天不怕地不怕,破坏自然,污染环境时,也有个类似的说法,就是“西方强国不也转移污染工业,甚至把废料运到别国吗?”言外之意是什么呢?就是西方国家曾经侵犯中国人民的人权,为什么共产党就不可以侵犯中国人民的人权呢?西方国家能够污染中国,共产党怎么就不能污染中国呢?

中国要与世界接轨,融入世界潮流,就需要听取国际社会的意见,除了学习别人的先进技术,还要研究先进的制度。为了化解国际社会在人权、民主自由等方面的压力,中共总是用“说我没做好,你自己要先做好”来无理取闹,误导民众,受害的是国家和民族的长远利益。

5) “对共产党要一分为二”

共产党自知坏事干绝,所以,希望人们能对它一分为二。老百姓自己也附和着说,“难道共产党一点好事也没干?”这种观点听起来好像有道理,但是这要看一分为二的场合和目的是什么。

一个杀人犯,杀人偿命,按照法律来说,就已经可以给他定性了。如果在法庭上要求一分为二,想用小时候曾经帮助老大爷推过车,植过树什么之类的来抵消杀人罪,那是不可接受的。

拿国家和政党来进行类比的话,可以看一下二战以前的德国。1933 年希特勒成为德国的元首,他的经济政策使德国的经济连续多年以 100% 的速度增长,德国的失业率从 30% 降到 0%,德国当时的国际地位大大提高,因为在一战以后德国是战败国,英法列强对德国是很歧视的,要收它的赔款,但是希特勒当了元首之后,德国成了欧洲的强国特别是 1936 年成功地在柏林举办了奥运会,使得很多国家对它刮目相看。当时德国修建的高速公路都是可以起降战斗机的,很多地铁的挖掘都是希特勒时代完成的,而且希特勒当时说要让德国的每一个家庭都有自己的轿车,这就是德国“大众”车牌的由来。但是不管希特勒在经济上做了多大的努力,在军事上

取得多大的成功,有人说他是军事家或是经济学家,这些都不重要了,因为他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了全球九千万人的伤亡,造成了四千亿美元的损失,同时他在集中营里面对犹太人残酷的屠杀,有六百万犹太人因为二战在集中营里失去生命。这些事情就足以给希特勒和纳粹定性了,所以今天你要是到德国去的话,没有人说我们要对希特勒和纳粹进行一分为二,而且包括现在拥有纳粹的标志,或者对希特勒崇拜都是违法的。

我们再拿日本人打一个比方。侵华日军在中国除了杀人,它还办了很多实业。特别是在东北三省,它开工厂,开矿业,一直到中共夺取政权之后,当时东北三省的老工业基地,很多都是日本人留下的底子,包括当时东北三省作为全国铁路网最发达的地区,都是日本人弄的。甚至南京大屠杀之后,日本在中国也搞了很多文化活动,比方说盂兰盆会,到南京秦淮河两岸看一看那也是属于花柳繁华、温柔富贵的,大上海那也是朝朝饮宴、夜夜笙歌的地方。那么我们要不要感谢侵华日军对中国经济发展作出的贡献呢?也要来个一分为二呢?我们好像没有人这样想,因为日本人有南京大屠杀,有七三一部队,有三光政策,而且这场侵华战争造成了中国两千万军民的伤亡,就这些事情本身就足以给侵略战争定性了。

所以回到共产党这儿,在夺取政权之后,中共造成了中国八千万人非正常死亡,其中四千万人是被它屠杀掉的,四千万人是活活被饿死的,这个屠杀的数量超过纳粹德国法西斯的十几倍,超过日本人四倍,另外一方面,共产党又出卖了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所以就这两件事情本身,就足够给共产党定性了。

在另外一方面来讲,共产党它自己做事情它也常常不分为二,它常常把事情做绝了。比如它在镇反的时候,为什么不对原来国民党的官兵一分为二呢?在迫害刘少奇、打倒林彪邓小平的时候,那时候怎么不对他们一分为二呢?今天镇压法轮功的时候怎么一句好话都没听说,全部都是诋毁法轮功的话呢?所以从它的表现来讲,它所谓一分为二,实际上是为它维持统治所找的一个借口,让大家对它有一定程度的认同而采取的一种策略。

如果真要是“一分为二”的话,那么,中共就应该面对过去,面对错误。中共说的“一分为二”其实是一个障眼法。它先虚晃一枪,说事情总有好有坏吧,让人觉得很“客观”的样子,然后,话锋一转,“坏”就不说了,落脚点却是“好”。所以,中共是不让人们去彻底全面地反思中共的过去的,它干的坏事是不让人说的,要说也只能按它的调子和分寸来说,这样说的后果反而是给今天的中共贴金。德国总理勃朗特(Willy Brandt)在华沙下跪忏悔对犹太人的罪行,而中共领导人却从来没有向全国人民忏悔。如果在德国的格言现在是“千万不要忘记”,而在中国则是“千万不要记住”。可是,忘记历史的社会能够自救吗?

6) “温饱权高于人权”

面对世界民主潮流,中共在人权方面的恶行成为中共在世界上的一大包袱。于是,御用文人们杜撰出了一个人权歪理,“温饱权高于人权”,“你到饥肠辘辘的农民那里去问问,他们是要饭吃还是要民主自由?”很多人面对国际社会批评中共的人权记录时,也会用中共这一套话语进行批驳。在中共的政治教科书和每年的政治考题中,对这个问题都是有标准答案的。中共在不同的外交场合,也经常俨然理直气壮,一副义正词严的样子。人们重复这句口号,跟中共的宣传和灌输是分不开的。

其实,这是一种混淆逻辑的诡辩,它把民主自由当作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把这个抽象的东西去同具体的“食物”进行对比,加上暗示农民的教育水平低,只会要具

大”,并从深度和广度上动用其掌握的国家资源进行推广。

中共认为“人间佛教”种种似是而非的说法恰好可以大加利用,只要信徒把关注“天国”的眼光转移到关注“人间”,那么中共就可以轻易编出更多的谎言,操纵教徒的思想。于是,“人间佛教”的传人,太虚的弟子赵朴初就成为中共最理想的代理人人选。

在赵朴初等人的带动下,中国佛教协会将“庄严国土,利乐有情”时时挂在嘴边。事实上,佛经中提到的“庄严国土”是指庄严佛国净土(如《妙法莲华经》中的诗句“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利乐有情”是指将“有情众生”渡化到涅槃彼岸,而绝非佛教协会所说的“积极参加祖国建设,努力为人民服务。”

(5) 成立中共宗教协会, 让代理人从内部批判宗教

五十年代,中共建立了完全受其操纵的佛教协会和道教协会,以其代理人占据要津,成为附属中共的类似现在所谓八个“民主党派”的政治组织。这些协会在党的组织体系中归统战部管辖,在政府体系中归国务院宗教事务管理局管辖,其目的不是为了繁荣宗教,而是为了控制宗教。

中国佛教协会在其发起书开篇处即热烈讴歌中共镇压反革命,并“感谢这一切的领导者——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谰词滚滚,与任何一个世俗组织相比都毫不逊色。

释迦佛出世为印度迦毗罗卫国净饭王的悉达王子,出家后又有瓶沙王欲以国王之位相让,悉达太子都没有接受,而是入山林苦修。可见,佛教之真意并不在人间的荣华与世俗的政治。而中共操纵的中国佛教协会在其成立章程中确立的宗旨即要求佛教徒参加所谓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道教的情形也差相仿佛。2005年通过的中国道教协会章程中明确规定要“加强……时事政策的学习,提高道教徒爱国主义觉悟和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自觉性。……促进道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为构建和谐社会贡献力量。”简单地说,道教协会就是要让《道德经》适应于中共的政策,直白露骨地要改变信仰的内涵。

佛教协会、道教协会在政治上投靠中共,自然也就按照中共的看法去解释教义。宗教认为世界是苦难的,这种苦难自然是与天国世界的美好相比,否则就无法解释释迦牟尼为何要放弃王位去修行。而中共的宗教代理人却谎称中共治下的中国“就不能再……说成是黑暗的、痛苦的”。更进一步,为促进信徒更进一步溶于世俗,各协会都在批判所谓“消极厌世、逃避现实的宗教观念”,让教徒相信建立人间天堂。这种说法与佛陀所说“苦、集、灭、道”的四谛妙法截然相反。

这些宗教协会的代理人以其在宗教中积累的资源从内部进行批判,例如佛教的主张废除戒律并说这些典章害死了许多青年男女。这种内部的批判要比中共从外部的诋毁有力得多。

(6) 营造宗教自由假象

中国所谓的“宗教自由”是一种伪自由,它有一个前提,就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简单的说,一个人烧香磕头、忏悔许愿,干什么都行,但是当他的信仰和共产党冲突的时候,他就必须服从共产党。

伪宗教自由表现为宗教世俗化、宗教团体机关化、宗教场所商业化、宗教领袖政治化或干部化。

在中国,宗教局是政府用来控制宗教的部门。许多寺院的方丈、道观的主持同时也是中共的干部,他们有行政级别,领工资,参加政协会议,甚至配备车辆、电脑,

修行者描绘为愚昧、无知、迷信，甚至利用宗教敛财等形象。此时，修行者的社会地位一落千丈，从被尊重者变为大众嘲弄的对象。许多出家人因为受不了这种精神落差而还俗。

“人往高处走”，每个人内心都潜在地珍惜自己的名誉，希望与成功者为伍。中共将佛、道教徒描绘成一个失败者、甚至是“剥削阶级”，将信奉神佛的人描述为迷信和思想落后，这都会使民众与信徒保持距离。

（2）摧毁修行的物质环境

如果出家人不在意世俗的看法，继续精进修行，那么接下来中共就要断修行者的粮道了。

一般来说，修行者的资粮来自两个方面，一为大众的供养，二为庙产土地的收入。当中共破坏民间信神环境时，第一个来源就中断了。对第二个来源，中共的对策就是土地改革。中共在1950年1月颁布的《老解放区市郊农业土地问题的指示》中规定寺庙、教堂等土地一律收为国有。各地寺庙中凡是有劳动能力的僧尼，转而从农、林、手工业和服务性行业，到麻袋厂、织布工厂、印刷厂、比丘尼缝纫组等处工作。

依照佛教传统，小乘佛教的教徒也都以乞食为生，并不从事生产。传入中国后，禅宗四祖道信定居双峰山，聚徒五百人，因为住地远离城郭，乞食困难，于是自耕自给，以农养禅。道信教诫门人，“努力勤坐为根本。”“能作三五年，得一口食疗饥疮，即闭门坐。”由此可见，农业生产并非目的，仅仅是为能打坐参禅而从事的糊口劳动，且只要有一口饭吃，就要闭门打坐。

由于中共对生产资料和商业行为的全面垄断，寺院道观的生产性质已非道信所提倡的以农养禅，完全成了世俗化的工作单位，并被置于共产党的经济控制之下，仰共产党鼻息而生存。经济上对政权的依附，结束了宗教的独立性，并进而在政治上成了共产党的附庸。这是对宗教传统最大的破坏。

（3）消灭肉体

1955年7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展开斗争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史称“肃反运动”，打着“纯洁佛教队伍”的旗号，杀一儆百，将不与中共合作的僧尼道士当作反革命分子逮捕枪毙。经济上的剥夺、政治上的压迫以及这种“罗织罪名、万人公审、宣判、枪毙”的恐吓，使很多僧尼站到了共产党的一边。

（4）歪曲宗教经典，将宗教庸俗化

佛教称“佛、法、僧”为三宝。其中“法”即佛经。中共除了否定佛的存在、镇压迫害高僧大德之外，对于经典的破坏更为隐晦和阴险。

释迦牟尼在《大般涅槃经》中预言了未来的情况，即有魔王转生成僧尼和男女居士从内部坏乱佛法。

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太虚和尚提出“人间佛教”的说法，认为三乘共法（天乘、声闻、圆觉）要么属于“迷信神权”、要么属于“消极避世”。“人间佛教”进一步主张“修行现代生活化”和“寺院现代学校化”，“现代化的佛教事业应包括工厂、农场、保险、银行、公司、所谓工农商贸”，等等。这种打着“人间佛教”的幌子而将佛教彻底世俗化、庸俗化的做法，与佛陀原意直接相悖，并不符合佛教几千年来所要求的远离尘世欲望，追求心灵升华与超脱的修行方法。藏传佛教的白教始祖密勒日巴也告诉弟子说：在自己修成正果前，不要谈度化众生的事业。

如绪论中指出的党文化的第三种类型，中共将已经存在的思潮加以“发扬光

体的，而不懂得抽象的东西，从而得出农民都“要饭吃”，于是，就否定了民主自由的重要，结论就是“温饱权高于人权”。

我们稍稍换一个说法，把民主自由具体化，农民们就不会上中共的文字游戏的当了。按中国农村9亿人口计算，要养活县乡村三级官员6000万，这就是说每15个农民（包括老人和小孩，按人口计算）要供养一个中共官员和工作人员。从历史上看，国民政府末年（1949年）是50个百姓供养一个官员，现在是15个农民供养一个官员。过重的负担，压得农民翻不过身，就连中共自己都承认减免农民负担是一项关系国家的大事。

对饥肠辘辘的农民，如果把“民主人权”的抽象字眼转换成具体的行为，我们可以这么问，“我们农民被整得苦啊，找人把你们的情况反映出去，你们愿不愿意？”“当官的欺压农民，苛捐杂税多啊，咱们把那个坏蛋乡支书罢了，选个真正为我们干点实事的，大伙乐意不乐意？”对于这样的提议，农民们难道会拒绝？

人的肚子饿了，要想得到帮助的话，首先就要发出声音，让人知道你的肚子饿了。就是说“言论权”比“温饱权”更紧要。可是，为什么中共颠倒顺序的狡辩人们也能欣然接受，听之任之呢？就算吃不饱的人没权说话，现在不是有很多人已经吃饱了吗？为什么不让他们说，或者容许他们替吃不饱的说呢？

其实，“温饱权”对于中共来说也不重要，中共在意的只是一个敷衍外界、抵触言论自由的借口。

类似上面这样的似是而非的例子还有很多很多。党文化改造人的思想之后，的确使得人们沟通起来都很困难，一个问题解决了，还有另一个问题冒出来。如何避免用党的思想思考问题，避免用党教会的话语说话，很关键的一点，就是把角色分开。把自己同党分开，克服党妈妈情结，突破“离不开党”的底线，不把党的无神论、唯物论和斗争哲学、仇恨哲学当作自己思想的基础。对于那些似是而非的观点，看一看如果你附和那些观点，到底对谁有利，是鼓励党干坏事还是监督党、抑制党不让它干坏事。中共可以为自己辩解，但是，我们老百姓不能跟着起哄。别人批评中共的时候，并不是在骂中国人。丢中共的面子，不等于丢中国人民的面子。能够挑战独裁，为真相挺身而出，是真正的勇士，是会赢得世人的尊敬的，这种尊敬是对中国人民的尊敬。

2、不信神，造成人做事不计后果，什么坏事都敢做

无神论是党文化的核心之一。中共之所以得以改造人们思想，就在于切断了民族传统文化，用马列主义外来文化替代了中国几千年来半神文化，从此“无神论”主宰大陆，敬天畏神、善恶有报变成了封建迷信和愚昧无知。就人类历史而言，对神的信仰和宗教在很大程度上维持着人类的道德。不再相信神的存在，也就没有了道德的约束，没有道德的约束，法律的约束也只能是有名无实。于是，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不相信今生来世，不相信做坏事有报应，于是，做什么事都不计后果，什么坏事都敢做。

漠视生命 肆意杀人

1949年以后，在“镇反”、“土改”、“三反”、“五反”、“反右”、文革等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中，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但在历次运动中，起作用的却不仅仅是中共本身。中共搞运动历来是煽动群众斗群众。很多受害者往往是被中共扣上什么帽子，然后众多乡邻、亲戚甚至家里人就会一拥而上，将其活活整死、打死。那些打人

者本身固然有被中共欺骗的一面,但他们之所以能做出这些恶行,却跟党文化的洗脑紧密相关。一个相信天理,相信人伦人性的社会,不可能大面积干出这种伤天害理、泯灭人性的事情。

“大跃进”之后的大饥荒,饿死的大约有四千万人,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饥荒。这一场大饥荒被中共歪曲成“三年自然灾害”,实际上那三年风调雨顺,大规模的洪水、干旱、飓风、海啸、地震、霜、冻、雹、蝗灾等自然灾害一次也没有发生,完全是一场彻底的“人祸”。事实上,如果当饥荒发生的时候,能够开放粮仓,能够寻求解决办法,这场饥荒的死亡人数不至于那么高。更令人震惊的是,面对饿得奄奄一息的村民,中共干部却命令军人强行封锁道路,目睹他们活活饿死也不准他们爬出去逃生。

文革中的“打砸抢”,学生居然用皮带抽死老师,孩子用砖头砸死父亲。还有人把对方打死之后,把器官取出吃掉。

中国古代讲“人命关天”,“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被当局整肃的对象,本身已经够可怜了。但现在很多人却不但见死不救,还要落井下石,甚至以杀人为乐,只要中共叫干什么就干什么,认为是党性的需要,是党的政策的需要,什么后果都可以不顾。中共思想改造的后果之可怕,可见一斑。

时至今日,这种不把人命当回事的党文化思维并没有随时间的推移而成为历史。因为中共的腐败与暴政,社会产生了大量的被压迫团体。富人高官可以利用特权过着一掷千金的生活,而下岗工人却因为没钱治病在家自焚身亡,贫穷人家的母亲因为没法替儿子交学费而上吊自杀……但面对下层民众的凄惨生活,很多人已经漠不关心,毫不在意。面对可怜无助的上访民众,那些所谓的执法人员可以大打出手,将人致伤致残,丝毫不管他人死活。所谓的何院士何祚庥,可以面对无数的矿难,说出“谁叫你生在中国”这样的狠话来。而中共将官朱成虎,则放话可以牺牲西安以东地区、不惜中国一半的人口来打一场核战争,跟老毛的“中国死了三亿,还有三亿”的说法如出一辙。仅仅因为没有“暂住证”,大学生孙志刚就被收容所活活打死。而在迫害法轮功过程中,大量法轮功学员惨遭酷刑甚至折磨致死,在2006年更曝光出自2001年以来法轮功学员器官被活体摘取,中共官员和医生从中牟取暴利。人性之泯灭,骇人听闻。

漠视生命不仅仅表现在政治运动当中,也不只体现在权势者对百姓的态度上,现在社会上人与人之间都充满好勇斗狠,肆意残杀的现象。现在年轻人动不动就砍啊,杀啊,对越暴力的越崇拜。手段残忍的校园凶杀案也屡屡发生。社会上谋财害命、用钱买命的事情随处可见。官员、富豪雇凶杀人,有时连自己的妻友也不例外。

当人的道德沦丧到如此穷凶极恶的时候,这个社会就处于极其危险的地步了。

战天斗地 破坏自然

几十年来,党文化把中国人民塑造成“无法无天”、“战天斗地”的一族,从当初的“大炼钢铁”、“围湖造田”、“疯狂地打麻雀”、“乱砍滥伐”到今天的以环境为代价的经济高速增长,都是只管眼前,无视子孙后代的福祉,给自然带来了巨大的破坏。中国国家环保总局透露,每生产价值为一万美元的商品,中国所消耗的原材料是日本的7倍、美国的6倍,甚至比印度还要高2倍。如果环境问题不能得到改善,中国的经济奇迹很快就要成为过去。世界银行说,在世界上10个环境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中国占了6个。全国水土流失面积占国土的38%,18个省(区)的471个县,近4亿人口的耕地和家园处于沙漠化威胁之中,专家估计,中国未来将有1.5亿人

2) 批判释家和道家

(1) 否定神佛存在,歪曲信教动机

老子的思想曾被孔子认为云中龙。今天的西方学界对老子的思想仍然推崇备至。“福兮祸之所倚,祸兮福之所伏”“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等《道德经》中的箴言至今影响力长盛不衰。自汉代以降,道家符箓、丹鼎等各个流派皆尊老子,留下如张道陵、邱弘济、许旌阳、葛洪等修道者白日飞升的神迹。历代帝王常以道士为国师,张良即称自己“以三寸舌为帝者师”,余者如蜀汉诸葛亮,唐朝袁天罡、李淳风,宋代苗光义,明朝刘伯温等都被开国帝王待以国师之礼。成吉思汗晚年也不远万里请长春子丘处机前去讲道。

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打坐七七四十九天,最后开功开悟,洞彻他所在境界的宇宙真相,教人重德行善,跳出轮回。释迦牟尼有十大弟子,都有很高的神通。他的第二十八代弟子达摩一根芦苇渡江,非常人所能为之,后在少室山面壁九年,将身影印在石上,成为千古奇观。禅宗六祖慧能圆寂迄今1000多年,肉身不腐,至今仍然端坐于广东南华寺中。

中共一方面进行社会发展史宣传,否定神的存在;另一方面,令其在各个宗教内部的代理人散布否定宗教创始者的言论。佛教认为佛是天国世界的创造者,如极乐世界即为阿弥陀佛愿力所成,而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赵朴初1965年在见到印尼总统苏加诺的时候却说“佛陀被神化了”“佛不是造物主……不能主宰人的吉凶祸福。”与此类似,受中共控制的基督教三自教会的主席吴耀宗也称耶稣的神迹都被自己“扬弃”了,并说“上帝已将人类得救之钥匙,从教会手里夺去,交予共产党了。”

神佛为宗教之本。无论是佛教、道教或其他正教,信徒努力提升自己的境界,最终是为了去所信神佛的天国世界,如佛教净土宗的人希望往生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等。如果否定神佛的存在,否定天国世界,对于宗教信徒来说,修炼就变得毫无意义了,而宗教这个修炼团体也就会瓦解。

中共作为无神论的宣传者,将宗教描述为“自然力量和社会力量在人们意识中虚幻的反映”,“在于劳动者对于剥削制度所造成的巨大苦难的恐惧和绝望”。基于这种宣传,一切有关天国地狱、善恶报应的教义都是中共直接否定的对象。

中共宣传“社会苦难是宗教存在和发展的肥沃土壤”,并刻意将那些在常人中遭遇苦难、万念俱灰的人入教当作是宗教信徒的常态。

事实上,道家的张道陵(即张天师)曾三次被汉和帝征为太傅(在九品官制中为正一品官),张道陵都没有答应,而是隐居在鹤鸣山中修炼。释迦牟尼佛出家之前是迦毗罗卫国的太子,他的父亲为了阻止他出家的念头造了一座大花园,修筑壮丽宏伟的宫殿,令几百美丽的宫女日夜歌舞管弦陪伴他,并为他迎娶印度第一美女耶输陀罗为妻。然而太子仍然夜半骑马跨越城墙,至山林中苦修。太子成佛后,最早度化的五十六人中有五十一人都是波罗奈国的豪族公子。世尊返国宣说佛法,有王族豪贵的子弟中品貌端正者五百人随佛出家。因此,出家绝非对现实苦难(感情失意,或经济困难等)的逃避,而是发菩提心,以慧剑斩断尘缘的大愿。

在中共夺取政权之前,民间有一个信神的环境。释教和道教中的修行者被称为“法师”、“道长”、“高僧大德”等,是德高望重的象征,也是人们尊重的对象。即使是传统皇朝的皇帝遇到高僧也都给予礼遇和尊重。

而中共夺取政权后,就在民间强行推广“社会发展史”教育,破坏信神环境,将

如果说上述的诬蔑还属于“名誉上搞臭”，卡住知识份子的饭碗则是“经济上截断”，从反胡风运动到反右、文革则是“肉体上消灭”的一部分。

许多同中共在夺取政权年代出生入死，倾囊相助的民主人士天真地以为自己是开基立业的功臣，因此“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中共也会让他们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宏大的抱负得到施展的机会。在鼓励鸣放的“真情”邀请中，这些“士为知己者死”的高人义士，一个比一个正气凛然，一个比一个跌得更惨。当人们目睹了中共的所作所为，“党天下”的真实含义遂昭然于天下：“人民民主专政，或曰人民民主独裁”。章伯均、章乃器、罗隆基、储安平……等著名文人，无论是爱国归来的留学博士，还是携财从共的资本家，从部长、教授、文学家、总编辑、记者的位置纷纷被扔进共产党的右派牛棚，至死也没能从冰冷的现实中弄清楚这“民主”和“独裁”如何能被中共结合成“人民专政”。久诵不衰的精忠报国、舍生取义、人格尊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传统品格，都随着这末代鸿儒博学之士孤独的死去永远从历史舞台上消失了。人们恐惧的看到，积极悬挂人间天堂诱饵的中共党，首先建立的是人间地狱。

那些能够幸存下来的人，从此战战兢兢，不敢再提传统的价值，不敢再坚持知识份子独立的思想 and 人格。例如冯友兰、郭沫若，仅仅因为毛泽东的一句批评便吓得赶紧改变自己的学术观点。对于知识份子而言，独立的思想与人格就等于生命。这种摧残造成知识份子的内心苦痛绝对是无法形诸笔端的。

“知识份子”曾经是一种道德的同义词，表达的是清贫、正义、知识、涵养、不趋炎附势的社会形象。到江泽民时候，党的官场上出现了这样一种角色——“政治化妆师”。与文人的正统迥异，他们在政治舞台上抬轿子、吹喇叭的匠人，辅佐的不是圣贤之君，而是鸡鸣狗盗的江泽民之流。

在一片机枪坦克屠杀造成的血污中、在国际社会一片制裁和谴责的声浪中上台的江泽民需要涂抹厚厚的政治油彩，于是这帮文人发明了所谓的“三个代表”。他们不仅从政治上葬送了国运，而且从道德上玷污了知识份子必须具有的清白。

时至今日，中国的“专家学者”早已不同于那些继承了深厚正统文化和行为方式的知识份子，其中绝大多数经过中共无神论、斗争哲学、社会发展史洗脑，他们只是掌握了科学技术的专业人员，对正统的儒释道文化并未做过深入研究，更未将其融入生活。

此时的中共打出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标语，做着“党恩浩荡”的表演，伪知识份子则不遗余力地编造繁复理论去论证中共统治的合法性，抑或是各种社会悲剧的合理性。中共成功营造了“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文化精英”的铁三角，需要的就是象何祚庥这样面对死于矿难的矿工说“谁让你不幸生在中国了”的“知识份子”。

还有一些受党文化污染严重的知识份子，虽保有做人的基本良知，但空有忧国忧民之心，苦无报国安民之路，无奈中只能争取“体制内”身份，要求“体制内改革”，凡事寻求“体制内解决”。“体制内解决”无非是首先向共产党称臣，承认共产党和党文化对自己的控制权和任意使用权，进而取得一点点可怜的发言权。在没有选择的社会环境中，一些浸泡在苏联文学和共产党著作中长大的人，珍惜自己成长过程中的宿食，不知道是毒药，难以放弃对共产党的理想心结，为社会不公呐喊之余，却无法帮助人们弄清中共才是万恶之源。这些人对中共寄予希望的做法实乃用个人的德行遮盖中共的丑陋，延缓行将就木的中共寿命。

口沦为生态难民。2006年8月26日中国人大常委会在一份环境检查报告中，以“有水皆污”、“逢雨必酸”、“污染之重，触目惊心”、“不能再拖下去了”等字句来形容污染的严重性。中央电视台2频道曾报导中国每年产出的GDP当中，有18%的GDP是通过透支生态环境和资源取得的。有一幅卫星拍摄的地球照片，许多国家是绿色覆盖，而中国是一片黄土。许多网友面对祖国母亲被蹂躏如此，看到中共还在高喊“崛起”，不觉“万念俱灰”。

“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这曾是中共宣扬爱国主义的主打歌曲，有考证指出，这条美丽的大河就是承载全国六分之一人口的中国第三大河流淮河。有道是“走千走万，不如淮河两岸”。但是，短短的几十年，淮河污染之触目惊心，让这句民谣成为历史。工业企业偷排污水、农村水源污染和城市生活污水，使淮河流域约60%为劣五类水质，污染由地上波及地下，直接影响1.3亿居民生活。中共也喊治理淮河，但是，如果人心不治理，是没有用的。2004年7月20日至27日，淮河爆发有史以来最大的污染团，有如巨大的黑蘑菇，从上游奔腾而下，横扫千里淮河，充斥河面的黑色污染水团全长133公里，总量超过5亿吨，一路浩浩荡荡杀奔洪泽湖，顺者昌，逆者亡，满河黑暗，浮尸（鱼虾蟹）千里。“10年治污水质回到‘原点’，600亿付诸东流。”

党文化带给中国人的“不计后果”的心态，更是表现在热衷于搞大运动、大项目，劳民伤财，不顾自然规律。再大的工程，总是先上马再说，哪管什么后果，满足战天斗地、好大喜功的变态心理，走一步看一步，出了事算“交学费”，把国家民族的未来当作儿戏。

在“三峡工程”、“南水北调”等如此重大的项目中，决策人员也仍然以政治为决策依据。“六四”之后，中国民心低落，三峡工程就被选为振奋人心的工程。关于三峡工程，该不该修，人们听到的都是一面倒的消息，就算提到负面消息，也是早就有了“应付”对策，而反对一方的专家们的进一步反驳和详细讨论，百姓是看不到的，那是禁区。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水要流动就得有坡度，库区的头尾就要有落差，淹没区就必须是一条斜线。但是三峡工程“移民组”为了迎合当局缩减移民搬迁费用，提出的三峡移民淹没线竟是平的，就是如果大坝蓄水到预定的175米，另一头的重庆的淹没线也是175米。但是按三峡工程泥沙组公布的万分之零点七的水力坡度来计算，600多公里以外的重庆的水位高度将不是现在说的175米，而是超过海拔217米，到时就要为重庆“准备后事”了。如果要保重庆，水位就不能蓄到175米，那当初的防洪发电的效益也就大打折扣了。从中央到地方这么多精明的官员，还有这么多科学家，都知道水从高处流向低处，这么严肃的后果就不当回事？还有，三峡工程中的目标和措施之间大多互相矛盾。防洪和发电矛盾，防洪和航运矛盾，防洪和排浑蓄清矛盾，发电、防洪、航运与移民矛盾等等。大坝防洪就要保持低水位准备蓄洪，水位降低又会导致发电和航运能力下降。2000年5月17日，力主工程上马的张光斗教授在发现三峡工程的实际防洪库容不可能达到设计标准的错误后，对三峡建委办公室主任建议了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案：即把洪水控制水位降低10米。但低水位必然影响到航运，同时也必然影响到发电，为此张光斗主张修建燃油、燃气或燃煤的火电厂进行调峰，张一再叮嘱“但这件事在社会上公开是万万不行的”（《三峡探索》总第二十七期）。再有，如何处理泥沙淤积是水库成败最关键的因素之一，而200公里长的三峡是沙石最好的避风港，三峡水库拟采用“蓄清排混”的运行方式。海外有学者预言“排混”只对大坝前很短距离有效，而清华大学著名水利专家黄万里教授则斩钉截铁地说一块石头也出不去！黄教授1957年因为反对修建黄

河三门峡大坝,被毛泽东亲自点名,打成右派。数年后三门峡大坝的失败证明了他的主张是正确的。关于三峡工程,黄教授写过三封信,陈述“三峡工程永不可建”的理由。他只要求中共领导人给他 30 分钟的时间,把三峡工程问题给他们讲清楚,说服他们改变这一决策。然而,他连这 30 分钟的时间也没有得到。

“南水北调”是继“三峡工程”之后又一项世界级工程,主要目标是将长江水分东线、中线、西线调往严重缺水的华北和西北地区。东线、中线工程已于 2002 年底开工;西线工程计划于 2010 年开工。当初“三峡工程”还象征性地有个全国人大无记名投票,而现在人们连那个过场都嫌碍事,南水北调西线工程的设计者们竟然说,中央宣布东线、中线开工,就意味着西线也开工了。早在 2001 年 7 月就通过水利部专家委员会审查的“西线工程纲要”,到 2005 年 3 月才让长期工作和生活在调水区的自然科学家、工程技术专家、经济学家、人文科学家等才第一次看到其“庐山真面目”,让这些第一线的专家们十分忧心。西线工程要在源头上把长江水引到黄河,而黄河比长江高出 200 米,比三峡工程不知要难多少倍,风险也不知要大多少倍。有专家感叹“西线工程令人担忧,会不会救了黄河毁了长江,甚至救不了黄河还毁了长江?”呼吁中共“告别改造、征服自然的幻想”。但是,他们的话在以政治决策为中心的中共那里,又能传多远呢?极力支持工程上马的西线工程设计总工程师对外界质询的回答是“随着项目推进,一切都会逐渐明了”。被中共的“战天斗地”洗脑过的人们,在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上动土,态度居然也是“摸着石头过河”。

老子讲“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从来没有让人去和地斗,破坏自然。在传统观念中,人和自然不是相互对抗的,“天人合一”讲的是要与自然和谐相处。现代的可持续发展观其实不是什么新鲜事,中国早在公元前就有保护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理论,它使得中国拥有过发达的传统农业,支撑了灿烂的传统文化。为什么现在发生了生态和人文环境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正是因为这种不计后果的做事方式,违背了自然规律,使得青山不再,绿水断流。特别是现在在金钱利益的驱使下,失去了对自然的敬畏心理的人们,更是胆大妄为,什么都敢去干。当大自然报复的时候,谁来拯救我们的民族呢?

世风日下 不讲道德

公务员以及其他各行业的职业伦理也日渐低下。看医生要递红包,孩子入学要交红包,打官司要给红包,记者写新闻要收红包……金钱把一切固有的职业道德污染了;正常的社会运作模式被破坏了;旧有行业的职业道德变坏了;新生行业的职业道德根本就没有一个健康发展的环境,一出生就已经被污秽包围了。

就说造假的程度,从假烟假酒假火腿,到毒米毒油毒奶粉,什么都有。2003 年安徽阜阳发生了害死婴儿的“毒奶粉”事件。长期食用这种奶粉的婴儿,头大身子小、身体虚弱、反应迟钝,并伴有大面积皮肤溃烂、内脏发育肿大。仅阜阳市出现营养不良综合症的婴儿就有 171 人,因并发症死亡的有 13 人。许多患“大头娃娃病”的农民家庭,为了给孩子治病,几乎花费掉了所有积蓄,有的甚至变卖了家产。不少家庭因为没有经济能力,不得不放弃治疗,眼睁睁地看着孩子死去。2006 年,北京市粮食局所把 2300 多吨陈化毒米流入市场,里面含有大量致癌物质,包括目前发现最强的化学致癌物黄曲霉素。然而商家为了利益不管百姓死活,毒米公然进入市场波及全国,湖南、湖北、上海、北京、广东、辽宁、四川、湖南都出现数以吨计的毒米。更有甚者毒米掺好米,百姓无从分辨,曝光已经是几年后的事情了。

过去叫盗亦有道,掺假骗钱,也就骗个钱,再缺德也不能下毒。而今天的人们,

悲剧算在孔子头上。

第八种是挑动人的嫉妒心。《批判》一书专门渲染“孔子的贵族生活”挑动人的嫉妒心。事实上,如孔子所言“鱼馁而肉败,不食”等实为基本的养生之道,并非什么贵族生活。

(2) 批判知识份子

《左传》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中国传统文化给知识份子提供大显身手的历史舞台,群星璀璨,人杰地灵。

改造知识份子也被中共视为极其重要的一步。中国传统社会讲“士、农、工、商”四个阶层,其中“士”简言之就是知识份子。“士大夫”阶层是道统的承担者,因此从道德角度来看,他们甚至比统治者更有话语权,更遑论普通民众。中共不认同知识份子代表的正统道德观念,但需要以知识份子为中介去改造普通人的思想,因此中共一旦掌握政权,首先要做的就是改造知识份子的思想。

1950 年 6 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的讲话中就谈到,对知识份子,“要使用他们,同时对他们进行教育和改造。要让他们学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等几门课程”。毛所谓的教育和改造除了令大中学校组织教师学习政协三大文件、社会发展史和新民主主义论之外,从 1951 年秋天开始,组织大批知识份子参加或参观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运动,这一场场的血腥运动让许多知识份子看到了共产党的残忍和凶狠,许多人的脊梁骨那个时候就吓软了。1952 年 1 月,全国政协常委会做出《关于展开各界人士思想改造的学习运动的决定》,即让被改造后的知识份子把中共给他们灌输的思想推向全国,改造所有人的思想。

早在清末废科举后,知识份子中的很多人转而去依附政党。这个过程是个痛苦的过程,也是知识份子“主动”进行思想转变的过程。这种转变当然不会被中共认为已经足够,因为知识份子尽管认为他们需要高扬民主和科学的大旗,而儒家的绝大多数修身立命之学仍可作为判断是非的准则。这恰恰是中共不能容忍的。

毛泽东在 1939 年 12 月发表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将知识份子一笔划进“小资产阶级范畴”。在那个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这项“小资产阶级”的帽子就足以让知识份子抬不起头来。

中共通过宣传机器歌颂工人和农民,将他们的知识匮乏当作是革命的动力,宣传“朴素的阶级仇恨”加上共产党的引导就足以使革命走向胜利。而在另一方面,知识份子被电影赋予了符号化的脸谱——戴一副眼镜,畏畏缩缩;他们拘泥书本,看不起群众,做事主观等等。

1958 年由成荫导演的《上海姑娘》公映不久就受到严厉批判,其原因竟然在于:“第一,知识份子在没有一个党委书记或支部书记给以批评教育的情况下,居然坚持原则,在建设中发挥自己的才干,这是取消党的领导,反对党的领导;第二,没有写知识份子的‘软弱性、动摇性、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等缺点,……这是美化资产阶级知识份子;第三,……表现主人翁是受到工人中一些落后思想的影响才导致急功近利……这是‘往工人阶级脸上抹黑’。”第三点的原因也是挑拨工人与知识份子的关系。

这些对知识份子的污蔑宣传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其原因在于知识份子一直是社会思潮的领导者,一直是社会问题的发言人,一直是传统文化的传承者和论述者,当知识份子的形象被成功抹黑后,他们所代表的价值观也就随之颠覆了。在群众眼中,知识份子不再是尊重和求教的对象,而是嘲弄和批判的对象。

续了部分儒家思想,即使西方启蒙时代的大哲学家伏尔泰也自称是孔子的学生。
自汉代以降祭祀孔子的香火不绝。夺取了国家政权却骂孔子、砸孔庙的事情只有共产党一家而已。

中共从毛泽东开始就非常痛恨儒家文化,其原因在《九评共产党》的第六评中已有分析,此处不再赘述。毛喜欢秦始皇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因为他与秦始皇一样采用法家的诡诈权谋祸乱国家,特别是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尤为毛欣赏、仿效和超越。

倡导“文、行、忠、信”的孔子被中共骂成“一切旧理论的师表,恶势力的灵魂”,称“自有生民以来,实未有如孔子罪大恶极,而为善人、大多数人的公敌者。今后,人类共起而攻之,可也!在古今中外所有思想家的言行当中,孔丘可算第一荒谬。”

上述泼妇骂街式的言论占据了中共批判孔夫子文章的主流,因为中共除了对孔子的言论进行断章取义、玩逻辑陷阱之外,从来没有拿出过、也不可能拿出令人信服的证据。

中共对儒家的批判是以阶级斗争为出发点和基础的,称孔子代表了奴隶主阶级的利益。今天在资本家已经加入中共,或者中共官员自己已经成为腰缠万贯的权贵资本家或权贵地主的时候,阶级斗争理论破产到中共都不愿意提起的程度(当然并不妨碍中共以阶级斗争的手法继续迫害异己)。此时回头观看对儒家的批判都成了笑话,因此中共为维护自己统治起见,也不得不假装去褒扬孔子。最近几年为了搞统战,中共又在海外准备建所谓“孔子学院”,试图利用自己批判过的孔子去骗向往中国文化的人。另一方面,大陆教学生背诵儒家十三经的民间学校却被中共取缔。

中共早在夺取政权之初,就出版了蔡尚思的《中国传统思想总批判》一书(以下简称《批判》),对孔子进行诋毁、谩骂和批判。其中中共所惯用的逻辑陷阱值得概要分析,因为这些逻辑问题仍然是中共党文化中大批判的重要手法。

第一种是断章取义。从孔子要收取学费(束脩)就断定孔子只为贵族服务,全然不管孔子“有教无类”的主张。孔子的学生中子路就出身贫贱。

第二种是张冠李戴,把别人说的话安在孔子的头上。例如《春秋谷梁传》为子夏的弟子所做,《批判》却利用其中有关伯姬的论述部分攻击孔子。

第三种是不当类推,从孔子说的“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得出“这无异于认‘国家兴亡,匹夫无责’”的荒谬结论。把个人对待职位的态度类推到公民的义务上去。

第四种是不当类比。称自汉代以降的独尊儒术与秦始皇独尊法家一样,全然不顾儒家以道德感召人,而法家以赏罚来引诱和胁迫人的不同。

第五种是混淆原命题与逆命题的不等价关系。比如《批判》中说:“既然女子全是小人,就可想见男子全是君子了。”

第六种是扣“反科学”之类的帽子,称孔子“违反自然科学”。事实上,孔子谈论的大多是伦理和政治层面的事情,这些都与自然科学无涉。正如不能用直尺测量重量,自然科学的原理也无法衡量人的行为的善恶。更何况孔子规定的“六艺”中包含“数学”,此为自然科学之基础。

第七种是含沙射影。提出“三纲”者明明是法家韩非子、汉儒董仲舒等人,《批判》一书也承认这一点,但是指出妇女为守贞节而自杀的时候举了几个很惨烈的例子。这些例子与孔子毫不相干,恰恰相反,《礼记》记载,孔子的儿媳妇与孙媳妇都是再嫁的。然而在通篇批判孔子的大背景下,难免不让读者将《批判》一书中的

除了少数心里还遵从传统道德约束的人,更多的人是觉得道德、良心能值几分钱?中共的无神论、唯物论、不讲天理,不讲道德,教育出来的就是这种为了钱,为了个人利益,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的人。

2001年4月16日,朱镕基在视察上海国家会计学院时,为该校题写的校训是:“不做假账”。无独有偶,2003年3月24日的《三湘都市报》报导,有些当地教育局出台的治理教育“三乱”的“八个严禁”,“严禁奸污猥亵女生”竟赫然名列其中。不知这样的校训和规章,是让人民放心还是更担心。

当一个社会已经确立了游戏规则,社会民主制度、法律体系、媒体监督和言论自由和宗教信仰已经比较完备地建立,民众的道德维持在一定程度,国民心态比较平稳时,再有乱七八糟的东西,也会是在规则之内,道德和法律在原则上有个约束。而中国是规则还没有确立,就先学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而且有过之无不及,没有任何道德的制度的宗教的底线约束,后果可想而知。

性泛滥造成社会危机

时下的中国,是一个“笑贫不笑娼”的时代。中共的政治改革是禁区,相反,“性生活”却成为开放最彻底的。婚外恋、包二奶、一夜情、白领阶层的换妻游戏、婚前同居、网婚、闪婚、隐婚、成人用品商店、卖淫、色情按摩、性表演、脱衣舞、电视电影节目煽情性的表演、性感美女在平面媒体的独领风骚等等,谈政治色变的中国社会,人称正在发生着一场前所未有的“性革命”。公安部的数据表明,1984年查获的卖淫嫖娼的人数是6千,1999年达45万,被查处的人数直线上升,但查获率是1%还是10%,没有人知道,但绝对超不过10%。在这股席卷全民的“黄潮”中,不但是青年一代意识领先,就是中老年人也不甘示弱,似乎要挽回过去被“耽误”的时光。电影《手机》和安徽原副省长王怀忠的名言“查嫖娼就是破坏投资环境”,就是这种社会现象的折射。忆往昔“全国上下一片红”,看今朝“全国上下一片黄”。

包二奶、养情妇、性贿赂,已经成为官员追求的一种“流行时尚”,不但不引以为耻,反而引以为荣。调查数据显示,被查处的贪官污吏中,95%有情妇。在1999年广州、深圳、珠海公布的102宗官员贪污受贿案件中,100%包养了“二奶”。但这还只是冰山一角。天门市委书记张二江一个人就有情妇107个。

从官方到民间,从权势人物到平头百姓,没有了道德的约束,只要有条件,就都想着占上一把便宜。上级对下级,老板对员工,教授对学生,导演对演员,强者对弱者,性侵犯处处可见,天理、人伦都可以不管。

就连本是教书育人的学校也频频出现禽兽教师。有的学生遭到强奸怀孕,有的被强奸并包为二奶,有的老师强奸未成把学生杀害了,有的甚至对非常年幼的小女孩下手。国内媒体2003年报导,重庆大足县一名小学教师,从2002年至2003年,先后对自己所教的10名未成年女学生实施强奸猥亵。甘肃陇西县一名体育老师以帮学生走后门上学为名,将该校12名初三女生强奸,其中两名学生被强奸后怀孕。贵州省锦屏县河口乡中仰小学一名51岁的教师在一年半时间里42次强奸12名女学生、35次猥亵16名女学生,仅有3人幸免于他的魔爪。2004年6月,临夏县一小学教师在一年半时间内先后将三年级的9名女同学多次强奸和猥亵,其中次数最多者达数十次,而这些孩子最大的一名还不满15岁,其他均是9到10岁的女童。湛江市下辖的雷州市南兴镇某小学校长林登平3个多月竟然作案7次,共强奸11名均是在校学生的未成年少女,受害者最小仅10岁……这样丧心病狂、触目惊心的恶行,在今天却已经屡见不鲜。

中国人在性的问题上自古都是严肃认真,把操守看得很重。只有结婚之后才能住在一起。结婚时要拜父母、拜天地,有天地神明为自己的婚姻作证。反之,如果有人被指控私通、淫乱,那会是一项大罪。强奸就更是跟杀人放火一样,罪不可赦。“万恶淫为首”,但今天的中国人,似乎已经完全忘记了先辈的古训。这种局面,不能不说与中共破坏传统道德价值,宣传无神论、唯物论密切相关。在中共的党文化里,权力就是道德的最大诠释者。只要有权,只要有条件,就可以肆意妄为。从共产党早期的“共产共妻”,到毛泽东的淫乱,再到现在中共官员的腐败堕落,从官方到民间,一切传统价值都被颠覆了,一切家庭人伦观念被抛弃了。但历史一次次地告诉我们,乱性往往是一个民族走向覆灭的先兆。再发展下去,我们到底期望一个怎样的未来?

黄赌毒产业化 官方成保护伞

中国卖淫业一直是非法的,性产业必须同军警结合才能生存和发展。有些性产业根本就是同军警合作办的,有的也不隐瞒这点,因为这是提供安全的保证,例如军队或公安的招待所反而客似云来。性服务业涉及的经济利益越来越庞大,就业人员大约有 1000 万,涉及的消费每年大约 1 万亿人民币。由于 2000 年的警察行动,中国经济学家杨帆估计,失业的女性工作者的消费降低,中国 GDP 因而减少了 1%。北京大学中国公益彩票事业研究所兼职研究员王增先在研究会上“保守估算”,每年有将近 6000 亿元人民币的赌资流向国外及港澳地区。毒品市场 3000 多亿人民币,吸毒人员超过 1 千万。沈阳市禁毒支队队长陈鑫、沉河区分局原局长曲月福和现局长张保华及另外 100 多名警官为毒贩做保护伞,毒贩和警察勾结,贩毒“一条龙”。黄赌毒三大市场几乎相互关系协调发展,由于从事三大行业的人员需要有特殊的地位与背景,因此,中国的军警及政府要员成为三大行业的最重要的受益者,因为没有政府及军警做背景这三大行业在中国寸步难行。官方参黄参毒参赌,上行下效,造成中国人对吸毒贩毒赌博卖淫嫖娼司空见惯,甚至亲身参与,不觉得自己干坏事。

在感受着经济发展带来的现代生活时,人们最有切肤之痛的就是社会道德下滑后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有人形容共产党过去在课本里宣传的“德育、智育、体育”全面发展,今天早已变成了社会实践中的“权欲、钱欲和性欲”全面崛起,名曰“三玩博士(玩权,玩钱,玩女人)”。假货盛行,色情泛滥,黑社会活跃,官商勾结,警匪一家,而民间疾苦却乏人问津,社会公正更是不得伸张。这样的社会里,没有内在的道德约束,没有外在的舆论约束,没有外在的法律约束,每个人都是受害者。

3、天不怕地不怕,张嘴就是谎言,满嘴脏话,行为低下

中国素以“礼仪之邦”闻名于世。敬天信神、相信善恶有报是中国人几千年的传统,即使那些没有明确信仰的人,也相信“老天爷”的存在。传统上中国人遵循神佛、圣贤的教诲而努力完善自己的人格。人们对天、地、人的态度是恭敬、谦卑的,整个社会通过礼仪来规范。

然而共产党鼓吹的是“天不怕地不怕”。只有把人改造得无所畏惧,中共利用来夺权、搞运动才方便。要是人对人有礼,对物有惜,对天地神明有敬畏,这样的人是不会把“听党的话”放在第一位的。因而在党文化的建立过程中,中共灌输的无神论使得中国人远离华夏祖先对天地神明的敬畏和对生命终极的关怀;其斗争思想又使得中国人既不信“壁立千仞,无欲则刚,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古训,也不信“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教诲;其唯物主义则使中国人彻底抛弃祖辈们上下求索

系统地接受中共以无神论为基础的邪说,进而再制造并维护适合中共生存的社会环境。这就是中共进行系统的思想改造的后果。

1、批判儒释道

在几千年的历史中,儒、释、道家的影响深入到中国社会各个阶层。

中国儒家尚“仁”、尚“义”,孔子讲“见义不为,无勇也”,又讲“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儒家的天命观深入民间,《论语》中说“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中庸》开篇讲“天命之谓性”,指出人的根本特性乃受天所命。在古人看来天是万物之本,是一切价值的源头。人的生命既由天所赋,此生的目的即在回归天命,实现内心向善的要求。被儒家视为群经之首的《周易》讲“三才”,即天、地、人,天生人,地养人;人又可以取法天地,“与天地合其德”。天地的运行则遵循不变的天理。老百姓相信一个高高在上而又制约人世间一切的“天”,用“不变”的天理衡量人间的一切。儒家思维维系着道德与社会秩序。

佛家讲善,讲慈悲、讲忍辱,重视生命,信奉众生平等。在中共建政之前,佛家的六道轮回、积德行善、因果报应已成为百姓的常识,即所谓“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来世果,今生作者是”。客观地讲,佛家“善恶有报”的观念对于稳定社会、维持人的道德,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道家强调“真”,强调清静无为,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的统一,达到返本归真的目的,即所谓“人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中国的中医与气功皆源自道家,此外服气、炼丹乃道家养生之道,道家占卜与预测之准确则让人叹为观止,大道修炼者更有肉身成道、羽化成仙的神迹。在世层面,当今天人与自然的关系越来越对立,环境问题成为全球最重要的话题之一时,道家思想也引起各国学者的重视,更显出其特殊的价值。

对于中共来说,儒家的“天命”、佛家的因果报应、道家的无欲无求、与世无争是中共发动“阶级斗争”的障碍。儒释道经典确立的道德观,是中共树立自己道德权威的障碍,也阻碍了中共造反、革命、专政等政治运动。佛道两家修炼都让人超越生死,儒家让人舍生取义,这是中共利用物质手段来控制整个社会的障碍。佛家的涅槃彼岸、道家羽化成仙的遗迹与道法自然的精神、儒家的天命观都被中共视为宣传无神论的障碍。

1) 批判儒家

(1) 批判孔子

儒释道三教中最溶入生活的还是儒家思想,盖因中国人一直以家族为生活中心,而儒家文化所规范的正是家庭伦理,再将家庭伦理推广到社会生活和政治中。

近两千五百年来,中华文化的入世部分基本上以儒家文化为主导。自鲁哀公立庙祭孔开始,汉高祖用儒家的礼节制定朝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唐太宗追封孔子为文宣王,到清圣祖康熙大帝手书“万世师表”四字于曲阜孔庙等等,历朝历代对孔子都有追封或祭祀,即使是在汉化程度最浅的元朝,元成宗也加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孔子对人类的影响早已超越国界,不仅日本、韩国、越南等亚洲国家承



逸因为缺少信仰约束、道德约束、媒体监督，所以利用国家权力行起恶来，其后果就极具灾难性。且其低下堕落的品质所起到的示范作用，带动社会道德急速下滑。

“造神”成为个人独裁的基础，因为神不会犯错误，共产党的领袖也自然要被装扮成真理的化身，其他人只要盲从就可以了。于是“一言堂”被合理化，一个大脑代替了几亿大脑，灾难性的后果得不到纠正。独立思考变成了一件危险的事情，因为可能会得到中共不想让人得出的结论，于是人们随大流、跟风等等，自己的人生自己不做主。一切问题唯中共马首是瞻，或等待组织决定。

造神的另一个后果，就是许多人在被迫害很严重的时候，仍然“相信组织相信党”。当信神者被迫害时，他们可以对着心中的神去祈祷，寄希望于神的公义，而无神论者被迫害时，他们无法寻找更高的道德权威，而陷于一种孤立无援的境地。此时人只好自我安慰说：中央是好的，“组织上会搞清楚的”。这种自欺欺人，也是中共自我神化的结果。

有神论者遇到困境时，会祈祷，甚至到寺院道观中烧香许愿。无神论者无处可去，于是“有困难，找组织”，希望党来解决问题，却不知党才是问题的真正制造者。

中共夺取政权之初即垄断媒体和教育，以一言堂的方式灌输“无神论”和“唯物论”，对传统信仰进行取缔、歪曲和镇压，对知识份子进行思想改造，对传统文化进行多方抹黑，贬成“封建”、“迷信”，一概骂倒，操纵暴力机器消灭不肯服膺于党文化的出家人或知识份子，或者利用切断生活来源的方式胁迫反对方臣服，再通过个人崇拜的造神行动填补人信仰需求的真空。在中共眼里，认同哪一种文化，并非是一个学术问题或单纯的观点问题，而是政治问题、阶级立场的问题。至文革后期，党文化终于磨砺成熟，对传统文化的系统性替代也达到了中共希望的程度。劣币驱逐了良币，新生代都在党文化教育中长大，对正统文化和观念更是懵然不知。

第二章 系统的思想改造

政治学习，改造思想，这类事情中国人都多多少少经历过。很多人可能会问，为何人的思想需要改造？其根本原因即在于中共的一套好恶标准、思维方式和话语系统都是反人性的，不但不可能在大众中自然产生，而且容易被人性所排斥。更何况共产党本是西方舶来品，是被唾弃的政教合一的独裁体系，与中华传统文化极为抵触。中共要想立足，就必须营造一个党文化环境，改造思想就成了必须而迫切的一步。

改造的重要一步就是批判中华文化的信仰之本——儒释道。同时，民间的传统观念，乃是三教所确立的价值观在世俗中的反映。这些观念早已成为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也容易使人上溯其宗教根源，因此对传统观念的批判，也是中共从中国人的思想里根除中国传统文化以及信仰的重要一步。这样，中国人就丧失了对中共及党文化的辨别和判断能力。

中共对儒释道的批判和对传统观念的批判清除只是属于“破”的一步，同时中共还要“立”它需要的思维方式，如斗争思想、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以及进化论与现代科学，从而让人



的心灵上的超越、人格上的升华之“道”，把来自东方的“慈悲”和来自西方的“博爱”视为“麻醉人民的精神鸦片”和“虚伪的遮羞布”。人们的语言中充满了“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咄咄逼人，充满了“战天斗地”的狂傲，举止粗俗、满嘴谎言和脏话，却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张嘴就是谎言

世界上哪个国家都有人说谎，但是，在许多国家整个社会的机制是以诚信为基础的，讲信用是一个人能够长期立足社会的资本。而在中共统治下，谎言成为中共社会的“立国之本”，整个社会靠说谎支撑，说谎成为人们在社会上生存的基本技能。

中共的历史就是一部谎言史，谎言是维持共产党的统治的柱石。不管是公开，还是私下，不管是对内，还是对外，不管是大事，还是小事，处处都充斥着谎言。人们在政治斗争中，从中共的榜样中，也学会了谎言。人们为了符合党的要求，避免自己成为被运动打击的对象，就得陪着党说谎，跟着喊“超英赶美”、“亩产万斤”、“一片形势大好”。中国大陆流传过这样一首打油诗：“村骗乡，乡骗县，下级骗上级，省长骗中央，一级一级往上骗，一骗骗到国务院。”一路说过来，人们觉得习惯成自然，好像说谎就是天经地义的事，整个世界和社会就是这样运作的。

电影《手机》反映了张口就是谎言的社会现象的一个侧面：因为有了外遇，所以要精心编制谎言来欺骗别人，家庭成了编谎和拆谎的战场。不但如此，它也演出了生活中惯用的许多经典谎言，整个社会存在手机恐慌症，不是怕手机，而是因为手机容易揭开谎言。电影的编导有句话：“有很多时候谎言支撑着我们的生活”。

传统观念中，道家讲做真人，佛家讲出家人不打诳语，儒家讲信，都认为撒谎是不对的。孔子把“仁义礼智信”作为五常。其中人与人之间的诚信，是人最重要的美德之一。所以孔子也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就是说如果人没有信用的话，不知道他还能做什么。

治理国家的道理何尝不是如此。孔子的学生子贡曾向老师请教治国的办法。孔子说：“一是让老百姓丰衣足食；二是国家拥有强大的军队；三是取得臣民的信任。”子贡问：“如果迫不得已要去掉一条，应该先去掉哪一条？”孔子说：“去掉军队。”子贡又问：“如果再去掉一条呢？”孔子答：“去掉衣食，宁可不得足食，也要保住信用。如果得不到臣民的信任，国家迟早要灭亡。”

因为唯物论强调物质是第一性的，人们考虑问题都从物质利益出发。在传统观念被批判否定后，中国人没有任何对谎言的顾忌和来自道德的约束。整个党文化体系又是鼓励说谎，人们说谎话没有任何负罪感。说谎变成了没有任何理由的一种本能行为。只要对我有利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天不怕地不怕，因此用谎话来取得自己的利益变成了普遍现象，不但张口就是谎言，而且说谎的时候已经在考虑下面怎么说怎么做能够圆谎了。

还有人把撒谎不讲诚信的社会现象，归结为西方“资产阶级”特有的、唯利是图的市场本性。然而市场经济在西方发达国家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了，而这些国家并没有因为实行了市场经济就成了骗子社会。恰恰相反，西方国家十分注重诚信，诚信是最不可或缺的个人品质和最重要的人生财富。在西方，诚信已成为经济交往中最基本的准则，也是企业追求的目标。在利益和信义发生冲突时，人们会选择信义，因为惟有信义才能带来持续的利益，一时的欺诈会取得短期的收益，但最终会成为企业发展的绊脚石。不讲诚信，在西方国家里，时间一长寸步难行。

党文化让人说谎还表现在两套话语系统中，就是台上一套，台下一套。“落实以

德治国,……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贵州省委书记刘方仁,受贿 660 多万元,无期徒刑),“我最大的心愿是在未来 5 年内解决尚未解决温饱问题的 160 万人口的贫困问题”(云南省省长李嘉廷,受贿 1800 多万元,死缓),“想到广西还有 700 万人没脱贫,我这个当主席的是觉也睡不好呀”(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克杰,受贿 2000 多万元,死刑),“反腐倡廉工作一刻也不可放松,始终头脑清醒、旗帜鲜明、态度坚决”(上海市委书记,政治局委员陈良宇,涉及数十亿社保基金案,被撤职调查)……同样,普通的民众也存在两副面孔、两套话语系统。在做政治表态,写政治学习体会时使用一套冰冷的政治话语,在生活中使用另一套比较人性化的语言。

人人张嘴就说谎,既是为了适应中共的政治环境,同时,也已经变成了人们的思维习惯,谎言造成了社会的诚信危机,老百姓最后不得不吞食社会道德堕落的苦果。一个全面腐败,全面造假的社会,人们自己都说“法不责众”,谁也不知道该如何收拾中共造成的这个烂摊子了。

党文化教人学流氓说脏话

除了撒谎之外,满嘴脏话也是党文化中的一个特色。传统观念衡量好坏看品德,而中共的历史唯物主义是在“革命”和“阶级”标准下辨别好人和坏人,把中华传统礼仪一脚践踏在地。

巴黎公社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可以说是共产党的老祖宗。自称流氓无产者的巴黎公社社员们按照历史记载是地地道道的流氓,当年这些没有受过教育、靠偷鸡摸狗过活的社会流氓地痞打着共产主义的旗号洗劫了巴黎城。受巴黎公社流氓起义的启发和苏共的栽培,中国共产党也是依靠流氓无产者起家。中共认为“流氓地痞之向来为社会所唾弃之辈,实为农村革命之最勇敢、最彻底、最坚决者”。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里并不讳言游民痞子的革命作用而大声疾呼痞子运动“好得很”。毛还在 1964 年 8 月 18 日一篇《关于哲学问题的讲话》里说,“什么北大、人大! 还是那个大学好,我就是绿林大学的,在那里学了点东西。”

中国古代也有流氓得天下的例子,刘邦年轻时在沛县当亭长,以好色嗜酒而出名。可是他夺得政权之后,也懂得马背上得天下,不能马背上治天下的道理。他命令儒者叔孙通和他的门徒一起,制订朝仪,用道家思想,以道德仁义、清静无为令天下休养生息。古时的流氓也知道维持政权得用正统文化而不能用流氓手段。

但中共夺权之后,却继续以流氓手段统治国家。在党文化的体系里,处处充满流氓的匪气霸气,知书达理是“封资修”,知识份子“臭老九”,粗鄙下流成为最具“革命精神”。满手老茧的工人心最红、农民脚上沾的牛粪最香。“尽管他们的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小资产阶级知识份子都干净。”你要觉得牛粪是臭的,那么就说明你的阶级感情有问题,所以几乎所有的知识份子都必须说牛粪是香的,越闻越香。经过数十年中共对流氓粗鄙文化的宣扬歌颂,从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中改造着人们的生活习性,把人变得满嘴脏话,行为低下。互联网论坛上,充满脏话和诅咒的帖子可以说是中文网站的一大特色。本来可以心平气和地讨论,却变成了某些人用各种下流恶语进行谩骂和大搞人身攻击撒野的地方。在被党文化灌输的仇恨和狭隘的“爱国主义”偏见之下,民主、人权、台海、法轮功、宗教信仰、外交关系等等话题,都能成为被下流谩骂的牺牲品。

从最高领导人的流氓语言,如“脱裤子”、“割尾巴”、“放屁”等被写进教科书,

中共仍然在用“反复学习”、“深刻领会”、“贯彻实施”、“抓好落实”之类的宣传,对待江泽民或胡锦涛的“重要讲话”,实则是对现任领导的造神运动。

无神论的推行来自十九世纪的进化论学说(进化论的谬误将在稍后的章节中述及)。所谓“唯物”并非完全否定精神的力量,而是否定超越人类之上的一切存在,即神的存在。

至此,来源于信仰经典的道德标准,包括东方佛教中的善、道家的真、儒家的“克己”与“和为贵”、西方的摩西十诫等等全部失去了依托。于是,道德标准变成了“人”们可以不断改变的行为准则。

共产党社会中,价值观和道德的解释权落到了最高统治者手中,一切与中共价值观抵触的普世道德,都可以轻易被中共扣上伪道德、封建残余、资产阶级人性论等等各种帽子,而后中共自己再站在解释道德的制高点,冠冕堂皇地进行批斗镇压。

既然中共“伟光正”,一切“党文化”就必须歌颂这种“伟光正”。然而另一方面,中共又是一个血债累累、邪恶至极的邪教组织。在失去道德坐标的情况下,歌颂共产邪教“伟光正”的文化,可想而知,会给人的道德造成什么样的混乱,会对社会风气起到怎样恶劣的导向作用。

在中共的宣传中,马克思不仅仅是革命家、哲学家、科学家,而且是一个道德上的完人。然而实际情况却远非如此。1843 年贵族小姐燕妮嫁给了 25 岁的马克思,还带来了陪嫁的女仆琳衡。一向对“剥削”假装深恶痛绝的马克思,不但心安理得地花着当资本家的恩格斯“剥削”来的钱,无偿占有着女仆琳衡的劳动,并强占琳衡的身体在 1850 年产下一个私生子。当时,燕妮因为此事和马克思吵得不可开交,于是马克思把眼光投向了老朋友兼单身汉恩格斯。为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声誉,要恩格斯替罪,私生子用恩格斯的字命名,由恩格斯寄养在工人之家。吃了哑巴亏的恩格斯临死之前得了喉癌,不能说话,在一个纸盘上写下了:“亨利·弗来迪是马克思的儿子,图西把她的父亲理想化了。”弗来迪就是马克思的私生子,而图西是马克思的女儿。这段丑事,现在已经在东德的博物馆里展出了。

2004 年 6 月的《欧洲神经学学报》(The European Journal of Neurology)上披露,三位以色列医师参考历史资料得出结论:列宁在领导 1917 年的 10 月革命之前,就在欧洲感染了性病梅毒,并终于在 1924 年毙命。所参考的历史资料包括列宁在欧洲和苏联的治疗医生的记载、列宁的健康状况材料及被研究者称为“政治宣传”的验尸报告。研究者之一的精神病医生勒纳(Vladimir Lerner)对纽约时报记者说:“如果你消去列宁的名字,而把其症状拿给任何一位精通传染病的神经学家看,他会说,‘梅毒’。”

中共党员在文革以前似乎都是禁欲主义者,但毛泽东有三个老婆当无疑问:杨开慧没有死,就娶了贺子珍;还没有与贺子珍离婚,就娶了江青。1994 年,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了二十二年之久的李志绥出版《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一书,披露了毛泽东纵情声色犬马、糜烂透顶的生活。书中提到毛“一贯以女人为玩物”,征召大批美丽、年轻的女孩入宫,“女人像上菜般轮番贡入”。

毛泽东的卫士宣称毛在大饥荒的时候不吃肉,以示和人民同甘共苦。而事实上毛在大饥荒已经发生的 1959 年,指示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为他修建了滴水洞行宫,其代号为“二〇三工程”。从 1960 年下半年启动到 1962 年,建筑面积共 3638.62 平方米的一、二、三号主体工程连同韶山冲至滴水洞公路,同时竣工,耗资 1 亿。这些金钱如果购买粮食,湖南省就不会在那三年中至少饿死 150 万人。

共产党领袖的荒淫生活当然不会仅仅局限在纵欲方面,其权谋、冷酷、骄奢淫

在纵情的享乐中无暇反对共产党,这样的“左右互搏”在中共的统治历史中比比皆是,背后维护中共统治的目的则一以贯之。

儒家文化的核心是家庭伦理,这种家庭伦理关注的是亲情,是仁爱。在共产党的宣传中,则是以阶级感情来取代亲情和友情。如李玉和所唱“人说道世间只有骨肉的情义重,依我看阶级的情义重于泰山”。所谓“亲不亲,阶级分”。互相成为“同志”者,即成为革命大家庭的一员,反之则是坚决镇压的对象。是“同志”还是“敌人”,简单的二元对立关系划分了一切社会关系,凌驾于亲人或朋友关系之上。当阶级斗争需要时,父子反目、夫妻成仇,用检举、批斗、毒打自己的亲人来表示自己阶级性强于人性,向党表示效忠。

在中共的宣传中,“咬住仇,咬住恨,嚼碎仇恨强咽下,仇恨入心要发芽”,类似的歌词充斥中国。仇恨是共产主义的动力之一,也是一种更为重要的共产主义情感,仇恨的反复灌输成为中共各种群众运动的动力所在。人类普世的同情、关爱、善良等等,因此成为共产主义天然的敌人,必须加以铲除。

4、宣传马恩列毛的伟大

在确立了无神论和唯物论两大党文化的理论基石之后,通过全面否定神传文化,党文化的体系就“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民众在信仰上形成了一个空白,共产党一定要造出自己的“神”,注入到民众的思想中去,填补这个真空。正是通过这种造神运动,共产党这种政教合一的邪教组织体系全部完成,画“神”点睛之后,反天反地反人性的党文化就终于活起来祸害人间了。

尽管中国历史上也出现过如“黄巾军”、“太平天国”之类政教合一的政权,然而这些政权都没有统一中国,更没有把他们的教义推广到其组织之外。而中共是唯一夺取了全国政权,并用暴力手段强迫人接受其教义的“政教合一”的组织。其教主就是中共在各个时期的最高掌权者。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之后,还有过两年的“英明领袖华主席”。造神词汇永远被用来修饰共产邪教的教主。因此相继成为“革命导师”的马恩列毛就是理所当然的造神对象。他们被冠以“解放者”或“救世主”的荣誉,捧上神坛。

神是全知全能,不犯错误的。中共在造神过程中也在树立自己“伟大光荣正确”的形象。因此,中共最高领导人如果在位的话,是不可能真的认错的。因其权力的合法性来源就在于他的“一贯正确”,一旦认错,就会造成合法性的丧失。而在另一方面,人不是神,不可能不犯错误,此时撒谎就成了必不可少的办法。

造神中完全否定任何超自然的存在另一个办法,就是伪造历史。举毛泽东为例,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狼奔豕突,四处逃窜。这一场失败大逃亡,在共产党的教科书中被宣传成了“北上抗日”。明明是在“九一八事变后”三个月,毛泽东就在井冈山成立了分裂国家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到了西安事变的时候,却成了“逼蒋抗日”的英雄。这种对历史的伪造给毛泽东套上了“民族英雄”的光环。

庐山会议上彭德怀挑战毛泽东左倾冒进和浮夸。这种对共产党领袖的挑战一旦成功,“造神运动”就会失败,如前所述,会直接挑战中共的执政合法性问题。因此,毛周等人在发动对彭德怀的批判后,更加失去理智的宣传“跃进”,直接导致了从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那一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饥荒。

中共不但通过文字,还动用戏剧、电影、歌曲、音乐等形式造神,用语录歌、忠字舞造神、用“早请示、晚汇报”造神,用敲锣打鼓欢迎“最高指示”造神。时至今日,

到文革全民运动中对流氓行为和语言的鼓励,再到八十年代以后引进上海滩之类流氓企业家影视作品作为样板,流氓居然堂而皇之成为了大家可以观摩效仿的对象。

在目前的社会中,信仰缺失,理想破灭,权力、金钱成为人们唯一的追逐目标和兴奋点。人们受进化论学说影响,争当欺压别人的强者,认为成功需要“匪气”。一般人没有随便打人的权力,骂脏话就可以起到让弱者畏惧、给自己壮胆的作用,“我是流氓我怕谁?”正是脏话背后天不怕地不怕心态的真实写照。

党文化使人举止行为低下

如果你直接对一位当代的中国人讲,你行为低下,很可能十个有九个觉得你有问题,自己的行为非常正常,哪来的低下?

2006年9月,中国国家旅游局在其官方网站公布了公众反映比较普遍的大陆游客国内国外旅游的不文明行为。

中国公民出国(境)旅游常见不文明行为:

- 1、随处抛丢垃圾、废弃物,随地吐痰、擤鼻涕、吐口香糖,上厕所不冲水,不讲卫生留脏迹;
- 2、无视禁烟标志想吸就吸,污染公共空间,危害他人健康;
- 3、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时争抢拥挤,购物、参观时插队加塞,排队等候时跨越黄线;
- 4、在车船、飞机、餐厅、宾馆、景点等公共场所高声接打电话、呼朋唤友、猜拳行令、扎堆吵闹;
- 5、在教堂、寺庙等宗教场所嬉戏、玩笑,不尊重当地居民风俗;
- 6、大庭广众之下脱去鞋袜、赤膊袒胸,把裤腿卷到膝盖以上、翘“二郎腿”,酒足饭饱后毫不掩饰地剔牙,卧室以外穿睡衣或衣冠不整,有碍观瞻。
- 7、说话脏字连篇,举止粗鲁专横,遇到纠纷或不顺心的事大发脾气,恶语相向,缺乏基本社交修养;
- 8、在不折扣的店铺讨价还价,强行拉外国人拍照、合影;
- 9、涉足色情场所、参加赌博活动;
- 10、不消费却长时间占据消费区域,吃自助餐时多拿浪费,离开宾馆饭店时带走非赠品,享受服务后不付小费,贪占小便宜。

国内的常见不文明行为,和这十条大同小异,但多了一些内容。比如,在景观文物、服务设施上乱刻乱划,踩踏禁行绿地,攀爬摘折花木;不听劝阻喂食、投打动物,危害动物安全等。一般旅游的人算是比较有钱的,社会地位和受教育程度也比较高,这些人尚且如此,一般生活在中国社会里的人就更不能幸免于这些低下行为。

全世界其他地方人也这样吗?其实不然。巴黎圣母院“请保持安静”这句话只写给中国人看,去过巴黎圣母院的中国人都会看到这句中文告示。在巴黎,公共场合有中文的地方并不多,而其他国家包括法国的游客并没有这种“礼遇”。泰国皇宫洗手间里有醒目的中文告示,“请便后冲水”。美国珍珠港的垃圾桶都有中文提示,“垃圾桶在此”。这种仅以简体中文标出的警示牌,也在中国人出境旅游的主要目的地——法国、德国、日本、泰国、新加坡等国频频出现。

中国人以前这样吗?中国叫礼仪之邦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了。中国的“礼乐射御书数”传统六艺中,“礼”字第一,充分说明了中国人重视礼仪的传统。《论语》上有一则故事,孔子警告儿子孔鲤说:“不学礼,无以立。”意思是:如果不学礼的话,是没有办法立足的。曾经家喻户晓的《三字经》中指出,做儿女的,从小时候起,就

应熟习在不同场合的各种礼节,学习礼节仪文之事。历史上一些著名的“家训”、“学规”中,都有大量的关于日常衣食住行、待人接物等方面的礼仪规范。人与人交往,如何称呼对方,彼此如何站立,如何迎送,等等,都有礼的规定。即使是吃饭,也应该在举手投足之际显示出自己的修养,谓之食礼。行为合于礼,是有修养的表现,反之则不能登大雅之堂。可以说,当时社会的主流是要求文明、修养、礼仪、行为高雅得体,如果想被社会接纳,就要修身养德而规范自己的行为。

唐宋以前,中华文化是优雅的代名词,中国是礼仪输出国。史载中国商人到东南亚去,被看作来自礼仪之邦的人上人,甚至免费食宿。日本和朝鲜也一直深受唐代文化的影响。现在的韩国和日本仍然继承了一些来自中国的礼仪规范,人们还比较重视使用表示敬意的雅语和举止。

中共的党文化里边有进化论的弱肉强食部分,鼓励人们互相倾轧,没有提倡对人个体的尊重的部分,宣扬粗鄙,在个人行为中,不考虑他人,随随便便,我行我素,怎么方便怎么来。

现在大陆民众对“性”的认识,更是“与时俱进”,“上升”到把“性”、“家庭”、“婚姻”分开对待,把“性”作为一种社会的娱乐活动,很多人还认为是进步。这种低下行为导致了社会伦理的混乱,把几千年来中国人的家庭观念都打破了。有人觉得外国人不是也很性开放吗?但是,在西方社会有宗教和道德、法律的约束在那里,事情不会太过离谱,现在连西方人到了大陆,都感慨大陆性之开放早已“胜于蓝”了。

心理学里有一个著名的现象,就是从众效应。讲的是,个人总是倾向于跟随大多数人的想法或态度,不知不觉地在认识和行为上和多数人保持一致,以证明他自己并不是孤立的,而是存在与一个群体之中。同样,在这样的粗鄙党文化占主导的社会里,把卫生习惯差、教养程度低的人作为行为模板,人们不效仿的话,自己都觉得怪怪的不合群。人们形成了习惯,不觉得自己的行为已经被党文化改变得低下了。

中共基于进化论自然选择、适者生存的思维方式,认为新的东西是经过筛选的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比旧的更好,古人都是落后的。因此,人们按中共意识形态政治正确的党文化为标准,不分青红皂白对传统思想、传统文化、传统风俗、传统习惯文明进行破坏,礼仪教养被作为封建主义批判,整洁文明被当作资本主义唾弃,延续了几千年的礼仪之邦的文明被摧毁了。

4、去掉党文化,人们已经不会讲正常人的话,不会用正常人的思维

说今天的中国人离开党文化,就不知道如何思维了,不会讲正常人的话了,有人觉得这话太“过分”,带有“侮辱”性,但是,事实就是这样,因为党文化的种种理论、话语系统和思维方式早已浸透人们思想的各个角落。

在中共五十多年的统治中,通过各种灌输手段造就了整个社会由党文化构成的环境,让人们耳濡目染。同时,在否定了传统文化和传统观念、批判掉儒释道之后,使中国人接受了无神论、唯物论、进化论和斗争思想,造成了中国人建立在党文化上的一整套思维方式和善恶标准。中共的逻辑成为大众的逻辑,中共的语言成为大众的语言,这种逻辑和语言反过来又强化了人们的思想。把党话变成了普通大众的日常词汇,进而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从根本上使得党的意志融入了人心。在人们说话时,习惯性地吧头脑中的党文化思维当作自己的思维。

那一套话语、行为和思维模式的内在变异含义,是由中共强加的,并不是一个正

灭的对象。而共产党消灭中国文化的一大武器,是历史唯物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将历史的发展解释为“阶级斗争”的结果和生产力及生产关系矛盾的结果,并“预言”无产阶级将在与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建立政权,而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自然就成了掌权者。按照这种阶级分析的方法,古代帝王和知识份子无论做过多少好事,因为代表了剥削阶级,所以都应该受到否定和批判;而暴动造反者,无论他们杀害了多少人,奸淫了多少妇女,因为他们是无产阶级或被压迫者,所以都受到鼓吹和赞扬;而历代为民请命的清官,却被中共认为缓和了“阶级矛盾”,延续了所谓地主阶级的统治,而受到比那些无恶不作的贪官更严厉的批判。

中国人相信“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以及“善恶有报”,认为富贵名利都是因前世今生的所作所为积下的因果。无论是富贵还是贫穷,“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因此并不存在共产党“阶级斗争”史观所灌输的“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包容的文化,儒释道三教并存,儒家学说中,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并存,道教中南方的正一教与北方的全真教并存,佛教的禅宗、净土、天台、华严等不同的宗派并存,乃至西方的基督教、天主教、东正教、犹太教、回教等也都和中国文化和睦相处。这都显示出中国人海纳百川,以和为贵的精神。在中国从未发生过不同宗教之间的战争,和宗教内部不同教派的战争。

这种包容思想与中共的斗争思想截然对立,因此是必须消灭的对象。

中共并非为“斗争”而斗争。这里至少有两个目的:人们在互相的斗争中失去信任,变成一盘散沙,便于中共控制;更重要的是,中共耍了一下赵高“指鹿为马”的权术。承认“指鹿为马”的赵高可放心重用;沉默不语的人显然良心未泯,赵高要加以排斥;反对者都被赵高杀掉。然而,赵高的“指鹿为马”只是宫廷权术,而中共的“指鹿为马”却成了强迫全民参与的“大众文化”。

如“土改”、“镇反”、“工商业改造”、“戏剧界的改制改人改戏”等诸多运动,都是一次次“指鹿为马”的检验。每个人都必须参加、必须表态。在非此即彼的二元世界中,不跟中共站在一起的就立即成为斗争对象。

道家崇尚“真”,佛家以修“善”为本,孔子主张“仁”与“信”。而共产党的历史就是“假、恶、斗”的历史。按照中共1987年通过的档案法第十九条规定,一般档案超过三十年即可解密,普通公民皆可查阅,然而中共至今仍不敢开放涉及抗日、内战、镇反、土改、大饥荒等历史档案、不敢公布毛、周与斯大林签订的中苏密约,无非是害怕用谎言掩盖的罪恶曝光而已。

唯物主义对于精神领域显得非常苍白无力。其中“美”就是一个例子。雨后的彩虹,夕阳下的晚景,在唯物主义中只能被分析成为电磁波的不同光谱;爱情,被归结为人类自身荷尔蒙的变化;人类的高贵情操,则被理解成琐碎庸俗的小恩小惠。

从本质上来说,任何的人性美好都是共产党统治的障碍,以至于中共发明了一个常含负面意义的词汇——“人性论”。党员需要以“党性”压过“人性”,对于普通人来说,“人性”也是革命不彻底的表现。

在中共的文艺宣传中,曾经高举“禁欲主义”的大旗,否定爱情、否定家庭。但最近十多年中共已经从“禁欲主义”进行了180度的大转弯,变成鼓励“纵欲主义”。这些看似与中共以前的做法互相背反的政策,却出自于同样的原因——过去让人禁欲的目的是为了让人效忠共产党,让党性高于家庭、高于人性;如今共产意识形态破灭,中共鼓励人沉迷于黄赌毒、一夜情、包二奶,则是为了沦丧人的道德,

则……这些都是解放军无往而不胜的原因。”

时至今日，中共还在吹嘘“三个代表”，声称这几十个字“形成了一个系统的科学……”是共产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中宣部部长称“必须下大力气使‘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入人心，成为广大干部群众的行动指南，成为我们各项工作的根本指针。”以至于在某农村墙壁上，都赫然出现大标语——“用‘三个代表’指导我们的屠宰工作”。

无论是“唯物主义”和对民主的讲述，都被置于共产党的另一大理论系统中，这就是辩证法。辩证法的功能，是如何把“白”说成是“黑”。因为“白”有不同的“白”，因此白有白白、灰白、深灰白、黑白等等不同的分别，所以一般人认为的“白”，大部分属于灰白和黑白，因此，相对于白白来说，大众认为的白实际上是黑的一种。“白”于是变成了“黑”，最后，白变成了比黑还要黑的黑。这种白马非马，灰白非白的游戏充斥在共产党的话语系统中，并且被大多数人潜移默化地接受。因此，跛足的市场经济被称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共的独裁专制被称为“社会主义民主”，专政成了“人民民主专政”，侵犯人权成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理论”。总之，在附加了前缀之后，便可以任意修改原词的定义。这类被“辩证”过的荒谬概念过去在中国大陆泛滥，今天仍然在继续发生。

3、否定传统文化

正如绪论中所描述的那样，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半神文化。神传文化反映在中华文化的诸多方面，也深深扎根在民间生活当中。在世俗的另一半中，中国人把社会伦理作为一种信仰，忠孝仁义，是确定道德高下品德高低的最重要标准。

在中国，不忠不孝不仁不义，足以使单个的人无法在社会中继续存在。诗经《周颂》有云：维天之命，于穆不已。上天的命令，永远是非常的严肃。在中国古代，神灵常以具名和不具名的形式，隐藏在“天”的后面，中国人坚信，道德和世俗生活的最终裁判者，无疑是“神”。

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后，中国民间遂逐渐坚信天堂地狱和轮回转世、善恶有报。这些观念和中国人对伦理的坚持形成一个共同的价值基础，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

中国文化中更为重要的部分，由中国传统知识份子承担。这一部分，以历史作为鉴往知来和预知盛衰兴替的基础。世界上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像中国人那样重视历史。从中华民族创造文字之初，记述历史就成了历代最重要的工作。造字的仓颉就是轩辕黄帝的史官。春秋乱世，齐国的伯、仲、叔、季四位太史中有三个被杀了头，只为了写下一句真话：“夏五月乙亥，崔杼弑其君光。”竹简写字十分不易，司马迁硬是在受了宫刑后，借着昏暗的油灯在竹简上写了五十多万字的《史记》。自汉代以降，“隔代修史”的传统使中国成为世界上唯一有着连续而准确的信史的国家。

历代修史之人都为当时之大儒，要求兼备“史学、史识、史才、史德”。记事之后常有“太史公曰”或者“臣光曰”之类的评论，这类评论体现了作者站在儒家观点上对一件事情的是非评断。因此，中国的史书不仅仅记录了真实的历史事件，也不仅仅是包括了当时的官制、天文、地理、水利、商业、兵法、音乐、科学等方面的百科全书式的著作，其中更包含了修史者所抱持的儒家道统。

这种儒家的历史观承载了厚重的中华传统文化，也是中共一开始就要立即消

常社会的表达方式，只有接受过党文化熏染的人才能够理解和解读。这种强行灌输而形成的全方位的遍及社会每个角落的党文化话语模式、行为和思维方式的现象，无论中国传统的古代社会，还是现代主流文明中，都从来没有出现过。因此，中共统治下的人们的言语、行为和思维方式，都与中国的传统社会、世界主流价值格格不入。中共领导人出访时的讲话与行为，也经常让人觉得怪怪的无法理解。

党文化的话语系统控制了人们的思想

党话是以“系统”的方式存在于当今中国人的生活中。与自然语言不同的是，党的一切建构了一个人为的“约定俗成”的政治话语体系，取代了正常社会自然形成的生活、思想和语言交际的内容，中国人就生活在党话编织的社会结构里。

中共建政以后，“人民”大概是使用最广泛的词语之一了：政府号称“人民政府”，军队叫作“人民军队”，钱币叫“人民币”，甚至走的马路也叫“人民路”，还有“人民电台”，“人民广场”、“人民公园”、“人民医院”、“人民银行”……和一切共产国家一样，一方面无处不在的被称为“人民”的各种设施、机构、团体暗示着每个人的一切利益、权利似乎都有了具体落实，不必自己再费心了；另一方面，“人民”被戴上了如此神圣的光环，以至于小老百姓都战战兢兢弄不清到底谁是人民。

有这么一个故事，上世纪 70 年代某人到“人民商场”购物，“人民营业员”态度粗暴，顾客质问：“你这是为人民服务么？”答曰：“为人民服务？你代表人民？”顾客竟一时结舌。

当然，同样的情形，也可以发生在和“人民政府”、“人民警察”打交道中……在中国，虽然“人民”没有法律上的定义，但在中共党文化里“人民”有着特殊的含义。在这里只有中共才可以代表“人民”，才有权划定谁是“人民”，谁不是；而后者就将成为“人民的敌人”，可以不经法律程序而剥夺其权利。他们通常被冠以另一个特定称呼：“一小撮”，尽管这“一小撮”有时候多达成百上千万人，比如 1957 年给中共提意见的“右派”、1999 年仍坚持修炼法轮功的人群等等。“人民”一词虽然不是中共造出来的，但在党文化中被赋予了特定的涵义，当人们习惯性的在各种场合使用着“人民”、“一小撮”等词语的时候，已经在无意识中认可了中共对于谁是或不是“人民”的随意划定，或按照中共的意图进行政治划分和站队。

类似这样渗透生活方方面面的党文化词句还很多。比如中共建政直到上世纪末，学生从学校毕业后，都要“分配工作”。“分配”一词就表明“党”具有支配权，所以很多人下意识中就觉得饭碗是中共“赐予”的，而不是自己通过努力获得的。特别是很多警察在追随中共迫害民众的时候振振有词：“共产党给我的饭碗，我就得听共产党的。”

党话系统是党的意识形态、党的意志、党的运作实施的载体和工具，中共利用一切国家手段和国家功能完成党语言的体系建立、规范和使用。所有标准话语产生的机构——舆论媒体都由官方占有，并配备中共独家特色的中宣部以及下属宣传系统，干部培训和组织生活系统，中央和各级党校等思想教育机构。历来报纸、文件、官方讲话、学校教材都是统一传播党语言的制度方式。多次政治运动生造出大量新词。各级组织带领群众使用并沉淀在日常生活中，形成党传统、党文化的基础。规范文艺、电影、广播、戏剧，树立党文人、党文化样板，推行党话语标准化。文字狱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的恐惧作用巨大而持久。在完成党话语建立过程后，中共又立法使之具有合法性。这一切都使得党话语系统成为中国人说话的主导。几乎每一个中国人，在需要的时候，都可以随口说出整段整段的极其标准的党八股话。

“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是真理”，这句话决不是仅仅具有修辞的意义。人们都讨厌党八股，可是从中共的文件、讲话、汇报、总结、报纸社论、大中小学教科书、新闻、电视、电影等等等等，被大量重复的恰恰是中共制造的那些党话，这些话并不因为人们讨厌它它就不发挥作用。恰恰相反，它们以语言符号的形式储存在人们的无意识深处，随时都会发生作用，左右人们的思想和行为。

有一个故事，说有一个厨师，家人深受共产党迫害，后移民到美国加州定居。在餐馆厨房剁肉时，伴着一刀一刀的节奏哼着小调，煞是来劲。不过，对共产党深恶痛绝的他，唱出的居然是“毛主席的书，我最爱读，千遍万遍下苦功夫”，别人给他指出，连他自己都哭笑不得。人们的思想中被灌输的太多的党文化的东西和太多党文化的话语了，成为了人们思维逻辑和讲话的自然部分。

中共建政之后，中共的老百姓就落入了中共政教合一的独裁统治的牢笼，但中共却宣传为“解放”；中共对中华民族正统文化的伤害、对中国人的迫害超过任何一个异族，但中共却称之为“新中国”；中共的瑞金“苏维埃”“革命政权”从事的其实是国家分裂活动，是投靠苏联的卖国政权；中共“长征”其实就是一场大逃亡；南泥湾“大生产运动”实际上是非法种鸦片的运动；中共的延安“整风运动”其实是一场骇人听闻的人间地狱式的精神迫害；饿死几千万人的“三年自然灾害”其实一场人祸；“文化大革命”其实是一场文化大破坏、全民大洗脑和政治大清洗；“改革开放”其实是暂时放松了专制高压，是中共不得已的救命招数……诸如此类，如果还原历史事件的真实面目的十分之一，就足以改变所有中共造出的那些词的骗人光环。但是，因为中共的灌输和话语垄断，人们一直沿用，如果去掉这些词，很多人真的会不知道怎样去描绘去思考那些历史事件，不知道该怎么说话了。

明明被共产党迫害了，一旦“平反”，就又对其感恩戴德；一提人权，就说是“搞政治”；西方有人一批评中共，就说是“反华势力”；海外华人抗议中共的暴行，就被认为是“不爱国”，是“抹黑”；听说了中共出卖大量领土，反而去给卖国的找台阶，觉得党这样做一定有我们不知道的“高瞻远瞩”（把他卖了还帮人数钱）；听中央电视台一年 365 天的灌输觉得很自然，收到几个揭露中共恶行的电话、邮件，或者几十分钟的真相插播，就认为是在“破坏社会秩序”；对于一个行凶的犯人，人们要追根究底，绳之以法，而面对共产党在历史上罄竹难书的罪恶，人们反而总是认为共产党善于犯错误，还会“有勇气改正错误”……人们自然流露的思维中，那些词语“平反”“搞政治”“反华势力”“不爱国”“抹黑”“高瞻远瞩”“破坏社会秩序”“有勇气改正错误”等等，都是中共高调宣传的词汇，却早已成为了人们逻辑思维的理论基础。

现代中国，人们的口头禅很多都是很有中共党文化的语句。比如“同志”，“贯彻”，“领导”，“号召”，“基本原则”，“基本路线”，“社会主义初级阶段”，“XXX 特色”，“将 XXX 进行到底”，“跟共产党作对，没有好下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爹亲娘亲不如共产党亲”，“听共产党的话，跟共产党走”，“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团结就是力量”，“红星照我去战斗”，“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走在社会主义大道上”，“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形势一片大好”……去掉这些党文化话语，很多人可能觉得日常基本表达都会很吃力。党文化语言对中国人的控制之深，远远超出一般人的想像。

所谓的新词也是在党文化的思想中制造出来的

党话不是停止不变的。人们形成的党文化思维就像是加工厂，机器和流程都是

历次政治斗争中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做法彻底颠覆了普世道德。“道德多少钱一斤？”此乃党文化教育出来的“唯物主义者”典型的思维逻辑。

唯物主义造成了对生命的漠视。由于不承认人的精神要素，只承认肉体要素，恩格斯认为生命不过是蛋白质的存在形式。一个人死了，不过是一堆蛋白质改变了存在形式而已，没什么大不了的，这是共产党杀人的重要理论基础。

唯物主义直接否定了良知的作用。信神的人做了恶后都会良知难安，恐惧于神明监察、因果报应。而无神论者行恶却没有任何顾忌，正如毛泽东所说“彻底的唯物论者，是无所畏惧的”。如果没有了神，能够惩罚人的只有人间的暴力，特别是当一个人或组织本身就是人间暴力的掌握者，那么还有什么恶事是不敢做的呢？

而更重要的，是善恶道德等价值评判，从超越人类世俗存在的神和天意那里被剥夺，而完全成为世俗权力的一部分，再随着世俗权力的堕落和声名扫地，最后完成了以个人利益来判断善恶好坏的价值观转变。

党文化认为“物质决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因此经济发展必将导致政治文明、民主完善、法制健全、道德升华、文化繁荣，这种彻底的党文化“唯物主义”思维方式，已经被我们亲眼所见的与几十年改革开放伴生的政治腐败、专制横行、道德沦丧、文化凋零、司法系统沦为专制帮凶等现象彻底证伪。

中共用经济发展为自己辩护的时候常常陷于一种两难的困境中。当你指责中国民主与法制建设缺位，信仰、言论、结社等基本自由被国家暴力残酷而无耻地剥夺时，中共会以经济不发达、教育水平低、人民素质差为理由。

果真如此吗？

“我们再不应该以为，只要船坚炮利就能算是强大的国家。我们必须看出，民主本身就是一个力量。一切财富，一切国防的武器，只有和民主结合在一起，才能算是真正强大的力量。”“他们以为中国实现民主政治，不是今天的事，而是若干年以后的事，他们希望中国人民知识与教育程度提高到欧美资产阶级民主国家那样，再来实现民主政治……正是在民主制度之下更容易教育和训练民众。”

这两段切中时弊的文字，出自中共自己的机关报——《新华日报》，只不过印刷时间分别是 1944 年 3 月 5 日和 1939 年 2 月 25 日，针对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战时特别状态所作的批判。

可见，中共在夺取政权之前，从来不认为民众的经济状况和教育程度是实现民主的障碍，而现在的经济状况和教育程度总要比抗日战争或国共内战期间好得多，怎么反而成为障碍了呢？

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高喊“唯物”的中共，本身就并不“唯物”。讲究“物质决定意识”的中共，从来都把作为意识形态的宣传部门看得比农业部门要重要得多。在唯物主义的旗帜下，中共却一再犯着“唯意志论”的错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一天等于二十年”、“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等等。彭德怀因认为这些口号“浮夸”、“小资产阶级狂热”，以及不符合经济法则和科学规律，被毛泽东将其打为“反党集团”，并在全中国开始“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最后直接导致了三千多万人饿死的大饥荒，这实乃中共“唯心”的结果。

1960 年林彪提出：“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这是我军政治思想工作的方向，也是整个军队建设的方向。”“四个第一”的提法将思想置于物质之上，毫无疑问属于“唯心主义”，毛却夸奖说“谁说中国人没有创造？四个第一好，这是个创造。”1964 年 2 月 1 日《人民日报》社论“全国都要学习解放军”中大力提倡“解放军大抓政治思想工作，坚持‘四个第一’的原

2、宣传唯物论

无神论作为党文化的基础,摧毁了人们对神的正信,而让中共能够为所欲为。但是,中共还要走得更远。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作为共产党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党文化的另一块基石,被唯物论洗脑的中国民众看到的世界和历史同过去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论不过是很有争议的一个哲学流派。出版商爱德华·伯恩施坦曾把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手稿交给爱因斯坦,请他发表意见,看这部手稿是否应该付印。爱因斯坦看过后对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不以为然,认为“要是这部手稿出自一位并非作为一个历史人物而引人注意的作者,那么我就不会建议把它付印。”“因为不论从当代物理学的观点来看,还是从物理学史方面来说,这部手稿的内容都没有特殊的趣味。”但是,共产党却把马列主义当作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成为教科书里的必修内容,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马克思辩证唯物论中的唯物论和传统的唯物论还不是一回事,他认为传统唯物论不过是一种唯心的哲学,马克思的唯物论认为,为了用来改造世界,哲学应该停止纸上谈兵式地认识世界,哲学必须参加阶级斗争。到此,这个唯物论已经不单单是一种哲学,它不但预测了所谓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的历史进程,还认为达到共产主义必须靠暴力革命。

共产主义理论在出现的时候是充满了理想主义色彩的,要在人间建立“天堂”的理想吸引了无数热血沸腾的人加入其中,其结果是红祸流布十几个国家,十几亿人被奴役,上亿人口死于非命。仅用暴力维系的政权不会长久,共产党在“坏事做绝”的同时还要“好话说尽”,即需要用谎言为血腥的杀戮提供某种“合理性”的解释。这种谎言经过精密的共产主义理论包装,显得如此美妙和貌似完备,它不仅为杀戮辩护,还必须对政治、经济、军事、法律、科学、教育、社会管理、医疗卫生,乃至住房、养老和家庭生活等方方面面都提出一套指导和控制的理论,对于历史也要提出它的一套解释。另一方面,中共要对社会各个行业、各个微细胞进行全面控制。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正好为共产党的暴力革命和斗争哲学等等具体行为提供了理论指导。

党文化的“唯物主义”最初表现为“暴力崇拜主义”。因此我们看到——

马克思:“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

恩格斯:“机关枪、大炮是最有权威的东西。”

列宁:“暴力比100次辩论更有效。”“国家是阶级压迫的工具。”

毛泽东:“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林彪:“政权就是镇压之权,有了政权,百万富翁,亿万富翁,一夜之间可以打倒。”

现如今,党文化的“唯物主义”进一步派生出“物质崇拜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最终引向“唯利主义”,它引导人走向真正的道德堕落。当代中国众多的人,包括许多“知识份子”在内,匍匐于中共的暴力镇压和金钱收买政策之下,成了彻底的“唯利主义”者。

迷信暴力和金钱的中共不理解信仰的力量,它对镇压的信心也来自于它的“唯物主义”。

唯物主义否定道德的作用,认为没有超越于人类之上的普世道德。所谓道德都是从属于某一个阶级的,而在中国,道德的定义者和阐述者自然都是共产党。中共在

现成的,来的新信息和社会现象经过党文化思维的加工就成了新的党话。它们属于党的系统,具有党要的内涵,但是又因为不是赤裸裸的党的意识形态内的词汇,所以更不好分辨。

当今网络上流行一个字母缩写“FB”,这两个字母原本是腐败的拼音字头,一般代表吃饭聚聚,也有些人就直截了当说,“今天去腐败一下”。这个词诞生于民间,本身不是中共造出来的,但它是在党文化思想的影响下造出来的。它把本来属于负面的腐败行为正规化,弱化了社会对腐败行为的道德压力,实际上也认可了腐败现象无处不在,暗示中共的腐败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这好比人们若习惯把日常的正常行为称做偷窃,则真正的偷窃者就不会再感到自己的行为可耻。

“弱势群体”一词,也是产生于民间,随着频繁使用,2002年开始在中共正式文件中也出现了。“弱势”的概念源于党文化适者生存的邪说,暗示这个群体是不适应社会体制而被淘汰的。这从根本上否定了中共本身的独裁制度造成的问题。以中国最大的“弱势群体”——农民为例,中国农民在政治和经济上长期地位低下,这完全是中共的歧视政策造成的。这种歧视可以和恶名昭著的前南非种族政策相比。这里引一段中共四十年前编写的小学地理课本对南非的概况描述,读者不妨对比一下中国农民和非洲黑人的境况:“南非联邦政府先后颁布了‘通行证法’、‘种族隔离法’、‘奴役法’等七十多种种族歧视和压迫的法令,每一个法令就是一道枷锁,非洲人的权利和自由被剥夺干净。拿‘通行证法’来说,这项法令规定年满十六岁的非洲人必须携带‘身份证’‘迁移证’‘寻职证’‘纳税收据’‘居住证’等二十多种,以备警察检查。如果证件不全或者忘记携带,就要作为‘无业游民’遭到逮捕。根据南非联邦警察局的报告,仅在1958年,就有将近六十万的非洲人由于违反‘通行证法’和‘检查法’而被逮捕。”但在党文化的洗脑下,清醒认识到中共的歧视政策并对此进行合法抗争的人并不多。

这些年很多有代表性的新词,比如“中国特色”、“四个现代化”、“初级阶段”、“小康社会”、“下岗”、“待业”、“非公有制经济”、“思想道德建设”、“扶贫”、“三讲”、“三个代表”、“以德治国”、“与时俱进”、“和谐社会”、“不健康内容”、“有害信息”、“和平崛起”、“崇尚科学”、“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和谐社会”、“提高执政能力”等等。这些新词也都是党文化的产物,被中共赋予了特定的内涵,用这些词语来为维护中共的统治,信息有没有害不是对人民而言,而是对中共有没有“危害”,高唱“崛起”是给人们弄一个民族主义的画饼,让人们忘掉社会的危机而去拥护中共。中共继“三个代表”之后,又搞了“八荣八耻”,其实,里面的每一条内容都是在党文化的范围中讲的:什么是封建迷信,什么是尊重科学?什么是爱国主义?完全是中共党文化的定义。符合共产党的就是“尊重科学”,拥护共产党的就是“爱国”的主义。

党文化的斗争意识成为人们的生活习惯

传统中国人的思维里,儒家讲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佛家讲与人为善,道家讲顺其自然。然而今天的大多数中国人,却在相当程度上认同中共把中华五千年辉煌的文明历史说成是阶级之间争权夺利的斗争历史。在今天的许多中国人眼里,甚至在很多知识份子看来,中国的煌煌二十四史,只不过是一部充满勾心斗角,尔虞我诈、权势倾轧等等厚黑诡谋的争斗史。中国人都相信读史可以使人明志、可以明理、可以增进智慧,可是如果中国历史真的如中共描绘的是充满奸诈、一片黑暗,人们又何从明志、明理?这样一个黑暗愚昧的民族又怎么可能曾经创造出辉煌灿烂的古代

文明？

人所看到的外部世界,其实恰恰是自己内心的世界的映射,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从党文化的斗争意识“武装”大脑的人,看到的中国历史自然也就是争斗与厮杀,而看不到唐尧禅让的美德、大禹治水之无私、将相和之宽容大度、看不到屈原的刚直不阿,也看不到苏武的不屈气节、文天祥的一片丹心、岳飞的精忠报国。

今天的中共虽然不再“以阶级斗争为纲”,可是人们的思想仍然受“阶级分析”的影响,“怀疑一切”、“深挖思想动机”,迄今仍然是许多人判断事物时的第一反应:分析中共六四镇压学生,因为学生领袖的动机不纯,所以他们应当负担一切责任,开枪杀人的中共反倒没有什么罪责了;海外有人揭露中共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罪恶,其动机一定是为了“抹黑中国”,中共的罪恶是否属实反倒不重要了;农民工辛苦一年却薪水被骗,不得已采用自焚、跳楼等极端方式讨薪,其动机是为了“作秀”,所以要立法惩治,而拖欠薪水的当事人和造成惨剧的社会制度反倒没有法律责任了;中共发动“大跃进”活活饿死四千万中国百姓,因为其动机据说是为了“赶英超美”,所以中共的罪行反倒是可原谅的了。

中国人的思维受党文化影响,受党文化支撑,其中唯物辩证法讲阶级斗争,进化论讲弱肉强食,简单的把中国历史看成血雨腥风的斗争史,这些都给中国人加深了斗的意识。中共反反复复种植暴力为核心的共产文化,把几代人造就成满怀仇恨、向往冲杀的“无产阶级战士”、“社会主义新人”、“党的驯服工具”。中国人的斗已经在思维里起主导作用,中国人喜欢内斗已经成为我们公认的事实。互相拆台,争斗得你死我活,中国人的生活规则变成了麻将规则——防住上家,看住下家,自己受不了,也不让别人和。有人有了成就,往往被排挤、诋毁,别人不是见贤思齐,而是妒火中烧。于是台上手握手,台下使绊子。斗还不光为了利益,而是以摧毁对方人格为目标,使用的手段也集中国人不好的智慧之大成,无所不用其极,不理睬任何规则。

这种党文化的非正常思维在解决事情时,往往第一念头就是整人、斗人、治人,把人家压服,气势上胜过对方,掌握“主动权”,强制对方按自己的意愿行事。体现在言语上就是语言中带有斗的意识,已经超越正常人的范畴,整个的语言系统的主导因素就是斗。语气带有质问,反问,挑衅的意味,说出的话刺人。如果说不通,往往胡搅蛮缠,不讲道理,无理辩三分。

有人做过一个小测验,问来自台湾和大陆的学生,如果到一间教室里觉得很热,要打开窗户的时候会怎么说。来自台湾的学生多倾向于:“太热了,我把窗子打开,你介意吗?”而来自大陆的学生则倾向于说:“这么热,怎么还不开窗?”两句话的意思相似,但反诘句使对方陷入被动,似乎没开窗是不正常、不应该的。后面这句话的说话者其实往往是无心的。这是因为党文化的争斗之心已经深入人们的话语习惯,人们都已经习焉不察了。

很多人,包括不少知识份子,在谈论国家大事时那种胡搅蛮缠、自以为是、怀疑一切的态度,让人很难平和的沟通。说他怀疑一切吧,他偏偏不怀疑共产党;说共产党不好吧,他说哪个党没有干坏事;说中共为了自己的利益而阻挠全面的改革吧,他说那是国情所限;说共产党正在迫害人权吧,他说证据在哪里;你指出证据吧,他说凭什么相信你的证据;说他喜欢共产党吧,他却忙着把财富和孩子送出中共治下的中国;说他不喜欢言论自由吧,他却很爱利用西方的言论自由来为共产党的恶行辩护……有一个不是笑话的笑话:你列出很多共产党干的坏事,他一个一个地否定,胡搅蛮缠,总是为中共找理由,问你证据在哪里;说中共竟然割犯人喉管,他才不相信,反驳说塞块布就完啦,傻子才会费那么大劲去割喉管;你说网上都有,他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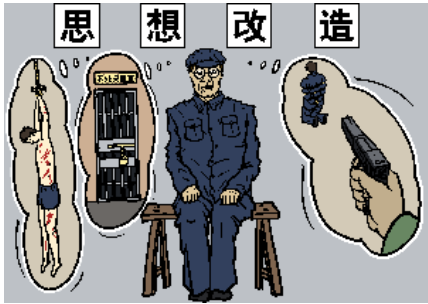
宣传无神论的最大障碍就是各种宗教信仰。因此,中共在夺取政权后就以镇压“反革命会道门”的名义向佛教、道教、基督教、天主教等各大信仰体系举起了屠刀;并派出特务打入宗教内部成立协会,一方面肆意歪曲宗教经典来迷惑信徒,另一方面宣布效忠于中共的领导,将中共的地位置于宗教信仰的神之上。

人生有三大问题:我是谁,从哪里来,向哪里去。传统信仰对此相应的解释分别是:神创论,前世今生与天国地狱。无神论的替代品:“神创论”变成了“从猿到人”、“劳动创造了人”;“前世今生”变成了“新旧社会两重天”;“天国地狱”变成了画饼充饥的“共产主义”。

在传统信仰中,“三尺头上有神灵”,他们以超常的能力监护着人。中共在摧毁人们的信仰后不断吹嘘自己“伟大光荣正确”,“带领我们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宗教中有救世主,中共则称从来就没有救世主,自己才是“人民的大救星”。

正统信仰具有稳定的特性。耶稣说“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中国人则讲“天不变,道亦不变”。因此有正教信仰的人会根据其经典来判断对错,这种是非标准是稳定的。而共产党却需要根据其政治需要,不断改变或推翻它刚刚还在宣传的是非标准。共产党的价值观最核心的一点是权力和利益,如果不在共产党权力控制之下,或者不符合其哪怕是临时的利益,都会被冠以“反动”而加以铲除。

如斯大林铲除俄国共产革命领袖之一的托洛斯基,毛泽东铲除同样是共产党领袖的刘少奇,并不是价值观的问题,而是由于权力归属的问题。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大量的“马克思主义小组”、“共产主义小组”等理论组织被宣布为反动组织,后来成为著名经济学家的杨小凯就是因为参加这样的理论小组,而被判刑十年。近年发生在中国的事情,也同样遵循这样的轨迹运行。2001年中共江西省委把一本减轻农民负担的中共中央文件集,宣布为反动刊物,下令全部收缴销毁。其原因十分简单,因为这些文件不利于江西省地方政府欺压农民政策的执行。



从消灭资本家到允许资本家入党,从“一大二公”到“包产到户”;从消灭私有制到大力发展私营经济;从“大鸣大放”到“不争论”;从“关键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永不翻案”的邓小平等毛一死就翻了案;“毛主席身边的人”被毛的卫士长逮捕成了阶下囚;“割资本主义尾巴”变成了“发家致富”,每一次改变都是原来的政策已经走入死胡同,再继续下去就要威胁到中共自身的安全了。

这恰如英国著名作家奥威尔所说:“极权主义国家的特点是,它虽然控制思想,它并不固定思想。它确立不容置疑的教条,但是又逐日修改。它需要教条,因为它需要它的臣民的绝对服从,但它不能避免变化,因为这是权力政治的需要。”

在共产党体系中,人性和神性的联系被彻底斩断,这些超越世俗权力的评判和裁判的功能被剥夺,原则和道德的认定和裁判成为世俗权力本身的一部分。共产主义者认为,非此不能建立真正牢固的共产党政权。但是,这样的价值观所支撑的人类行为,人性本质弱点所表现出来的所有恶劣部分,不可避免地逐渐被充分发挥和放大,最终演变成为独一无二的党文化体系。

导,同时按照共产党的价值观来判断精华和糟粕,先进和劣质,全面否定中国正統的传统文化,使民族失去文化的根,然后在“无神、唯物、没有文化根”的中国人民面前,宣传马恩列斯毛的伟大,大搞共产党的“人造神”。至此,伴随着在实践中用这套变异文化去改造亿万中国人民的思想的同时,反天、反地、反人性的党文化理论体系就确立起来了。

1、宣传无神论

数千年的人类历史形成了种类繁多的文化体系,和社会制度体系同时并存。在所有的体系当中,人类的终极价值观都以神灵或者天意的形式,超越世俗的行政权力而存在。国王和皇帝之上,必须有神或者天的认证、监护和指引,是为“君权神授”。在这样的体系中,神灵和天意作为俗世中价值观的终极认定和裁判者,对世俗最高权力拥有评判和裁判的功用,使得世俗最高权力无限膨胀的倾向受到限制。同样,在普通的世俗生活中,神灵和天也同样扮演了极为重要角色,发挥着规范人类行为,限制人类私欲膨胀的重要作用,也以超越世俗利益的形式存在。纵观历史,文化中含有“敬天”、“神权”的因素在世界各地都有体现,即使现代西方社会的民主制度中都随处可看到基督教文化中“神”的身影。

但是,共产党认为,传统的有神论对其执政合法性提出了挑战。大多数国家的教育体系中,对神的概念采取中立态度,即不承认也不否认神的存在。事实上,科学并没有否认神的存在,也没有证实无神论。作为共产党宣传无神论的所谓“科学”基础——进化论——迄今也不过是未经证实的一种假说,要不然,今天的进化论学家们为什么还一直在致力于寻找证据呢?把完全否定任何超自然存在的“无神论”这样一种学说上升到整个国家的思想体系高度,只有发生在共产党这种寻找执政合法性的国家。

于是,在共产党这里,没有了全知全能的造物主,而只有大分子随机碰撞产生的生命,再经数十亿年进化为人,人又依据丛林法则弱肉强食,经过阶级斗争而从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进化”到社会主义社会。这一套漏洞百出的说法尽管回答了为什么要共产党执政的问题,然而却与传统文化对社会、历史和政权的认识格格不入。

传统的正教都教化人修心向善,与天地自然和谐共处,而共产党却要与天、地、人斗争;信仰正教的人有着对天国世界永恒幸福的追求,不看重世间的荣耀和享受,甚至能够看破生死,而共产党却要靠镇压和杀戮来恐吓民众,用物欲来收买民众;正教给人树立的善恶标准更显出共产党的逆天而行。因此,共产党把信仰的存在视为其统治的最大威胁。

列宁的老师、俄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普列汉诺夫,在他 1918 年 4 月病危期间口授、苏联崩溃之后于 1999 年 11 月发表的《政治遗嘱》中,就曾明确指出:“列宁为了把一半俄国人赶进幸福的社会主义未来中去,能够杀光另一半俄国人。为了达到既定目标,他什么都干得出来,如果有必要,甚至可以同魔鬼结盟。”

在这里,超越世俗、权力和利益的原则和价值观消失了,剩下的只有赤裸裸的权力和利益,为了目标可以不择手段。八十年代初,中国曾经展开所谓“真理的讨论”,其争论要点之一就是,真理、人道主义,美好、善良等等,是否有阶级属性?在正統的共产党人眼中,只有符合共产党利益的,才是值得鼓吹和发挥的道德,否则都属于被打倒之列。

是振振有词,问你谁看见了?他说网上的东西你也相信?当你说出张志新的名字,他傻眼了,他才想起来行刑前割张志新的喉管却是共产党自己都高调承认的。

人们跳不出党文化的思维定势

党文化在生活中造就了一个“场”,只要顺着党文化去说话去思维就如同“顺水推舟”,“如鱼得水”,显得额外“自然”和“理直气壮”。相反,想要去澄清党文化的变异思维,反而显得如“逆水行舟”。越如此,人们就越迷恋于党文化,越难跳出党文化。

一个常见的现象就是,人们不但用对共产党的“爱”来为共产党找借口,同时,还用对共产党的“恨”来为共产党辩护——他可以用“经济的表面发展”来给中共涂脂抹粉,他也可以用“中共是强权,杀人不眨眼”来抵触揭露中共恶行的努力,认为“没有用”,从而继续维护中共的统治。他一方面说:“多党制是人们私下的共识,很多党员都意识到这个问题,中共会走到这一天的。”用正面期望来歌功中共。另一方面,针对人民组建民主党派,他会说“那是胡闹!共产党是强权,怎容得了你?”以此作为反面认识来维持中共的现状。对中共的爱可以在党文化中找到共鸣,对中共的恨可以在党文化中得到宣泄,于是,党文化就成为了一个封闭系统,完全可以满足人们对共产党的“爱恨情仇”,让人不想离开了。

举一个简单的问题,“共产党杀了八千万中国人,该不该清算?”如果按照正常的思维逻辑,杀人偿命,这是很容易回答的,当然应该被清算。可是,今天的很多中国人,他回答不出这个简单的问题。他会转弯抹角的把问题弄得很复杂。他会问,“你怎么知道有八千万?你亲眼看到饿死了四千万人吗?”你说中共自己内部都发表透露出这么大的死亡人数。假设你把材料给他看了,他还会说,“你这不是以牙还牙吗?你总得给人犯错误的机会吧?”你说杀人犯在法庭上能为自己开脱,要求一个犯错误的机会吗?他还会说,“总不能都是共产党的错吧?”“非洲还有国家也搞大屠杀呢!”“共产党现在变了,干吗揪住过去不放?”“共产党是什么?谁敢清算共产党?整死你!”你盯住他,就要他回答一个正常思维的人的简单答案:该还是不该。逼急了,他会告诉你,“跟共产党作对,有什么用处?”“你这个问题没有意义”。总而言之,共产党杀了多少人,都是没有必要追究的。中共由此可以胡作非为,逍遥法外。

我们看到,当要他去掉党文化来回答一个简单问题时,他就以“没有意义”来应付了。离开党文化,他真不知道如何思维了,共产党成了他的思维底线,任何“没有共产党”或“清算共产党”的思维对他来讲,既是恐怖的,也是不可想像的。他就此打住,是因为他不敢触及自己内心深处对中共的恐惧,更不敢正视自身的党文化因素。

再比如,人们常用这样的话来表达对中共政策的认同:“我要是邓小平,我六四也会开枪”,“我要是江泽民,我也要镇压法轮功”,“我要是共产党,我也会搞独裁专制”,等等。人们这么说是觉得很自然,感到很安全。“我要是某某某”,本来是用于衡量一件事情“该不该”,把本来不是自己的事情,设身处地地假设一下,用这种方式来重点突出“我”的态度。但是,当用于中共的时候,“我要是某某某”就变成了用“别人(共产党)该不该”来代替“我该不该”了,重点不是“我”的态度,而是去表达中共的态度,“我”被藏起来了,从而默认、怂恿中共的恶行。追问一下,他本人到底是什么态度?他会说,我的态度不重要,“没有意义”。就是说,要他回到正常思维时,他又觉得“没有意义”了。其实,人们应该向好人看齐,把自己比作历史

上的正义之士,看看在遇到中共迫害人民时,应该如何。就算胆小,不敢说“我要是高智晟律师,我也要如何帮助被中共迫害的人们维权”,也决不当非要把自己比作强奸犯、杀人犯或是独裁者啊,这不是个很可耻的比方么?

党文化对中国人思维的局限,也贯穿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以无神论为基础的党文化中,没有超阶级的普世价值,就如毛所说的,“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过去中共不承认自由、人权等普世价值的办法是给它们一概加上定语“资产阶级的”,所以是“虚伪的”,“无产阶级”不需要;今天则换上“中国的国情特殊”的借口加以拒绝。受党文化这种狭隘思维左右,特别是当整个社会都已陷入道德冷漠、出现诚信危机、当善恶有报被贬成“骗人的迷信”之时,很多人也不再相信良知、道义了。

中共通过长期赤裸裸的宣传或半遮半掩的暗示烘托其“中央领导人”的伟大,从昔日的宣传马恩列毛之“伟大”、歌功“红太阳”,到今日的吹捧“改革开放的设计师”、“继往开来的领路人”,造成很多中国人以宗教的虔诚信任“中央领导”。许多人都很清楚自己身边中共地方官员的腐化堕落,但这并不影响人们对“中央领导”的良好印象。尽管大家都知道今天中共的“中央领导”都是从地方官员一步步攀升上来的,但人们并不去琢磨为何贪腐的地方官员一旦进入“中央领导”阶层就会变得“英明”起来。所以坏事都是地方官员瞒着“中央”干的,重大问题只要“惊动了中央”,或“中央来人了”,就感到有希望解决了;面对中共几十年来造成关系国计民生的诸多社会问题,很多民众宁愿一厢情愿地相信“中央领导”总是有办法解决的,而不是如自由国家民众那样,对于国家和社会独立思考并提出自己的见解。中共镇压法轮功,很多人虽然不解中共为何对一个民间气功团体如此小题大做,但第一反应往往是,“中央这么做必定有它的道理”,用“党中央”的大脑代替自己思考,而不是理性地去思考“法轮功群众到底有没有违法”,“中共这么做到底合不合法”;中共的三峡工程上马后,有海外专家指出其可行性论证中有重大漏洞。有网友马上振振有词地质疑海外专家的水平,并说:“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真的从中央到地方不是傻瓜就是疯子,否则怎么会这样愚蠢的工程上马呢?”言外之意,“英明领袖”们不可能干傻事,不可能有私心,所以“愚民百姓”不必瞎操心。

正是因为人们跳不出党文化,才使得中共调动、控制人民的思想 and 行为变得易如反掌。中共就像快死的人一样,靠的就是不断的打强心针——面子工程,三峡大坝,神五神六,争办奥运等等。我们看到无数的国人跟着中共一起振奋,一起高呼。在这危机四伏的多事之秋,我们看不到人们的清醒和理性,看到的只是在盲目的喧闹中感受党文化酝酿出的扬眉吐气和得意忘形。中共大把烧钱搞面子工程,而不关心对老百姓生死攸关的事情,要的就是为摇摇欲坠的统治“涂脂抹粉”,欺骗人心。

大家都知道,教育和医疗的保障是一个国家生活水平的重要标志。教育是关系国计民生特别是民族未来的大事,不过,因为不是中共的利益所在,所以长期以来中共对教育的资本投入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例只有2%-4%不到,甚至低于世界上排名一百的非洲小国乌干达。中国的医疗制度更是造成老百姓看不起病。过去是广大的农民没有医疗保障,现在是许多城镇人口也有病看不起。为什么中国人的储蓄率居高不下,就是对未来没有安定感,有钱不敢花。西方媒体常问这样一个问题:中共一面为了当世界强国而到处招摇,另一方面对于真正让中国强大的基础问题却长期忽略。让他们感到困惑不解的是,中共领导到底想干什么呢?

天已经被战天斗地所取代;殊胜的修炼文化,今天被扣上了封建迷信的帽子;历朝历代的先人贤哲,被轻易地用阶级立场一脚踩翻在地;几千年来重德行善、仁义礼智信的美好价值,被当成了封建糟粕,成为讥笑嘲讽的对象。取而代之的是一套中共的反天、反地、反人性的邪恶党文化系统。在这里,道德原则的最高标准是党的权力和利益。中国人的一言一行,一思一念,无时无刻不被这个党文化左右着,人们深受其害而却难以察觉,更难以摆脱与归正。

本系列文章将分析中共是如何系统的替代传统文化,如何系统的进行思想改造,采用何种灌输手段,以及被改造思想后人们的种种表现。宣传中常见的党文化、党文化的话语系统、生活中的党文化以及习惯性的党文化思维这些遍及思想、语言以及行为上的具体表现也将在本文中详加论述。

落叶归根,中国人对自己根的寻求和渴望从未停止过。近几年海外流传着一句话,“要做中华儿女,不做马列子孙”,让无数海外游子燃烧起对自己民族的强烈的归属感。对党文化进行清醒的反思和抛弃,驱除马列毒瘤,解体党文化,回归中华民族正统文化,恢复民族的神韵,此其时也。

第一章 系统的替代传统文化

世界上所有的古文明文化,都是由神话开始的。印度幻化万物的湿婆之舞,雅典宙斯山上诸神的惊心动魄,耶和華维此一念创立世界,埃及太阳神及其万灵护法,以及中国盘古和女娲的伟大神迹,都是这些古老文明的启始来源。数千年以来,人类活动也都在神或者诸天的监护和启示下展开。

中国人称自己的家园为神州,是神的国度。中国人叫皇帝为“天子”,即天之子,天坛是皇帝祭祀天地之神的地方,面积比紫禁城还要大四倍。“观天之道,执天之行,尽矣。”这是《黄帝阴符经》开篇第一句话,或者说是中华民族有文字记载的第一句话——体察天道,顺天而行,所有道理尽在其中。中国人不但崇拜“天”,而且崇拜的还要是“天”中那个最老的,是谓“老天爷”,这是中国人对宇宙的敬仰。在中国人的记忆里,从盘古开天地,女娲造人,到神农尝百草,神扶持着人类走过了鸿蒙开辟时的艰苦岁月。中华远古半神文化留下的针灸、易经、八卦等文明,虽经几千年,今天的人类仍然只能惊叹而无法完全理解。从轩辕黄帝向神仙广成子问道,孔子向老子问道,再到佛法东传,儒释道为中国人奠定了重德行善的文化内涵,留下了正统的神传文化。显然,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人间规则之外还有通往“天”的部分,人们心里有对冥冥中超越世俗的世界的向往,中国人所说的谦卑的真正内涵是对神的敬畏。就连国家发生任何天灾人祸,都和“天子”自身的问题有关,皇帝需要自我反省,进行大赦或者是斋戒沐浴礼敬神天。

但是,自上个世纪共产主义祸乱人间,中共夺取政权后,为了维持共产统治,中共展开了全面摧毁中国神传文化的暴烈运动,系统的替代传统文化,建立起非自然的党文化体系。其替代的系统性体现在,中共用“无神论”斩断中国人几千年来对神的信仰,又把共产党的那一套“唯物论”当作认识世界和历史的基本方法强行灌输给人们,为暴力和斗争找到理论指



【解体党文化】绪论

在地球的东方,生活着我们中国人,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风俗各异,方言口音千差万别,是什么纽带把我们维系在一起,使中国人成为中国人呢?显然不仅仅是地域,更重要的是文化和传统。数千年里,中国人同敬天地,祭奠共同的祖先,使用同样的文字,学习一样的典籍……在西方人的眼里,那里曾经是礼仪之邦。

然而,还是在那块土地上,今天的中国人却和历史上任何时期都不同。从小学到大学,我们使用简化字编成的教科书,我们的必修课是两个德国人在一百多年前创立的如何摧毁世界的理论和一个俄国人应用这个理论的暴力实践,我们曾经被告知一切和历史传统有关的物品都叫做“四旧”而应该被烧毁或者砸烂,我们今天的语言、风俗、习惯、思维方式早已和自己的历史格格不入,和传统文化格格不入,和世界格格不入,我们不知道自己来自哪里要去往何方,我们成了一个失去了自我的民族。尽管我们的血脉仍在延续,但是华夏文明的薪火承传却已被截断。从文化上看,中国人已经是亡国奴,这并非危言耸听。

纵观欧洲、亚洲各国,在其现代化进程中从来没有如此彻底地丧失民族性。如果去除了高科技工业化因素,在日本人身上仍可以看到传统日本人的影子。就是按中国人观点看没有历史的美国人,和两百年前独立战争时也还有很多相似之处。中国人的变化不是工业化、现代化过程中不可避免的自然过程,而是强制性的人为的过程和结果。这个变化开始于1949年,一直持续至今。老一代被强制性的放弃传统,新一代则完全浸泡在这种无所不在的环境中成长,以为中国人、中国文化就是这样的。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大陆创造出来的文化怪胎——党文化。

文化一词本身,很难进行精确定义。现代的“文化”词义,大约在十九世纪之后才逐渐定型。1952年,美国的克罗伯和克拉克洪在《文化:概念和定义的批评考察》一书中给文化下了一个综合定义:“文化由外显的和内隐的思维和行为模式构成;这种行为模式通过象征符号而获致和传递;文化代表了人类群体的显著成就,包括他们在人造器物中的体现;文化的核心部分是传统的(即历史的获得和选择的)观念,尤其是他们所带来的价值;文化体系一方面可以看作活动的产物,另一方面则是进一步活动的决定因素。”这个定义,被大部分后来的学者所接受。

在这个定义中,文化包括了两个部分,一是内在的价值观,二是外显的和内隐的行为和思维模式。所谓党文化,指的正是由共产党价值观为基础所支撑而成的思维方式、话语系统及行为模式。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党文化可包括三种类型:第一种为共产党强行建构和灌输的文化;第二种为民众为了在中共暴力和谎言下生活和自保而产生的变异文化;第三种为古已有之的糟粕,而被中共重新进行理论包装,并推广普及和充分实践的文化。

在其他文化系统中,终极价值观都来源于一个超越世俗的最高权力存在。在古代社会中,担任这个角色的是神,在现代社会,则由神和法律共同担任。和所有传统文化不同,共产党的价值观,是一种不断变动和调整的动态系统,其核心简单地说就是权力和利益。在党文化下,我们祖先留下的半神文化,似乎离我们已经无限遥远,人们不相信那些美好的事物曾经存在过;祖祖辈辈教给我们对天地神明的敬畏,今



中共的改革是跛足改革,但是,从党文化的框框中,就变得格外理解中共,“欣赏”中共。说是因为有意识形态的阻力,中共的改革是“光干不说”,有了效果再上升到理论,从经济改革会一直推演到政治改革。好像有一天中国人民都全民选举选出了总统,有了效果,中共才正式宣布要搞民主一样。其实,中共没有原则,只要有利它的统治,什么都可以做。但是,任何有实质意义的政治体制改革必然导致中共的垮台,所以,中共在经济领域是“光干不说”,大家都去捞钱享乐,而在政治领域,中共却是“光说不干”。如果在网上搜索“政治体制改革”,你会发现在中共的媒体上这是一个热闹非凡的词:“全面推进经济政治体制改革”,“设立政治体制改革特区”,“全面正确把握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和根本”,“政治体制改革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改革破冰启航”,“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环境治理与政治体制改革”,“以政治体制改革推进反腐败斗争”,“政治体制改革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唯一出路”……但是,人们的一切言论都是在党文化的框框中转悠,就好比一栋大楼要塌了,人们想的还是如何装潢房间的事。跳出党文化,就能看清中共改革的底线,中共的改革不过是为了维护其统治的改革。就知道它不愿也不敢退出历史舞台,指望中共从良,无异缘木求鱼。

有人说领导人的更替,新一代上来,总会自由了吧?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如果没有人民的努力,独裁国家不会有真正的民主自由。

大家都注意到一个现象,就是现在年轻一代升任到领导岗位之后,许多人比他们的上一代更大胆。这里的大胆不是民主大胆,而是抓权、抓钱和搞乌七八糟的事更大胆。他们就是在共产党的那个体制中吃透了共产党的那一套钻营上去的,是带着共产党的原罪上去的,他们是没有理想的,心思都在个人的、家族的、集团的利益上,指望他们把权力交给人民,是不可能的,就算有个别人要做,他们面对的却是共产党整个的一部暴力机器和一损俱毁的利益集团。

看到中共现在的领导权交接比较平稳,有人又想了,中共进步了。其实,过去因为党的地位很稳固,权力斗争就表现为个人与个人之间赤裸裸的争斗,他们没有“党要完蛋了”的后顾之忧。而现在,中共的“亡党危机”迫在眉睫,维护党的统治本身就成为中共的“共识”,党的集团利益是个人利益的最佳保护伞。所以,权力斗争就演变为要“维护大局”下的帮派与帮派的“团伙”斗争。表面上好像平静了,实际上,黑箱斗争更激烈了,既要维护党不垮台,又要争权夺利,矛盾更复杂,危机更深重。就像一条街上,过去是两个恶徒老在街上打架,现在是拉帮结伙,转入地下,变成了黑帮组织,这比过去更可怕。中共现在的所谓领导权交接的“制度化”,就是黑箱制度化,团伙化,完全黑社会化。

结 语

几十年来中共改造人们思想的努力一直没有变过。激烈的批斗大会、枯燥的政治学习、喜闻乐见的文艺节目,都是中共灌输党文化的有效工具。五千年的文化底蕴,终究敌不过共产党的这种封闭式的舆论宣传。人们的思想真的被改造了。



我们常说中华民族是勤劳勇敢智慧的民族,创造了辉煌的历史文明。在现在所谓的“人口多,底子薄”的国情之下,更需要全民族的智慧和胆识,共襄国是。可是人民的智慧却被党文化所控制,把思考权推给了共产党,在重大国策面前只想党之所想,只做党之所做,智慧被共产党所限制。

共产党把秉承神传文化的炎黄子孙变成了不信神的民族,把敬畏天地神明的善良百姓教唆成天不怕地不怕的狂徒,道德败坏,什么坏事都敢做,满嘴谎言,行为低下,这样的民族如何在世界之林“崛起”?

党文化带给我们民族的灾难是深重的。共产党关心的是自己的个人和集团利益,为自己的恶行制造各种似是而非的借口,作为一种罪犯心理,这种情况有其必然性。但是不管它们自己怎么想,人民大众除了关心今天的生活,也同样关心国家和民族的长治久安。如果接受共产党以维护它们自己利益为根本目的的思维和逻辑而置民族的未来而不顾,那就非明智之举了。

“给中共时间”,是人们回避中共问题的常用借口。听起来好像人们有很多种选择,这次先给中共多一点时间试试看。其实,人民根本就没有选择的机会,这么说是给自己找个心理平衡。时间本身不可能改变中国,只有在这段时间内人民的努力才能真正改变中国。解体中共,解体党文化,根除阻碍中国自由发展的根本因素,让人民回归到正常的思维,民族才有重振的希望。

(上篇完)

目 录

【解体党文化】绪论..... 3

第一章 系统的替代传统文化..... 4

1、宣传无神论..... 5

2、宣传唯物论..... 7

3、否定传统文化..... 9

4、宣传马恩列毛的伟大..... 11

第二章 系统的思想改造..... 13

1、批判儒释道..... 14

2、批判传统观念..... 22

3、灌输斗争思想、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邪说..... 26

4、灌输进化论与现代科学..... 32

第三章 灌输手段..... 43

1、紧抓宣传机器推行党文化..... 44

2、强制人民读马恩列斯毛的书..... 53

3、利用邪党的文人歌功恶党..... 55

4、利用教科书灌输党文化..... 61

5、利用多种文艺形式灌输党文化..... 66

结语..... 73

第四章 被改造思想后人们的表现..... 75

1、用恶党的思想思考问题,用恶党教会的话语说话..... 76

2、不信神,造成人做事不计后果,什么坏事都敢做..... 86

3、天不怕地不怕,张嘴就是谎言,满嘴脏话,行为低下..... 91

4、去掉党文化,人们已经不会讲正常人的话,不会用正常人的思维..... 95

结 语..... 102

解体党文化

(上 篇)

大 纪 元

二零零六年十一月